



蔣 介 石
的
文 臣 武 將

王維禮 主編

蔣 介 石
的
文 臣 武 將



ISBN 957-9238-03-0

【蔣介石的文臣武將】

主 編 王維禮

出版者 巴比倫出版社

發行人 花逸文

社 址 台北市光復北路八十五巷七號五樓

電 話 (〇二)七六二二八九〇

郵政劃撥 一四九二五五三五／巴比倫出版社

法律顧問 王秋霜律師

美術設計 劉開工作室

電腦排版 率先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流通書報行銷有限公司

電 話 (〇二)七二三六九六三

印 刷 協昇印刷有限公司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四七五一號

定 價 新台幣二二〇元

本書經河南人民出版社授權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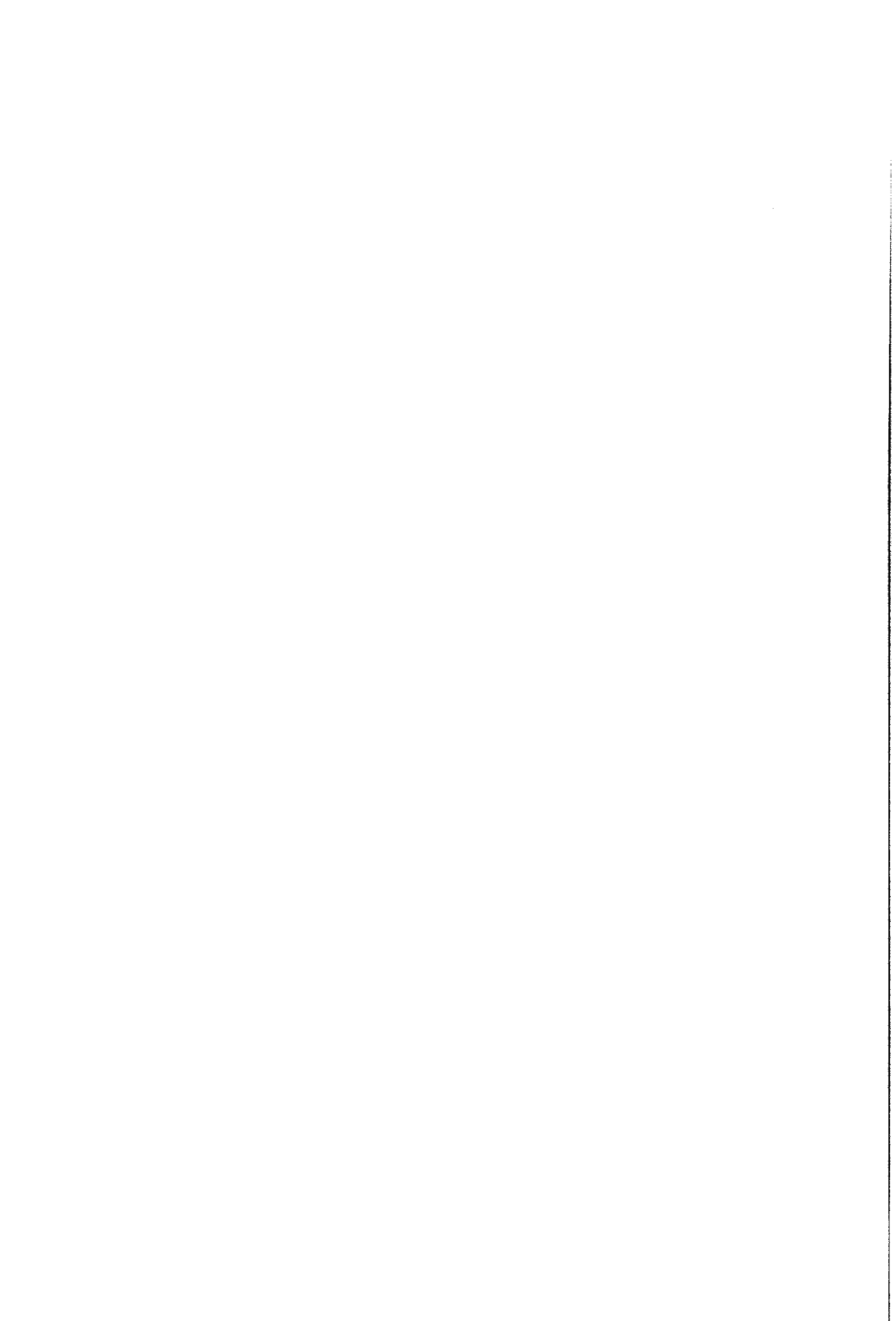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238-03-0

初版一刷・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

【蔣介石的文臣武將】

王維禮

主編



出版序

「蔣介石的文臣武將」這本書，介紹了輔佐蔣介石登上權力巔峰，最重要的十五個人物。

這些人物之中，有為蔣作理論宣傳的陳布雷、戴季陶；為其掌管帳房的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為蔣效命沙場的胡宗南、杜聿明等人。

其中還有，雖非嫡系但又屢次被蔣所利用的衛立煌；身分神秘的特務頭子戴笠；以及人稱「小委員長」的陳誠等等。

這些人物，以各種不同的理由，投入蔣氏門下，長期追隨蔣介石，幫助他建立了政權，統一了全國。

而隨著蔣氏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這些文臣武將，有的效忠到底，伴蔣終生；有的流浪異國，當了寓公；有的人則背叛蔣介石，投向中共。這本書對他們一生的經歷，最後的下場，有著詳盡的描寫。

蔣介石的歷史功過，尚無定論，了解他身邊人物的個性、思想作為，以及蔣介石對待這些近臣的手腕，非常有助於了解蔣介石成功與失敗的理由。

這本書原由東北師範大學教授王維禮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社取得版權，擇其
精要，在台灣出版。

本社

【目録】

出版序

目錄

- 【第一章】蔣介石的導師張靜江 009
- 【第二章】文膽陳布雷 027
- 【第三章】蔣記理論家戴季陶 047
- 【第四章】CC掌門人陳果夫陳立夫 067
- 【第五章】政學系首領張群 089
- 【第六章】黨國鐵老吳鐵城 103
- 【第七章】豪門權貴宋子文 119

【第八章】聚斂之臣孔祥熙 135

【第九章】軍界元老何應欽 149

【第十章】小委員長陳誠 165

【第十一章】黃埔驕子胡宗南 199

【第十二章】中原王湯恩伯 225

【第十三章】嫡系中的雜牌衛立煌 245

【第十四章】少壯將領杜聿明 271

【第十五章】蔣家鷹犬戴笠 293

【第一章】

蔣介石的導師張靜江

北伐出征前，蔣介石等在火車前攝影留念，其中有一位最爲引人注目：單獨端坐在前排藤椅上，骨瘦如柴，腿部癱瘓，他就是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後來被蔣介石尊爲「導師」的張靜江。他之所以享有這等「榮耀」，不僅是由於他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時那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在支持蔣介石的過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富翁到「聖人」

張靜江，譜名增澄，字靜江，又名人杰，別署飲光，晚年又號臥禪。浙江吳興縣南潯鎮人。生於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先世以經營絲、鹽起家，至其祖父時，已有價值白銀四十萬兩的資產，是南潯巨富之一。張靜江二十歲時因患骨痛症，致雙腳行走不便。同年，他的父親爲其捐得道員銜。一九〇二年，孫寶琦出任駐法國公使，張靜江以江蘇候補道隨赴巴

黎，任使館商務隨員。

張靜江抵達巴黎後，在使館中無事可做。他根據中國商品在歐洲市場上的行情，決意集股籌辦一個推銷中國貨物的公司。一九〇三年，他專程回國募款招股，卻無人願意冒險投資，最後由其父張定甫出資三十萬元，在巴黎開辦起獨家經營的通運公司，經營古玩古瓷，兼銷絲茶綢緞，其中尤以經銷古董獲利最豐。不久，他又將營業擴展至紐約和倫敦。

從甲午戰敗時起就不滿於清王朝腐敗無能的張靜江，受法國盛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很快成爲一名反清革命的倡導者。他以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宣講師」自居，常在旅歐華人中發表反清言論。由於他清使館隨員的身分，當時中國留歐學生中的反清革命者懷疑他口操激進言辭可能別有用心，多不敢與之交往。一次，張靜江陪同孫寶琦赴比利時參觀列日城博覽會，逢人必談革命，竟被留比學生中的革命黨人誤認爲奸細，幾乎遭到群毆，他一陣急走才得倖免。這段狂熱而孤獨地宣揚革命的經歷，帶有那一時代渴望革命又找不到具體道路、並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許多反清志士的共性，雖然他們在加劇舊秩序的崩潰和擴散革命情緒方面具有某種積極的作用，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很幼稚，革命激情大都流於無法持久的情緒表現和發洩。因而，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容易傾向具有真正理論素養和高尙人格的革命領袖。張靜江即歸屬於這一類型。所以，直到他遇到了孫中山，他

的革命熱忱才有了真正的現實基礎。

一九〇五年冬，張靜江乘輪船赴法，當得知孫中山恰與同船時，便立即前去拜訪。他非常誠懇地對孫中山說：「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爲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知，余當悉力以應。」並相約通電暗號，款項多少以A B C D E爲序：A爲一萬元，B爲二萬元，C爲三萬元，D爲四萬元，E爲五萬元。孫中山雖不敢深信這位萍水相逢的闊佬能有求必應，仍爲其雄風俠骨所動，視爲「奇人」。

一九〇六年底，張靜江與吳稚暉、李石曾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次年刊行《新世紀》週報、《新世紀叢書》和大型美術畫報《世界》，開中國人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先河。刊中所載文章廣泛介紹世界各國革命的壯舉，猛烈攻擊清朝封建專制制度的漏弊，適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張相呼應，使反清革命的聲浪更加高漲。

一九〇七年，東京同盟會本部經費枯竭，籌款無著，孫中山於窘迫之中偶然想起與張靜江邂逅之事，便對黃興談起，擬往巴黎發電一試。黃興聽說張靜江是清使館人員，頗懷疑慮。孫中山按地址拍出一電，電文只一個「C」字，數日後即有三萬法郎從巴黎匯到。一時間，東京同盟會員奔走相告，傳爲「天佑」，黨務頓呈活氣。次年三月，孫中山籌集

兩粵及雲南革命起義所需款項，又先後以A字和E字致電張靜江。兩次均於電發後數日如約匯到一萬和五萬法郎。事後，孫中山讓胡漢民代筆函謝張靜江，並詳述舉事經過及款項開支情況。張靜江覆信稱：「余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於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於作長信多多。」孫中山後來憶及此事時說：「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對其慷慨資助革命之舉，給予高度評價。

一九〇六年，張靜江於返國途中在新加坡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但沒有舉行入會儀式。次年七月，他在香港養病，同盟會香港分會負責人胡漢民、馮自由請他補行入會手續。但看到同盟會盟書中有「當天發誓」字樣，乃對胡、馮二人說：「余為無政府黨，不信有天，如許余不用『當天』二字，當可如命。」主盟人胡漢民和馮自由鑒於張靜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乃破例許之。

張靜江為革命連續支出巨款，使通運公司周轉不靈，以致停業。他一面設法維持經營，一面繼續盡其所能資助革命事業。一次，他接到孫中山催匯巨款的電報，即決定變賣通運公司下屬的茶店以籌款項，但尚未找到買主起義即已失敗。這座茶店後來終於賣出，

大部款項仍用於革命活動。一九〇九年，于右任得張靜江資助，發刊《民吁報》，因聲援朝鮮革命，被捕入獄。張靜江多方營救，出獄後又資助其東渡日本。是年，他為擺脫經濟困境，曾擬籌設通義銀行，但未能實現。所辦《新世紀》等刊物也因耗資巨大而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停刊。武昌起義後，張靜江回國，對陳其美、周淡游等人在蘇浙各地的舉義，給予大力支持。就在此時，他結識了陳其美手下的蔣介石。他在上海的寓所，成為革命黨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孫中山回國的電報即由此發出。時東北革命黨人蘭天蔚到上海尋求援助，張靜江即為之秘購大炮四門、步槍三千枝。南北對峙之時，同盟會員彭家珍在北京捨生炸良弼，也得到了他的經濟資助。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提請張靜江出任臨時政府財政部長。張靜江堅辭不就，準備約集兄弟數人，加股通運公司，專心致力於貿易。當時，南北尚未統一，他與褚民誼等以商人身分輸集款項十萬兩以資助臨時政府北伐。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陳其美就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率軍進攻北洋軍占據的江南製造局，張靜江親赴前線鼓勵士氣，並在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此役失敗後，在上海的革命黨人多秘密往來於張靜江家中，或由其資助生活，或得其饋贈旅費，出走日本。

張靜江除在經濟上傾囊接濟革命黨人之外，也親自參與和組織武裝活動。一九一三年

五月，駐節揚州的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受撫於袁世凱。為除掉袁世凱的這個幫凶，張靜江組織了一次成功的暗殺活動。他知道徐寶山嗜好古董，遂請四川革命黨人黃復生密造一枚炸彈，放入通運公司預製的古董箱內。並摹擬徐寶山派往上海尋購古董的親信艾某的筆跡致書徐寶山，詭稱找到一青銅器，為三代古物，先派人呈鑒，如中意然後議價。另派人把古董箱送到揚州徐寶山的副官處。徐寶山開箱觀看古董時被炸，當場斃命。時人均為除掉袁氏一爪牙而拍手稱快。

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任命張靜江為中華革命黨財政部長，他毅然受命。但因其住巴黎主持通運公司，加之宿疾難癒，不能赴日本就任，故由次長廖仲愷代理其事，並憑其信譽向各地華僑借款。一九一七年，他因腿部不能行動，由法國回上海就醫。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處於低潮，張靜江每日以奕棋書畫自娛。一九二〇年，孫中山為籌措革命經費，籌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由張靜江、戴季陶等具體主持。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靜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孫中山對這位以萬貫家財資助革命的富翁，始終抱以敬佩之情，譽之為「革命聖人」，並親題「丹心俠骨」四字相贈。他對張的健康也十分關懷。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

孫中山得悉張的病經電療有效，「甚爲喜慰」，致信希望他能堅持治療，「排除三十年舊疾，俾貴體恢復常態而再出爲國盡力」。一九二四年六月，張靜江的病情加劇，孫中山又特意寫信推荐新近由德國回國的醫生前去診治，對此，張靜江感念至深。一九二五年二月，他於上海收到孫中山在北京病危的急電，即刻啓程北上探視，在孫中山臨終前簽署遺囑和逝世時一直守護在身邊。在孫中山的有生之年，他始終是其忠實的追隨者，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在不同的革命時期中，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貢獻。

從「良師」到「重心」

孫中山逝世後，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的中山艦事件，是其公開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信號。遠在上海的張靜江聞訊後，「不辭道遠，刻日南行」，希望能在這場變故中，爲蔣介石「稍盡其獻替」。

張靜江此行受雙重因素的驅使：其一，他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中，存在著許多以地域爲標誌的派系集團，張靜江與蔣介石同屬上海諸多幫派中的一支。辛

亥革命中，蔣介石追隨陳其美在滬杭一帶活動，張靜江就以經濟上的資助與其結合在一起。隨後，他們共同參與了討袁之役，又一起加入了中華革命黨。陳其美被刺後，蔣介石更時時奔走於張靜江門下，兩人關係日臻密切。一九二〇年，蔣介石不安心在援閩粵軍中供職，跑到上海同張一同經營交易所。其間，孫中山、張靜江對其時常給以指教規勸。蔣介石感佩張靜江能「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對其常懷「敬憚之心」，並將其視為僅次於孫中山的「良師」。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發動叛亂，困孫中山於永豐艦。蔣介石奉召赴難之時，特意致書張靜江，以後事及兩個兒子相託，對其抱以最大的信賴和倚重。次年，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出使蘇俄考察，行前歸後都與張靜江進行商議。蔣介石性情驕躁，因負氣而擅離職守的事時有發生，張靜江總是促其盡快回到孫中山的身邊。孫中山逝世後，張靜江對蔣與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角逐極為關注，得悉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後，他唯恐蔣介石會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遂急馳廣州，自覺地扮演起蔣氏軍師的角色。

驅使他奔赴廣州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他與蔣介石階級立場的一致。張靜江身為資產階級的一員，推翻滿清封建統治是其誠心所願，但對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運動卻抱敵視態度。盡管早年他在為宣傳無政府主義所辦的《新世紀》周刊上，曾專闢《萬國革命之大風潮》欄目，介紹國際工人運動概況，甚至登載讚揚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匯集反清革命的力

量。及至他自己也進了「政府」，看到工農運動並非按自己的意願去發展，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葉公好龍的本相。他決不允許無產階級的壯大危及本階級和集團的利益。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與蔣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他到達廣州的當晚即趕到蔣介石的住地，鼓勵蔣「止其（共產黨）包辦之運動而約束之」，對蔣在中山艦事件中採取的陰謀手段大加讚賞，稱其為「天才」。

張靜江的到來，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蔣介石頓覺有了支撐，每日相與密議反共。按其預謀，蔣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使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大為下降，由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二中全会新設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職，原定蔣介石擔任，後由張靜江任代理主席。至此，蔣介石權勢大增，為日後實行軍事獨裁打下了基礎。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介石率師北伐，張靜江留守廣州，成為後方策劃反共陰謀的核心人物。當時任組織部代理部長的陳果夫在組織部內專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項都請張靜江決策。陳果夫曾計劃以自己的親信接管主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廣東省黨部，因感事關重大，問張是否應請示蔣介石。張靜江乃告以：「應該做的事，就負責做去，不必請示，本黨整個政策並沒有變更，領袖不能表示態度。如果去電，叫他如何答覆？我們的事

只要審慎處理，不要增加蔣先生的麻煩。」在其授意下，陳果夫更加肆無忌憚地實施其反共計劃，在「改組一廣東省、市黨部之後，又陸續向各地黨部選派反共分子。這些人出發前，張靜江總要親自接見，講些「救黨的責任放在諸位身上」之類的話，以示鼓勵。七月間，中山大學發生沈某組織法西斯組織殘害共產黨員的事件。當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如何處置沈某時，張靜江對其百般庇護。為培植從事黨務活動的爪牙，陳果夫與張靜江商議，由組織部創辦了黨政訓練所，但諸事並非盡其所願：一些共產黨員也進入訓練所學習。張、陳對此耿耿於懷。當訓練所發生風潮時，張靜江要市公安局長李章達派警鎮壓，因後者未予理睬，他竟請政府將其免職。同時借學校風潮之機，把共產黨員和參與風潮的學員悉數開除，使原有的一百名學員僅剩下五十餘名，且多是頑固的反共分子。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全國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長江流域，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武漢。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譚延闓等中央執監委員啓程北上，途經南昌時，被蔣介石截留。蔣無理提出遷都南昌的主張，挑起遷都之爭，旨在置國民政府於自己的肘腋之下。張靜江支持蔣介石，留在南昌，拒絕赴漢。此間，他與陳果夫指使爪牙占據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及許多縣黨部，大肆摧殘工農運動。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為擴大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張靜江致書一年前被蔣介石排擠出國的汪精衛，為蔣介石說項，勸其捐棄前嫌，盡快回國，

與蔣氏攜手反共。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進入上海，立即與中外勢力達成了交易。從四月二日起，蔣介石、張靜江、李濟深、李宗仁等連續召開秘密會議，商議反共「清黨」問題。二日，由吳稚暉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隨即由張靜江等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呈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對各地共產黨員實行「非常緊急處置」。四月九日，張靜江等又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出所謂《護黨救國通電》，為政變大造輿論。上海的陰謀準備就緒，四月十日，張靜江又乘專輪趕赴家鄉南潯，親自布置武裝「清黨」。四月十八日，在屠殺革命人民的腥風血雨中，蔣、張之流額手稱慶於南京，建立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蔣家王朝。

陳果夫在回顧這段反共歷史時說：「靜江先生代理中央黨務會議主席的時間雖不久，但是清黨的基礎由此奠立。」蔣介石對張靜江「北伐之際，居守中樞」，「倡言清黨」以及幫助自己奠定朝基的「功績」更是盛讚不已，稱之為「安厄斯仗」之人。其實，蔣介石也只有在危難時才真正需要他，張靜江也總是鼎力相助。在後來的雙十二事變中，蔣介石被扣於西安，南京的國民黨巨頭們各懷心曲，政壇一片混亂。陳果夫於情急之中同CC派骨幹商議，認為「中央必須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時以靜江先生為最宜」。遂派人將已很少過問政事的張靜江從上海接到南京，再次坐鎮「中樞」，支撐蔣派渡過危局。只是由

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迅速返回南京，才使張靜江失去了繼續爲蔣「獻替」的機會。

從「建設」到佛門

陳果夫對張靜江有過這樣的評價：「他能爲國家建設，能爲國家增加資本。會賺錢，又有會用錢的本領。在全國，在本黨，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中國會賺錢的不算少，而真正會用錢的卻不多。本黨同志當中，會替自己賺錢的大有人在，能爲國家爲黨賺錢的就更少了。至於肯爲國家爲黨用錢，又能夠在短期內替國家賺錢的，則惟靜江先生一人而已。」此話雖有過譽之嫌，卻也並非全無道理。

張靜江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耗在賺錢與用錢上。早年，他憑藉個人資本和經營中的機智，投資謀利，用於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晚年，他則依靠手中的權力，斂財於民間，用於蔣記「民國」的「建設」。

蔣氏政權建立後，爲鞏固其統治，在經濟上做出勵精圖治的姿態，張靜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二八年二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立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由張靜

江擔任委員長。據說，他是經過一番爭逐才獲得這個職位的。他直言不諱地宣稱：「總理說過的，革命就要建設，不建設，革命就要失敗。因此，我黨政軍都可不管，唯有建設，我是一定要幹的！」他顯然以經濟幹才自居，大有施展一番抱負的雄心。建設委員會初建時，職權範圍極廣，凡屬國營事業的設計與開創，都歸其統轄。在張靜江主持下，建設委員會改建了南京發電廠和常州戚墅堰發電廠；設立國際廣播電台一座、國內無線電台二十七處；興辦江南汽車公司，江南、淮南鐵路及淮南、饒頭山、宜洛、長興等煤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張靜江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期內集主要精力於發展全省的交通事業，並籌設杭州電廠、舉辦全省電話事業。一九二九年六月到十月間，張靜江以發展經濟建設和工農業生產爲名，在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並爲此在杭州市內鋪築柏油路。這次博覽會耗資巨萬，吸引了衆多的中外人士，可謂盛況空前。然而其效果，除了滿足人們觀光遊覽的雅興，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卻並不顯著。

張靜江以增加苛捐雜稅爲浙江建設經費的主要來源。他巧立各種名目，有所謂「建設特捐」、「建設附捐」、「水利費」、「土地測繪費」等，一律在原有田賦項下附加徵收。其中，以「建設特捐」一項最重，按田賦正稅每元附加一元四角，附稅超過了正稅。同時發行公債，並向上海、杭州、寧波、紹興等地銀錢業進行抵押借款。後來又增加一「積谷」項

目，按畝徵谷二升，商人積谷則在營業稅項下附徵。國民黨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徵營業稅時，聲明營業稅不得徵收任何附加，因此一再令張靜江停收，張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

人們對張靜江在浙江省的所作所為褒貶不一：有人痛恨其橫徵暴斂，稱之為「敗家之子」，有人則說他「用少數錢」，「求多數利」，是幾任省主席（國民黨時期）中最有作為的一個。自然，不能說他的「建設工作」毫無成績，但對人民的殘酷搜刮，張靜江難辭其咎。

張靜江的一些舉措引起蔣介石的不滿。蔣介石原擬以路礦權利向德國借款，從杭州建造浙贛鐵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軌。而張靜江則著眼於牟取高額利潤和早些還本，堅決主張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由他向銀錢業借款建造輕軌，認為這樣成本低，客貨運費收入短期內即可償清借款，於是執意動工而置蔣介石的主張於不顧。同時，他對浙江的公路建設也未能與蔣介石的「軍事計劃」相配合。蔣介石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贛邊境及浙東、浙南山區公路，而張靜江出於對實利的考慮，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紹興的一段公路，成為全省唯一有盈餘的公路。這都使蔣介石大為惱火。此間，張靜江同國民黨中的一些新貴之間的矛盾也在滋長。走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是張靜江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只要全力發

展資本，國民黨的統治即可鞏固，因而把戴季陶從理論方面歪曲孫中山的主義、陳果夫鼓吹的「合作運動」「二五減租運動」等把戲統統視爲多餘，致使陳果夫通過省黨部推行的「合作」和「二五減租」在浙江一籌莫展。此外，他在浙江省政府內也四面樹敵；他曾因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兼《民國日報》社長胡健中發表不利於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將其逮捕，結果遭到國民黨中央和行政院電斥；爲在省府內爭權奪利，他與原來的親信、省民政廳長朱家驊反目成仇，並藉故將其免職。張靜江的政治獨立性越來越難見容於心胸狹隘的蔣介石，加以在蔣氏王朝的權力再分配中，由於宋、孔家族地位的上升，張靜江的地位日趨下降，因而政治上的失意在劫難逃。一九二九年三月，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於蔣介石的授意，張靜江由中央執行委員改任中央監察委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蔣介石又命陳布雷、葉琢堂勸張靜江「自動」辭掉了浙江省主席的職務；張靜江雖仍居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時通過一項議案：「建設委員會應將屬於各部主管事業分別移交各部接管」，使建設委員會的職權大爲縮小。一九三一年十月，以宋子文爲首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後，建設委員會更是名存實亡，張靜江成了有職無權的擺設。然而，蔣介石卻不忘作虛情假意的表面文章，在張靜江死後的《褒揚令》中，稱其「出主浙江省政，兼長建設委員會，推輪肇始，筭路開疆，碩畫宏規，民生攸賴」，並以「蹕厲無

前，以致力建設」，讚揚他的這段「政績」。

蔣介石的疏遠，權力的喪失和癱瘓症的日益嚴重，使張靜江意態消沉，漸漸離開了政治舞台，而「狡兔死，走狗烹」的被遺棄感卻深深烙在他的心頭。每當看到年輕的僚屬和親友，他總是說：「不要做官，沒有做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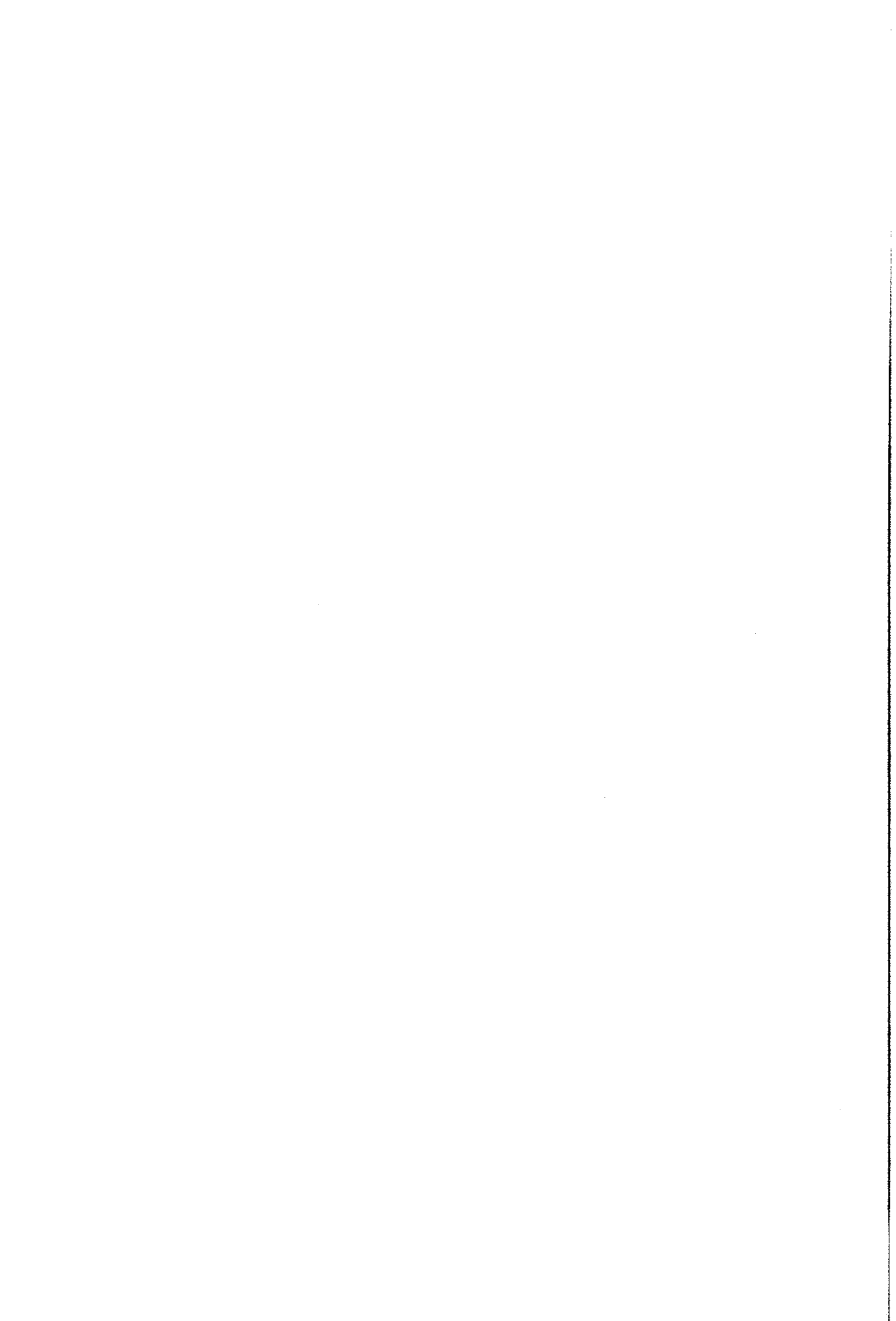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爆發。當得知日軍進攻上海、屠殺無辜的消息時，正舉箸向肉的張靜江投箸而起，決心從此戒腥茹素，以示對弱肉強食的侵略行徑的仇視與厭惡。一九三六年八月，印光法師抵上海，他專程登門拜訪，法師與其頻頻耳語，離別時張靜江突然大哭，自覺大徹大悟。這位早年無政府主義的狂熱信徒、浪跡歐美的闊佬、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花甲之年卻在空門之中找到了歸宿。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靜江攜眷由上海乘輪至香港。一九三八年一月建設委員會撤銷。三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舉行，張靜江因病不能出席，仍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八月，他離港赴歐，繼而前往美國，寓居於紐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張靜江的寓所召開了第一次「世界國際社團同盟」大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Groupments），旨在向各國政府呼籲和平。美國、法國以及南美各國國際社團代表都出席了會議。張靜江被推為大會主席，由李石曾代為主持會議。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主持了閉

幕儀式。這是張靜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享有在國際上從事公衆事業的榮耀。三年後，癱瘓使他雙目失明，只能以收聽廣播和吃齋念佛苦苦度殘生。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日，張靜江死於紐約。九月十六日，蔣介石在台北爲他主持追悼會，並親書「痛失導師」的輓詞以示悼念。

（王東方）



文膽陳布雷

從報人到文膽

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浙江慈溪人，生於一八九〇年農曆十一月十五日。他天資聰慧，自幼飽讀經書史籍，十一、十二歲開始學習英文和數學，十四歲應府試。知府喻兆蕃特別欣賞他，將其拔置第一。次年參加院試，以第五名錄取，補為慈溪縣學生。繼之，先後就讀於慈溪中學、寧波中學及浙江高等學堂。就學期間，他關心國事，喜瀏覽時事報刊，且涉獵廣泛，博聞強記，為日後的筆墨生涯打下了堅實的根底。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陳布雷步入報業，並為之終生痴迷。

一九一一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同年途經上海，寄寓在《天鐸報》。當時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因結婚請假，請陳布雷暫為代理，每天撰寫短評，有時也寫社論等。不久，陳布雷即受聘為正式撰述記者。時值武昌起義爆發，上海各報因懼怕清廷，多稱起義軍

爲「逆軍」，但《天鐸報》傾向起義軍，以「革命軍」稱呼起義者。陳布雷受命撰寫社論，連日揮毫潑墨，作長文《談鄂》十篇，按日刊發，爲張揚革命軍的正氣，傳播中國近代歷史上這一意義深遠的事件，寫下了精彩的一筆。此間，陳布雷攻讀多年的英文也首次發揮了作用。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孫中山由海外回國，當選爲臨時大總統，準備發布對外宣言。該文稿是英文，交王寵惠帶到上海發表。《天鐸報》總經理陳芷蘭得知此事，以陳布雷熟諳英語索來該稿。王寵惠初時信不過，讓陳布雷試譯了一段後，認爲不失原意，便全部由其譯出。這篇對外宣言就由《天鐸報》首先公諸於世。

陳布雷供職《天鐸報》期間，每以「布雷」作文章的署名，此二字原是在浙江高等學堂時同學們給他起的外號。因那時他面頰圓滿，同學們戲稱他爲「麵包孩兒」，由英文的麵包一詞 BREAD 音譯而得「布雷」，而他的原名反逐漸被冷落和遺忘了。陳布雷步入報界之後，同業又贈給他一個綽號——「香扇墜」，譏指其身體瘦弱。該「號」未得他本人的採用，故除同行之外鮮爲人知。此間，他還結交了一批革命黨人和報界名人。入《天鐸報》不久，他就前去請教當時主掌《民立報》的革命黨人宋教仁。宋詢問了他的學歷，問他何以到報界作事。陳布雷回答：「爲求學問長見聞而來，自信較入大學爲有益」。宋教仁稱他這種「以報館爲學校」的作法爲「海上奇聞」，自此兩人過從甚密。在《天鐸報》的短暫經歷，對

陳布雷職業的選擇和基本政治傾向的確定都有重要影響。

一九一二年，陳布雷應故鄉長老動議，回鄉執教於效實中學。雖在《天鐸報》供事僅數月，但他深沉的筆力、流暢的文字和報人不可缺少的氣魄，已爲人們所矚目，使「布雷」之文名大噪。他回鄉後，逢同盟會甬（寧波）支部成立，即加入爲會員。這時他對新聞事業仍抱濃厚興趣，邊教書邊任《申報》義務譯述記者。後來又任《四明日報》特約撰述。

一九二一年，他重返報界，任《商報》編輯主任。當時《商報》初創，陳布雷與潘公展等人通力合作，使《商報》銷行日廣，並以其社論短評的犀利風格著稱於上海報林。當時主辦《中華新報》的張季鸞讀了《商報》所刊的評論，稱其爲「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並著意尋訪，與陳結交。此時陳布雷多用「畏壘」作筆名。他才思敏捷，運筆如神。每當在編輯部撰寫他拿手的時評時，少不了要香烟、濃茶相伴，再啃上幾口饅頭，這三樣東西下了肚，一篇擲地有聲、令人折服的文章即告完成。

陳布雷辦報所持的政治立場與廣州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異曲同工，自然引起軍閥們的仇視。有人怕他直言不諱會招惹麻煩，勸他以曲筆自安，他卻回答說：「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不久，此話竟不幸而言中：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因《商報》新聞欄所刊評論激烈，被租界工部局控告，受審於會審公堂，幾遭監禁，後聘請了一位英國律師爲之辯護，才以罰

金了事。此事反倒提高了他的聲譽，其文名更是蜚聲文壇。孫中山對《商報》的作為，曾有過高度的評價：「□□等報，雖屬黨員辦的報紙，可是為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遠不及商報，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裏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

五卅慘案的槍聲，激起全中國人民的義憤，反帝怒濤席卷全國。《商報》每天發表評論，監督政府交涉，力主「以懲凶及保障為第一義」。在整個五卅運動中，陳布雷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奔走於各愛國團體之間，掌握第一手資料，故所發文章議論均能把握問題中心，切中要害，在群眾中產生較大的影響。他此時的文章，《向導周刊》曾多次給予轉載和評注。

隨著時局的變化，名振一時的《商報》很快趨於解體。在北伐軍的節節進逼之下，孫傳芳盤據的上海灘已是風雨飄搖。《商報》董事會的大亨們，多與孫傳芳關係深厚，因而對抨擊軍閥、同情國民革命的辦報立場日見不容，甚至橫加干涉，致使報社的許多重要成員辭職他就，《商報》只剩下一個勉強支撐的破敗殘局。在這種情況下，一向痛惡軍閥而對國民革命懷抱熱望的陳布雷「決意西行一遊，暫解處境之困」，遂於一九二六年底乘報館休刊之便，同潘公展共赴南昌，會晤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

陳布雷所以決意此行，除選擇政治道路的因素外，也歸之於蔣介石延攬名士姿態的吸引。早在一九二六年春，邵力子奉廣州國民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宴請上海報界名流，闡明革

命局勢。蔣介石委託邵力子將自己親筆簽名的小照轉贈陳布雷，以示對陳的青睞。北伐軍克服湖北後，陳布雷在北伐軍中的友人請他以記者身分前去視察，並轉達蔣介石約其相見之意。盛情之下的這次旅程不意竟成爲陳布雷一生道路的重大轉折點。

陳布雷和潘公展於農曆除夕抵達南昌。二人首次往見蔣介石時，蔣對其談了北伐局勢、人心趨向和如何收攬黨外人心等問題。兩天後，蔣再次邀他們談話，提出希望二人加入國民黨。陳布雷初本無意立即加入，隨後，就他對國民黨的綱領政策不盡明瞭之處提出問題，蔣介石一一作答，並力勸陳、潘二人「君等在精神上早爲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係，然國民救國爲人生天職，加入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就這樣，陳布雷由蔣介石和陳果夫作介紹人加入了國民黨，潘公展也同時加入。此後，蔣介石每三四天必招陳布雷晤談，有時還請陳爲他代擬文章。蔣在南昌發表的《告黃埔同學書》，就出自陳布雷的手筆。蔣介石問起陳布雷今後志願，陳說仍要回上海作記者，蔣介石只好表示同意。

陳布雷回到上海時，國民革命軍的旗幟已遍插十里洋場。四月，陳布雷應浙江省主席張靜江的邀請，就任浙江省府秘書長。不久，又赴南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數月之間，雖由一名記者而一躍爲政界官僚，但他仍無意久居官場。八月中旬，蔣介石迫於桂系的壓力辭職離開南京，他也回鄉小住，頗有「如釋重負」之感。十月，陳布雷應上海主辦《時事新報》的潘

公弼之約，任特約撰述。同年冬，蔣介石出遊日本，事先讓張群詢問陳布雷能否同行，得知陳不懂日語，始作罷論。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重新上台，邀陳布雷同返南京，並有意讓陳布雷出任總部秘書長，命陳立夫去徵求他的意見，但被拒絕。陳立夫回報蔣介石說：「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蔣介石亦無可如何。不久，他又提出讓陳布雷自己選擇所願意擔任的職務。中國知識分子在舊式政治結構中的議政傳統，已深深地根植於陳布雷的意識之中，當他面臨政治道路的扶擇時，必然將輔助明君的賢士作爲自己「兼善天下」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陳布雷對蔣介石表示：「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爲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爲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爲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蔣介石笑答：「何能以君爲私人秘書？」乃轉請陳擔任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的主筆。陳布雷堅辭不就。後得到蔣的允許回到上海，入《時事新報》爲總主筆，主持該報社論。

陳布雷雖是重操舊業，然而短暫的官場生涯對個人獨立精神的巨大腐蝕和同化能力已對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文辭依然流暢，而昔日的風骨卻在稀釋淡化。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般人認爲他此時「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爲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爲有效。」他頗爲自得地記錄了他在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宣傳上的先後轉變是如何地

與「中央」的旨意不謀而合：「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生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衆，宇內激昂，余首撰《暴日應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尙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爲「統一第一」之口號，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徹底圖強。」陳布雷文旨的這一「轉移」，正中蔣介石下懷，恰到好處地迎合了蔣介石既不想開罪日本帝國主義，又急於同北洋軍閥爭奪地盤、完成「統一」的迫切需要。陳布雷力持此論，同主張宣戰的其他報紙展開激烈的論戰。「其後國府譚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余所揭槩者合符……」顯然，此刻他爲民立言的報人宗旨已爲迎合蔣介石需要的政治意識所代替。他開始重蹈歷代名士的覆轍——隨著他們同權勢的結合，其布衣文士時期憑個人才華所鑄成的輝煌已逐漸逝去，獨立的人格也在不知不覺的自我奴化中分裂和消失了。

此時的報人陳布雷，已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由職業者，他隨時聽從蔣介石的召喚，帶著文房四寶件其往來於新都南京和剛剛克復的舊都北平之間，參與各種軍政大計的謀劃，代蔣撰寫各類重要文章，包括克復北平後的《祭告總理文》、《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國記者團》以及《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文，以一支生花妙筆，把蔣介石這個新獨裁者應付時局的各種意願變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時人對

陳布雷有蔣氏「文膽」之稱。他的這番作爲，自然深得蔣介石的嘉許。蔣在陳布雷死後爲其所作的祭文中，歷數這位以筆墨佐助自己奠定朝基的文人的「功績」：「夙以文雄，玄誠黜漓。……畏壘椽筆，逾百萬師。昔邁陽九，俾正厥辭。誕告多方，遂奠邦基。」然而這極文華之盛的頌詞對於一個以自殺來否定自己一生的人來說，是褒揚、是嘲諷亦或是褻瀆，則只有任陳氏於九泉之下獨自品味了。

幕後角色

感於蔣介石的知遇之恩，陳布雷以病弱之軀，「盡一己所能」，聽從「驅使」，因而深得信任，被蔣視爲「股肱心膂」，成爲其智囊中須臾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二十年間，蔣介石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幾無一不與陳布雷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陳布雷以他同蔣介石的親密關係、「無派無系」的超然形象以及舊文人潔身自好的「清譽」，成爲蔣介石統治集團中頗能協調各種複雜關係的特殊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應張靜江的兩次邀請，出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張靜江看中陳的理由是：「君性情溫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合黨政之間。」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蔣介石因教育部內兩

大派系爭鬥不止而自兼教育部長，但實際上又無暇親理部務，於是調陳布雷任教育部常務次長。陳深知此職「將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雖不情願，也只好走馬上任。在職期間，自認為對「處理學潮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蔣介石遇有較為棘手的人事安排，也時常派他出面處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陳布雷出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奉命同葉琢堂一起勸張靜江辭掉浙江省主席職務而專管建設委員會事務。結果「靜公欣然許諾，乃完滿解決。」每遇國民黨中的傾軋之事，陳布雷也總是盡力排解維繫。一九三五年六月，他隨同蔣介石轉道貴陽至重慶，後又赴成都。此間南京行政院與監察、司法各院之間紛爭不已，許多要員紛紛跑到四川告狀。陳布雷見到這些人時，「均勸彼等以大敵在前，宜盡祛疑慮，既信任領袖，即應信領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艱難，必中樞安定，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也。」有時，陳布雷還為蔣介石遊說、拉攏國民黨外的幫閒者。抗戰初期，國民黨組建三青團。陳布雷親訪青年黨的主要首領左舜生，並轉達蔣介石邀其在該團任職的意圖。左舜生因自己另有黨籍，「恐滋生誤會，婉辭謝之」，但與蔣介石、陳布雷的關係卻從此大為親密，自稱「其實在抗戰期間，凡所以融洽黨派以統一全國意志者，余幾無一事不與布雷、岳軍協商，亦幾無一事不開誠相見而得圓滿解決，及今思之，深覺布雷調撥之功不可沒也。」對於蔣介石不放心的人，陳布雷則動用各種手段進行嚴密監視，這是他主持

侍從室二處的業務之一。陳布雷與張治中私交甚篤，但由於張治中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同共產黨領導人較為接近，陳布雷從一九四三年六月起便開始派人秘密收集張治中在三青團的政治性經費，以及各項專款和私人機密費開支等情報，以監視張治中的政治動態。爲盡愚忠，友情也顧不得了。

爲蔣介石撰擬文稿，整理講話記錄，是陳布雷晝夜辛勞的第一要務。他洞悉蔣介石的心理狀態和思維特點，善解蔣意，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蔣思想的組織者和加工者。一九三四年二月，陳布雷在浙江省教育廳長任上（第二度出任該職）出席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集的十省行政人員會議。蔣介石以行營文字撰述無適當人選爲由，希望陳布雷能來相助。陳布雷於兩個月後辭去教育廳長職務，赴南昌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主管文秘工作。南昌行營撤銷後，在武昌改設「剿匪」總部，陳布雷又轉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該處是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實際權力中樞，處理國民黨的政治、經濟、外交、黨務等各項事宜，主任直接對蔣介石負責。陳布雷擔任這個職務達十年之久，雖業務繁鉅，但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發布的重要文電，仍大多由他親自撰寫。蔣介石每次要發表有關方針、政策或重要決定的講話，也多在事先同陳布雷商量、斟酌擬訂講話提綱。有時，則由蔣自己寫出提綱，再經陳潤色和條理化。蔣介石講話的速記稿，陳布雷還要作一番文字加工，最後送蔣親自核定後發表。此外，如蔣

介石五十歲生日所發表的《報國與思親》這類個人的重要紀念性文字，也大都由陳布雷捉刀代筆。一九三九年五月，陳布雷利用休養時間，整理蔣介石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日記，因原稿久置地下室，被水浸入，造成許多不可辨認之處，全由陳布雷進行查補，共費時六星期，才全部完成。陳布雷還親自編製了關於蔣介石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動的記錄——《蔣介石的實錄》，供後人爲其樹碑立傳做根據。有時，陳布雷不僅要替蔣寫文章，還要充當蔣的代言人。一九三九年某日，一位學者向蔣介石傾談三民主義救國的理想，並徵詢蔣介石的看法。蔣介石對他說：「你可找陳布雷談談，他的想法和看法和我是一致的。」

當然，代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捉刀爲文，並非易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飛機，即命前去迎接的陳布雷於當天趕出一篇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訓詞」。不久，又命陳布雷寫《西安半月記》。這項使命強烈地衝擊著陳氏深植其心的爲文之道，使他的神來之筆不勝其累。據說，陳受命後，因全篇文章均需杜撰，久久寫不出一字，便拿手中的狼毫出氣。古人有言「代大匠斫者傷其手」，是說代人爲文之不易，那麼，代說謊者立言的苦楚就更可想而知了。

陳布雷是國民黨宣傳方面的主要主持者和決策人之一。他於一九三一年任教育部次長時，即曾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持侍從室二處期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方針、計

劃，也都要向他請示報告。抗戰勝利後，侍從室改組，陳布雷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不久又改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任），在此期間，蔣介石爲其撥款法幣一百億元，讓他組織一個旨在進行反共反民主運動的「宣傳小組」，一切國民黨官營或供養的通訊社、報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廣播電台以及與宣傳有關的機構，都遵奉「宣傳小組」的指令行事，陳布雷因此被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的大員們稱爲「宣傳作戰的參謀總長」。他還利用熟悉報界人士的條件，大力施加影響，要其審慎處理「有政治毒素」的稿件，在宣傳口徑上與蔣記中央相協調。

陳布雷常說，他願作No.2，而不願作No.1（願作二號，不願作一號）。較之登前台北演，他更喜歡在幕後做羽扇綸巾的策士。在蔣介石周圍衆多的智囊中，陳是對其最有影響者之一。他曾對人說：「我接近委座，愧無積極貢獻；僅在消極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議而已！」抗戰勝利後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爆發民族武裝革命，反抗國民黨在新疆的統治。蔣介石將白崇禧採取政治解決辦法，與三區進行和平談判的意見轉詢陳布雷，陳表示贊同並建議蔣介石接受了這個方案。他還時常主動爲蔣介石提供參考意見。三青團成立時，原擬稱蔣爲「領袖」。在蔣介石上台講話前一分鐘，陳給蔣寫了一張紙條，說不宜稱「領袖」，「在家爲家長，在團爲團長，無不當也。」蔣看了紙條，欣然接受陳的意見，在

大會上指示，稱蔣介石為三青團團長。遇有重大事件發生，蔣介石時常單獨約陳密談，有時竟至通宵達旦。陳布雷一向為人謹慎，守口如瓶，所以密談的內容很難為外人知曉。儘管如此，從蔣介石對陳布雷「籌策謨獻，胥關大計」的讚詞中，人們仍可清楚地看出他在蔣介石鐵幕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陳布雷對自己在蔣幕中的作用也有評價。曾有人問陳布雷，他對蔣介石這個「領袖」的貢獻是什麼。他經過認真的考慮之後回答說：「委員長是全國的領袖，繫國家安危於一身。譬如說他是『火車頭』，牽引著滿載全國軍民的一長列火車前進，有時速度太快，路基不穩，左右顛簸擺動太猛的話，就難免沒有危險。我的作用，就等於『剎車』，必要時可使速度減低一點，保持平穩。」他的話不無道理。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期間，西南聯大發生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的大規模學潮，蔣介石對此十分頭疼。他指定陳布雷及教育部長朱家驊、宣傳部長吳國楨、中央團部書記長劉健群等成立鎮壓西南聯大學生運動的專案小組，由陳布雷任小組召集人。但小組剛剛成立，還沒採取行動，蔣介石就因學潮更加高漲而下令解散西南聯大。命令下達後，蔣即赴平津巡視，教育部長朱家驊也因事外出。陳布雷認為解散不是好辦法，所以一反「奉諭」辦事的慣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決定一面由他本人打電報向蔣介石報告西南聯大問題正在設法「疏導」，請准予暫緩解散；一面以「解散」威脅聯大

師生，並策動學生家長將子弟暫召回家，同時通知駐昆明部隊作「接管」學校的準備。這套辦法實行的結果，既沒有解散西南聯大，又鎮壓了學潮。這也許就是陳布雷所說的「剎車」作用。

古語云：「伴君如伴虎」。在國民黨大員中，能久居樞要而又長期為猜疑成性的蔣介石所寵信者極為鮮見，而陳布雷則是其中之一。他曾對人表白：「自二十四、五年以來，給事於領袖左右，平日謝絕一切酬應，摒絕一切家事，區區愚忠，無非欲騰空此身，俾將全部時間，自早至午夜，全歸領袖之支配……」這並非誇張之詞。他到南京任職後，家眷仍留上海，平時很少回家探望，整天守在他的小樓一角，即使偶爾外出，也一定留下去處的電話號碼，以便蔣介石隨時都可以找到他。他枕畔的茶几上放有一部可與蔣介石和各重要地區主管者直通的電話，雖足不出戶，卻可及時通曉各方面的機密要聞。

陳布雷這樣兢兢業業、克盡職守的幕僚，對蔣介石來說極為難得，因而著意親近拉攏。他深知這位不圖職位、不謀金錢的舊文人心理。在陳布雷五十歲生日時，特為之手書「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八字為祝，並附書云：「戰時無以祝壽，特書聯語以贈，略表向慕之意也。」當時，打著抗戰旗幟的蔣介石正處在威望和權力的巔峰狀態，也是其形象對充滿幻想的書生最具魅力的時刻。陳布雷受其如此敬重，不禁感慨萬千。蔣介石用諸葛武侯之名言為

質的深刻寓意，深深地打動了陳布雷，他常言「蔣先生給我這八個字，使我特別感奮！澹泊爲立身之本，寧靜爲處世要著，澹泊則與世無爭，寧靜則堅忍不拔，和我平日所自勉正直平凡二字相表裏，能守正，則不致爲環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誘，自然寧靜；甘平凡，則透徹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的貢獻。」蔣介石投其所好，以一紙賀辭就使陳布雷認爲蔣氏「知其最深」，「勸勉期許之意溢於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

讓我安靜

積澱在內心深層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和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決定陳布雷以追求生命的最大價值爲上乘的人生哲學。他自謂「縈繞心中朝夕與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爲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無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徹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他沒有找到實踐「人生真義」之路，但自我實現的意願並未泯滅。

與克盡職守爲蔣介石效力的現實相反，陳布雷在心靈世界中對官場生涯深感厭惡，悲嘆正在消失的自我。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性格與角色的衝突，加劇著他人格的雙重化趨向，導

致他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出扭曲的心態。顯赫的高位與日益痛苦的心靈如此難以協調和統一，使他時刻感受到這種內心衝突的尖銳與沉重。他在教育部次長任內，曾在鷓鴣寺求觀音簽，問何時可以解官歸里。目睹國民黨上層分子之間永無休止的勾心鬥角，對政情宦海的黑暗內幕了解愈深，「益視政治生活爲畏途」，而愈加渴望回到早年的報人生活中去。抗戰後期，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主席，讓陳布雷作文官長，陳一直推辭不就，以致宋美齡曾爲此責備陳太頑固。抗戰勝利後，陳布雷還時時想回上海去作記者。當他得知他的一位朋友去官而專辦報紙的時候，特意致信道賀。信中說：「兄今眞爲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欣羨之辭飽含著對自己依從地位的厭倦和對獨立與自由的深切嚮往。然而對獨裁者「知遇之恩」的圖報之心和輔助明君安邦治國的幻想，又使他處於欲去不能、欲罷不忍的境地。

早在大革命時期，在各階級、黨派、個人都經歷著分裂與聚合、離析與再組的風雲變幻中，陳布雷就把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望在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身上。五卅運動後，陳布雷曾以他信奉的是「全民革命」爲由，拒絕了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的期待之手。一九二七年陳布雷見蔣介石後不久，因蔣對他說，中國不應取「一黨專政的辦法，頂好將來要各黨各派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就「覺得蔣先生的看法，胸襟遠大，於國家有利，故從那時起就死心踏地爲他服務」。然而，嚴酷的歷史進程毀滅了他的天真幻想。一九四八年，中國大地上光明與黑

暗兩種勢力展開了最後的決戰。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國統區經濟崩潰，南京政壇更是一片混亂，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瓦解只在彈指之間。這一切，對陳布雷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如他在給蔣介石的遺書中所說：「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此刻，他已十分明瞭，他二十多年的隱忍，半生爲之獻身的所謂「事業」，只不過是一場虛幻的泡影。理想的破滅所導致的深深絕望使他的生存意志崩潰了。哀莫大於心死。

精神和肉體的極度痛苦使陳布雷棄世的念頭萌動不已。千古相承的君子之憂在陳布雷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此心安放不下」。可悲的是，他的憂思卻寄託於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沒落的政治實體，爲「黨國」而憂，爲反動獨裁的「領袖」而憂，其結果，殷憂非但不能啓聖，反而備加苦悶，積鬱成疾，加之工作繁鉅，用腦過度，致使健康狀況嚴重惡化。極度的神經衰弱和失眠症使他終日疲憊不堪，「油盡燈枯」之感已浸透了他的整個身心。「我的身體是無法好起來的，我的心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每逢心裏痛苦時，常常有『終結我的生命吧』的念頭來襲余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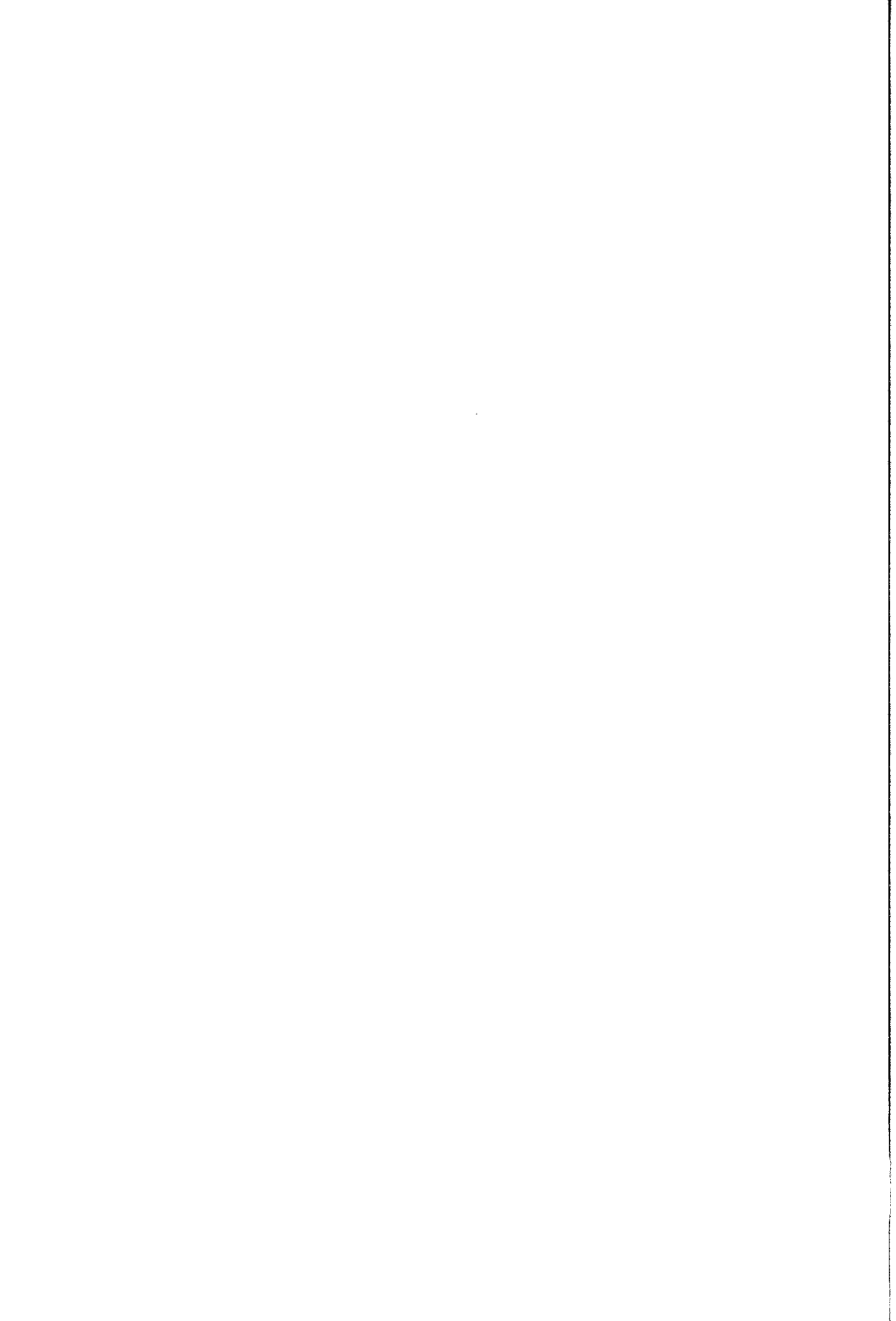
在「決絕」之念已定的時刻，陳布雷非常清醒、冷靜地在遺書中對親友傾訴苦衷，稱自己「遭時艱虞慮而生性孤僻如此，處境之進退無措至此，身心之疲弱無能復至此，其終於出此下策。」但是他卻有意忽略了促使他訣別人世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陳布雷出席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聯席會議。會上，蔣介石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講話，宣稱：「抗戰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據說，陳布雷看到這句話之後目瞪口呆。整理蔣介石的講話記錄時，陳想將其略去，蔣則堅持保留。另外，據言此前不久，他曾向蔣介石提出過與共產黨談判的建議。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聲色俱厲地痛斥主和派即是向共產黨投降，並聲言一切和談謠言「絕不影響他戰鬥到底的決心」。盡管蔣介石的話也許並非針對陳布雷，但在客觀上，無疑是對他精神上的一個巨大打擊。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陳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臨時會議，返回住所時臉色大變，一進門便問秘書，自己的臉色如何。秘書覺得他確實與出門時大不相同，面頰灰暗無光，一副病容，便催他趕快吃飯休息。在飯桌上，他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態，對幾個文祕人員侃侃而談。從自己讀書、考秀才、作記者、入參戎幕二十餘年的經歷，一直談到當前的時局，最後他深為感慨地說：「外間都說我在委座面前說話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說話，現在在委座面前說話的人多了，我更少說話，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聽。」他這與人們的最後一席談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可為他在幾天之內所遭受的刺激和他與蔣介石之間隱含的矛盾，以及他內心深處的失意之感作一個註釋性的說明。或許就在此刻，他作了最後的決斷。

他鄭重地告訴副官和秘書：「讓我安靜些！」他「需要休息」，從此閉門謝客，在一天半的時間裏，從容地寫好了一批遺書和雜記，然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東方）



〔第三章〕

蔣記理論家戴季陶

年輕志士號「天仇」

戴季陶，名傳賢，字季陶，原籍浙江吳興，後遷四川廣漢。早年家境貧寒，以至除夕夜祭祀祖先只能以燈代燭。後經營景德鎮瓷器漸漸富裕起來。少年時代在成都客籍學堂讀書，聰明伶俐，考試名列前茅。因聚集同學抗議校方袒護富家子弟，被開除學籍。長兄賣掉土地，資助其赴滬，擬東渡赴日留學。但在上海碼頭，錢財被流氓搶劫一空，好在遇到一位旅滬四川同鄉也要去日本，對他的處境很同情，攜其一同東渡，得以進日本大學法律系學習，時年十五歲。

戴季陶在日本受到了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和革命思想的薰陶，但並沒有加入同盟會。留日學生中有許多富家子弟，在異國他鄉揮金如土，極盡奢華。他家裏接濟有限，常常衣食無著，全靠同學幫助，才得以渡過難關。但他發奮學習，倚年齡小的優勢，掌握了一口流利

的日語，這爲他以後出使日本從事外交活動奠定了基礎。當時留日學生雖多，卻沒有統一的組織，全以地域同鄉爲紐帶，成一派系或團體。戴季陶與後來任《大公報》總經理的胡政之，發起組織留日同學會，得到留日學生的贊同。成立大會上，日本文部省和許多大學校長出席，戴季陶以發起人當選爲會長。意外的成功，使年輕的戴季陶竟激動得回到宿舍大哭起來。

由於家中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同學幫助也是杯水車薪，難以長期支持，戴季陶遂決定回國。臨行與他同結爲「松濱四友」的伙伴，賣掉了講義、妻子的首飾，爲他湊足了路費，終於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了山雨欲來的祖國。

他先應江蘇巡撫端方之邀，任教習之職。後赴上海，通過考試進入《中外日報》和《天鐸報》當記者，開始了筆耕生涯。因才華橫溢，兢兢業業，被任爲《天鐸報》主筆，他取與清朝政府不共戴天之意，以天仇筆名，抨擊清王朝的黑暗腐朽。不久結識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同盟會，赴檳榔嶼主辦革命派在這裏的報紙《光華報》，宣傳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假立憲陰謀。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革命黨人陳其美在上海與紐永建起兵響應。戴季陶回滬參加起義，見到了在日本即已相識的蔣介石。上海武裝起義勝利後，蔣極力推戴陳其美出

任都督，戴季陶也極力說服鈕永建勿與陳相爭，終於避免一場內哄，這可以說是他與蔣介石的首次政治默契。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國內外具有崇高威望和社會影響的革命領袖孫中山自海外返回祖國。戴季陶以革命黨記者身分，前往上海碼頭迎接。首次目睹孫中山的領袖風采，欽佩不已。孫中山對戴季陶的年輕而富有才華，也十分欣賞，攜其赴南京參加大總統就職儀式和中華民國成立大典。孫中山讓總統之位給袁世凱後，出任全國鐵路督辦，帶著修十萬里鐵路的幻想赴日訪問，戴季陶隨同前往，任翻譯兼機要秘書。孫中山在日本受到朝野各界的熱烈歡迎，並與許多政界要人進行過多次密談，只有戴季陶一人在側，可見此時他已得到了孫中山的極大信任。

袁世凱竊取大總統之位後，由排斥異己，步步走向獨裁專制。戴季陶在自己主編的《民權報》和于右任主編的《民國日報》上，抨擊袁世凱安插親信，營私舞弊，取締報刊，控制輿論，以總統之名，行專制之實。文章嬉笑怒罵，潑辣鋒利，淋漓盡致地揭露了袁世凱的醜惡面目。袁世凱惱羞成怒，查封了《民權報》社，將戴季陶逮捕入獄。可以說在許多國民黨人都陶醉於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對袁世凱的幻想時，戴季陶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清醒的革命黨人之一。

「二次革命」爆發後，戴季陶在友人營救下出獄，立即加入了「武力討袁」的行列。他曾在南京協助黃興調兵遣將，失敗後又曾秘密返回南京，準備再次策動中下級軍官起義，因被出賣不得不再次離寧赴日。一九一四年，鑒於「二次革命」的失敗和國民黨組織的渙散無力，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戴季陶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

一九一七年七月，孫中山為抗議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保衛《臨時約法》，率部分國會議員南下廣州，組織「非常國會」，宣布護法。「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戴季陶出任大元帥府秘書長。次年五月，孫中山受地方軍閥排擠赴滬，戴季陶隨同離粵。一九二〇年底，陳炯明驅逐桂系，孫中山重返廣州，重組軍政府，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戴季陶被任為外交次長兼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不久蔣介石以留日士官生和陳其美部下的身分，持老國民黨員張靜江薦函來廣州，被孫中山任命為少將參議兼粵軍參謀長，戴季陶多有美言。但不久蔣受陳炯明排擠，跑回奉化溪口鬧起了情緒，孫中山屢電催其返粵，蔣介石均置之不理，戴季陶親往奉化勸駕，結果兩人鬧翻，不歡而散。事後蔣介石曾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季陶則回信說：「杯酒失意，輒任性使氣，不稍自忍，以此處世，深慮召禍，即不然，亦足礙事業之成功」。蔣介石深受感動，覆信說：「兄之待我者，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在戴季陶的敦勸下，一九二二年六月，

蔣介石回到廣州，在陳炯明炮轟觀音山，包圍總統府的危急時刻，保衛孫中山登上永豐艦，進一步得到孫中山的信任，升任粵軍中將參謀長，並於次年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

南方「護法」幾落幾起，北方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思想解放浪潮則不斷發展，西方各種思想學說紛紛傳入中國，給辛亥革命後趨於沈寂的中國思想界帶來了生機活力。戴季陶奉孫中山之命，在第一次護法失敗後主辦了《星期評論》，側重於勞工問題的研究。他本人也發表了一些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在當時進步思想界有一定影響。在共產國際幫助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戴季陶與後來參加「西山會議派」的沈玄廬均有所參與，但組織上並沒有加入。他的理由是：孫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退出國民黨而加入他黨。

民國初年，戴季陶確實是作為孫中山先生忠實的追隨者和反袁健將，活躍在政治舞台的。

「戴季陶主義」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戴季陶不贊成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爲此和廖仲愷還發生過激烈爭論。多次函電催促，他才勉強參加大會。討論到《中國國民黨章程》，戴季陶又糾合一部分人提出反對「跨黨」案，共產黨人李大釗等據理駁斥，指出共產黨人跨黨加入國民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有所貢獻於國民革命事業，並不是爲了討便宜。戴季陶的提案雖被否決，但仍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擔任了宣傳部長之職。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黃埔開學。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爲校長，廖仲愷爲黨代表，戴季陶爲政治部主任。建校初期，戴季陶曾爲解除校內兩黨之間的猜疑和偏見，做過一些工作。但他多次遊說，讓共產黨員放棄黨籍，加入國民黨，受到許多共產黨人的抵制。作爲與蔣介石兄弟相稱的至交，他積極策劃，協助蔣介石培植個人勢力，控制軍隊，攫取政治資本。他的「戴季陶主義」更是極大地影響了蔣介石。

一九二四年十月，孫中山首次依靠黃埔學生軍，迅速平定了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商團叛亂。戴季陶乘機向孫中山進言，說蔣介石勵精圖治，建校有方，智勇雙全，才堪大用，使孫中山進一步加深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戴季陶還奉承蔣介石「以飽經憂患之身，具堅貞不拔之氣，沉毅豪爽，殆聚程不識、李廣爲一人」。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篡奪軍政大權的野心。

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將領馮玉祥受廣東革命形勢影響，發動「首都革命」，推翻了賄

選總統曹錕，驅逐末代皇帝溥儀出宮，電邀孫中山北上共議國事。孫中山於十一月帶病自廣州出發，經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行程一個多月抵達北京，受到十萬多北京市民的熱烈歡迎。由於一路輾轉勞累，致使肝病復發迅速惡化，戴季陶聞訊趕赴北京，隨侍於孫中山病榻左右。據戴自稱，孫中山病中，他曾陳述己見，認為三民主義實淵源於中國古代正統思想，請示是否可就體會心得，寫成文字問世，以「正人心而端趨向」，孫中山聽後「許其盡情傾吐」。戴季陶遂「勇氣百倍」，竟改名傳賢，以孫中山精神遺產的繼承人自居，聲稱要對三民主義學說「金聲而玉振之」。料理完孫中山的喪事後，戴季陶直奔上海，在薩坡賽路慈安里，設季陶辦事處。用兩個月時間寫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

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戴季陶提出，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學說，完全來源於中國古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孟的忠孝仁義道德思想；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中，戴季陶強調，欲圖中華民國之生存，必先圖中國國民黨之生存，更需充分發揮為中國國民黨生存所必須具備之獨占性、排他性和統一性，才能實現各階級的聯合革命。這兩本小冊子片面誇大了孫中山思想理論的消極成分，否定了三民主義學說的革命性、戰鬥性，其實質是排斥中國共產黨人，爭奪大革命的領導權。

孫中山生前，儘管國民黨內對國共合作有種種的分歧和激烈的爭論，但由於孫中山的崇高威望和領袖地位，足以使全黨保持統一，即便是一些右派元老，也不能不斂手就範。但他逝世後，國民黨失去重心，各種政治力量「道不同，不相為謀」，黨內紛爭，勢所不免，特別是國民黨老右派，更是有恃無恐。戴季陶以東方文化觀和傳統道德的角度，解釋三民主義學說，是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歪曲，意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學說；他所鼓吹的獨占性、排他性、支配性，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一大」宣言背道而馳，為國民黨極右勢力排斥打擊共產黨，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論根據。難怪後來他常常自吹自擂，以反共的「先知先覺」自詡了。

戴季陶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強烈譴責。蘇聯顧問鮑羅廷稱其為國共合作的一大魔鬼；瞿秋白、李大釗等人寫了大量文章，針鋒相對地批判了戴季陶的謬論。《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書，在全國各地被焚毀很多，僅北京、武漢就有一萬多冊。戴季陶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發言人」自居，從廣州到南京，從南京到上海，一路哭哭啼啼，大講其「戴季陶主義」。他獻於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的輓聯，上款「夫子大人」，下款「受業 戴傳賢」，更頗有「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傳賢」的味道了。這種自封為孫中山「道統」繼承人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國民

黨元老，包括一些右派分子的不滿，謝持和楊庶堪就氣憤地說，總理生前既沒有收他做門生，他也從沒有拜總理做先生的一回事，僭稱受業，不僅欺人，也欺總理在天之靈。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鄒魯、謝持為代表的國民黨右翼勢力，決定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戴季陶作為「反共先鋒」欣然前往，並與鄒魯、林森聯電汪精衛北上赴會。但當時在京的右派馮自由，誤聞戴季陶是共產黨，便雇了幾個流氓綁架了他，對其劈頭痛打。戴一再哭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不待開會即返回上海，但聲明可以同意大會決議。

「西山會議」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職務，開除汪精衛、李大釗黨籍等一系列決議，並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創《江南日報》，宣傳右派主張，公開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和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紛紛要求予以懲戒。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申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貫徹三大政策，並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對林森、居正等人予以警告處分；戴季陶沒有與會，聽說形勢不妙，便對代表中央前來讓他表態的鄧演達痛哭流涕，說自己從未參與「西山會議派」的實際活動，非常痛悔於列名通電，正閉門思過。鄧演達返粵後向全會報告，戴才得以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但許多委員仍指

出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對引起國共兩黨糾紛和統一戰線內部思想混亂，難辭其咎，所以大會嚴令他迅即猛醒，「不可一誤再誤」，三年內不准發表文章，以免擾亂視聽。

二大結束後，戴季陶又發表聲明，說鄧演達向大會的報告並不是他的本意，藉以平息「西山會議派」指責他反覆無常，背信棄義；同時又表示決不接受大會警告，並繼續從事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他給蔣介石寫信說，一黨應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歷史地位，若喪失歷史地位與組織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進一步向其灌輸一黨專政思想。二月黃花崗起義紀念日，他返廣州與共產黨人譚平山及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同到七十二烈士墓致祭，歸至廖宅，還對譚平山說，現在最能奮鬥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大多腐敗退縮，但今日中國需要一有力的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所以共產黨應放棄黨籍，加入國民黨。遭到譚平山的嚴詞駁斥。

一九二六年十月，國民黨任命戴季陶為中山大學校務委員長，但他鬱鬱寡歡，不安於位，不久即應蔣介石之邀上了廬山。此時，北伐軍在兩湖和東南戰場已取得決定性勝利，被他視為「國民黨後起之秀」的蔣介石，已身兼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要職，隨著權力的增長，篡黨奪權的野心日益顯露。蔣介石軍政大權在握，

又得英美列強和江浙財閥的支持，但若反蘇反共，還必須求得近鄰日本的默契，所以擬派一特使赴日，疏通關係。左右平衡，無論就個人親密關係，還是論外交能力，戴季陶都是最佳人選。在廬山，戴季陶與蔣介石就軍政大計進行了秘密策劃。二月八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爲將中國國民熱誠所貫徹之國民革命運動真意傳諸日本，求得日本國民的諒解，並將中日兩國將來親善基礎，築於民族平等人道主義之上，特派戴季陶爲國民政府代表赴日。二十五日，他攜夫人紐有恆以及李煜瀛和易培基由上海乘山城丸赴日。當時國民黨東京支部懷疑戴季陶出使受蔣介石指使，有秘密使命，所以特爲其設一辦事處，以便監視。但他利用許多私人會晤的機會，積極尋求日本對蔣介石的支持。與此同時，他目睹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備戰，矛頭直指中國，也「引爲至憂」。出於民族義憤，他以一口流利的日語，先後在日本各地發表演講六十四次，爲維護民族尊嚴也多有抗爭。三月，東京貴族院議員宴請戴季陶，一貴族大放厥詞說，世上最不公平令人討厭的東西就是領土主權這個名詞。日本人口每年過剩很多，卻無法移民出去，中國滿洲空曠得很，日本要移民，爲什麼不行？戴季陶回答說，就人口而論，北美合衆國每平方英里住五十人，南美洲每平方英里二十人，加拿大每平方英里僅十人，而中國是每平方英里三百四十人，幾乎和日本密度相同，日本既要移，爲什麼偏向人口密度差不多的中國移，而不向人口稀少的北美、加拿大移呢？直駁得這位議員瞠目結舌。

十六日，大阪實業界宴請戴季陶，席間一人士問道，照目前形勢，國民革命軍勢力已及於江浙，但國民政府是否有能力保障上海租界的秩序和外僑的安全呢？戴季陶立刻說：「不能」！全場一驚，他接著說，我雖然至今沒有接到國民政府的訓令，但可以代表政府回答這個問題。何以說國民政府不能保障上海租界的秩序和外僑的安寧呢？因為從政治學原理上說，要保障一地方的秩序和安寧，重要的是統一和主權。上海租界的情形，翻開近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便一目了然，甲國一個領事裁判權，乙國一個領事裁判權，背後都帶一大群士兵，所以上海的主權不統一，竟是不可勝數，秩序安全又何以保障？唯一的方法，就是將上海租界的主權還與國民政府，日本既看到這個問題，我們十分感激，還望能付諸實施，毋做口頭禪才好。

蔣家王朝的「衛道士」

一九二八年八月，蔣介石依靠軍事實力已基本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但仍面臨地方軍閥的威脅。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為實現「整理軍事」、「實施訓政」的要求，首先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戴季陶被選為七常委之一。為建立蔣家王朝「法統」，鎮懾地方實

力派，根據蔣介石的「訓政」綱領，全會通過了《五院制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十月十日，國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五院正副院長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戴季陶出任考試院院長。

就職後，他選擇南京鷄鳴寺東關岳廟，開始興建考試院大樓，次年落成。院外大牆書醒目大字：「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材，鼓勵有方，則野無抑默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考試院接待室懸掛一聯：「入此門來，莫作升官發財思想；出此門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戴季陶的辦公室，則命名為「待賢館」，以「選賢任能」相標榜。

一九三一年，考試院舉行第一次高等考試，戴季陶擔任主考官兼典試委員長，親自主持命題。考試完畢，數萬考生停候南京等待消息，戴組織人員日夜閱卷核分，根據錄取人數，典試委員會決定凡五十五分以上者一律給予及格分錄取。放榜後，他又組織覆審，發現一考生已達五十五分以上，卻未能錄取。戴季陶一面下令錄取，一面上報呈請處分。在國民政府會議上，他聲淚俱下，認為首次高等考試，承辦人因受催促忙中出錯，情有可原，處分不妨從寬；至於他本人急於放榜，領導無方，必須從嚴處分，才能教育屬下，以儆將來。直到蔣介石表示過嚴處分，恐今後再無人敢做主考官，才決定戴季陶本人罰扣薪俸三個月，秘書長罰俸一個月，科長記過一次。從此考試院官確較其他院部謹慎，不敢粗枝大葉。戴任院長二

十多年，頗有「使天下人才盡入彀中」之意。

戴季陶常以「東方文化的繼承者」自居，宣傳封建文化，抵制共產主義學說，並藉以籠絡一部分封建文人，為蔣介石統治效勞。當時中國社會劇烈動蕩，中西文化之爭十分尖銳。戴季陶發表文章，認為文化是有時代性、歷史性、地域性的。西方文化雖光彩奪目，但東方文化也有其根深蒂固堅強不拔的基礎，所以東方民族決不應該放棄自己的傳統。

戴季陶借用宗教手段，對內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層宗教人士實行懷柔政策。凡是有關邊疆地區重要人事變動和決策，蔣介石一般都要先徵求他的意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達賴喇嘛圓寂於拉薩，當班禪大師於次年一月來京時，戴便提議由國民政府舉行達賴大師近孝會，設壇誦經。他陪同班禪大師主法，分內外兩壇，內壇設考試院，外壇設鷄鳴寺，歷時兩日，場面浩大，轟動一時。北大教授、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劉半農爲此在北平《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南無戴傳賢菩薩》的文章，將戴季陶官佛兩棲生涯刻劃得維妙維肖。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深感對日外交棘手而又事關重大，特設外交委員會，以戴季陶爲主席，專門處理對日關係。戴秉承蔣的旨意，竭力推行依賴國聯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受到國內輿論的紛紛譴責。

在蔣家王朝中，戴季陶輩屬元老，但他既不像林森、居正那樣表面受到尊崇實際有職無

權，也不像陳誠、胡宗南那樣殺氣騰騰，戴笠那樣陰森可怖，更不同於陳立夫、陳果夫權勢顯赫，活躍於前台，他始終作爲幕後智囊，參與蔣介石的重大決策；在關鍵時刻起著特殊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南京國民黨內亂作一團，連夜召開最高軍政會議，數小時無人提出具體主張，獨戴季陶力主討伐，並提出了「以國家紀綱爲重，以個人安危爲輕」的口號，聲言必須以武力使叛逆知中央威嚴，方可確保委員長安全。一時，國民黨元老派「討伐西安」的主張頗占優勢，何應欽也曾下令國民黨中央軍向潼關推進。宋美齡爲保護蔣介石生命安全，決定與宋子文、端納前往西安，戴季陶聞訊曾親到機場阻止，被宋美齡搶白了一頓。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何應欽大受蔣介石的冷落，戴季陶卻依然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在國民黨五屆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蔣介石決定辭去行政院長之職，各方以爲宋子文救蔣有功，行政院長非其莫屬。果然蔣推宋子文繼任，無人異議，獨戴季陶站起來說，子文同志侃侃大才，黨國倚畀正殷，將來必委以重任。但在今日之情況，則天下將以爲委員長以國家名器爲私人酬庸之具，反爲子文同志出處之玷，非所以愛子文之道。這一番慷慨陳詞，顯得堂堂正正，無可辯駁，宋子文的行政院長就眼睜睜地丟了。其實這是他和蔣介

石早有密議，雖然宋子文與蔣爲姻親，但因其頗具才幹，在英美方面又很有影響，蔣介石十分嫉視，宋子文有英美撐腰，不願俯首聽命，這更是蔣介石所不能容許的，所以，便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了宋子文的出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同慶，戴季陶竟憂懼無喜色。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他對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即十分憂慮，認爲係心腹之患，其害無窮。九月，他約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朱家驊，在陳立夫寓所商討東北戰局，力主不要匆忙派兵出關，以免兵力分散被各個擊破。但蔣介石當時十分狂妄，不久即派大軍搶占東北，直到遼瀋戰役前才醞釀收縮，遲疑未決時即被人民解放軍全殲。

戴季陶之成爲幾十年政治上的不倒翁，是因爲他始終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爲己任。寧漢合作之初，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任立法院院長，當時蔣胡所以尙能相安無事，除了政治形勢所致，還多得力於行政院長譚延闓的調和。譚死後，戴季陶作爲與胡漢民私交頗厚的好友，當得知胡準備辭職出走的消息後，竟向蔣介石告密，結果導致胡漢民湯山被扣。

戴季陶長期在文化教育領域任職，爲標榜其作爲一個佛教徒以慈悲爲懷，也做過一些善事。他任中山大學校長多年，使國民政府對該校的教育經費由九萬增至十四萬，中文圖書由四萬冊增加到十二萬冊，西文圖書由三千冊增加到四萬冊，中西期刊五百餘種，學校下設兩

個附屬醫院，開荒種地二·五萬畝，爲中山大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與于右任先生共同呼籲努力，創農林專科學校於西北武功；在家鄉吳興，也創設了后林小學。舊中國軍閥混戰，天災人禍並行，戴季陶對於救災事業，尙能表現出一點熱心。民國以來四川戰亂迭起，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四川省請願代表來南京請願，戴季陶在國民黨中常會第一七八次會議提出川政混亂，苛稅繁多，民生凋敝，應從速解決。同時提交了苛稅一覽表。十一月，國民政府爲籠絡人心，發布命令：四川應裁減軍隊，統一政令，廢除雜稅，「不容絲毫敷衍」，對於改善人民的生活處境，盡管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但呼籲之勞，總比唾聲默認還是好些！

戴季陶的個人生活，始終得到蔣介石的特殊關照，因此豪華舒適，足以暴露出其標榜「捨己爲群」的虛偽。他在南京湯山購地引泉，修建別墅，落成「望雲書屋」，中刻太夫人手書孝經，以當代名流題詠刻石鑲入壁間；又在上海覺圓修西式住宅，所用費用都用蔣介石贈與，實是揮霍百姓膏血。難怪一九三二年在西安各學校聯合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他大談恢復中國固有道德，興乎萬事以保養先務爲遺教，學生惡其老朽虛偽，憤怒地燒毀了他的汽車。

在國民黨軍政大員中，戴季陶頗具撲朔迷離的色彩。他手捻佛珠，爲蔣介石懷柔西藏、蒙疆；每當政局於己不利，又可遁入深山古寺，等待時機。考試院位於古同泰寺下，鐘磬之

音，密邇相問，他在處理政事完畢後，便前往打坐誦經。其妻紐有恆，是個比他更虔誠的佛教徒，紐氏七歲即吃齋念佛，並曾出家赴南潯塔院，依古德比丘尼學戒。一九三〇年依班禪大師受觀音菩薩藥師如來金剛灌頂，投花授經，名蓮花金剛。

戴季陶多愁善感，又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所以性格奇特，近於神經質，身為政府要員的他，有時竟會像孩童般大哭不止。擔任中山大學校長期間，聽說許多學生都在從事孟姜女哭長城的研究考證，且爭論激烈，他便召集這些同學開會，一言未發先哭將起來，學生愕然，他卻說，聞諸君但知孟姜女哭長城，所以不能不為諸君痛心而哭。學生們啞然失笑，表示以後不在此下太大功夫，戴才破涕為笑。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首都南京仍是一片歌舞昇平景象，戴季陶一天夜裏與友人偶到首都飯店，見達官貴人仍沉浸在笙歌曼舞之中，便當場大聲哭嚎，以抒發其對於「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痛憤之情。

聲勢顯赫的權貴總是特別懼怕死，總是千方百計尋求延年益壽之術。戴季陶卻是幾次自殺未遂，而且大多是想往江海裏跳。據他說是於茫茫碧波之上，便有萬事皆空絕塵去世之感。一九二二年秋，他奉孫中山之命赴四川宣傳廢督裁兵主張，調解各派衝突，不知何故，半夜投入江中。上海一友人聞訊，成哭戴季陶詩若干首，後又聽說他被漁民救起生還，遂改成賀詩，戴曾將此裱成屏條四幅，懸掛於成都四道街寓所。「西山會議」後他受到警告，心

情煩躁，神經衰弱加劇，到香港治療途中，又幾次尋找機會跳海，嚇得護送的朱家驊等人不敢離開半步。

儘管戴季陶幾次自殺未遂，但最後又並非死於自殺。他長期患有神經衰弱，安眠藥由於經常服用也漸漸失去作用，只好不斷加大劑量。一九四七年中即曾幾次服用過量，幸搶救及時脫險。解放戰爭後期，也許是因爲國民黨江河日下，他才更加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所以，他並不想死，還曾埋怨陳布雷，不該在這危難之秋自殺，離蔣而去。一九四九年春，他從杭州抵達廣州，和于右任同住迎賓館。當時，人民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震撼著華南大地。蔣家王朝已是危在旦夕。據說于右任曾責備戴季陶，作爲蔣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對蔣不加規勸，應對蔣的許多罪惡負責。這使他受到相當刺激。不久，孫科率行政院到達廣州，要占用迎賓館，便不客氣地把戴季陶趕到了條件較差的東園招待所。戴氣憤不已，大罵孫科，決意離粵赴川。當時他的兒子戴安國任交通部航空署長，已備好專機，因氣候惡劣未能成行。二月十一日晚，終於因服安眠藥過多死去。蔣介石聞訊，明令實行國葬，並交付國史館立傳。其子戴安國奉靈柩返回四川，於四月三日葬於成都市郊西棗子巷先塋。

（劉福祥）



【第四章】

CC掌門人陳果夫陳立夫

何爲CC？

其由來兩說並存：

其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被桂系軍閥把持。陳果夫爲反桂擁蔣，以留在上海的部分黨政幹部組成「中央俱樂部」，英文譯爲Central Club，簡稱CC。

其二：陳字的英文音「Chen」以字母「C」打頭，故以CC代表陳果夫、陳立夫。以二陳爲首的派系即稱CC系。

陳氏兄弟對CC的稱謂非常惱火。陳果夫曾氣急敗壞地否認說：「我的性格不會用外國字來組織自己團體的。」然而，不論「CC」屬於哪種含義，以二陳爲首的政治勢力的存在卻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它應蔣家王朝的建立而生，又隨其在大陸的垮台而消亡，是蔣介石二十二年獨裁統治的一大支柱。身爲CC系的「掌門人」，二陳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擁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

以叔侄之緣平步青雲

陳果夫，名祖燾，字果夫，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浙江吳興一個商人家庭。他的胞兄弟陳立夫（名祖燕）小他八歲。他們的叔父陳其美是民國初年的風雲人物，被孫中山稱爲一代「人傑」的著名革命黨人。他們兄弟即是由於陳其美的關係，而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蔣介石與陳其美有著「安危同仗」、「生死與共」的患難經歷，他在革命隊伍中嶄露頭角，即得之於陳其美的「誘掖之功」。他們相識在二十世紀初年反清革命志士雲集的日本，陳其美介紹這位浙江同鄉加入了同盟會，並爲其引見，與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相識。當時，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風暴正在孕育之中，陳其美、蔣介石奔走於日本與上海之間，開展革命活動。在艱苦的環境中，二人「患難日迫，感激日深，幾不知復有爾我之分」。辛亥革命爆發，陳其美在上海舉義，蔣介石聞訊由日本回國，受陳的派遣，參加了光復杭州的戰鬥。隨後，蔣介石回到上海，在已任滬軍都督的陳其美手下任滬軍第五團團長，並與其互換蘭譜，

結爲異姓兄弟。由此論之，蔣介石便與二陳有了叔侄關係。

辛亥革命時，陳果夫正值弱冠之年。在陳其美的影響下，他於一九一一年三月正式加入同盟會。武昌首義後，陳其美策動南京響應，陳果夫與其所在的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的同盟會員們積極籌劃南京起義計劃，後因形勢發生變化，他與另兩位同學到上海請示辦法。時間清軍由京漢線攻打漢口，形勢對起義軍不利，陳果夫等乃遵奉宋教仁的囑託，趕赴武漢助戰。漢陽失守後，陳果夫東下上海，按陳其美的指示組織招待所，聯絡陸軍小學、中學的同學，分別介紹到各起義部隊。就在這戎馬倥傯的冬日，陳果夫在陳其美的病榻前第一次見到了正在商談起義事宜的蔣介石。他後來憶及此事時說：「蔣先生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刺殺宋教仁的槍聲，粉碎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對袁世凱的幻想。孫中山揭發二次革命的大旗，興兵討袁。陳其美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果夫奉陳其美的命令招集軍校同學二百餘人組成奮勇軍，並任副司令，率部參加了攻襲江南製造局的戰鬥。該役失敗後，陳果夫負責辦理善後事宜，因勞累過度大量咯血，入醫院治療兩個月才康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陳其美再次發動肇和兵艦起義討袁，陳果夫專任聯絡通訊工作。在起義的關鍵時刻，法國巡捕突然到起義指揮總機關進行搜捕。陳果夫聞聲啓門時，見有五個巡捕用槍對著自己，想到陳其

美、楊滄白等人正在樓上開會，他便奮力同巡捕爭持，拖延時間，並設法弄出聲響，引起樓上警覺，使陳其美等人及時越屋逃脫。及至巡捕上樓搜查時，陳果夫和其他在樓下被捕的人又奪窗而走。脫險後，他在蔣介石的寓所找到陳其美，繼續爲聯絡各部奔忙。蔣介石在陳果夫死後的《褒揚令》中，有「繼承革命家風」之語。若以此評價他追隨陳其美參加革命的這段經歷，尙屬貼切。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陳其美被袁世凱的爪牙刺殺於上海。由於白色恐怖，一時間竟無人敢認領屍體。蔣介石感其知遇隆恩，悲痛萬分，哀哭之後，把屍體載回自己家中。陳其美死時家中只有二十元錢，蔣介石的錢也不夠，便出外借錢爲其料理後事。他還親撰一篇至哀至痛的祭文，發誓要做陳其美的「化身」，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對蔣介石的俠義之舉，陳氏兄弟沒齒不忘，並以畢生忠誠作爲回報。

陳其美遇難後，陳果夫遷返故鄉。一九一八年春，由其岳父介紹進上海晉安錢莊學習錢業。蔣介石沒有忘記這位義侄，一有機會，便對其備加照應提攜。一九二〇年，孫中山爲籌措革命經費，籌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由張靜江、戴季陶等具體辦理。時值蔣介石不安心在援閩粵軍中任職，也到上海參預其事，並讓陳果夫組織茂新號，擔任五十四號經紀人，專門經營交易所生意。一九二四年，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籌建黃埔軍校，立即邀請陳果夫赴粵

襄助，因其未往，又令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和一切軍用品。不久，蔣介石又轉給陳果夫一張孫中山任他爲招兵委員的委任狀，並讓他負責主持招兵工作。陳果夫先後在江、浙、皖招募了四千餘人，做爲第一、二兩團教導隊新兵，又在上海及北方和華中招收軍校第三、四期學生三千餘人，還招收軍官數十人輸往黃埔。這些都是日後統一廣東和參加北伐的基本隊伍。

陳果夫對蔣介石所交辦的一切事情均盡心盡力，然而他真正成爲蔣介石的左膀右臂，則是在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決意加緊反共的時候。孫中山逝世後，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蔣介石爲取得最高領導權，加緊布置自己的心腹班底，遂屢次電催陳果夫南下。一九二六年四月底，陳果夫離滬赴粵。此前他已被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爲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因是以「陳果夫」三字當選，此後便以字行，而祖燾的名字反不爲人所知。他到廣州不久，蔣介石在國民黨召開的二屆二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致使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離職。至此，蔣擔任了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任陳果夫爲組織部秘書。六月又提升陳果夫爲中央組織部組織委員會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秘書。七月九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誓師北伐，組織部長一職即由陳果夫代理，並兼政治會議委員，

而辭去該會秘書職務。時僅兩個月，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陳果夫也隨其飛黃騰達而一舉成爲黨務要人。

在蔣介石忙於羅致親信的時候，陳立夫已由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回國，應聘擔任了中興煤礦公司的工程師。蔣介石召其赴黃埔軍校當秘書，陳立夫覆電表示自己已是學礦的，要找礦開。蔣介石又說，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你還開什麼礦？陳立夫就此棄工從軍，北伐期間，在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任機要科長。

就這樣，這對同胞兄弟以叔侄之緣平步青雲，開始了他們的仕宦生涯。

助蔣反共

陳果夫從擔任組織部秘書時起，就自覺地擔當了助蔣反共的角色。在回憶錄中，他對當時組織部的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組織部完全在共產黨之手。宣傳部也半入於共產黨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黨操縱之下，本黨無法聞問。可以說本黨已經爲共產黨完全篡奪去了。在各省市方面，黨務大半爲共產黨所主持。……部中同事共二十九人，從名冊及思想方面，加以縝密的觀察調查，只有三位算得真正的同志，其餘都是跨黨分子……工作簡直無從著

手。」陳果夫是搗鬼有術之人，他立即請示蔣介石，加派他們信得過的人入組織部工作，同時利用各種手段將共產黨員排擠出去。他接任組織部長後，任吳倚滄爲秘書。「組織部人事經此不斷調整，並將各部門負責人逐漸改用本黨同志，對外才得順利開展，而部內與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負責，秘密工作則由倚滄同志負責，外人不知也。」對於陳果夫一夥，共產黨員楊匏安曾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因當時黨的總指導路線的右傾，遂使陳果夫等人的陰謀得逞，逐步控制了組織部的領導權。陳果夫不無自得地說：「經過這樣的幾次事件，章則已有改動，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遷到南昌之時，部中僅留有共黨三個，其餘都是純正的本黨同志了。」

中央組織部大權既已穩操在手，陳果夫又開始向各級黨部開刀。他把組織部內反共分子以視察和指導工作爲名陸續派往各地黨部，傳達反共旨意，聯絡組織反共分子並傳授反共的方法。未派人去的省分，則分別電令其來人到廣州面授機宜，策動各級黨部反共分子奪權。

在上海工人慶祝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的歡歌聲中，蔣介石與中外勢力達成了交易。陳果夫直接參與了「清黨」的陰謀計劃和部署。四月二日，他夥同吳稚暉等人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案，並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呈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對各地共產黨

領導人給予「非常緊急處置」，「在所在各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時分別看管監視」。爲蔣介石的反共屠殺張目。四月九日，陳果夫又與吳稚暉等聯名，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一份長達三千餘言的《護黨救國通電》，對中國共產黨和武漢國民黨中央進行大肆攻擊，爲蔣介石完成了最後一項政治準備。三天後蔣介石便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

「蔣家天下陳家黨」

蔣家王朝建立之初，蔣介石爲最終實現其獨裁統治，一面同新老軍閥在戰場上廝殺，一面同國民黨中其他政治派系——汪精衛派、胡漢民派、西山會議派展開了「正統」之爭。前者，蔣介石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和黃埔系的武力取勝，後者，則主要通過陳氏兄弟操縱國民黨組織大權來完成。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蔣介石在寧漢對立出現轉機之時，採取以退爲進的策略，宣布下野。陳果夫此前經營的派系勢力被悉數鏟除。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再度上台，重掌軍政大權，仍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復任代理部長。

陳果夫立即著手兩件大事：其一，提出《整理黨務案》，「其精神在把以往就人來劃訂組織，改爲以事來劃訂組織。將共黨遺留作風一掃而空。」其二，重新進行國民黨員總登記。在總登記表上關於政治信仰的欄目中，列舉對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與區別的問答題，測驗填表者的政治趨向，據此決定其登記與否。這既是繼四一二之後的進一步清黨，又是對非蔣勢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陳果夫對部內的人員進行了改組，盡其所能安插親信，其調查科長以陳立夫擔任。隨後他又以選派各地黨務指導委員爲手段，由其親信接收全國各省市黨部，並掌握各黨部的組織部門，據此把手伸進國民黨最基層的組織中去。

陳果夫排斥異己的作法，遭到其他各派的抵制，其中尤以謝持反對最爲激烈。陳果夫爲了整治他，略施小技，派人「經過詳密偵察，且得證據」，證明謝持所介紹過的人中，有兩名共產黨員，就此封住謝持之口。同時，陳果夫對其他反對派極盡分化、收買之能事，使其中很大部分歸附自己的門下。以這番準備做基礎、加之武力做後盾、並運用圈定和指派代表的手段，蔣派勢力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中取得了絕對優勢。陳氏兄弟及其大量親信被選入中央委員會，蔣介石連任組織部長，陳果夫爲副部長、代理部長，陳立夫由前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一躍而任中央秘書處秘書長，使中央組織部得到最高幕僚長的呼應和協助。不久，又由陳果夫接任組織部部长。至此，蔣派把持國民黨中央、控制各省市黨部已成

定局。

從一九二九年國民黨三大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統治崩潰這二十年漫長的歲月中，國民黨各級組織人事大權和黨務經費的管理權與支配權，多半操在陳氏兄弟手中，二人輪番執掌，他人極少問津。他們利用職權之便，擴張羽翼，結派營私，把重要親信都提拔為中央委員，而這些人又層層網羅追隨者，其勢力迅速膨脹，從而形成以二陳為首的CC系。猶如黃埔系之於軍隊，CC則是蔣介石在黨務系統中的嫡系，故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CC系由封建關係結合而成，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中最腐朽、最反動的部分，是蔣介石賴以維持其獨裁統治的中堅力量，其罪惡活動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特務活動等各個方面。

一九三三年初，在蔣介石的授意下，CC系成立了一個具有嚴密組織機構和政治綱領的「秘密法西斯團體——以「青白團」為核心的「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其組織章程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擁護蔣介石一人為國民黨唯一領袖，終身不渝。該會在南京設立中央幹事會，陳果夫、陳立夫分任正副幹事長，中央常務幹事由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五人組成。該會成立後，二陳即派中央幹事到各省市秘密組織分會及作為該會外圍的青年組織，如北平的「誠社」、南京的「青年社」、東北的「東北青年學社」、河南的「武德社」、上海的「上海協會」等。這些組織都以擁護反共，破壞民主革命運動為宗旨。

國民黨中央的特務機關也一直被CC所把持。一九二八年，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將該科業務全部轉向特務工作系統。一九三六年該科擴充為黨務調查處，並於一九三八年由中央組織部劃出，單獨成立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陳立夫、朱家驊先後兼任該局局長，負責實際責任的副局長一職則長期由陳立夫的表親、CC系的重要頭目之一徐恩曾擔任。中統的主要任務是調查、迫害、逮捕、審訊共產黨人，兼對其他黨派和國民黨政府機關人員進行調查監視，是蔣介石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得力工具。

CC系除充當蔣介石打擊汪、胡等異己勢力的打手外，也積極插手蔣介石拉攏和分化地方實力派的活動。蔣介石政權雖表面上號稱「統一」，實際上，其勢力偏在東南數省，對邊遠省區的省主席則一般不得不以地方實力派充任，而這些省的省黨部則多由二陳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派去親信，再搭配幾個地方實力派推荐的委員組成。如果派去的人不得力，就從當地與地方實力派關係密切者中去收買。如抗戰前，日本帝國主義一再拉攏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搞「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對韓很不放心。與韓復榘關係密切的何思源本來與CC有矛盾，曾一度與韓共同與蔣做對。後來二陳認為「與其在山東另培養人，不如拉現成的」，於是陳立夫便主動到濟南何思源家中登門和解，並在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親率張道藩、洪蘭友等CC系大員推選何當了中央委員。這番拉攏果然奏效，此後，韓復榘的一舉一動都在

蔣介石的掌握之中。二陳還積極鼓勵手下的人打進各級政府，陳果夫曾對一個CC分子說：「我們要使一些同志想出各種方式方法和各省主席發生關係，……一直到獲取他們保荐為省政府委員、廳長或是縣長。」

CC系還是蔣介石制衡其他嫡系——黃埔系、政學系的重要砝碼。在三派爭寵爭權的鬥爭中，蔣介石大耍權術，使其相競相克，以收絕對效忠自己之功。CC在黨政系統中和政學系鬥，在特務組織中和以黃埔為核心的復興社鬥，在經濟部鬥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為首的裙帶派鬥。無止無息的傾軋，常使CC頭目焦頭爛額，而使他們最為寒心的，是蔣介石有意製造派系矛盾。他們曾問任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書記長的張治中：「蔣先生既要我們搞這個組織，為什麼又要黃埔學生搞那個組織？」一九四六年三月，蔣介石為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選問題徵求陳果夫意見。陳果夫表示自己身體不好，並不客氣地對蔣說：「總裁究竟要我辦金融，抑仍欲余任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則不必多此一舉。」蔣介石回答：「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陳果夫隨即反詰：「現在中央誰做得好？」問答之間流露著微妙的哀怨之情。

包攬職權種種

二陳除長期執掌中央組織部大權外，還在中央及地方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

一九三三年十月，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他強化江蘇的警察制度，在部分地區實行「警管區制」，並訓練壯丁，組織保安團隊，自任省保安司令，統掌全省的地方武裝。爲配合蔣介石在江西對（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圍剿，陳果夫在江蘇也進行了血腥的「剿匪」。在對革命群眾進行武力鎮壓的同時，還建立起所謂「感化院」。其「感化」的方式多種多樣，除刑法之外，還包括向年老耆講陰德報應之說，請和尚講佛經等。他在任內還力主禁烟，但對娼妓卻較爲寬容。他認爲「政治應該講實際。娼妓在不能根本解決以前，既無法使之不存在，與其名禁而實不禁，不如管制的開放，對社會道德、民族健康乃至於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

爲了給自己樹立一個清官的形象，陳果夫處分了四個貪污有據的縣長，其中還有一個是他的親戚。爲了整頓財政，他在省縣各級確立財政預算制度和金庫會計制度，把全省金融統抓在自己手裏。他還以陳報土地作爲整頓田賦的辦法，使搜刮民財的組織工作更爲縝密。

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的同時，兼任導淮委員會代理副委員長（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任）。他主張治理淮河應上下游同時治理，並主持了工程浩大的導淮入海工程。

陳果夫患有嚴重的肺病，不得不經常在病榻上處理公務。與其兄相比，陳立夫則健康活

躍，奔走各地集會講演是其樂事，蔣介石遇有「遠征」性質的重要使命也多派他去承擔。

一九三一年六月，陳立夫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一九三五年底卸任後，他接受了一項秘密的外交使命。自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採取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更加變本加厲。在其步步緊逼之下，蔣介石擔心與日本的決戰遲早不免。為在國際間尋求盟友共同對日，他派陳立夫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張沖一起經歐洲去蘇聯進行外交活動，以求同蘇聯建立軍事同盟。但消息很快即為日方得知。蔣介石不願公開得罪日本，聞訊後立即將陳立夫召回，命其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南京進行交涉。此間，陳立夫還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就停止內戰共同對日問題進行了商談。他同蘇方進行了長時間的商議，沒能達成軍事同盟，但卻達成了互不侵犯條約，在其內容與文字等細節全部談妥之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由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方代表正式簽字生效。

為落實互不侵犯條約附帶條件中的援華物資運輸路線問題，陳立夫又奉派新疆與盛世才商洽。當時盛世才在新疆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對南京國民黨中央的指令時常不買帳。陳曾在盛與「中央」的爭執中為「中央」解過圍。此次新疆之行也達到了目的，對沿途各站飛機、大炮等重武器運輸所需的汽油等問題都做了安排。抗戰初期在保衛武漢的空戰中給予日本飛機以重大打擊的中國飛機，就是從這條運輸線運到抗日前沿的。為此，陳立夫在戰後獲

得空軍獎章。一九三九年七月，蔣介石參照陳果夫的意見，增設侍從室第三處，以陳果夫為主任，掌握人事及訓練大權。作為蔣介石的人事幕僚機構，侍三處的職責主要是開展對全國人事的調查、登記、考核、分配和通信指導，既為蔣介石提供政府機關中上層人員的工作情況，又為其聯絡、吸收和甄選各方面為蔣家王朝忠實服務的「人才」。在陳果夫的主持下，侍三處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這樣一來，全國各界的人事情況盡入陳氏彀中。遇蔣介石需要某種人選，侍三處就把相關人員的登記卡提交蔣介石參考使用。隨著侍三處組織的完備，不為陳果夫所中意的人，很難作為候選人得以簽報，或是在簽報時，被加上一些不利的按語，藉以影響蔣介石的決定。陳果夫掌管人事的權要部門達六年之久，屬於CC系的大小官僚自然是向陽花木、近水樓台，這是該系勢力在抗戰期間大為擴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九二六年，陳果夫初次代理組織部長時，為培養反共分子，提議創辦了黨政訓練所。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之後，他又與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磋商，將黨政訓練所擴大為中央黨務學校。不久，又改稱中央政治學校。蔣介石任校長，實權則掌握在陳果夫手中。他先後擔任該校的總務主任和教育長。他在談到辦校目的時曾對人說：「我們辦政治學校就是為全國培養縣政人才。由縣長可以升為廳長，逐漸就將全國各級政府抓到手裏。」希望這所學校能

像黃埔軍校在軍事系統中的作用一樣，擔負起政治上的責任。他對學生的思想統治極為嚴密，對有進步思想或不聽擺布的學生，動輒處分、開除。抗戰初期，該校由南京遷往湖南芷江。在此期間，陳果夫因校內風潮開除了大批學員。學校實行軍事管理制度。多年後，他在回顧這段經歷時，認為自己辦校有功於「黨國」，但卻又故作謙恭地說：「本校之設立，在本黨言，則為比較有成就的一環，在學生方面言，則於政治方面雖有貢獻，但尙少赫赫之功，實有負校長以政治家相期許耳。」

陳果夫在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期間，還兼任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辦公廳主任、教官及教育委員，經常支撐著病體去訓練班上課、講演。他對辦訓練班的作法印象甚佳，以致數年後的一天，忽發奇想，說八哥、鸚鵡等「均可設訓練班訓練之。如能教成各種含有警誡語氣之人類語言，懸置於重要通道，當有裨於人類之進德修業。學校、機關、醫院、監獄、公園等處，如能以鳥作人言，輔助教訓，作用當更大。」由此可見，他的訓練目的只在於使人們成爲毫無獨立思想個性、只會聽從他們擺布的工具。

陳果夫對培養黨棍的熱情和他對普及教育的冷漠態度適成鮮明對比。他認為「普及教育是很危險的。中國人腦中充滿了做官的思想，一讀了書就想做官。……教育變成製造亂子的東西。」他對高等院校的文科教育尤其反感。早在一九三二年，他就提出《改革教育的初步

方案》，經國民黨中央修正通過，交教育部執行。其中規定，全國各大專院校一律停止招收文學、法學及藝術科學生，暫訂以十年為限，所節省之經費移作擴充農、工、醫科之用。這種「減少文科、增加實科」的做法曾在當時的教育界引起強烈的爭論。增加實科固然不錯，但減少文科卻是為國民黨加強對教育及文化的統治服務的。

陳果夫的上述所謂「政績」，被蔣介石稱譽為「內佐銓衡，肅政培才，彌宏實效」。而在這個問題上，陳立夫的「作為」也毫不遜色。教育部門歷來為CC系所垂涎。陳立夫在任組織部長時曾對人說：「教育部門，我們必須拿到手。這是管理思想的部門。我們天天喊叫黨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門在人家手裏，這還行嗎？」抗戰初期，他擔任軍事委員會第六部部長，該部解散後調充教育部部長。他打著「抗戰第一，國家至上」的招牌，開始實施他的「戰時教育」措施，極力在教育界擴大CC系的影響。他首先拉攏一些名流學者擔任各司司長，並大量安插CC骨幹分子占據教育部的重要職位。為了對學校施行法西斯的思想統治政策，培養效忠「一個黨、一個領袖」的人才，陳立夫在教育部設立了大學訓育指導委員會，向各大學指派訓導長，以管制大學生們的思想，打擊進步教授。在中等以上學校設「導師制度」，「導師」一律為國民黨的爪牙，其職責是對學生進行監視並施以嚴格的「訓導」，禁止學生集會、結社。教育部還在一九四三年發布命令：凡有不遵守校規、「思想不純正」的

學生務須開除，交青年訓練團（即勞動營）施以特別訓練後，分發補充壯丁。白色恐怖加以戰爭造成的民生凋敝，使國統區學校師生困苦不堪，教育事業面臨毀滅的危機。這就是陳立夫八年戰時教育的「功績」。

身爲中統的頭目，陳立夫特別注重對特務的訓練培養。他在談到特務訓練時說：「重質不重量，寧可少，不可濫。我們不許用那種北洋軍閥招兵的方式，舉起旗子叫人跟著走就算自己的兵。我們要找孫猴子，找了一個孫猴子，可以放棄一百個豬八戒。」這就是CC對核心組織骨幹分子的培訓原則。抗戰期間，中統在重慶舉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中央青年幹部訓練班」，陳立夫、張道藩、葉秀峰、葉青等人和中統內部的若干高級特務經常前去進行「精神講話」。其中陳立夫的講話對學員們的影響最大。他善於捕捉特務們的心理，以親切的態度、「自己人」說「自己話」的語氣博得特務們的好感，使自己的灌輸發生效力。他經常在講話休息時間和他們聊天，爲特務們撐腰打氣：「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在別的範圍遇到困難，吃了苦頭，得不到半點支持和溫暖，在我們這裏就不會，絕對不會，只要你不出賣組織，天大的事體我陳立夫包下來！」這種話對許多不識騙局、沒有經驗的新特務產生了一定的向心力，這是陳立夫「培才」的特有效果。

進獻「良謀」

同許多在大革命中跟隨蔣介石的人一樣，陳果夫仍自認爲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信徒。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曾經談到一九二九年他任監察院副院長並兼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時，制定了兩個計劃：「一爲城北土地開發計劃；一爲南京市平均地權計劃。」不久，當他自己想在南京買地時，才得知地皮已盡爲那些開會的「委員」們所有，「乃恍然大悟。」碰了這個釘子之後，他又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數次提出有關地政的議案，此外，他還作了一首《地政歌》，歌中唱道：「國民革命，爲打不平，富不過富，貧有田耕。民生主義，必須實行。」然而，不管他個人的主觀意願如何，「平均地權」都只能當作民謠吟唱一番而已。

陳果夫還是國民黨中「合作運動」最熱心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確：「合作必合於民生主義，始可針治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之妄」。他把合作制度稱作「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端中間的一條中庸大道，它調和著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營和私營，而且具有計劃統制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是實行三民主義社會經濟建設的康莊大道。」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國合作學社成立於上海，陳果夫任常務委員。他還創作了三首合作歌和一部名爲《合作之初》的四幕白話劇本，廣做宣傳。蔣介石認爲這種合作運動符合他的

反共政治需要，因而支持陳果夫的倡議，在陳起草的《本黨應特別提倡合作運動案》上與張靜江、李石曾等共同署名，提交國民黨第三屆第四次全體執監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民政府實施。一九三六年，由陳果夫提議，在中央政治學校增設了合作學院，專門培養開展合作運動的人員。此後又成立了中國合作事業協會、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中央合作金庫等機構，均由陳果夫主持。盡管合作運動的聲勢轟轟烈烈，對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卻微乎其微。

此外，二陳積極追隨蔣介石，宣揚王陽明「致良知」的哲學，提出所謂「力行哲學」，將封建倫理思想與法西斯主義溶為一體。陳立夫拋出《唯生論》一書，為蔣介石的力行哲學張目。一九三四年他又發起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自任會長，出版《文化建設》雜誌，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實際上，他所謂的「建設」，走的仍是清朝統治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路。

封建文化是蔣家王朝得以建立和維持的最深厚的土壤。陳果夫深諳這個道理。他說：「保留舊制度、舊習慣，為中華民族將來著想，實有必要；因外來文化之侵略力大，不能不用此為最佳之抵禦防線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陳果夫任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制定了《文化事業計劃綱要》，又稱《中國國民黨之文化政策》，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提交中常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為了恢復「民族的固有文化」和排斥外來文化，綱領

十一條規定：本國人相互間不得使用外國語言文字。因爲在陳果夫看來，中國人之間不用中國語言「簡直是忘本」。「中國人不用本國的紀元而寫一九四一」也被說成是「精神上」亡國的一種表現。他這種可笑的小題大作，恰是腐朽的國民黨集團對一切外來文化的恐懼和排斥心態的真實反映。在陳果夫的眼裏，唯有封建的倫理道德才是衡量事物的至高標準。抗戰初期的一天，文藝協會的天風劇團在廣播電台播話劇，陳果夫聽到中途，命令停住，因他認爲「母女與子合謀毒殺父親，其父親雖爲漢奸，可殺，但殺於家庭，不可也，暗殺方法尤不可也。照民族主義，忠孝應兩全，不能爲盡忠而反孝道也。」他還主張「訓練優良公正之家長作爲地方自治之基層幹部」，把封建宗法家族式統治奉爲佳作。他把自己所倡所行的這些陳腐貨色都加上「根據」孫中山某某「遺訓」的標籤。這表面上，是拉著大旗做虎皮；骨子裏，是企圖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完全儒家化、道統化。

有時，陳果夫對蔣介石的處事方式也略進幾言。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他致函蔣介石，勸其「勿以責罵、嗟息、盛怒、著急等態度對同志，而應以教育家感化方式處之。本黨以前，教養無道，鼓勵無方，致現在無人才。若不以教養鼓勵出之，著急無益也。」當然，這種包含批評意味的「逆耳忠言」，陳果夫只是偶爾爲之，而出謀劃策，討取蔣介石的歡心，則是其刻意所求：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向何應欽等建議：「委座生日，最好發動由

各方面捐獻飛機，作爲壽禮，可固國防。」遂在蔣介石五十壽辰之日，演出了一場獻機祝壽的鬧劇，在陳果夫主政的江蘇省，即獻機九架。十年之後，爲蔣介石六旬大慶，陳果夫又發起在南京建築「介壽堂」。

對陳果夫的種種活動，蔣介石多有評價，稱他「匡維禮俗，……改革地政，倡導合作，蓋畫良謨，有裨建國。」當然，蔣對二陳也並非處處滿意。他曾公開誇獎復興社分子劉健群「比陳果夫兄弟要進步五年」。

（王東方）

〔第五章〕

政學系首領張群

說客、謀士、懷刀

在天府之國四川，華陽縣與成都縣同城，一八八九年五月，張群（字岳軍）就出生在這塊富庶的平原上。一九〇一年後，張群就學於新學堂。一九〇六年，張在華陽中學時，聞保定軍官學校在四川招生，決心投筆從戎，投考獲取，北上入學，隸步兵第二隊。時蔣介石在砲兵科，兩人來自中國的一東一西，並不相識。一年後，張與蔣介石等六十人東渡日本留學，在船上蔣、張二人相識，張見「賢」思齊，改爲和蔣介石同學砲兵科。到東京後，入振武學堂。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界革命氣氛蔚然成風，受其感染，張旋即加入中國同盟會，並由黃郛介紹參加同盟會中軍校同學之秘密組織「丈夫團」。畢業後，和蔣介石一同在砲兵聯隊實習。張群以後能官運亨通，仕途青雲，他和蔣介石的這段同窗之誼是爲契機。

張群雖然學過軍事，但他並沒有成爲軍人，他棄武從政，在中國政壇活躍幾十年，是舊

中國官場上靠政治起家的典型。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蔣介石、張群等潛回上海，參加上海光復之役。張同蔣介石、黃郛同在陳其美手下任職。

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舉起護法旗幟，張群和蔣介石同任大元帥府參軍。當時西南各省發表宣言，支持孫中山；但四川軍閥林立，意見分歧，張奉命赴川聯絡協調，並同楊森等在重慶組織「川事維持會」，遭北洋政府通緝。返回上海後，主辦「民國日報」及「中華新報」。後又赴川，任成都市警察局長。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張應胡景翼之邀赴開封，任河南省警務處長兼開封市警察局長。

黃埔軍校創辦時，蔣介石曾派王柏齡到上海邀舊時同學及同事赴粵工作，張因故未能成行。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並著手準備全面反共，建立政權，極力拉攏黨政軍各方面官員，拼湊班底，張群被任命為總司令部總參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張群任軍政部次長。從此，張群一躍成為蔣介石身旁的要員和最親近的幕僚，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作為「蔣介石的懷刀」，活躍在國民黨內，為蔣介石出謀劃策，四出遊說；蔣經常把最不放心，最難處理的事情交給張群辦理，張也最能領會蔣介石的意思，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張始終和蔣介石共進退。

張群投靠蔣介石後，便奉命遊說孫傳芳。孫傳芳本人及將領數十人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張群與之均有同窗之誼，張以此關係，向孫建議三策：(一)上策：與國民黨革命軍攜手共同北伐；(二)中策：局外中立；(三)下策：助吳佩孚對抗國民革命。孫當時輕視國民革命軍力量，又曾受吳佩孚之提攜，不願負吳，乃採中策。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自保境安民的主張。當時北伐軍揮師挺進武漢，孫傳芳感到自身可危，乃自贛西發動攻勢，但勢孤力單，大勢已去。

蔣介石南京政權建立後，張群擔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上海兵工廠廠長。一九三〇年四月，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張群剛剛走馬上任，中原大地，又起戰火。當中原大戰正酣之際，爭取張學良成爲蔣介石及反蔣派誰能取勝的關鍵。張學良在戰爭初期，表面中立，靜觀局勢發展。張群受命帶著南京政府任張學良爲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及巨款到瀋陽，又跟踪張學良，從瀋陽到葫蘆島，至北戴河，軟磨硬泡，費盡心機。終使張學良出兵助蔣，張群立了大功。

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中，張群是新政學系的領袖。由於張群在蔣介石身邊的顯赫地位，新政學系水漲船高，發展很快。實際上，政學系只不過是一個政客集團，既無組織，又無原則，僅憑政治策略和運用以獵取個人的政治地位而已。他們善於揣摩蔣介石的心理、願望和

需要而進行政治策動。有時對於各種政治問題都是預先做好幾種不同的答案，一旦看準風向，就提出相適應的主張，故能和蔣介石的意圖一拍即合而獲得信任，有時也確能出謀劃策，針對蔣介石的願望和需要而解決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政學系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新政學系中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擔任過蔣介石秘書的楊永泰，一度成爲寵臣，另一個就是張群。政學系的政治資本，主要建立在：一是對各黨派的運用；二是對各實力派的運用；三是對英美和對日本外交的運用。其中對實力派和各黨派的運用，是政學系手中的一張王牌。拉攏各黨各派，增加蔣家王朝的勢力，張群起了重要作用。張群在蔣介石身旁，被稱爲做「漿糊、膠水工作」，許多實力派、反動黨派，幾乎都通過張而與蔣結合。民社黨首領張君勳，本是政學系重要幹將張嘉璈之兄，與張群極熟，運動民社黨投靠蔣介石，並由國民黨中央發給民社黨經費等事均由張群辦理。青年黨頭子曾琦，一九三二年與張群熟悉後，又由張介紹給蔣，使青年黨逐漸投靠蔣介石。各地方軍閥，雜牌隊伍，通過張群拉攏而附蔣者頗多。四川是張群老家，各軍閥都通過張群向蔣疏通。軍閥陳調元、劉鎮華、徐源泉、龍雲等，多由張群而加強了同蔣的關係。閻錫山、馮玉祥等也多由張群拉線傳達一切。

一九三三年，張群出任湖北省主席。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在此前後，汪

精衛遇刺受重傷，親日派要人、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刺身亡；南京國民政府人事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任行政院長，張群擔任外交部長。一九三七年二月，張群改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張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次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張群雖官運亨通，但出任四川省主席卻爲同鄉所拒。原來，抗戰爆發後，川軍以國家、民族爲重，派出十四個師出川抗戰，劉湘隨軍督戰，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病在漢口逝世。劉湘一死，川軍群龍無首，四川政局不穩，蔣介石想藉機掌握四川，宣布撤銷劉湘主持的七戰區和川康綏靖公署；任命張群爲四川省主席，接著又任命張爲四川省保安司令。這一撤一任，使川軍將領感到嚴重威脅，雲集於新頭領王陵基麾下，逼蔣介石收回成命。張群爲川人所拒，蔣介石也覺得放不下面子，一心想讓張群掌握川政，穩定大後方局勢。一九三八年八月，蔣介石曲線迂迴，任命張群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主管西南各省，乾脆爬回到四川省府頭上做窩。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群參與國共兩黨談判，並參加舊政協會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舊政協會議召開之前，張群爲拆散民盟，孤立共產黨，費盡腦汁，機關算盡。民盟在醞釀推選參加政協的代表時，一天，張群、吳鐵城等出面邀民盟一部分常委，以商談舊政協籌備事務

的名義，舉行談話會。開始，張群講了些蔣介石準備怎樣舉行舊政協的話，並徵詢大家的意見，話鋒一轉，故意挑起關於民盟九名代表名額在民盟內各黨派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時，青年黨左舜生突然發難：「青年黨在中國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歷史的大政黨。它在民盟三黨三派中當然是最大的一個政黨。民盟九個代表的名額，青年黨要占五席。」左舜生這段話使在座的其他民盟領導人大為驚異。原來這是張群一手導演的雙簧戲，是一個拆散民盟的陰謀。當然遭到民盟其他人的反對，雙方爭論不休，僵持不下。張群站出來圓場說：「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問題上真有困難，青年黨作爲一個獨立單位參加政協倒是辦法之一。這不就減少了民盟內部的糾紛嗎？至於這兩方面每方面幾個代表，是否兩方面代表的數目一定要相等，這總是可以協商解決的。」這樣，張群一方面按照預定計劃，支持青年黨來達到分裂民盟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做得十分圓滑而不過分地得罪民盟其他的領導人。

在接收東北問題上，由於張群、吳鐵城的建議和策動，政學系捷足先登，蔣介石內定由政學系要員熊式輝接收東北。張群企圖在東北製造一種虛假的、形式的民主，設法爭取中間派的合作，使之更具有欺騙性。這一企圖最後破產。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在召開「國大」、制訂憲法之後，又加緊實行所謂「實行憲

政」的準備。一九四七年四月，國民黨又演出了「改組政府」的丑劇。在這場鬧劇中，張群粉墨登場，出任行政院長，這一所謂的「多黨政府」，成爲蔣介石獨裁統治的裝飾品。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群改任總統資政。一九四九年初，蔣家王朝將要滅亡，爲做垂死掙扎，張群受命擔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及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爲挽救國民黨的敗亡出力。同年底，蔣介石眼看四川將要解放，成都旦夕不保。他策劃，想利用雲南和西康這塊地方，作爲負隅頑抗和垂死掙扎的最後據點。爲此，張群多次赴昆明活動，十二月初，張群到昆明和雲南省主席盧漢協商，說蔣介石準備把中央政府搬到昆明和西昌，盧漢以「雲南民窮財盡糧缺，負擔不起，雲南人民不會同意」相拒絕。十二月九日下午，張群再次飛往昆明，並想經昆明去台灣。當晚，盧漢率部「起義」，扣留了張群，並讓張的隨員對張說：「起義是雲南人民的強烈願望，我們是順應民意棄暗投明而起義的，希望張先生和我們一致行動。」張群說：「你們的起義行動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國民黨的確是無法挽回了。蔣先生過去所做所爲，連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係你們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們一致行動。如果你們要把我當作俘虜看待，交給共產黨，我想他們也不會對我怎麼樣的。要是你們讓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後也不再做什麼事，到海外做個寓公算了。」由於張群的表白

和乞求，盧漢一念之差，顧及和張群的舊情，將張釋放，使之逃到台灣，免當階下囚。

對日外交的老手

同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樣，對日外交也是國民黨政府最直接、最棘手的問題。張群作為蔣介石的智囊，特別是對日外交的主要參與者，負有特殊責任。在他九十高齡時撰寫的回憶錄《我與日本七十年》，啓筆憶舊，追溯往事，一部充滿屈辱、血淋淋的中日關係史躍然紙上。正如張群所說：「追懷往事，真不勝其感慨，在這七十年的中日關係史上，我可說是淵源最久，接觸最多的一個……我幾乎是無役不從。」

早在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時期，張群就開始插手中日交涉，曾就「西原借款」問題赴日本活動。這是張群一生致力中日關係的開端。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被桂系逼迫，及其它原因，第一次下野，以退為進，暫歸奉化故里。九月底，在上海東渡日本，隨行主要有張群、陳群等人，蔣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同張群等一道廣泛結交、會見日本朝野，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等密談，拜謁日本黑龍會的頭山滿，為東山再起撈資本。蔣回國後，張群繼續在日本活動。

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國民黨軍隊進行對張作霖的「北伐」。日本對於「以美元為背景的南軍北上」，顯然是不甘心的。五月出兵濟南，釀成濟南慘案，蔣介石妥協退讓，不准還擊，「忍辱負重」，國民黨軍退出濟南，繞道北上。與此同時，張群叩命赴東京斡旋此事，拜訪日本首相，乞求日本政府對國民黨政府的「北伐」予以理解和支持，力請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濟南事件，但並未獲得日方的滿意答覆。當張群回到徐州時，濟南事件已告一段落。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伐」結束後，張群再次被派往日本，和日本首相田中會談，目的是向日本介紹中國國內政局，希望日本在中國東北問題上保持友好態度，對國民黨南京當局的統一事業不要加以阻難。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空前高漲，身為上海市長的張群，「盡力防弭淞滬地區人民反日行動，不使擴大為全面之衝突。張認為中國內部尚未統一，國力尚未充實，對日關係，不宜破裂。」這種舉動和主張，遭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張被迫辭職。一九三二年初，蔣介石集中力量在南方對紅軍大打出手，為應付北方政局，任張群為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兼北平市整理指導文化委員會副委員長，協助張學良策劃北方軍政大計，主持對日交涉。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被張群在執

行對日交涉中，忠實、具體地體現出來。長城抗戰爆發後，黃郛受命北上，與日軍交涉，張群多方協助，簽定「塘沽協定」。把對日妥協活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張群在座，對日軍在華北的活動，張群指出：「如日本召還土肥原，阻止多田駿赴濟（南），則自治運動，可以立熄。昨日華北來人指告：土肥原曾提出共同防赤自治委員會組織方案，其中以土肥原為總顧問，可見自治之事，係由日本所鼓動！」態度較為強硬。不久，張群任外交部長，負責對日交涉。張群上任後，一改四年來中國「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採取「主動的與日本談判」，以求全面調整中日關係。

張群受命於危難之際，此時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將侵略魔爪伸向華北，浪人走私，經濟蠶食，支持漢奸暴動，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這些行徑，嚴重威脅了國民黨的統治，也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響，一二九運動的爆發，使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五全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發生了新的動向。日本政府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開始，向中國方面提出了「廣田三原則」，蔣介石起初曾表示可以原則上接受，以後態度則漸趨強硬，遂使談判僵持而無結果。張群在談判中秉承蔣介石意圖，針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口頭提出的超過「二十一」條的七項強硬無理要求，

提出了中國希望調整兩國關係的五點希望，要點爲：塘沽協定及上海停戰協定的取消，冀東政府的解散，華北自由飛行的停止，停止走私及恢復中國方面取締的自由，察東及綏遠北部僞軍的解散。張群表示此五項問題爲中日糾紛癥結所在，若不解決，中日邦交無由調整。這些是針對日本的無理要求而提出的反要求，顯然不會被日本接受。談判到西安事變前，最後破裂。在中日近一年的談判中，張群與日方代表八次會談，一改以前對日一味退讓的態度，維護了中國的主權。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駐華使館秘書、武官奉調回國，謁張辭行，張群明確指出：「日本之對華態度如何，影響甚巨，故我國一方面決由外交途徑進行調整交涉，而同時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棄抗日之準備也。」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群作爲蔣介石的主要謀士，參與對日決策。張群（一說吳鐵城）提出了「戰必敗，和必亂，戰而後和，和而後安」的失敗主義論調的基本政策，在實際中被國民黨的消極抗戰政策所體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加緊進行「調停」活動，張群以中國代表身分參加談判。由於日本占領南京後，要價越來越高，態度更加強硬，談判破裂。次年一月，中日兩國同時召回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斷絕。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群任總統資政；九月，代表蔣介石赴日本，視察美軍占領日本後政

策實施情況。與麥克阿瑟及日本政界首腦會商戰後有關中日的關係問題。

國民黨政權潰敗台灣之後，張群仍是對日外交的主要擬定和執行者。到台灣後，張群任「總統府」資政、中央評議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一九五三年底接任「總統府」秘書長和「國防會議」秘書長，後因年邁去職，改任「總統府」首席資政。由於張群長期主持中日交涉，一九五〇年後，頻繁來往於台北、東京之間，強調日、台的新關係，及日、美聯繫的重要性。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廣泛活動，結交日本朝、野上層右派，挑撥分化中日兩國關係，破壞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九七一年七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八十三歲的張群還飛往日本做最後掙扎，和日本當局四度會談，企圖阻止中日邦交。最後，張群面對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無可奈何，悲嘆自己外交上的失敗。回到台灣後，被人說到：「只用耳朵聽他們日本朋友的話，只想保住和擴大權勢，一味親日，落到今日的下場。」

得意的政客

一九二四年以後，張群與蔣介石關係漸密，為博得蔣介石信任，張八面玲瓏，多方照

應，唯蔣命是從，無一絲異意與其間。在蔣介石二十多年的統治中，張群一直是蔣介石最親近的幕僚。據跟隨張二十年的秘書說：張「從無甚政治主張和目的，只關心權位和金錢」。張的一句名言是：「原則同意，技術研究」，乍聽起來，似乎還對，可是，一看下句，把上句完全否定了，等於沒有說。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占領上海後，張群的朋友評價張說：「衆友評岳軍，只能呼爲蔣之使女，而不得稱爲如夫人，以如夫人尙有恃寵撒嬌時，而張并此無之，惟有唯唯諾諾，欲如何便如何，無一絲違抗」。此評價確實入木三分。

一九三三年張群任湖北省主席，協助蔣介石「剿共」，頗賣力氣，權勢日重，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對張不滿，稱張爲「得意的政客」，其語也算貼切。

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被扣西安，南京國民政府群龍無首，一片混亂。中日情勢頗爲緊張，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壓迫國民政府，企圖以外交手段達到其侵略目的。張群任外交部長，首當其衝，又無法請示蔣介石，擔心把握失當，不符合蔣的胃口。因此，每遇對日交涉前，都召何應欽、熊式輝、王寵惠、張嘉璈等商議。確定之後，再據之以答。張還焦慮恐慌，深怕出錯。當時，張嘉璈譏笑張說：「不要緊的，我看你的氣色，不會倒霉。」又說：「你對於事上之道，已算盡其所能，不會有問題的。」

張群到台灣後，因年事已高，專攻養生之道，積十五年經驗，寫成《談修養》一書，到八十年代初期已印行九版。此書被捧為「經史爛熟於胸中，治中西哲理於一爐。」實際上是張群幾十年來讀書和做人做事的經驗總結。張群談修養，實是自我寬慰。他一生高坐政壇頂峰，鮮有政績，常被人們議論。對此，張群滿腹牢騷地說：「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多恩多怨，少恩少怨，無恩無怨。」他在書中告誡人們要度量寬宏，尊賢容衆。張群在書中表示要學郭子儀「功蓋天下主不疑，位極人臣衆不妒」。這裏道出了張群「修養」的奧妙！

到台灣後，張群多次出訪日本，有一次，張群在日本，有人說張：「岳公，你遣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一部分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回答得很坦率，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吃什麼菜，我做什麼菜。」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唯命是從，絕無半點自己的主張。

（程舒偉）

【第六章】

黨國鐵老吳鐵城

吳鐵城，以字行。一八八八年三月九日生於江西九江。吳家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縣）平湖鄉。其父吳玉田在光緒初年到九江任商店司賬，後自營洋貨店，充任九江商會協理，在當地頗有影響。

吳鐵城幼年時，由其父延師教授經史、英文等課程，後入美立九江同文書院讀書。一九〇九年，他結識了在九江任職的同盟會員林森，二人共同創立了「潯陽閱書報社」，作為宣傳革命思想的場所。吳經林森介紹加入了同盟會。他利用其父的地位和影響，聯絡新軍官兵和幫會力量，開展了一些反清的秘密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參加策動新軍標統馬毓寶於九江獨立，任九江軍政府總參議官。同年十二月，吳鐵城以江西代表身分，到南京參加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受到孫中山的接見。孫中山得知吳是同鄉的年輕革命黨人，便將他留在身邊工作。後隨侍孫中山北上會見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下令通緝革命黨人，吳亡命日本。翌年，首批加入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五年，

奉孫中山之命，赴檀香山辦理黨務，任華僑《自由新報》主筆，曾以「吳丹」的筆名著文，抨擊袁世凱的復辟活動。第二年春，吳回國，在香港、澳門等處進行反袁活動。孫中山成立廣東護法軍政府時，吳被孫中山電邀回廣州，任大元帥府參軍。後軍政府改組，隨孫中山回上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孫中山回廣東重組軍政府，吳仍任參軍職務。次年五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吳改任總統府參軍。隨後孫中山赴廣西準備出師北伐，吳留守廣州，接著出任香山縣「民選縣長」。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發動討伐陳炯明叛軍的戰爭，粵軍許崇智等部在福建組成東路討賊軍經汕頭向廣州方向進攻。吳鐵城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軍司令，率部參加作戰。二月，孫中山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吳鐵城旋被任命為廣州市公安局長兼省警務處長、工兵局籌餉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等職。當年十月二十五日，他被指定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參與國民黨改組工作。他曾創辦警衛軍講武堂，考選各地革命青年，學習軍事，經辦二期。及至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任校長，學員併入該校。一九二四年九月，吳隨孫中山北伐，任行營警戒兼代大本營參軍長，至韶關，旋奉命率警衛軍星夜回師廣州，參加平息商團叛亂，重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市黨部委員、組織部長等職。後其所率警衛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師，吳任師長。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之後，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發生了異

常的變化。國民黨右派勢力乘機抬頭，攻擊國民黨的左派，推行反共政策。

一九二五年六月，共產黨決定領導省港工團舉行省港工人大罷工。當向政府提出建議的時候，吳鐵城、孫科、胡漢民等人表示堅決反對，說什麼罷工將招致外禍。而在阻止不了時，又一再要求「推遲」舉行。十九日，省港大罷工終於開始。於是，他們極力加以破壞。他們通知「黃色工會」，不要派隊參加遊行，即使參加也要少數人去「應景」，並走在隊伍後面，遇有鎮壓可以搶先逃走。同時，收買部分把頭、工賊，陰謀分裂工人組織。爲了破壞封鎖港澳，他們爲港澳運送物資，並公開包庇破壞罷工的罪犯。許多罪犯，吳鐵城根本不加訊問，就予以釋放。國民黨右派的行爲，受到了左派領袖廖仲愷的嚴厲譴責，指出他們破壞罷工，就是破壞孫中山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應該受到懲處。

接著，吳鐵城等右派人物就把矛頭指向了堅持三大政策的廖仲愷。吳鐵城、鄒魯、林直勉、許崇智等人，在胡漢民家開了好幾次的「倒廖會議」，並接受了港英政府二百萬元的賄賂，決定實施暗殺手段。於是，右派分子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等有恃無恐，指使陳瑞等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將廖仲愷刺死在廣州市黨部門前。吳鐵城還藉故預先撤去市黨部門前的警衛，爲行刺提供方便。爲此，他受到了左派人士和人民群眾的憤怒斥責，並在廖案查處中被撤銷了廣州市公安局長的職務。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蓄意製造了反共反蘇的「中山艦事件」。在此期間，吳鐵城等右派頭目「共籌剿共之策。訂期三月某日，逮捕穗共，予以一網打盡。」氣焰十分囂張。「中山艦事件」激起了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和譴責。蔣介石感到自己羽翼未豐，時機尚不成熟，不敢當時就與共產黨公開決裂，遂採取「捨卒保帥」的辦法，懲處爲他製造事件的右派，以示其「第三者」的「公正」。結果，吳鐵城作爲「替罪羊」之一，被免除第十七師師長職務，並被押解到虎門橫檔砲台禁錮。

在陰暗的囚室裏，聽到外邊的潮聲和輪船的汽笛聲，吳鐵城「意亂心煩，憂慮未來不可知的命運。」他並不忘恨蔣介石，相反更加仇恨共產黨。同年雙十節，吳鐵城獲釋後離開廣州逃至上海，投居孫科家中。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隨後在南京建立了政權。吳鐵城抓住這個東山再起的機會，站到蔣的麾下，投入了「清黨」。是時，寧漢對立。吳憑著與孫科的關係，力促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孫科等與南京政權合流。蔣介石見吳鐵城不乏利用價值，便於同年六月起用他爲廣東省政府委員、建設廳廳長。這樣，吳鐵城終於在蔣家王朝找到了歸宿。

蔣介石的說客

吳鐵城素來擅於交際，追隨孫中山革命時，走南闖北，結友甚廣，且機靈敏銳、能言善辯。當上南京政府的大員後，他效法春秋戰國時的遊說之士，為助蔣介石完成「統一」大業而四處奔走。出使東北，是他一生最引為驕傲的歷史。

一九二八年，日本悍然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千方百計地阻止張學良改旗易幟；國內閻、馮、桂三派也紛紛派代表到瀋陽遊說。蔣介石思量再三，派吳鐵城北上，先往北平，與張學良所派代表進行了多次談判，後又親赴瀋陽。他利用與許多東北將領的舊交，「感以私誼，曉以大義」，「幾經折衝，始排萬難，說服了東北地方當局，達成易幟協議。」雙方密定：七月二十一日東北易幟。但是日本方面對張學良施加壓力，迫使易幟兩次緩行。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衝破日本阻力，銳意換旗。至此，南北「統一」實現。吳鐵城大功告成，初露鋒芒。

東北易幟後，蔣介石策動張學良於一九二九年九月發動了反蘇的「中東路事件」，中蘇邊境戰爭驟起，東北軍傷亡慘重，節節敗退。蔣介石為鼓勵張學良，命吳鐵城赴東北勞軍宣慰。是時，吳鐵城正和林森忙於主持將孫中山先生的靈柩由北平奉安南京。他接到命令後，「冒零下五十度之嚴寒，秉節出關，馳驅於冰天雪地中，往來於中東路。遍至長春、吉林、哈爾濱、扎蘭諾爾、齊齊哈爾、博克圖各地。」儼然如欽差大臣，到處發表演說，疾呼：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此次東北之行，不僅炫耀了蔣介石的中央政權的聲威，而且加深了他與東北人士的關係，為第三次出使東北打下了基礎。

一九三〇年，閻、馮、桂、汪等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坐視關外的張學良，對時局有舉足輕重之勢。所以，交戰雙方都不遺餘力地去拉攏他，大批說客雲集瀋陽。蔣介石以吳鐵城與東北交往輕車熟路，故第三次派吳出關遊說。吳至瀋陽後，即憑他三寸不爛之舌，纏住張學良不放。七月二日，張到葫蘆島主持建港開工典禮，吳緊跟不捨，以南京鐵道部名義，為開工紀念碑揭幕，並發表演說。張在此停留一個月，吳也逗留不走。八月十日，張到北戴河，吳又跟踪而至。他又秉承蔣介石旨意，施展銀彈攻勢。吳等曾把六百萬元現金（一說二千萬元）送給張學良。同時，吳又對東北各方人士大肆進行收買。據說，他在一次賑災會上以四萬元買下一朵少帥夫人所做的紙花，又與諸方人士作豪賭，故意輸掉數十萬。「張的副官馬弁都被吳鐵城收買拉攏……張的一切行動，他們都瞭如指掌。」這樣，閻錫山、馮玉祥的說客薛篤弼、賈景德就相形見绌了，「他們倆在瀋陽的交際費不過每月規定不超過五千元，然吳、張（群）二人費用卻在百萬元以上。因此，吳、張可以隨時走進張少帥的公廨和寓邸洽談一切，而薛、賈須事先登記，等候張少帥抽暇延見。」

由於吳鐵城等人的勸說，加之蔣介石又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相許，張學良權衡利害，遂決心附蔣。九月十八日，張學良通電討伐閻、馮，隨即，東北軍大舉入關。腹背受敵的反蔣派迅速土崩瓦解。吳鐵城「以三寸舌，當百萬師」，爲蔣再建奇功。

中原大戰結束以後，蔣介石躊躇滿志，不斷排斥異己，以實現自己的獨裁統治。這就引起了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不滿，公開與之抗衡。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軟禁了胡漢民。以此爲導火線，陳濟棠、李宗仁、孫科、汪精衛等反蔣派再度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了「非常會議」，與蔣介石南京政府對抗。爲了擴大反蔣勢力，孫科派周一志、麥朝樞北上瀋陽與吳鐵城聯繫，希望通過吳拉張學良加入廣州的反蔣陣線。吳鐵城看到非常會議氣勢很好，又不滿蔣對他有功不賞，不加重用，遂暗滋反蔣之心。他同反蔣派暗中接頭，答應秘密就廣東任他的國府委員職，俟軍事行動一起，即以非常會議代表身分拉張學良參加倒蔣。但是，吳鐵城並未盲動。他向來處事謹慎，爲人圓滑，遇到如此大事，不能不深思熟慮。他一方面深知反蔣派內部成分複雜，矛盾潛伏，前途未卜；另一方面又得知陳銘樞已從日本秘密返回南京，同蔣介石密議多次，兩廣出兵計劃將遇到很大困難。所以他認爲此時步入反蔣行列，爲時尚早，對自己不利。故又突然告知周一志，表示取消他所答應的預定計劃。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救亡運動

風起雲湧。爲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壓制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寧粵雙方同時唱起了和解的調子。吳鐵城眼見寧粵合流已是大勢所趨，便立即站在南京方面，呼籲粵方「俯納調停，共倡和平」，「杯酒言歡，化干戈爲玉帛」。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寧粵雙方於上海舉行了「和平」會議。吳鐵城作爲寧方代表參加談判。雙方經過激烈的爭吵，不得不有所妥協。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宣布下野，國民黨政府進行了改組，寧粵雙方完成了政治分贓，結束了分立局面。

上海灘的闊佬

早在一九二九年間，蔣介石就打算提拔吳任北平市長，只因閻錫山推荐了人選，結果落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海市長張群因學生反日運動高漲而被迫辭職。蔣介石即命吳鐵城接任上海市長職務。

吳鐵城當上了上海市市長，對蔣感恩戴德。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在上海市政府舉行了隆重的就職典禮，宣稱要勵精圖治，整頓和建設上海。吳鐵城走馬上任，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淪陷，激起了全

國人民的無比憤慨，抗日救國運動一浪高於一浪。上海尤為激烈。張群對此既然一籌莫展，吳鐵城也甚感棘手。何況日本又決定在上海挑起戰端，致使淞滬危機迫在眉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日本在上海策劃了挑釁事件，焚燒了中國三友實業社，殺死警員一人，並搗毀許多商店等。面對日人的暴行，當天下午三時，吳鐵城派市政府秘書俞鴻鈞前往日本領事館提出口頭抗議。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表示遺憾，並允嚴糾凶犯。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村井到市府對吳鐵城當面表示了前述態度，但同時對日僧被毆受傷事件提出了書面抗議，提出四項要求：(一)市長對總領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賠償醫療費及撫慰金；(四)取締抗日活動。否則，日海軍將採取相當手段。對此，二十三日，孫科以行政院名義急電吳鐵城：「本日下午與汪蔣兩先生詳商應付上海事件，僉主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二十七日，村井向吳鐵城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所提出的四項要求。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吳鐵城秉承蔣介石屈膝投降意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下令解散各種抗日團體，查封抗日救國會。然而，日人挑釁完全是發動侵略上海的藉口，就在當日深夜二十三時三十分，日軍砲轟開北，發動了「一二八事變」。

事變爆發後，十九路軍和廣大上海人民奮起抵抗，與日作戰一個多月，迫使日軍三易主

帥，取得了輝煌戰績。然而，蔣介石集團極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破壞上海抗戰。蔣授意軍政部長何應欽於一月三十一日電告吳鐵城：(一)「各國領事既出而調停」，可「斟酌接收」；(二)通令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擊」；(三)「親善」各國軍隊與僑民，以取同情；(四)對「假托愛國名義之搗亂團體，應嚴加制止。其他民衆愛國之行動，亦須周密注意，以防共匪從中利用機會。」之後，二月五日至九日又幾次電告吳鐵城：「適可而止」，要吳「力排衆議」，「設法轉圜停戰」。十五日，再次電吳，讓他以私人資格與攻滬日會商定和平方案。吳遵照蔣介石、何應欽的旨意，多方拜謁，竭力媾和。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協定斷送了上海軍民的抗戰事業。

消息傳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震怒。上海各界愛國群衆紛紛向市長吳鐵城請願，並發生了愛國律師吳邁怒打吳鐵城的特大新聞。在協定簽字前，吳邁曾親晤吳鐵城，義正辭嚴地告誡：「閣下如不顧民意，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協定，到時殺市長頭者就是我吳邁！」吳鐵城則假惺惺地說：「吳先生愛國熱忱令人敬佩！我也是炎黃子孫，何忍獲罪國人？」然而協定還是簽訂了，這使吳邁悲憤交加，他率愛國學生、群衆五百餘人直赴上海市府聲討吳鐵城。吳鐵城聞訊，慌忙從後門逃到英租界私邸躲藏起來。吳邁率衆跟踪不捨，吳鐵城被迫答應第

二天上午接見。翌日，吳邁準時赴約。一見到吳鐵城，他就正色怒斥道：「日前，市長向市民保證不與日軍簽訂城下盟約；今日食言自肥，閣下有何理說？」此時吳鐵城窘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他故作鎮靜地說：「這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是實難違抗呀！先生何不進京向行政院表達民意，籲請收回成命？那麼，不僅協定條款可以從長斟酌，連我也當謝解厄之情，對得起民衆了！」這些推卸責任的話，使吳邁怒火中燒，禁不住脫口問道：「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計，派夫人、令嫖前去慰問白川大將，我斷言閣下必將犯顏抗爭，以全家聲。然而，近年來東北諸姑姐妹，被獸軍凌辱蹂躪者何可計數？閣下卻知而無動於衷。兩相對比，豈不是重家恥、輕國恥的漢奸慣常行爲嗎？漢奸人人皆曰可殺，今天我與你同死報國！一說著，操起席前痰盂，猛然朝吳鐵城砸去，擊中吳鐵城左肩，嚇得吳鐵城連聲呼救。這時，預先埋伏在室外的上海市警察局長吳芷賢率便衣探警破門而入。吳邁再欲追打時，無奈寡不敵衆，被吳芷賢抓進了看守所。吳邁被營救出獄後，上海律師協會組成律師團，依法具狀控告吳鐵城、吳芷賢利用職權侵犯人身等罪。結果，吳芷賢被撤職查辦，做了吳鐵城的替罪羊。

吳鐵城深知，上海是交通樞紐、南京的門戶，掌握上海，既可「綰轂南北」，又可「屏蔽首都」；上海又是帝國主義各國在華勢力的大本營，江浙財閥的重要據點，是蔣介石政權賴以存在的支柱。所以蔣介石說：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

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爲根據，若上海特別市不能整理，則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則不能有頭緒。」吳奉行蔣介石的意旨，竭力把上海建成中外反動派的樂園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發家基地。上海停戰後，吳即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繼續推行黃郛在任時所擬定的「大上海計劃」。市府大廈、博物館、圖書館、醫院以及街道等新市行政區工程復工；開闢碼頭、投資建廠等大批新工程也破土動工。由於國民黨政府財政窘困，無法撥款，上海市府只有靠搜刮民衆來維持巨大的財政支出。吳鐵城曾幾度採取發行公債、「招領」土地和增加房租地租等辦法集資籌款。經過五年的苦心經營，上海建設確實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因爲「大上海計劃」過於龐大，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無法完全實現。至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大上海計劃」即宣告流產。吳鐵城曾哀嘆：「回首既往，過去五載實在予人以慘痛之教訓……都市問題複雜，……終以限以財力，格於環境，不獲副原有之期望。」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蔣介石的五十壽辰。在此前夕，吳向全國倡議，發起「獻機祝壽」運動。一是爲蔣祝壽，討得蔣的歡心；二是發展國民黨的空軍，增強蔣的軍事實力。吳鐵城在滬籌募了一百萬元巨款，購得戰鬥機十架，編爲一隊，定名爲「中正隊」，每架飛機的命名均以「滬」字爲頭，以炫其功。

吳鐵城統治上海時期，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反共的政策，嚴厲防範和鎮壓革命活動，取

締抗日救國組織，摧殘進步文化。據官方記載，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上海警察局共經辦了一六四〇起迫害共產黨人的案件，逮捕了五千名以上的共產黨員（實際上不止此數），這些多在吳的任期內；查禁共產黨刊物，僅一九三六年一年，即有八十二起、三三〇種、二四〇六件。吳鐵城還千方百計地阻止和鎮壓學生愛國運動，逮捕學生不計其數。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的《告全市學生書》中，要學生「勿浮囂、勿盲從、勿越軌、勿違法、勿遊行、勿罷課」，「埋頭於知識戰爭中去，以爭取我民族最後的勝利」。國難臨頭，這無疑是欺騙學生的荒謬之談。

廣東省的蠹蟲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廣東發生了陳濟棠反蔣事件。一段時期，廣東政局不穩。蔣介石對廣東這個反蔣運動屢伏屢起的地方非常重視。一九三七年四月，調吳鐵城任廣東省政府主席。

廣東省原來各市縣都設有烟館，由本地商人經營，自煎自銷，利源驚人。吳就職之後，規定各區設土膏店，縣設售吸所，二者分開營業，由他派去的七十多名「查禁專員」管理和

監督，從而把售烟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吳鐵城進行這項改制，一是爲了安置部下。吳當時有兩部分部下，一部分是從上海跟隨而來的職員；另一部分是他在一九二五年離粵軍第十七師師長職和廣州市警察局長職時投閒置散的舊部。吳初到廣東，無閒職安排他們，故只好就全省「禁烟」機構設法。此外，吳實行改制，名爲辦理禁政，實際在攫取鴉片利源。吳鐵城是廣東人，又在廣東做過官，對於「禁政」的利源，他諳熟秋毫。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廣東省每月烟土吞吐量大約有百餘萬兩，走私進來的尚不計在內。所以他安排部下，也是利用他們做自己的扒錢工具。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日軍由海上登陸進攻廣州。吳鐵城和當時主持粵省軍務的余漢謀等根本不做抗戰的準備，致使戰事一起，前線官兵紛紛敗逃。十月二十日，蔣介石下令撤退。二十三日，日軍占領廣州。吳鐵城在日軍進城的前五天，就和財政廳長曾養甫棄城逃往粵北連縣；余漢謀也在日軍進城的前三天慌忙北竄，廣州軍、政兩界群龍無首，致使廣大群眾和許多學校機關的撤退工作無人過問。十月二十日夜，才由警察局通知市民撤退。在無交通工具的情況下，逃難市民拖男攜女，互相撞擠，老幼被踐踏，哭聲罵聲交織在一起，真是慘不忍睹。粵省人民故有一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甫（甫是廣東話譜的諧音）的說法。

文臣中的領班

一九三九年春，吳鐵城應蔣介石的密令離粵赴渝，奉命主持港澳黨務兼閩粵兩省對外宣傳。同年冬，被蔣提升為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任職期間，他曾代表蔣出使南洋，攻擊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激起廣大僑胞的切齒之恨，一時傳為醜聞。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吳鐵城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成了蔣家王朝的「幕僚長」。

一九四四年冬，國民黨西南戰場進入了最困難的階段。日軍進入貴州境內，重慶告急。前線士氣低落，後方民心不安。吳受蔣的手令，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由中央黨部高級領導人率領，組成一個代表團，進行慰勞傷兵難民活動。這一舉動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二是號召青年從軍。經過吳的宣傳和發動，各地黨部積極行動，在短期內完成了蔣介石的使命。這支青年軍經過嚴格的訓練，戰鬥力很強，但抗戰勝利後被蔣利用，成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工

具。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有國民黨、共產黨、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

會議在重慶召開。吳鐵城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身分當選為國民黨代表。他在政協會會上為蔣介石個人獨裁和國民黨一黨專制搖旗吶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孫科奉蔣旨意出面組閣，吳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總統，願意與中共談判，吳和孫科把行政院撤到廣州，表示反對，隨後辭職。在蔣家王朝岌岌可危之際，吳鐵城還到東南亞等國進行反共宣傳。

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解放前夕，吳鐵城赴香港，後轉至台灣，任「總統府資政」等職。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病死於台北。

〔第七章〕

豪門權貴宋子文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從美國舊金山的一個小型宴會上，傳出一條消息：前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歷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外交部長、中央常委的宋子文，因誤吞鷄骨而被餓死，終年七十七歲。這位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四大家族」之一的大財閥，在離開大陸二十二年之後，竟然這樣離開人世，實出人意料之外。然而使人不解的是，這位宋氏家族的台柱葬禮的規模，同他的姐夫孔祥熙比，相差太遠。而他的同胞妹妹宋美齡，當時已在美國定居，竟沒有參加他的葬禮，更不免為報界提供了津津樂道的新聞。

家世與教育

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年代裏，宋子文曾一度成爲左右他的人物。這種權力的獲得，同他的家世和所受的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宋子文的家世，在他出生的那個年代，並沒有什麼特殊值得誇耀的地方。只是因為後來宋家出了三個地位顯赫的女兒，才使人們總想去刨根問底。不過當時的宋家，在上海雖算不得什麼名門望族，卻是個令舊式中國人嫉妒的新暴發戶。他的父親宋嘉樹（又名宋查理）是一位社會地位不高的牧師兼出版商。宋子文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開始經營工廠，有了自己的洋房，所以，他從小就處在一個經濟富裕、生活優裕的環境中。

宋子文是宋家的長子，到了上學讀書的年齡時，家中爲他聘請了家庭教師，後又入聖約翰大學少年班就讀。一九一五年，宋子文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前往紐約，在國際銀行供職。在此後的兩年中，他以一個辦事員的身分辦理向中國的匯款業務，這項工作使他有機會結交一批美國財政界的朋友，爲他在日後幾十年的金融活動，奠定了基礎。

一九一七年，宋子文回國，擔任了上海漢冶萍公司的秘書。據說他「上任伊始就把帳目和財務清理得井井有條。於是，消息傳開，說他簡直是個天才」。後來，他應孫中山之邀，來到廣州，就職於國民政府。也有人說，他是與清末大買辦盛宣懷的兒子升頤等合辦一個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蝕了本才跑到廣東去投奔孫中山先生。宋子文來到廣州之後，雖仍然從事經濟工作，但這卻是他步入政界的開始。

廣州時期

宋子文初到廣東國民政府時，被孫中山任命為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負責當時廣東革命政府的主要財源。除稽核所外，管理鹽政的機構還有兩廣鹽運使，在廣州則設有「省河督運緝私局」。這個機構是和兩廣鹽務稽核所互相制約、互相監視的。因此，雙方因爭權奪利，時常發生爭吵，而且多受政治影響。宋子文上台不久，便和兩廣鹽運使趙士觀發生了衝突。

鹽稅一向是舊中國歷屆政府的主要財源之一，而鹽商也多為有錢之巨富。但是這些商人盡管有錢，卻沒有權。為了使自己的利益得到當權者的保護，只好用錢來收買官吏。久而久之，廣州鹽業便形成一種慣例，既要向兩關的人行賄，又要給鹽運使以好處，兩面都不能得罪。宋子文上任不久，便因業務關係同兩廣鹽商林麗生搞得很熟。當得知鹽商也要向鹽運使行賄後，宋子文即告訴林麗生，有他做後盾，以後可以不必害怕趙士觀。可是，趙士觀是代表胡漢民等元老派利益的人，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首先摸清了鹽商和東、西兩匯關串通販返私鹽的路線，然後利用省河督運局的權力，將走私鹽船現場截獲，將鹽商扣留秘密審訊，得到人證物證後，查封了林麗生的鹽館帳簿。面對元老派的這一打擊，涉世不久的宋子文一籌莫展。幸虧他手下的得力幹將鄭芷湘為他舉荐了老官僚吳國章，經吳謀劃後，借助稽

核所的特權，編造了一篇有根據、有分量的聲辦公文，向財政部提出召集雙方公開審訊，財政部指定由司長李承翼全權辦理此案。

這場官司對於李承翼說來，是頗費一番心思的。申訴的雙方，均是有後台的。但考慮再三，還是將砝碼移向宋子文一邊。原因很簡單，宋子文是孫中山的妻弟。經他多方奔走，終於判宋子文勝訴，他也因此和宋子文結下了深緣，成為當時廣東財政界的重要人物。而宋子文經過此次較量，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開始打開了局面，擴大了影響。

此後不久，孫中山決定成立自己的中央銀行，從根本上控制廣東的財政。鑒於宋子文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專攻經濟，畢業後又在美國及國內銀行業供職，遂任命他為中央銀行行長。中央銀行建立之初，基於「發展國內實業，調劑國內金融，補助國民經濟，促進國際貿易」的宗旨，除辦理普通銀行經營的業務外，還經國民政府授權，代政府募集內外實業債款；發行紙幣和代理金庫現金之出納及代收各項公款，實際上居於國庫地位。宋子文利用職權之便，設立了寶華銀號，與十三行開銀號的鄒殿幫等互相角逐，操縱銀市，漲落無常，使許多商人破產，他卻因此大發橫財，具備了成為財閥的經濟條件。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不幸病逝，但宋子文的地位並沒有因此而動搖。同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謀殺後，宋子文接任國民革命政府財政

部長。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們對孫中山的崇拜，更重要的是在宋子文任商務廳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的過程中，已顯露出他的理財本領。

宋子文上台後，鑒於廣東因連年戰亂，政府財政狀況一直陷於困境，財政體制異常紊亂，財權分割的局面，集中主要精力進行財政統一工作。他首先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家預算制度，使政府收支有序，量入爲出。由於當時的國民政府只占有廣東一省，中央政府內設有財政部，廣東省政府內又設有財政廳，而兩個部門實際上控制著同樣的區域，職權區分不明，給財政管理造成人爲的混亂局面。所以，宋子文又劃分出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明確規定了財政部與財政廳的職務範圍。此外，他還統一了各種稅務的徵收機關，收回了爲各軍和地方政府分別把持的稅收權，基本上實現了廣東政府的財政統一。這就從經濟方面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軍隊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保證了北伐戰爭的急需供應。使得軍權在握的蔣介石，決計拉住他這位理財能手，做爲蔣氏的經濟台柱。

政治道路的抉擇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及國民政府

委員會聯席會議開始在武漢辦公。然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軍占領南昌後，蔣介石即將他的總司令部設立於此，並於次年一月三日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黨政府暫駐南昌」，挑起了轟動一時的「遷都之爭」。武漢政府因迭電蔣介石取消非法決定，速來武漢就職，蔣均置之不理，遂決定派財政部長宋子文親赴南昌勸駕。豈知，這正中蔣介石下懷。

宋子文作爲一個精幹的理財家，當然是蔣介石需要的。而且通過他還可以與外國的銀行和江浙財閥建立起聯繫。所以，宋子文一到上海，蔣介石就將他軟禁起來，要求他加入自己的幕府。蔣派他的臣僚們不斷地給宋子文「清洗腦筋」，並動員了宋家在上海的親朋故友來做他的工作。宋子文雖然已經感到他沒有別的選擇，但因對蔣介石這種近乎脅迫的方式異常反感，所以仍遲遲不肯就犯。直到蔣介石打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封閉了宋子文在廣州苦心經營的銀行，他才勉強對蔣表示屈服。當然，實際情況遠比這表面的過程複雜得多。在蔣介石對他進行拉攏的同時，他也在對時局的發展進行著精心的預測，對自己的政治道路進行著艱難的抉擇。事實上，早年的宋子文就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個帶有濃重商人習氣的自由主義者。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經歷，他的財產使他厭惡革命運動，懼怕工農大眾。作爲一個商人的宋子文深知財產與「秩序」的關係，渴望金錢與權力的結合。他早年投奔孫中山，是想通過親緣關係取得權力。後來，依附於蔣介石，也顯然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他並不喜歡

蔣介石這一介赳赳武夫。

小妹的婚姻

一九二七年對於宋子文說來，是一個大轉折的年代。首先是個人政治道路的改變，接著是與蔣介石的個人關係有了重大變化。由於蔣介石和宋美齡結為夫婦，使宋子文再次成爲一位風雲人物。然而宋子文對於妹妹的婚姻並不很情願，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反對這樁親事，他在上海就什麼也作不成。所以，爲了宋家的利益，他還是同意了這樁親事，並且同大姐宋靄齡一起，來做母親的工作。宋母對於這位「女婿」沒有什麼好感。她不相信這個有過一位結髮妻子、兩個姘婦的人會真心愛上她的女兒。退一步說，即使他真的愛上了美齡，宋母也不願讓美齡成爲一名軍人的妻子，況且蔣介石還不是基督徒。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宋母漸漸發現家裏人（除靄齡外）都開始讚同美齡與蔣的婚事，而且不時在她面前說些讚美蔣介石的話。經過了漫長的五年，蔣介石仍在苦苦地追求美齡，使宋母很受感動，她終於決定見蔣介石一面。在她與蔣會晤後，她改變了對蔣的看法，同意了這樁婚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這次婚姻使得南京軍隊過去最強有力的

領導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國民黨的創始人、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家庭聯成一體，蔣獲得了他所需要的政治資本和經濟基礎。

宋子文的理財術

對於剛剛建立的南京政權說來，宋子文的加入無疑起了一針強心劑的作用。作為財政部部長，他使南京政權的經濟混亂的局面得到了逐步改變，而且在短時期內便籌措到大筆經費，保證蔣介石進行軍閥混戰和維持官僚機構的龐大開支。因而，國民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宋理財有術。其實，宋子文所謂的「理財術」仍不過是加稅和借債兩個老辦法。問題在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僅借債不容易，而且加稅也是難乎其難。而宋子文卻能巧妙地利用商人的心理和各種利害關係，把錢搞到手。

對於經商的人說來，最怕的就是無休止的稅收。對於商人的這種心理，宋子文自有對付的辦法：他加的稅，都是在愛國的名義下設立的，使商人不敢反對，以免被扣上反對政府的帽子。加稅的項目，對外國企業又都頗有好處，因此可以首先得到外商的贊助，他再藉此向國內商人施加壓力，使他們必須交出稅款。如卷煙稅，這原是江蘇省「教育會派」爲了求得

教育經費獨立而設立的一種稅收。北伐以後，國民黨政府收歸自辦。裁撤厘卡後，改爲產品稅。產品出廠繳稅可行銷全國，不再收稅，所以叫統稅，是國家財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中國境內的卷烟廠，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產量超過全部華廠的總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絕繳納統稅，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條約，他們的紙烟經過厘卡時本來是不納厘金的，裁厘與否，與他們無關。外商有領事裁判權作護身符，他們不繳稅，中國政府也沒有辦法。宋子文上任後，與之交涉，結果外商同意繳稅，還把過去欠繳的稅款補繳了一部分，使宋子文不僅在財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這種事看來奇怪，說來簡單，宋子文把原來卷烟的五級稅制改爲二級稅制。因卷烟稅是從量不從價，因而不論單價如何，納稅額一樣。這樣，就大大有利於英美烟公司，等於幫助他們擴大了市場，在競爭中壓倒一切華商烟廠，因而得到洋商的支持。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夠加稅而不遇到大的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資產階級及其買辦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原因之一。

再說借債，中國的商人願意和官吏往來，給些小便宜於官吏，就可以有很大的方便，獲得厚利。但卻不願借錢給官廳，因爲政治局勢常有不測，人事一經變動，就無人對債務負責。宋子文上任後，採用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維持債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還本，保持信譽，一面借新債；另一個是「誘以厚利」。他向銀行家們表示願意減價出售政府債

券，接近五折的價格賣給他們。政府在正式發行日期之前把債券存入這些銀行，而銀行則預先付給相當於債券票面額百分之五十的現金。在正式發行日期後，債券即由上海股票交易所、上海渣打股票和物品交易所經銷，或由銀行自己保存。上述這些機構可以通過談判，確定最後的出售價格，立即獲得利潤。債券的利息大大超過工業收益或銀行利息，所以出手很容易，而銀行家們由於買了大筆債券，就把自己的經濟利益同國民黨政府連接在一起，以此之故，各銀行不能不支持南京政府，因為如果政府更迭，他們所購的公債就會本息無著。

儘管南京政權把宋子文看作是一棵搖錢樹，但宋子文卻深深意識到這棵樹是沒有根的，因此，他向蔣介石建議限制軍費開支，實行預算制度，並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銀行，蔣同意了宋子文的建議。起初，宋子文會同上海兩個主要金融機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進行交涉，因為這兩家銀行原是作為國家銀行建立的，後來在二十年代的動亂中落入上海金融家之手。但兩行總裁不願把他們的銀行交給宋子文。宋子文也不想和他們對抗，因為他們是政府債券的最重要市場，於是便採取了一種權宜之計，向這兩家銀行借錢建立起中央銀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作為國家銀行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宋子文任首屆行長，總行設於上海的德國俱樂部舊址。除此以外，還成立了一個除宋子文之外全部由軍人

組成的政府財政預算委員會。由於此後軍費開支不斷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宋子文在商人面前失去信譽，這使他大為惱火。於是，他開始運用自己的職權，干預蔣介石的經費開支，宋蔣之間出現矛盾。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極端親美的宋子文與蔣介石在對日政策上產生了較大的分歧。他撥出的抗日專款大都被蔣介石拿去「剿共」。並且，由於蔣介石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對日妥協，在經濟上也採取退讓的政策，使宋子文與金融界積怨日深，他遂於一九三三年十月辭去財政部長職務，由其姐夫孔祥熙接任。

「功德」與「報應」

對於宋子文個人說來，一九三三年的下台，並沒有使他受到多大損失，他憑藉自己的專長和原有的基礎，開始積極進行私人工商活動，對工廠、企業、銀行進行投資，不僅在國內，而且還在美國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勢力，儼然成了一名工商界的首領。他還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捐資修建傷兵醫院，創辦一些社會福利事業，在社會上一時名聲雀起。

這一時期，由於日軍大規模蠶食華北，國民黨政府連連妥協退讓，舉國上下群情激憤，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收復失地。在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以英美為背景的抵日派與親日派

的分化。主張抗日的人自然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然而這時的蔣介石堅持「剿共」政策，在對日態度上遲疑徘徊，首鼠兩端。既然這個問題本來就是導致宋子文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蔣介石在他的對日政策沒有明朗之前，當然不同意讓宋子文重返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南京的國民黨上層，在對待事變的態度上分成兩派：一派以何應欽爲首，主張明令討伐張、楊，並用飛機轟炸西安附近各縣，實際上是置蔣介石的死活於不顧。另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爲首，主張不要頒布討伐令，也不能用飛機轟炸西安，而應設法與張、楊和解，以營救蔣介石。

何應欽以「討逆軍總司令」的名義，調集大量軍隊於洛陽附近，並進逼潼關。而宋子文爲家族的利益，立即投入了緊張的營救工作。以致何應欽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插手這件事。但宋子文卻冷冷地回答說，他是個不擔任公職的平民，不是軍人。當蔣介石停止進攻三天的手諭送到南京後，宋子文即於二十日以個人身分飛往西安。宋子文的到來，使蔣介石對張、楊的態度有了轉機，勉強同意接受最重要的幾項要求。幾經周折，西安事變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

蔣美之橋

西安事變之後，宋子文繼續經營他的中國銀行。蘆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被迫宣布對日抵抗，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際上則實行依賴英美的外交政策。宋子文成爲這一政策的執行者。

一九四〇年六月，宋子文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分，飛抵舊金山，開始了兩年的旅美使命。在宋子文的活動下，美國國會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批准了羅斯福總統再給中國一億美元貸款的要求。爲了管理這筆巨款和處理由此而來的複雜的交易，宋子文在美國建立了一些相應的周轉公司，爲首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中國防務補給公司和設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的環球貿易公司。中國防務補給公司成了聯繫宋氏家族和羅斯福家族的紐帶。

此後的一年中，宋子文除了經營在美國設立的幾個公司外，又暗中奉蔣命購置飛機，以期擴充中國的空軍力量。爲了幫助宋子文，蔣介石特派陳納德返回美國協同他工作，不僅買到了飛機，還由陳納德編練了一支美國人組成的自願赴華作戰隊——飛虎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成了中國最主要的戰爭伙伴。爲了適應對美外交的需要，國民黨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開的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決定，由宋子文接替郭泰祺擔任外交部長。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宋子文以外交部長的身分拜訪了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轉達了蔣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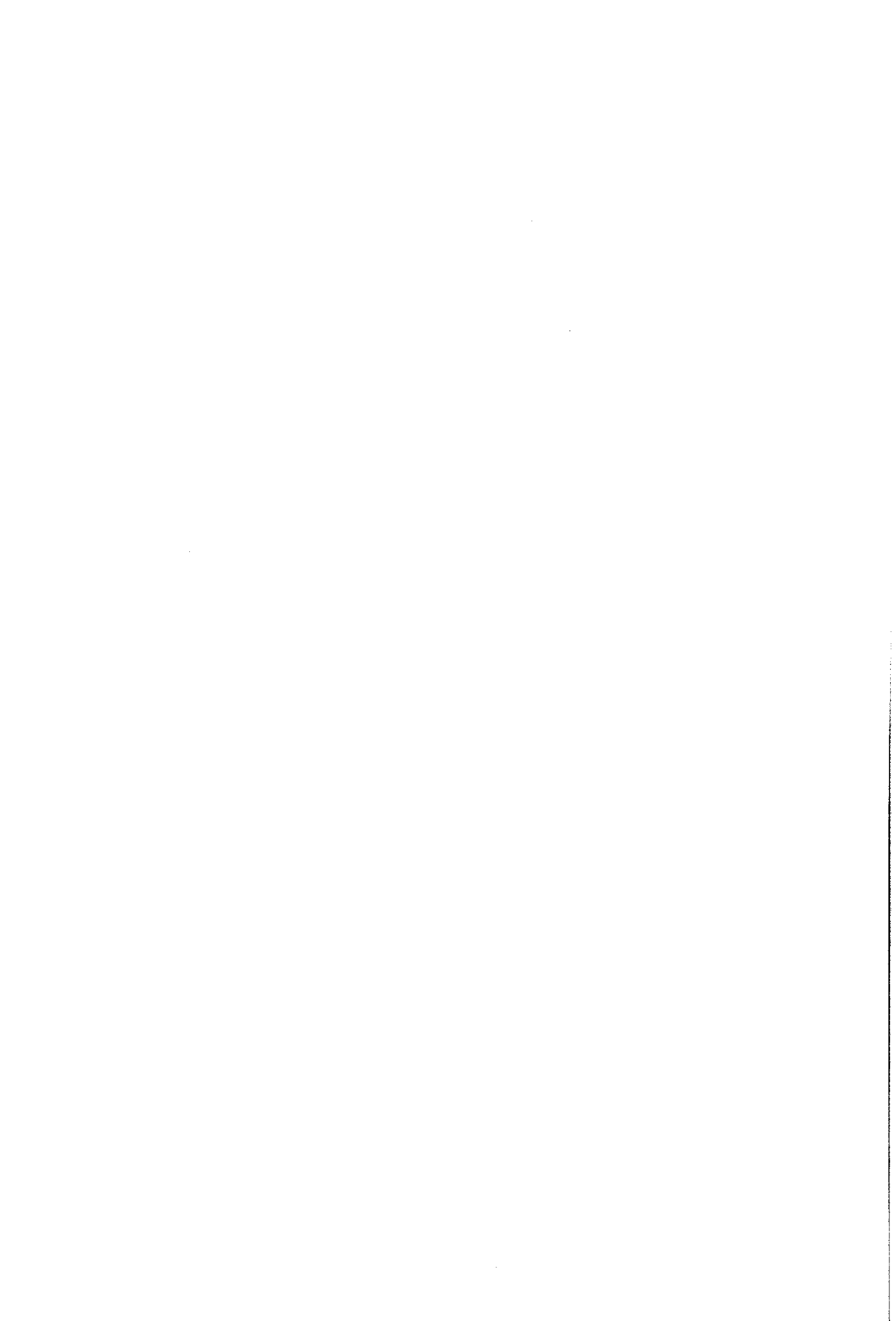
石希望美國提供一筆五億美元新貸款的要求。一個月後，美國國會批准如數提供這筆貸款，而且條件優惠。一九四二年底，宋美齡去美治病，實際上兼起了其兄的在美使命，宋子文遂於一九四三年初回國，正式就任外交部長，同時兼任行政院戰時經濟部部長，主管戰時的經濟控制，經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憑藉這一職權，他大發國難財，急劇地增加了宋氏家族的財富。一九四四年底，宋子文又當上了代理行政院長，兼任外交部長。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得到行政院長的正式頭銜，同時還接替了孔祥熙的財政部長職務，達到了他一生權力的頂峰。

一九四五年七月，宋子文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關於中蘇友好條約問題。其中關於外蒙獨立問題涉及領土主權，所以老於世故的宋子文盡管有蔣介石默許，仍不願措此黑鍋。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中旬回國，辭去外交部長職務，由王世杰繼任。八月六日，再次率團赴蘇談判，於十四日由外長王世杰代表中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了字，承認外蒙脫離中國獨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國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民黨的「劫收」和亂發紙幣，造成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內戰的消耗和破壞使國民黨政權陷入異常混亂狀態。中國法幣與美元的匯

率高達一千一百萬比一。作爲財政部長的宋子文，爲了挽救經濟危機準備發行一種以「黃金」爲後盾的「金圓券」取代法幣。這意味著中國有錢人將失去所擁有的白銀和黃金。於是，軍隊首先出現了波動，一些人將銀行存款以黃金形式全部提走。機密洩露後，宋子文因被指控引起「搶兌黃金」而引咎辭職，改任廣東省省長和綏靖專員職務，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大陸去美國定居爲止。蔣介石逃到台灣後，雖一再邀請宋子文出山，但宋始終沒有答應。

（李柏齡）



〔第八章〕

聚斂之臣孔祥熙

在蔣介石周圍的親信和嫡系當中，孔祥熙既非張群、陳布雷那種「足智多謀」的文臣，也非陳誠、胡宗南一類「戰功卓著」的武將，他是蔣介石的姻親和「理財家」的身分步入中國的政治舞台，立足於蔣家王朝的。

孔祥熙給外界的印象頗為矛盾，有人說他是個受夫人操縱的庸才。其昏庸糊塗，常出於一般想像之外，有人則說他極有心計，只是為應付環境而假裝糊塗，其精明厲害堪稱「千年狐狸」。但是孔祥熙對蔣家王朝的作用和影響，則幾乎是世人公認的。這位在國民黨政權中多年身居要職的「理財家」，以其「特殊的才能和方法，聚斂了巨額財富，用大量的債券，不斷貶值的紙幣……支撐著風雨飄搖中的蔣家王朝，並通過巧取豪奪方法使自己成為全國的大富。」蔣介石對他這位財政部長備極寵幸和推崇，在其死後諡之為「久同患難，共任安危」。

因妻得官

孔祥熙，字庸之，一八八〇年生於山西太谷城西程家莊。據蔣介石撰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說：太谷孔氏，本為山西望族富戶，自庸之祖父孔慶麟起經營商業，人稱山西首富。然而，有的書籍卻說，他並非出身於什麼名門望族或富家大戶，而是誕生在一個敗落、潦倒的窮書生家裏，他父親孔繁慈是個窮秀才，常要靠典當過日子。後因受美國大理會傳教士影響，戒掉了大烟癮，入了教，並為教會當差。孔祥熙幼年喪母，曾經飽嘗過飢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約十歲時，進入了當地一座教會學校，後轉入通州協和書院肄業。一九〇二年留學美國。一九〇六年畢業於歐柏林大學後，入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一九〇七年取得學位後回國。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太谷辦起一所「銘賢」學校，由他任校長。「銘賢」學校是美國歐柏林大學捐款辦的，「銘賢」的意思是紀念庚子年「為道殉難」的美國傳教士。這所學校使孔祥熙與許多美國人建立了密切聯繫，並使他贏得了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的美名，為他的發跡作了準備。後來，孔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都是「銘賢」學校的學生，在國民黨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銘賢派」勢力。

孔祥熙任「銘賢」校長時，密切注視著政局的變化。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在太原成立了一支學生軍，繼而又組織了一千多人的「營務處」，自任「總辦」，指揮城防。一九一三年八月，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山西政局動亂不穩。孔因前妻病死，心情沮喪，於是東渡日本，任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留日中華青年會總幹事。這期間，他結識了孫中山，參與了一些革命活動，並認識了未來的妻子宋靄齡及其全家。宋靄齡，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稱一個愛錢，一個愛國，一個愛權中的那個愛錢如命的老大。這兩個在金錢問題上同樣「絕不裝腔作勢，而全然是像觸電一樣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傾心，結成終身伴侶。這一婚姻，為孔祥熙日後的飛黃騰達鋪平了道路。孔祥熙後來在蔣介石政府中官運亨通、權勢顯赫，很大程度是由於他與蔣介石的姻親關係，所以有人稱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發財」。

一九一五年秋，孔祥熙回到山西大谷，在任「銘賢」校長的同時，籌辦了祥記公司和裕華銀行。祥記公司主要是經銷英商的煤油、洋鹼、白糖等，孔氏夫婦在經營買辦商業中開始發財。

一九二五年初，孫中山先生臥病北京，孔剛從國外歸來，因親戚關係參加照料，以此成為「顧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幹的政治家，但卻初登政壇即官運亨通。一九二六年他被任命為廣東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部務，以後更是扶搖直上。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依靠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權。南京政府初建，統治尚不穩固。在寧漢對立中，曾任廣東財政廳廳長、武漢政府實業部長的孔祥熙及時投向南寧政府，為蔣介石效力。這時，寧漢兩方都極力爭取馮玉祥，他握有重兵，對寧漢兩方確實有舉足輕重之勢。孔祥熙受蔣派遣，利用舊關係秘密到鄭州勸說馮玉祥，促成了蔣馮合作，為南京政府的鞏固立了一功。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合，是孔祥熙夫婦最早提出的，但卻遭到宋子文的反對，於是，他們與美齡商量，請出對宋子文有重要影響的譚延闓勸說，最後使宋子文屈服，終於形成了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齡）合作」，蔣、宋、孔三家結下了利害與共的不解之緣。

一九三〇年，閻錫山、馮玉祥、桂系、西山會議派和汪精衛等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開戰初期，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在蔣介石的分化收買政策下，反蔣派很快瓦解。這期間，孔利用其北方籍貫四處聯絡，對反蔣派進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略中國，蔣介石卻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妥協，加緊「圍剿」紅軍。為幫助蔣介石擴充軍事實力，孔祥熙受命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實業專使」名義出國遊說，為蔣介石接洽借款，購備械彈。孔祥熙通過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

特與克虜伯軍方等方面的援助。蔣介石對孔祥熙這次歐美之行非常滿意，當時曾有設立航空部並由孔主持的擬議，後因軍方和宋子文的反對，孔才知難而退。

蔣介石對工農紅軍「圍剿」規模愈來愈大，而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總試圖壓縮蔣介石的軍事預算，這釀成了蔣介石要更換財政部長的意念。一九三三年四月，宋子文出訪，孔祥熙由歐美回國，蔣介石立即任命孔為中央銀行總裁，以代替宋子文。四個月以後，宋子文從美國歸來，發現蔣介石的開支超出預算六千多萬元，而孔祥熙則幫助蔣這樣做，這使宋大為惱火，與蔣的衝突發展到當面對罵的程度。結果宋子文辭職，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職務。

孔祥熙和宋子文雖然都是蔣介石的姻親和「理財大臣」，但他們的性格作風卻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幹練，一派歐美資產階級作風，辦事講究手續，蔣介石向財政部要錢，他總要問一問作什麼用。而孔祥熙卻不像宋子文那樣直言不諱和鋒芒畢露。他主持的財政部對蔣介石從不講求什麼手續，要錢就給，不問用途，不打折扣。宋子文敢於對蔣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對蔣則一貫言聽計從，逢迎諂媚。

然而，孔祥熙雖非像有人說的那樣「精明得厲害」。但許多事說明他是頗有政治心計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異，各投所好，表面上是寬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實際上卻是有意對

同僚部下進行拉攏利用，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兒子留學回來，請其「栽培」，孔立即任他爲中央信託局專員。司法院副院長王法勤臥病在床，孔主動派人送去千元現款。陳布雷體弱多病，他便幫著從香港搞藥品。他還利用公家的錢來拉攏部屬。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禮。所以國民黨政府中許多稱他「厚道」，講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範圍上也是很有考慮的。他很少與軍人接觸，他女兒孔令俊曾說：「院長不結交軍人，怕的是委員長吃醋。」抗戰初期，孔祥熙被任命爲行政院長，他的幕僚勸他聯合國民黨元老和CC系，培植新的政治勢力，孔卻說，「我們今天完全是由蔣先生的支持而上來，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聯合這班人有啥道理。」可見，孔對蔣言聽計從完全是出於靠蔣介石來鞏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蔣記財長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孔祥熙剛剛接任財政部長，第一件「公務」就是號召全國「慷慨解囊」資助反共戰爭。他曾明確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財政預算的平衡更爲重要。於是，他的第一個「成就」就是摧毀了宋子文歷時五年、苦心制訂的財政限制措施，盡力地幫助蔣介石籌措軍費，購買軍火，進行「剿共」內戰。使蔣介石麾下的戰將們，可以在日本步步加

緊侵略的民族危機中，在「剿共」的戰場上「建功立業」，使蔣介石能夠在華北落入日本掌握之中的時候，慶祝「圍剿」紅軍的勝利。

發行公債，是孔祥熙為蔣家王朝籌措經費聚斂財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底，南京政府財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發行公債五七、八〇〇萬元，一九三六年發行了二〇八、二〇〇萬元。巨額公債的發行，使金融資本家與南京政府結下了休戚相關的姻緣。因為在高利率的引誘及政治壓力下，大部分公債均被各大銀行認購，他們不想因政權更迭而使手中巨額債券變為廢紙，就得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債被當作官股加入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通商、四明、國貨、中國實業等行，使這些銀行，逐漸為國民黨政府所控制，成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附庸。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則憑藉政治特權，在發行公債和進行債券投機中大發橫財。孔祥熙的「公債政策」，真可謂「一箭三鵰」。然而，大量公債的發行卻給中國的工商業和農村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孔祥熙入主南京財政部的另一重大舉動是主持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極其繁雜、混亂。一九二七年以前，僅經核准可以發行貨幣的，就有華資幾十家，外資十幾家銀行。各種貨幣同時流通市場，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對政治上也有很大的離心作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美國由此採取的「白

銀政策」，給了南京政府的幣制以很大壓力。美國實行提高銀價，購進白銀的政策後，上海的金融家們即大量出口白銀獲利，造成白銀大量外流，債券銷售一蹶不振。同時由於白銀外流造成國內銀根奇緊，銀行貸款利率驟增。南京政府曾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和十月先後下令取締外匯投機，徵收白銀出口率和平衡稅，仍未能阻止白銀的繼續外流。孔祥熙在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的指導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幣制改革」，對中國金融現代化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搜刮到了價值在三億元以上的巨額白銀。同時，由於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統一的發鈔權，這就為它通過濫發紙幣來掠奪民間財富大開方便之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孔祥熙在上海得到消息後，立即驅車趕回南京，與蘇聯駐華大使館秘書鄂山蔭會面，開門見山說：「蔣如被殺，勢必迫使中國投靠日本，以中國人力物力供給日本軍閥，做侵略資本，對亞洲對蘇聯都是嚴重威脅，希望蘇聯能設法保全蔣的生命，其他問題事後從長計議。」當時，何應欽置蔣介石死活於不顧，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聯合各方準備對西安用兵，並令空軍轟炸西安。孔祥熙則力持慎重，主張在保全蔣介石生命安全的條件下，考慮其他問題。孔還與地方實力派聯絡，積極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從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蔣介石一直讓他的這位連襟兼任行政院副院長（抗戰初期曾任院長，蔣兼任後，孔仍副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這使孔祥熙掌握著行政、財政、金融大權，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 and 影響達到了他一生的頂點。這期間，「孔財神」的主要「政績」，就是以抗戰之名，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方式，為四大家族聚斂財富。

七七事變爆發以後，正在歐美商購軍火的孔祥熙立即回國，旋即在武漢恢復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由他自任「總務」理事會主席，「四聯總務」最初的職能是聯絡各行業務，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黨頒布《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以後，它成了四大家族壟斷全國金融業的核心機構。孔祥熙還在西南、東南各省增設了六十多個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設了一百五十個分行。這樣，就大大加強了「四聯總務」對全國地方銀行和私人銀行的控制和監督，進一步鞏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全國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

抗戰期間，孔祥熙為蔣介石政府斂財的手段之一是發行公債和增加捐稅。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由他主持的國民黨財政部共發行內債十八種，總計法幣一、五一九、二〇〇萬元。同時，在孔祥熙主持下，國民黨政府還大量舉借外債。一九三七年以後，共向英國借款十二次，向美國借款九次，致使國家利權大量外溢。孔祥熙等經辦的公債，多數是以總預約

權形式交給「四行」辦理，由「四行」將現金先墊給國民黨政府，再由銀行發行公債。但「四行」墊付的現款，只是不斷增發的鈔票，這樣，四大家族控制的「四行」不但得到了公債面額與政府實領之間的巨大差額，同時，可以通過公債投機獲取巨大利益。然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公債無論還本付息，都只能靠搜刮人民，所以，孔祥熙不顧本已十分苛虐的捐稅，繼續擴大徵稅範圍，形成了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

實行外匯管制和買賣黃金，也是孔祥熙暴發橫財的一種手段。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三八年三月開始實行外匯管制。隨著法幣的日益貶值，外匯和黃金的官價與黑市價格差額越來越大，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再以黑市價格拋售出去，轉手牟取暴利。實行專賣制度，是孔祥熙的又一條「發財之道」。一九四一年四月，國民黨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在孔祥熙等二十人的提議下，先後對食鹽、糖、卷烟、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制度使國民黨政府收入猛增，一九四二年增收額為四七、八〇〇萬元，一九四四年竟達十八億元，此外，孔祥熙還主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黨政府成立貿易委員會，下設復興、富華和中國茶葉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實行統購統銷。資源委員會則統購統銷出口的礦產品。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低價強購，轉手高價出售，從中獲取重利。在實行專賣制度

中，孔祥熙兼任復興公司和富華公司董事長，以自己的親信把持這兩個公司的業務，壟斷了絲、茶、桐油等出口貿易。此外，他還直接控制合辦農本局的福生莊，對棉花、棉紗和棉布進行獨占性經營。

在四大家族的衆多「財源」中，孔祥熙最欣賞的要算是濫發紙幣了。他曾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抗日戰爭以前，國民黨政府共發行法幣一四四、四九〇萬元。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不斷增加發行量，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公布：「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一〇三、一九〇億元。」爲抗戰前的七三〇〇倍。從而造成幣值慘跌，物價暴漲的惡性通貨膨脹。一九三七年時，一百元法幣可買兩頭牛，一九四三年能買一隻雞，到一九四七年就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了。孔祥熙借助政治權力，通過各種手段奪走了人民大量的財富。據蔣介石所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披露：當一九四四年孔祥熙辭職下台時，國民黨政府國庫中僅外匯和金銀等各種硬幣兩項，就價值十億美元以上。孔祥熙的女兒孔令俊曾說「打了八年仗，爸爸爲他（指蔣介石）積了十來億美金，不能說沒有功勞」。稱他是蔣家王朝的「聚斂之臣」，他是當之無愧的。

「公」不忘私

孔祥熙任財政部長的十多年中，通過各種手段，使自己成爲億萬富翁，中國的首富。有人分析說：「僅靠孔家企業自身的盈利，他是不可能成爲億萬富翁的。他的財產主要是從營私舞弊、假公濟私、貪贓枉法中得到的。」一九三三年四月，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以後，掌握了軍火貿易大權。孔從訂購軍火活動中，套取巨額佣金，這是孔祥熙發財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抗戰期間，孔祥熙又抓到了審批外匯大權。於是他套取大量官價外匯，然後在黑市上高價拋售，謀取暴利。此外，他還通過大搞公債投機、走私販私、囤積居奇、製毒販毒等手段，大發不義之財。抗戰爆發前，孔祥熙就利用整理公債，統一發行的機會，製造「此舉意在停息」的謠言，造成持券者競相拋售，債券價格慘跌，孔則於暗中大肆購進，不久，價格回升，他又大量拋出，在這一進一出的過程中，孔「獲到三千萬元之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從美國借到五億美元，其中一億元作爲公債推銷。到一九四三年春，銷售數量達到五千萬元美金時，孔下令停止銷售，所剩五千萬元美金主要由他與宋美齡等人鯨吞，用官價購入，再高價出售於黑市，轉手獲得巨額利潤，這就是當時輿論界轟動一時的孔祥熙的「美金貪污案」。在印製鈔票中，孔也可以拿到大量佣金。他還與財政部副部長俞鴻

鈞，軍統頭目戴笠等合夥，勾結法國軍火商人奧迪南從事販毒活動，不但自己財源茂盛，也算給那些烟販烟鬼們作了功德。

由於孔祥熙爲蔣家王朝「理財」「聚斂」，備受蔣介石的青睞，所以，蔣對孔祥熙的貪贓枉法總是盡力庇護。孔祥熙等平分「美金公債」消息傳出後，黃炎培、傅斯年等在國民參議會上提出質問案，但卻在蔣介石的干預下不了了之。《晨報》曾在陳果夫、陳立夫的指使下，連續發表揭露孔的文章，蔣介石即下令將《晨報》停刊。孔祥熙的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激起了國統區廣大人民的不滿和反抗，以致發展成一九四二年的反孔倒孔浪潮。同時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日益尖銳，倒孔情緒日增，連美國政界要人也嚴厲指責他，要求蔣介石換馬，在這種內外交攻的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於一九四四年十月相繼免去孔祥熙的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重要職務。孔祥熙的政治生涯終於宣告結束。蔣介石在大陸統治垮台後，孔祥熙曾短期留住台灣，後定居在美國，直到一九六七年病死。

(王玉華)



〔第九章〕

軍界元老何應欽

在蔣介石長達二十多年的統治中，何應欽身居要職，位極人臣，是蔣介石手下的首要軍事將領。他和蔣介石既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窗，又同在陳其美手下共過事，雖沒結爲金蘭，但有知遇之恩，生死之交。以後雖有一些風波，蔣何相互利用，關係極爲微妙，但總的來看，還是如蔣介石所說：「沒有我蔣中正，決不會有何應欽。」

在黔受挫與再次發跡

何應欽，字敬之。一八九〇年四月生於貴州興義縣。一九〇一年，何應欽考入貴州陸軍小學，後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一九〇八年赴日本留學，入振武學堂，和蔣介石同窗。旋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何聞訊振奮，輟學回國，參加上海光復之役，和蔣介石共事於陳其美手下。二次革命爆發後，何任江蘇陸軍第一師步兵營長。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次革命失

敗，遂東渡日本完成學業。

一九一五年護國之役在滇爆發，貴州學旗響應。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加入中國國民黨，追隨孫中山革命。在政治上，組織「少年貴州會」，軍事上，訓練新軍並四處物色軍事人才。時何應欽由日本畢業回國，王以鄉親關係邀何回黔相助，並將其妹嫁給何應欽。委任何應欽為貴州講武學校校長和少年貴州學校校長，後任黔軍第五旅旅長兼貴州警務處處長、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名聲漸起，嶄露頭角，成為貴州新派中的核心人物。直到王文華在滬被刺，新派失勢，他才離黔經滇出亡廣州，搞復黔運動，被原貴州督軍兼省長劉顯世派人行刺，槍中肺部，經一法國醫生治療，才免於一死。以後他在滬過著寓公生活。孫中山籌建國民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蔣介石任校長，由何應欽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王柏齡推荐，何赴廣州任軍校少將總教官。這是何應欽成為蔣介石幾十年統治的重要支柱，為蔣家王朝效盡犬馬之勞的開始。蔣何雖為同學，又在陳其美手下共過事，但並無深交。何到軍校後，辦事認真，處事謹慎，漸漸博得蔣介石的賞識。蔣在軍校的心腹幹將王柏齡，正事不足，在廣州尋花問柳，遇事難以找到。而何應欽忠於職守，深得蔣的信任，多將要事交他辦理。何受如此優遇，大為感激。後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組成兩個教導團，何任第一團團長。他率領黃埔學生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先後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兩次東征，討平劉、楊叛亂等

役，何屢建戰功。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一次東征。在棉湖之役，林虎部以近十倍於國民黨的兵力，圍攻蔣的指揮部。何率第一團拚死抵抗。在危難中，蔣介石流著淚對何說：「你必須想法堅持，挽回頹勢，否則什麼都完了！」何聞此言，也流著淚回答說：「既然非拚即死，那麼我就去了！」說完，挺身上陣，督隊衝鋒，關鍵時刻，第二團也從側背攻林虎軍，將敵擊潰，奠定了第一次東征勝利的基礎。三月十二日，成爲蔣何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

廣東國民政府完成對粵的初步統一和鞏固後，蔣介石將原黃埔學生軍的兩個教導團，擴編爲兩個教導師，成立了第一軍。何任第一師師長，蔣自任第一軍軍長。第一軍成爲以後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的基礎，也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基本班底，是蔣介石幾十年統治依靠的嫡系力量。當時，何以第一師師長兼任東江綏靖委員坐鎮東江。

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爲了完全控制第一軍的領導權，預謀發動中山艦事件。但蔣介石感到時機尚不成熟，一旦動手，恐怕勢單力薄，猶慮不決。蔣在廣州密電在汕頭的何應欽徵求意見。何立即覆電表示他本人和第一師堅決支持蔣，一切作蔣的後盾，必要時請蔣到汕頭指揮。何的態度，使蔣下決心發動中山艦事件，打擊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共產黨人。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出師北伐，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下設七個

軍。黃埔學生軍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何應欽升任第一軍軍長。當時北伐軍分兵三路，主攻方向在兩湖，何應欽以東路軍總指揮的名義率三個師出東江向福建進攻。由於孫傳芳主力集中在江西一帶，何部進展順利，未遇激烈抵抗於十二月攻下福州。次年二月發動江浙戰役，大挫孫軍，三月占領杭州，何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何部損失很小，卻大功告成，何聲譽漸起。

蔣何間的初次風波

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政變後，寧漢妥協正在醞釀之中，蔣桂矛盾又爆發了。此時，蔣何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原來，四一二政變後，蔣密令何應欽執行剿滅桂系的計劃，何沒有執行。其原因有：一是當時蔣、桂力量不相上下，沒有把握取勝；二是何與白崇禧私交不錯，何不想無故翻臉。何爲此曾專程面見蔣介石，陳述利害，說明執行命令的困難。蔣雖不好強迫何繼續執行，卻認爲何「已經軟化了」，對何頗爲不滿。桂系得知蔣的陰謀，遂加緊勾結各方反蔣勢力，以備相機行事。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直魯軍猛攻徐州，徐州失陷，蔣無端責難何應欽指揮無能，並親臨前線指揮，結果敗的更慘。八月初，蔣回南京。蔣軍前線將

領，十軍軍長王天培到南京向蔣報告戰況，並請示機宜，蔣爲諉過他人，不問情由，把王關押起來，不經審判，將王處決。此事引起各部將領的極大恐慌。王天培是黔系將領，何應欽的同鄉，何對此頗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時，李、白也受到極大的震動。擔心會做王天培第二。當蔣介石要白崇禧部署軍隊與武漢作戰時，白公開頂撞蔣介石，拒不執行，並暗聯胡漢民，從旁掣肘。蔣介石意識到桂系在「逼宮」，以辭職相威脅。吳稚暉等出面，爲蔣捧場，召集寧方要員開會，力主蔣留任，何應欽卻一言不發。當蔣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時，白崇禧馬上表示贊同。蔣環顧何應欽，何低頭不語，其意已明。蔣便拂袖而起說：「好，好，我就走吧！」於是通電下野，返回奉化。在白崇禧演出的這場「逼宮」戲中，何應欽無疑是暗中踢了蔣介石一腳。

蔣介石「斷然」下野，實際上是一種「以退爲進」的政治賭博。蔣桂爭鬥中，何應欽雖然表現曖昧，但他並不想和蔣徹底鬧翻，只是對蔣介石的專橫不滿，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地位，何所率的嫡系部隊仍然效忠於蔣，蔣下野後數日，孫傳芳乘機南下，與何應欽第一軍及桂軍沿長江激戰，到九月二日，何、白兩軍取得龍潭大捷，何的第一軍擴編爲第一路軍，以何爲總指揮。當孫傳芳軍打過長江時，蔣曾指令何應欽把第一軍撤退到江浙邊去，保存實力，而讓桂軍與孫軍單獨作戰，以收借刀殺人之效，何應欽當時也想率軍逃

跑，卻被李宗仁留住，未能實現。

蔣介石子然下野，實力卻未損傷，更加劇了政局的波動，他的爪牙群起鼓噪，為蔣喊冤，請蔣復職，許多地方實力派也權衡自己的利害，希望蔣介石復出。原為衆怒所指的蔣介石，一變而身價百倍，上上下下響起一片請蔣介石復職的呼聲，蔣介石的政治賭博先贏了一局。各方面的擁蔣復職電紛紛而至，但第一軍反應冷淡。這使蔣大為惱火與不安，後來在李仲公的催促下，何請李代擬一電發出。蔣接到擁戴電後，遂入南京。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蔣介石悄然來到徐州，進入第一路軍總指揮部，突然下令撤銷了何應欽總指揮的職務，何在南京住宅的衛隊也被全部撤走。當時，何正在城外打獵。他趕回來時，正遇見李仲公，何氣急敗壞地說：「老蔣對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調我為總司令部參謀長，把我的面子丟盡。不管怎樣，我決不就，聽候他發落好了！」李勸解道：「他的脾氣你知道，愛之加膝，惡之墜淵，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既然他存在一天，你沒有把黃埔軍隊拿過來的把握，那麼，你要同他鬥，是鬥不贏他的。」何才嘆了口氣，答應就任參謀長。兵權被蔣奪了，爲了顧全面子，何希望蔣准他到上海治病。何在仕途上又栽個跟頭。當李仲公趕到徐州臨時行營見到蔣時說：「他痛自引咎，一切唯總司令之命是聽，同意就任參謀長。」蔣說：「他這樣就好」，接著激昂地說：「你

去告訴敬之，不要打錯主意；沒有我蔣中正，決不會有何應欽。這次的擁戴電，他遲遲不發，是何居心？現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傳，說我已不能掌握黃埔軍隊，能掌握的只有何應欽，他這樣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撐腰，坍我的台，叫我對北方怎樣說話。所以我就來前方試試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黃埔軍。」又幾次重覆地說：「沒有我就沒有他，他必須知道。」

「逼宮」一事，雖然使蔣何之間產生某些芥蒂，但蔣何之間，互有所倚，還是能夠合作的。占領北京後，蔣即委任何應欽為「國軍編遣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訓練總監部」總監等職務，顯示了蔣的寬大為懷，使何應欽繼續成為蔣驅使的工具。

蔣何南北呼應

何應欽自受到「入壁奪符」的打擊，有如當頭一棒，以後，對蔣介石俯首貼耳，曲意相迎，凡事不論大小，處處小心謹慎，不敢自作主張。他忠實執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指揮大軍圍剿（中共）革命根據地，為蔣介石賣命不留餘力。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三省，又將侵略魔爪伸向上海，挑起戰端，十九路軍在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推

動下，奮起抗戰，大挫日軍。此時，蔣介石第二次下野，退居奉化。在幕後操縱一切。淞滬戰役爆發前，蔣就指使軍政部長何應欽三次急電十九路軍：「著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以免妨害國防大計」。這時，國民黨政府爲躲避「暴力威脅」遷都洛陽，何應欽留守南京。何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繼續進行一系列阻撓和破壞十九路軍抗戰的活動。

一月三十一日，何電蔣光鼐、蔡廷鍇和上海市長吳鐵城，要求接受各國領事的調停。並命令十九路軍「嚴守紀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擊，在前線部隊尤需遵守。」十九路軍在上海孤軍奮戰，英勇殺敵，國民黨政府不但不調兵，二月五日，何應欽以特急電令蔣光鼐等，原配屬十九路軍之航空隊「除對日機加以抵抗外，即對日海軍決不拋擲炸彈！」又嚴令十九路軍，「南市守軍不得有挑戰行爲，如日兵艦或軍隊未向我攻擊時，不許發彈射擊，避免南市糜爛爲要！」這樣，長江口和黃浦江內日海軍可任意行動，日軍飛機可在戰地上空自由飛翔，支援地面陸軍作戰。而十九路軍以血肉之軀，孤軍局促於長江、黃浦江和蘇州河間的淞滬三角地帶與敵作戰！

當十九路軍與日軍在上海激戰之際，全國各地部隊激於義憤與愛國熱情紛紛請纓殺敵。何應欽竟發電警告說：「各軍抗日請求，非得軍政部之命而擅自開拔者，雖意出愛國，仍須受抗令處分！」國民黨陸軍八十七師二六一旅旅長宋希濂曾回憶說，他面見何應欽，陳述官

兵請求開往上海參戰的強烈願望。何應欽聽後，板著面孔說：「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叫他們撤離上海他們不撤，反而同日軍打起來了，破壞中央的整個政策，弄得很難處理，你們還來要求開往上海參戰嗎？這是不行的。」

二月八日，何應欽又急電吳鐵城和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們，提出「適可而止」從速設法停止戰爭。接著何應欽又按蔣介石指示，派陳儀和王俊到上海向日軍乞和。二月十三日夜，何又電十九路軍：「蔣公之意，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終難達到目的，已派陳次長與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師團參謀長田代少將接洽，先談雙方停止射擊若干時間，為辦理調停餘地，然後進一步商談如何撤退等問題。」在當夜又以「限三十分鐘到」的急電致蔣光鼐、蔡廷鍇、吳鐵城、宋子文：「介公刻到浦鎮，召弟等指示，滬事以十九路軍保持十餘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軍侵占山海關，又把侵略矛頭直指熱河。二月下旬，分兵三路，取開魯、朝陽、凌原。三月初，承德失守。全國輿論嘩然，同聲譴責國民政府，並集中攻擊蔣介石和張學良。而蔣早有以何應欽取代張學良的計劃，曾事先派何以視察為名到北平。此時正好實現以何代張計劃。三月八、九日，蔣、何先後抵石家莊，兩人在石密談後，蔣約張學良在保定見面。准張學良辭本兼各職，派何應欽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軍進犯長城一線，中國軍隊在長城線上浴血奮戰，重創日軍，使「日本支隊屢陷苦戰」。但長城線上的炮聲未息，國民黨政府的對日妥協活動已經開始。五月三日，黃郛銜命北上，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問題。在蔣汪的共同負責下，黃郛與日軍代表徹夜協商，於五月二十三日晨達成停戰案概要。當日午後，何應欽便予以承認。五月三十一日，何應欽派熊斌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談判，熊斌在日本關東軍印刷好的停戰協議草案上，一字不容修改的情勢下簽了字。這就是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性，使我國主權進一步喪失。蔣介石對此備加讚賞，對於華北當局答應的喪權辱國條件，連說：「好！好！你們處理的對」。並另電何應欽表示讚同。

馮玉祥聯合方振武、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所部迅速發展到十萬人。馮玉祥舉起抗日旗幟；卻遭到蔣介石、何應欽的反對和破壞。何應欽數度派人勸馮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停止抗日的軍事行動。遭到馮的嚴厲駁斥。同盟軍收復多倫後，何應欽又派人赴張家口勸馮。七月初，蔣介石電令何應欽對同盟軍「速籌軍事之徹底解決辦法」。何應欽又與關東軍要員土肥原賢二聯絡，秘密商定協同進攻抗日同盟軍。在日偽、國民黨軍隊的聯合鎮壓下，同盟軍遭到失敗，馮玉祥解甲泰山。何應欽在北方對日妥協有成，鎮壓抗日民主運動奏效；南方蔣介石對紅軍大打出手，重兵圍剿，蔣何南北呼應，配合默契。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日本爲實現獨霸中國的野心，將其侵略勢力擴展到華北，創造了「察東事件」、「河北事件」，五月二十九日，日本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等向何應欽提出：中國在天津、河北撤退駐軍，撤銷黨部和軍事委員會，將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撤職等無理要求，並揚言如不接受，日本要採取「自由行動」。國民黨政府雖然電令將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免去了于學忠職務，但並沒有滿足日寇侵占華北的企圖。六月九日，酒井又會見何應欽，又提出五項要求，並限十二日上午答覆，否則日軍將採取自由行動。何應欽向酒井表示，各項要求大致都可接受，並說明：「中、日必須親善合作，方足互維東亞和平，此爲我中央既定之方針，亦即蔣委員長之方針，迄今並未變更，凡此皆有事實可以證明。」在做出以上屈辱讓步之後，六月十日傍晚，何應欽面告日軍說：中央決定「全面承諾日方要求」。但日方不滿足何應欽的口頭承諾，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讓人給何應欽送來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除上面提出的五條件，又附加三條，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國民黨政府也不敢讓何應欽簽字，又無法應付日本，何應欽只得從北平逃回南京。但日方派員找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在日軍的威脅下，國民黨政府又卑躬屈膝了。七月六日，何應欽致函梅津，「敬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期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後來，日本又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十一月三十日，面對平津的「危迫情勢」，蔣介石命何應欽迅速北上，讓何到華北之後「斟酌情勢，負責辦理」，「力圖挽救」。何到達北平，宋哲元卻稱病西山休息。北平上空日本軍用飛機低空飛行，地下何應欽住所中海門前，有自稱「北平民衆代表請願團」的數十人請願，要求自治自決。何應欽面對各方面壓力，感到十分棘手，於十二月五日和秦德純、陳儀等會商一整天，對付危局的高招，卻是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一適應日本要求的組織籌建時，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何應欽由於懼怕學生運動，十二月九日前就從他居住的中南海居仁堂，溜到了西山。

西安事變的波瀾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後，國民黨統治集團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何應欽積極主張「不惜玉石俱焚」，要明令「討伐」「叛逆」。何目的有二，(一)如能在討伐中置蔣介石於死地，他就可以取而代之；(二)如果出兵把蔣救出來，他又是救駕的第一功臣。爲此，他與桂系接頭，聯絡西南軍閥；並對政治各項有所考慮。十二月十六日，何應欽下達「討伐令」，並自任「討逆軍」總司令。並舉行了「白衣誓師」儀式，造成了濃厚的軍事進攻，大

兵壓境的氣氛。接著，何應欽又調動了十幾個師的兵力進逼西安，同時，又派國民黨空軍狂炸陝西的渭南、富平、三原等縣。戰雲籠罩在西安上空。

十二月十七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親信蔣鼎文回南京，蔣鼎文帶著蔣介石寫給何應欽的親筆信，要何「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立即停止轟炸爲要。」但何應欽繼續調集重兵，並做了進攻西安的軍事布置。戰事一觸即發。

南京政府中的親英美派，積極設法救蔣。蔣的顧問端納，首先飛抵西安，將宋美齡的親筆信交給蔣。信的末尾寫道：南京戲中有戲。蔣看信時，淚流滿面。此時，在南京，宋美齡在召集黃埔系空軍人員開會，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求道：「不要聽何應欽的命令。」何應欽當面「斥責」宋美齡是「婦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宋美齡傷心地說：「你這樣做太辜負蔣先生了。」暗鬥明爭，十分激烈。

何應欽正在準備大興討伐之際，蔣介石突然被釋回到南京。但這台戲怎樣收場呢？當時何應欽的尷尬處境是可想而知的。何應欽只好硬著頭皮向蔣介石述說他一片仗大義、伸國法，主張討逆救主的苦衷。蔣介石也不便公然發洩，但又不能容忍，懷恨在心，埋下了「君子報仇」的種子，加強了用陳誠代替何應欽的決心。

蔣何間的微妙關係

有了「逼宮」的一齣戲，又有西安事變這一幕，蔣何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複雜了。蔣介石採取了中國紫禁城的方式：疏者位尊而大權旁落，親者位卑而獨攬一切。何應欽在黃埔系中居於僅次於蔣介石的地位，有相當大的影響。蔣還需要他賣命，留用他更顯得蔣的寬大為懷。更主要的是，蔣一手扶植起來的陳誠還不夠做何應欽的接替人。

雖然何應欽陷入極不自然的處境中，但他對蔣表示千恭百順，絕對服從，其次何在國民黨中是反共死硬派的頭幾號人物；再則，他對人謹恭和藹，不擺架子，在黃埔系中頗得人心；辦事慎密、勤奮，在國民黨軍事機關裏有「幹才」之譽；更主要的是，蔣最忌諱的是組織團體，自成體系，何應欽在國民黨中沒有自己組織的團體，又始終超然於CC系、政學系、復興社之間，基於上述原因，蔣還繼續利用何應欽。抗戰期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何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坐鎮廣州。次年一月，升任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昆明就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何應欽由南寧飛昆明與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初步交換處理日軍投降事宜的意見。

九月九日上午，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正式接受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

官」岡村寧次的降書。但何卻秉承所謂「以德報怨」國策，「對岡村及其統率的一百三十餘萬日軍卻給予比較一般國際習慣爲優的待遇」。何應欽勾結日僞軍，以恢復治安，維持秩序爲名，讓日軍保持建制，特令岡村寧次負責聯絡。

一九四六年九月，聯合國安理會設置軍事參謀團。十月，國民黨政府特派何爲中國代表團團長前往參加。何應欽正官運亨通，突然被貶出國，擔一虛職，究竟爲何？原來，在日本投降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派代表到重慶，詢問中國繼承人的事情，蔣介石以自己體力還健，尚未考慮爲答。日本投降後，羅斯福總統又派代表到南京重提舊事，蔣介石不得已姑以何應欽應之。何以爲蔣介石「聖心」回轉，同意他繼承「大統」呢！高興起來，就忘乎所以了，想在黃埔系中「自成體系」，還要搞什麼「何氏內閣」，結果，觸到蔣介石痛處，被蔣一腳踢開到地球那一邊，閒放起來。

一九四七年五月，何奉召回國出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冬，何不甘寂寞，想當行政院長，經好友勸說，方轉意。但他卻虛情假意地說：「這是報上拿我來做材料，連在美國時，美國當局認爲蔣扶植不起，希望我作他的替人，願在經濟、政治各方面加以援助，我曾以條件不夠加以謝絕，還想做什麼行政院長。」

一九四八年五月，何應欽接替白崇禧，任國防部長。同年底，蔣介石和桂系爲副總統選

舉鬧到白熱化程度，李宗仁不願蔣的阻攔，以微弱多數當選。爲和桂系抗衡，蔣認爲何應欽有可利用之處，何應欽應運當了行政院長。

到台灣後，一九五〇年五月，何應欽就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參加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多次訪問日本、美國及歐洲各地。

一九五四年五月，蔣介石第一屆「總統」任期屆滿，按國民黨的憲法規定，台灣當局應於四月份選出第二屆「總統」。當然，總統是非蔣莫屬，在競選副總統問題上，蔣介石不想昔日孫科、李宗仁的往事重演。蔣介石說：「問問何應欽願不願意競選副總統？」作爲國民黨元老、四星上將何應欽，自知以前曾兩次「對不起」總裁，連忙作揖婉謝，從此更專心參加「道德重整會」，作「道德專家」去了。何應欽的作用已隨著蔣家王朝在大陸上的滅亡而銷聲匿跡了。

（程舒偉）

小委員長陳誠

一九二四年的廣州，英才薈萃，生機盎然。

時間已近子夜。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一片沉寂，師生們已經帶著訓練中摸爬滾打的疲勞進入了甜蜜的夢鄉。時值校長蔣介石查夜，發現一扇窗戶還透著微弱的燈光，推門進去，原來是炮兵隊區隊長陳誠，在挑燈讀《三民主義》一書。

蔣介石打量了這個身材矮小的年輕軍官幾眼，默默走了出去。至門外才想起自己一年前任粵軍參謀長，隨孫中山出征西江時，在肇慶醫院探視傷員，也曾見過陳誠。當時，他雖然胸部負傷，卻不同於其他傷號的病態呻吟，仍是軍容整齊富有生氣。陳誠當然也記得這情形，只是對這位總是板著臉的浙江同鄉有些望而生畏。

次日清晨，早操完畢，蔣介石宣布：炮兵隊區隊長陳誠，發奮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為少校炮兵隊隊長，以資鼓勵。陳誠先是一愣，繼而激動萬分。但陳誠絕沒有想到：這還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一個起點。

北伐驍將

陳誠，字辭修，別號石叟，一八九七年生於浙江青田高市一個小學教師家庭。父陳希文是前清秀才，曾入杭州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了高市小學校的校長。陳誠幼時體弱多病，因隨母親種菜、上山砍柴，體力漸漸增強。九歲入高市小學，智力平平，常去距高市三華里的石門洞玩耍。這裏飛瀑直下，浪花四濺，景色奇偉秀麗，是明代誠意伯劉基讀書的地方。陳誠常津津有味地聽父老鄉親講述劉基輔佐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故事，稍大些，便自署石叟以自勉。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青田依然如故，陳誠的家境也並未好轉。高市小學畢業，他私自赴麗水考取了省立十一中學，這使他父親深感為難。家裏生活拮据，原擬讓他以長子佐理家務，從事耕種。多虧有一位得過前清貢生的叔父陳一鸞，從旁勸說，並願有所資助，才得以轉入公費的處州第十一師範。一九一六年畢業後，陳誠與該校同學吳子奇的妹妹結了婚。婚後拿了妻子的嫁妝費跑到杭州，考進體育專科學校，雖不足半年，卻使身體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為日後從軍打下了基礎。體校畢業，他希望能當上個小學教員，

幾經努力終未能如願。適逢其父老友杜志遠先生當選為國會議員，北上赴京途經杭州，見他年紀尚輕，卻為謀生而苦悶，便攜其北上，想介紹他投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但由於陳誠身材矮小，考試成績又不很理想，沒有被錄取，經杜志遠向主考官、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翰疏通，才以備取名義，考入第八期，分隸炮科。他的區隊長，就是後來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的鄧演達。

陳誠在保定軍校畢業後，與同學周至柔等分派到浙江陸軍第二師三旅五團三營任見習官，後又當了上尉排長。不久，鄧演達奉孫中山命羅致保定軍校畢業生赴粵參加革命，陳誠隨同前往，次年任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上尉副官，團長為鄧演達，營長是後來的「湖北三怪」之一的嚴重。在隨孫中山出征於肇慶同馮葆初部作戰中，陳誠胸部受傷，住進肇慶醫院。旋因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帶傷回籍奔喪。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六月，在蘇聯幫助下，孫中山在黃埔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以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鄧演達為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後任教育長）。陳誠隨鄧到黃埔軍校，先派為上尉特別官佐（候差），後調任第二期炮兵隊區隊長，又被蔣介石破格提升為少校炮兵隊長，並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商團叛亂中受到嘉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國民革命軍以蔣介石爲總指揮，周恩來爲政治部主任，再次東征陳炯明，並決定首先拿下東江樞紐惠州。惠州三面環水，易守難攻，陳軍在城頭設機關槍陣地猛烈掃射，東征軍雖前仆後繼，因傷亡太大未能攻克。深夜，陳誠潛至離城五百米左右的一個小茅草屋，架上火炮，次日拂曉瞄準城頭機關槍陣地，一發試炮，再發命中，步兵乘機發起衝鋒，攻下惠州，全殲陳炯明主力，十一月完全收復東江，並消滅了粵南鄧本殷部，使廣東實現了完全統一。惠州之役，陳誠因功升任炮兵第二營營長。

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以蔣介石爲總司令，李濟深爲總參謀長，鄧演達爲總政治部主任，在廣州誓師北伐。爲適應作戰需要成立補充二十一師，蔣介石調黃埔軍校訓練部主任嚴重任師長，陳誠隨嚴到該師任團長，周至柔爲團參謀長，歸何應欽指揮。進至浙江龍游、蘭溪，與孫傳芳軍孟昭月部展開激戰。克服嚴州、廬州後，孟部退居杭州。二十一師在桐廬西北、浪石峰過江，陳誠指揮一個團背水激戰，傷亡很大，乃於深夜襲擊敵軍師部，敵不知虛實，倉皇敗退，二十一師乘勝追擊，克復新登，進入杭州。嚴重爲陳誠請功，並提升爲二十一師副師長。此時北伐軍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戰場相繼告捷，爲攻取江蘇、安徽，調整作戰部署，江右軍由九江下蕪湖，東指南京，東路軍攻淞滬，江左軍由真山、霍山出安慶，協助江右軍。陳誠隨東路軍攻下平望、蘇州、上海，蔣介石率領的江右軍也進入了

南京。

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也越來越複雜。國民黨老右派分裂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由來已久，以蔣介石爲代表的新右派，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買辦資產階級支持下，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政治野心也大爲膨脹，已隨時準備反蘇反共。在統一戰線內部，不僅國共兩黨之間，而且國民黨內左派、右派、新右派和老右派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大浪淘沙，形勢的發展要求每一個人都做出自己的政治選擇，陳誠當然也不例外。他對師長嚴重的學問道德推崇備致，卻又發現嚴在國民黨內十分孤單，將來勢必難以立足；蔣介石雖高傲狂妄，目空一切，所受各方攻擊也不少，但實權在握，能破格用人，特別是對浙籍青年軍官格外看重，而且地位日高一日，大有取胡漢民、汪精衛而代之的趨勢。權衡利弊，他覺得追隨蔣介石才最有發展。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政變，致使統一戰線破裂，大革命歸於失敗。陳誠一度思想十分迷惘，曾找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求救，研究蒲魯東學說，還到上海大學聽過課。但他很快發現，政治格局的變化不僅對他沒有絲毫的損失，甚至可能提供進一步升遷的機會。不久，這種猜想就變成了現實：鄧演達因不滿於蔣介石、汪精衛的所做所爲，翩然出國，嚴重也隨後辭職，臨行推荐陳誠繼任師長之職，陳誠在三四年的時間裏，由區隊長升至

師長，除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多得力於鄧演達的關照和嚴重的提拔。他對嚴的知遇之恩始終難忘，抗戰前嚴隱居廬山，躬耕自食，他曾多次親往探望，並常命部下饋贈火腿、茶葉、烟絲、食鹽等物品。

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受到桂系等各派挾逼，被迫宣布下野。孫傳芳糾集六、七萬人，長驅直入，渡江占領龍潭車站、棲霞山和烏龍山等地，截斷了滬寧路。何應欽、李宗仁調大軍與孫軍在龍潭決戰，孫傳芳也和其重要將領親自到前線督戰，雙方爭奪十分激烈。二十一師奉命奪取棲霞山、青龍山。此時陳誠雖胃病嚴重，但想到任師長後初次受命，便抱病乘轎指揮作戰，經激烈的爭奪，終於將青龍山「八五九」等高地占領。國民黨軍又從南京及滬寧線東西同時總攻，孫傳芳軍全線崩潰。

是役陳誠抱病上陣，自感問心無愧，但何應欽憤於自己的第一軍傷亡太大，又聽說陳誠坐轎指揮，即下令免去了陳誠的師長職務。這使陳誠從此萌發了對何應欽的成見，並成爲他們終生勢同水火的起點。他趕赴南京，向自己的老上級，軍事廳廳長嚴重申冤，經嚴向何應欽解釋，又重新保荐他任軍事廳副廳長。但因治療胃病，並未到任。

不久，下野的蔣介石東山再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陳誠以浙籍青年軍官再次被起用，任南京總司令部警衛司令，轄六個團的兵力。

他利用職務之便，與國民黨頭面人物頻繁接觸，邀于右任、李石曾到總司令部演講，任張厲生爲秘書，藉以擴大政治影響。一九二八年四月陳率炮兵一、二團隨蔣介石參加對張作霖的戰爭，過徐州北進。張作霖、孫傳芳的部隊節節敗退，陳部沿津浦線北進，五月一日進入濟南。忽然又接到蔣介石迅速撤出的命令，便下令撤退，隨後便發生了「濟南慘案」。蔣介石繞道濟南，攻取平津。陳誠剛回南京，代蔣留守的何應欽便下達了裁撤警衛司令部的命令，從此陳誠對何挾怨益深。

「剿共」先鋒

陳誠真正登龍發祥，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任十一師師長時開始的。

一九二八年秋，蔣介石結束了對奉軍的戰爭，初步實現「統一」之後，便策劃召開全國編遣會議，以削弱馮玉祥、閻錫山和桂系等的軍事實力。陳誠雖不滿於何應欽所爲，表面上卻表示讚同立即撤銷警衛司令部，以響應蔣介石的「編遣」主張，並將萬元結餘全部上繳。這對當時貪污和侵吞軍餉成風的舊軍隊來說，確屬罕見，因此深受蔣介石的讚賞。不久，福建周蔭人殘部曹萬順投降國民黨。蔣介石將其部縮編爲四個團，再加上原南京警備司令部所

轄的兩個警衛團，合編爲十一師。初擬陳誠任師長，遭到何應欽的反對，認爲他資歷太淺，不配與顧祝同、蔣鼎文爲伍，只能任副師長。陳誠聞訊，由南京出走上海。蔣介石此時已有意栽培陳誠，並希望他將來能在黃埔系內以少壯勢力形成與何應欽的牽制均勢，所以特派人赴滬，講明副師長只是過渡，並給予處理人事的實權，陳誠才赴蕪湖就職。

次年春，蔣桂戰爭爆發。十一師奉命西進，由蕪湖進至賀勝橋控制要衝，使桂系與兩湖聯繫中斷，李宗仁部李明瑞又在孝感倒戈附蔣，蔣軍遂兵不血刃進入武漢。十一師駐鄂西宜昌，因係兩部分組成，時常發生衝突。前警衛團官兵自視爲蔣介石嫡系，又得到陳誠支持，拒不接受曹萬順調遣，使其師長名存實亡；團長蕭乾（黃埔一期）又借曹萬順任用私人到該團任連長事件，向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和蔣介石控告，曹被調出，陳誠升任十一師師長。他大刀闊斧，銳意整肅，將屬於曹萬順的人員全部換成清一色的黃埔生，中下級軍官實現年輕化，素質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對蔣介石比較「忠誠」。在整肅後即首創唐生智，初露鋒芒。

一九二九年秋，馮玉祥部張維璽軍由陝鄂邊界進駐湖北襄樊。蔣介石命十一師與蔣鼎文第九師，夏斗寅十三師共同奪回該地。雙方激戰中，唐生智又率領京漢鐵路北段湘軍南下反蔣，前鋒沿平漢線抵達駐馬店、確山附近，武漢空虛，人心浮動。蔣介石急令鄂西北的夏、

蔣、陳三師回援。陳誠奮力擊敗張維璽軍，並在漢水上游四處搭橋，佯作攻擊之狀。其先頭部隊則從均縣連夜折回，在風雪嚴寒中以急行軍速度最先趕到確山附近。十二月五日夜在劉店與唐生智部展開激戰，雙方傷亡慘重。時唐軍飢寒交迫，軍心動搖，陳誠乃派羅卓英拉攏王東原分化唐軍，致使其兩營嘩變，造成內部混亂，加之楊虎城部又從南陽襲擊駐馬店，唐軍腹背受敵，全線崩潰。陳誠率十一師追至漯河，又偷襲了唐生智的司令部，將其全部繳械，唐隻身脫逃。這次戰役，如果十一師遲一步，讓唐軍越過武勝關，武漢就可能失守，唐生智便可與湖南的何健、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成一氣，造成不堪設想的局面，故再得蔣嘉勉。

蔣唐混戰結束，十一師調武漢整訓。次年春移駐蚌埠，將徐聲珏獨立旅改編，以周至柔為旅長。三月，閻錫山、馮玉祥和李宗仁分任「中華民國陸海軍」正副總司令，集結六十萬大軍聯合反蔣。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調主力部隊應戰。中原大戰爆發。

陳誠奉命率十一師經徐州沿隴海路西進，在馬牧集俘獲萬選才之弟萬殿尊，擊潰其一師之衆；隨即進抵商丘，與晉軍楊效歐部展開激戰，楊節節敗退，十一師進逼寧陵。寧陵晉軍守將劉茂恩與陳誠有同窗之誼，陳致書敘舊，勸其早識時務，劉遂開城門迎接蔣軍，晉軍士氣大喪。十一師繼向杞縣、蘭封推進，與戰鬥力較強的馮玉祥部展開了逐村的爭奪戰。十一

師較之蔣軍其它部隊，確有較強的戰鬥力。馮軍彈如雨傾，伴以大刀衝鋒，蔣軍大多聞風喪膽，獨十一師尚能與其對壘。陳誠持槍在陣地上嚴督部下死戰，不准放棄一寸陣地。六十一團團長劉天鋒（劉峙之侄）丟失歸德陣地無力奪回，陳誠不顧手下將領苦苦哀求，將其正法。部下見此不敢玩忽職守，只有拚死作戰，旅長李默庵在部隊敗退時，臥地堵截，負傷而歸，才免於追究。

七月，閻錫山從津浦路南下，渡過黃河，占領濟南、泰安，圍攻曲阜。守城十三師迭電告急，徐州動搖，南京受到威脅。蔣介石連夜從隴海線調出十一師，沿津浦線馳援曲阜。陳誠下令官兵不准設營就宿，日夜兼程前進。有的部隊飯未吃上，喝口水即行開拔。為鼓舞士氣，陳誠亦隨軍步行。全師以每天一百二十華里的速度趕到兗州，即與十九路軍聯合展開了曲阜破圍戰。時天下大雪，晉軍多染海洛因癖，無法吸食，戰鬥力大減，經不住蔣軍內外夾攻，全線潰退。十一師俘獲了大汶口以南晉軍的炮兵和輜重以及許多高級將領的小汽車。蔣介石聞曲阜捷報，升任陳誠為十八軍軍長和右翼軍指揮官，仍兼十一師師長。陳率軍北上，於八月十五日占領濟南。

津浦線戰事告一段落，陳誠趕赴柳河，在一個掛滿軍用地圖的小道房裏見到了身穿栗色夾袍的蔣介石。蔣稱讚十一師勇敢神速，出奇制勝，並表示要改變戰術，放棄陣地戰的打

法，採用錐形戰術，大膽穿插，就隴海路、平漢路的正面和兩側，編爲十三個縱隊，以鄭州爲目標，不顧一切鑽進去，以瓦解馮軍，將其壓到黃河南岸殲滅。同時給十一師下達了突進鄭州的任務，並宣布先入部隊賞大洋三十萬元。陳誠率軍由杞縣以南繞至鄆陵附近，與十三師會合後，在洧川北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夜襲和尚橋，經新鄭向鄭州推進。十月五日偷襲成功，向鄭州進發。此時張學良已發出擁蔣通電，派兵入關，蔣軍士氣大振。陳誠爲了搶頭功，事先擬好了報捷電報，並派衛士隨先遣部隊前進，以便占領鄭州後從速回報，立即拍電報捷。六十一團在二里崗擊潰馮軍跑步入城，張貼安民告示，衛士飛騎來報，陳誠以十萬火急電報向蔣告捷，蔣賞洋三十萬元。事實上，上官雲相的七十四師已先於十一師占領了火車站，卻忙於搶劫財物輜重，忘了報功。所以陳誠領大洋時又表示十一師首先占領鄭州，是友軍協助之功，不敢有賞獨受，將一半分給了七十四師。

鄭州爲中原心臟，既落入蔣軍之手，馮、閻聯軍敗局已定。閻軍見勢不妙，忙向山西龜縮，馮軍一部在許昌被殲，孫連仲部被壓於黃河汜水附近，被迫投誠。中秋節前後，蔣介石在鄭州銀行召開軍事會議，結束對閻錫山、馮玉祥的戰爭，初步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地位。十一師在中原大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蔣介石譽爲「馬收集開戰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之果」，陳誠由此升任十八軍軍長，與顧祝同、蔣鼎文等平起平

坐，成爲後起的少壯派軍人領袖，這一年他才三十四歲。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陳誠自日本觀操回國，應蔣介石之邀赴漢口，檢閱錢大鈞的教導第三師。不久，宋美齡又搭橋牽線，將其乾女兒譚祥（又名曼意，留美學生，譚延闓的二女兒）介紹給他做妻子，這使陳誠有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之感。他從長沙購買了鵝絨織錦沙發椅墊，鵝絨被等物品，送到譚公館作爲求婚禮物。隨後赴武昌，將錢大鈞的教導第三師改編爲十八軍所屬十四師，自兼師長，以周至柔爲副師長，柳善爲參謀長，又以武漢要塞攻城營和工兵營改編爲一個攻城旅，以李延年任旅長，使十八軍共轄兩師一旅。整編完畢，奉命率軍由武漢到達南昌，準備參加對江西紅軍根據地的大規模軍事「圍剿」。戰前，他回到浙江老家，辦理與原配妻子吳氏的離婚手續。經各方相勸，吳氏提出了「生不能同衾死必同穴」的條件，陳誠知這純屬身後事，便滿口答應，隨即到上海與譚祥結婚，時人稱之爲又一樁「政治婚姻」，從此他和蔣介石更增添了一層密切的「翁婿關係」。

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調三十萬大軍，以十八軍等嫡系部隊爲主力，採取「分進合擊」「長驅直入」的戰略方針，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陳誠率十八軍經撫州、南城，在黎川、南豐、于昌、寧都等地轉了三個月，沒有見到紅軍的影子。部隊瘡疾、痢疾流行，士氣大損，連他自己也漸漸支持不住。由富田南進不遠，韓德

勤的五十二師在東固被紅軍殲滅，十八軍被迫撤至吉安。三次「圍剿」的失敗，使陳誠認識到單靠軍事進攻不能消滅紅軍，國民黨吏治腐敗，是造成根據地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一面抨擊湖南省主席何健的昏庸無能，一面把矛頭指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命部下搜集有關江西苛捐雜稅和貪污腐化的情況，向蔣介石提出指控。

一九三三年二月，蔣介石集中主力五十萬人，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此時，十八軍已擴編為六個師，共八、九萬人，陳誠出任中路軍總指揮。為輕裝前進，提高戰鬥力，他提出了「吃在一身，睡在一身，用在一身」、「找匪打，與匪拚」的口號。鑒於十八軍過於龐大，他又提出了組建第五軍的建議，被蔣介石採納，將所轄五十二、五十九師撥給該軍，以羅卓英任軍長。由於臨戰易帥，觸兵家大忌，羅卓英尚未建立起指揮機構，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已向形勢險峻的東坡、黃坡前進，並形成了左右游離狀態。時天暝霧重，不辨東西，早已埋伏於此的紅軍以逸待勞，一擁而起，將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全殲，師長李明、陳時驥分別自殺和被活捉。陳誠在撫洲聽到第五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大哭失聲。但他馬上又接到空軍不準確的報告，說紅軍正向廣昌行進，便作出了紅軍主力已拚光的錯誤判斷，糾集吳奇偉的第四軍，配合十八軍進行追擊。十一師最先到達黃坡附近的草苔崗，被紅軍包圍，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裏，旅團長傷亡過半，師長蕭乾負傷，部隊被殲

三分之二，殘餘狼狽逃竄。陳誠聽到命根子十一師的噩耗，幾乎暈倒在地。

第五軍和十一師被殲，導致第四次「圍剿」的失敗。蔣軍上下一片嘩然，何應欽指責陳誠指揮不力，是驕兵必敗，熊式輝對其攻擊更甚，乾脆建議蔣介石撤銷陳誠本兼各職，將十八軍部隊改編。陳誠遭此重創，也羞愧至極，匆匆安排了部隊的整訓，便回到南昌寓所躲了起來。

四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就如何消滅紅軍和根據地意見紛紜，莫衷一是。蔣介石權衡各方條件，採納了「戰略上以守為攻，戰術上以攻為守，碉堡推進，經濟封鎖」的戰略計劃。但環顧手下大將，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等不是優柔寡斷，便是暮氣沉沉，都不足以擔當「圍剿」重任，唯有陳誠作風潑辣幹練，才堪其用，所以決心再次起用。但陳誠心懷怨氣，不願承擔。經譚祥勸說才往見宋美齡，蔣介石在家中將「圍剿」計劃合盤托出，並表示要重新擴充十八軍，每師三團，取消旅級建制，以加強機動能力。陳誠喜出望外，欣然從命。

第五次「圍剿」，蔣介石調集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陳誠任第三路軍總指揮，將五次「圍剿」的戰略方針概括為「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十六個字，並提出「碉成民安，路到匪除」的口號，在所轄部隊廣為宣傳，督促實行。針對失敗主義

彌漫全軍的狀況，陳誠下令全軍官兵習讀戚繼光的《風雨同舟篇》，少校以上軍官要能夠背誦。他深知此次戰役事關重大，所以腳穿草鞋，腰繫寬皮帶，和部屬同揹乾糧袋，吃大鍋飯，藉以維繫軍心。每逢戰鬥激烈，他常晝夜不眠，很少在部下面前現頹喪疲憊之態，使士氣有一定程度的振作。十月洵口遭遇戰蔣軍失利，唯獨六師翁國華團拚命守住了陣地，陳誠當即將翁提升為一級，並由張繼率慰問團到該部舉行授旗典禮，營以下軍官均有升遷，發給獎金五千元。這些措施無疑還是起了強心劑的作用。一九三四年二月，陳誠驅兵占據了廣昌、建寧，並於年底攻下寧都、瑞金。紅軍被迫開始了戰役大轉移。

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結束後，陳誠被任為陸軍整理處長，派員赴各省區校閱各部，協助蔣介石整編全國軍隊，並在武漢設立軍官訓練團，輪流調訓各地軍官。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發生。陳濟棠聯合李宗仁，打起「抗日反蔣」旗號，計劃由桂軍先取衡陽，控制湖南。陳誠力主日寇蠢蠢欲大舉進攻之際，應以武力做後盾，爭取「兩廣事變」和平解決，關鍵是確保衡陽。六月八日，他奉蔣介石之命飛往武漢，令七十七師羅霖部，四十三師周祥初部，九十七師孔令恂部，連夜集結赴湘；另以譚道源二十二軍開赴萍鄉、醴陵，周岩第六師開赴株州待命。部署完畢，陳誠於次日赴長沙，攜三師師長同時抵達衡陽，穩定了湖南局勢。七月，廣東空軍飛行員黃志剛等二十一人通電擁

護「中央」，駕機九架投蔣，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則直飛南京，商討和平解決。陳濟棠見大勢已去，出走香港，二十五日，陳誠飛抵廣州，協助綏靖主任余漢謀整理廣東軍務，又赴南寧，與李宗仁、白崇禧達成協議，和平解決了「兩廣事變」。

隨著日本對華北的蠶食，英美在華利益和蔣家王朝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明確表示：「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反映出國民黨對日政策日趨強硬。陳誠及其所代表的大部分黃埔系軍人與一些正直的國民黨元老，深感國亡無日，民意難違，形成了占壓倒優勢的主戰派。西安事變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後，陳誠向蔣介石提出在廬山舉辦班暑期訓練團，邀請國民黨中央及政府各部、院黨政軍首腦和各地軍政要員、專家學者作報告，並就此召開一次抗戰建國動員大會，以激勵民心，振作士氣，被蔣採納。廬山訓練團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廬山大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蔣介石任團長，程潛、賀國光、白崇禧、何應欽、張治中、陳誠任副團長，陳誠兼教育長負責實際責任。受訓學員三分之二為中上級現役軍官，三分之一為高級小學校長、縣長、各省市黨部委員等文職人員。訓練團由蔣介石講《總理遺教》和《抗戰建國》，戴季陶講《三民主義研究》，汪精衛講《全民總動員》，陳立夫講《唯生論》，胡適講《實用哲學》。陳誠在其《暑訓

班之使命》中反覆向學員強調，暑訓班負有驅逐日寇，復興中華民族之使命，「委座」期之甚殷。一定要盡忠職守，精誠團結，報效「委座」的培養與愛護，增進對「中央」的竭誠擁護和對「領袖」的信仰，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思想灌輸之外，陳誠對學員的生活頗為優待，每人除發羅斯福卡嘰軍服兩套，純毛軍毯一床，還有雨衣、水壺、乾糧袋，以及精裝的《總理遺教》、《領袖言行錄》、《三民主義研究》、《新生活手冊》等書刊。畢業前夕，又從蔣介石家鄉運來奉化水蜜桃和金華火腿罐頭，贈給每人四盒，以示「領袖」關懷。廬山訓練團兩期共訓練學員三千六百多人，進一步增強了地方，特別是邊遠地區軍政人員對國民黨的向心力；這種氣氛，打擊了對日妥協投降活動，促進了國共合作抗日談判的成功。九月二十二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最後形成。

功過相間的主戰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平津相繼失陷。八月十三日，日本又對上海發動軍事進攻。次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實行自衛，抵抗暴力」，並開始組織淞滬

抗戰。

八月十五日，陳誠應蔣介石電召，自廬山飛回南京，擬訂戰鬥序列。次日飛抵上海。他用兩天時間考察了淞滬戰事，返回南京向蔣介石匯報說，雖然日本兵器利，占有優勢，中國卻不能不戰，也不得不戰。並自告奮勇，願指揮淞滬抗戰責任。二十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南北戰場爲五個戰區，上海爲第三戰區，以陳誠爲前敵總指揮兼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統帥十八軍、五十四軍、第六師、第五十一師、江防守備軍。陳誠率部到達上海時，日軍已由獅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張華濱附近強行登陸，正向寶山、羅店、瀏河一線進犯。陳誠與朱紹良、張發奎分別指揮左、中、右三路部隊，與敵軍展開激戰。日本援軍也陸續到達，總兵力增至十五萬人，雙方在北站、楊行、瀏河一線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楊行陷落，劉行被突破，國民黨軍退守施公相廟一帶，重新調整戰鬥部署，蔣介石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任前敵總司令，負淞滬指揮全責。此時，日軍增兵已達二十萬人，火力兇猛異常，閘北大場失陷，被迫撤到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一帶。十一月，日軍在杭州灣登陸，陳誠奉命率部撤出。

淞滬抗戰堅持近三個月，使日軍主力轉移到了東戰場，避免了日軍由平津南下，出洛陽以塞潼關之口，趨武漢而斷蔣軍後路的危局，斃敵軍五萬多人，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

的夢想；是役蔣介石投入了相當數量的嫡系部隊，初步以實際行動表明了抗戰的態度，使國民黨內的妥協投降活動有所收斂。陳誠作爲前線最高指揮官，其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國民黨片面抗戰方針和消極防禦思想影響下，他指揮作戰缺乏靈活性，只在陣地上死打硬拼，對淞滬抗戰失利，也負有一定責任。

上海南京失陷後，國民黨雖已宣布遷都重慶，但軍政要人，在野各派知名人士和文化界名流等卻大多到了武漢，武漢成爲抗戰初期實際上的軍政中心和臨時首都。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陳誠奉命出任武漢衛戍司令。二月間，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擴大政工職權，成立政治部於武漢，陳誠任政治部長。政治部作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象徵，陳誠在人員組成上，擺出了較開明的姿態，請共產黨人周恩來，第三黨黃琪翔出任副部長，任張厲生爲秘書長，下設黨務、民衆組織和宣傳三個廳，他三次致電、並登門拜請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答應在人事安排、制定計劃、使用經費等方面予以全權。由於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參加政治部，打破了一黨包辦的格局，使政治部的工作出現了生機活力，在發動全民族抗戰，保衛大武漢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抗日戰爭時期，流行著「八路軍英勇善戰，共產黨埋頭苦幹」的說法，許多頑固派爲了排斥國民黨中的一些正直之士，便使用扣紅帽子的方法，造謠說這些人是「共產黨」，這很使陳誠惱火。在軍政聯合擴大紀念周上，他從維護國

民黨的形象出發說：「現在我接到不少報告，從中得到這樣的印象，在軍政機關中，凡是敢說敢做，積極肯幹的人，都是與「異黨」有關的人士，在部隊中，凡是能打仗、不貪污、愛兵親民的軍官，都是接近共產黨人的「左傾人士」，照這樣說，我們國民黨軍政幹部就沒有好人麼？真是荒謬……」。

周恩來、郭沫若北伐時都是陳誠的上級，盡管政見不同，但他對周、郭還比較尊重，常徵求意見，談話、報告中也多次讚揚周恩來的高尚品德和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解放戰爭時期，他針對國民黨內爭權奪利之風，還說：「你們都知道周恩來吧，民國十二年就是中將級的軍校政治部主任，可是十三年後，軍委會總政治部成立時，他甘當我手下副部長，可又把政治部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這不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鑑嗎？周恩來在共產黨中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可他那麼尊敬毛澤東，可是我們黨的高級人員，對服從中央，效忠領袖又是怎樣呢？」

由於共產黨人周恩來、郭沫若的努力和進步人士的支持，政治部能如實宣傳國民黨將士和八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跡，使武漢成爲動員全民族抗戰的中心。時任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曾這樣寫道：「《新華日報》復刊了，鄒韜奮和柳湜主編的《全民抗戰》也復刊了，空氣的確在變，沉睡了十年的武漢，彷彿在漸漸地恢復到它的北伐時代的氣息了」。武漢三鎮舉行台兒莊大捷慶祝遊行，近五十萬人參加，聲勢浩大，黃鶴樓下，水洩不通，反映出民衆高漲的抗

日熱情。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郭沫若等人又發起抗日獻金活動，設五座固定獻金台，三座流動獻金台，武漢各界人民踴躍捐獻，人數達百萬以上，捐款總數超過法幣一百萬元。這些捐款購買了大量藥品和食品，分發各個戰區，大大鼓舞了前線將士禦倭抗敵的決心。顯然這與陳誠的支持不無關係，當然這本身也增加了他的政治資本，進一步提高了他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聲望。

一九三八年六月，陳誠首次出任地方行政要職，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當時全省七十一縣已淪陷三十餘縣，但陳誠仍要大顯身手，以示與一般昏庸老朽之輩不同。他每天早晨，必到省政府親自巡視檢查，嚴禁玩忽職守，貪污受賄。並約束自己的子女，上學一律搭乘公共汽車，不准動用自己的轎車，同時採取了許多措施，加速湖北的建設。

他常以「開明人士」自居，對湖北名流張難先、李書城等禮遇有加，又請來一些專家學者，為建設「新湖北」獻策，藉以裝點門面，標榜招賢納士，從諫如流。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就在恩施住了一個時期，陳誠始終待以上賓之禮。他還以請客吃飯，登門拜訪等多種手段，籠絡各界知名人士，藉以擴大政治影響。

隨着權力的膨脹和社會影響的增強，陳誠開始向何應欽、白崇禧挑戰。徐州大戰結束後，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在武昌珞珈山召開了「徐州戰役軍事檢討會議」，陳誠聯絡了部分少

壯派軍事將領，提出了一個詳細的徐州戰役分析報告，歷數何應欽指揮不當，誤失戎機，使何狼狽不堪。不久日軍進攻長沙，國民黨藉口「焦土抗戰」縱火，致使軍民死傷枕藉，財產損失不可計數。在南岳軍事會議上，陳誠當著第三、九兩戰區師以上百名將領的面，質問白崇禧何以撤走長沙外圍兵力，使日軍長驅直入；既撤走了部隊，爲何又大談「反攻勝利」？直問得這位「小諸葛」啞口無言。全國輿論，也紛紛譴責火燒長沙的殘暴行爲，蔣介石不得已將長沙警備司令鄧悌等三人槍斃，以平民憤。陳誠則進一步獲得了蔣介石的信任，相繼擔任了三青團書記長、遠征軍司令長官、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要職。

政治上的扶搖直上，助長了陳誠的好大喜功，導致他在宜昌戰役中栽了大跟頭。一九四〇年七月，日軍南從洞庭湖，西自襄樊一帶分兩路向宜昌進逼，不數日，沙市失守，宜昌危急。宜昌是拱衛陪都重慶的外圍戰略要點，一旦失守，即等於打開了川江大門，日軍隨時可以逆江而上，直搗重慶。陳誠揣度此種情勢，即請命於蔣介石，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調川鄂大軍趕往宜昌前線。然而宜昌易攻難守，結果大軍未到，已告失陷，蔣軍慌亂後撤，自相踐踏，死傷甚多。何應欽、白崇禧總算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對陳誠大張撻伐。蔣介石無奈，讓陳誠在軍政職務中隨選其一，陳誠遂辭去政治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職務，專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離開重慶前夕，陳誠在兩路口嘉陵飯店宴請政界要人和各界名流，包括政治部副部長、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席間，由於處境欠佳，對於現實的不滿溢於言表。當時重慶物價猛漲，市民不安，各方人士群起抨擊，重慶當局深感頭痛。陳誠有感於此，寫了一篇抨擊後方腐敗及奸商囤積居奇的文章，在報紙上顯著位置公開發表，各報紛紛轉載，蔣介石聞知大怒，將陳誠叫去狠狠訓了一頓，叫他以後不要干預政事，並下了一個手諭給重慶新聞檢查所，以後高級軍政要員的稿件，都須經過他親自審閱後才能發表。從此，陳誠表示「只管前方之事」，快快不快地到了湖北恩施。

第六戰區轄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及湘西，形勢險峻，山岳連綿，進則可以反攻宜昌、沙市，光復武漢，守則可以拱衛陪都。因此，蔣介石對第六戰區十分重視，曾提出「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的口號。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寇爲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陳誠時在昆明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聞訊於五月十七日飛回恩施第六戰區司令部組織鄂西會戰。不久，漁陽關、長陽失守，陳誠命胡璉十一師嫡系部隊死守石牌要塞，使日軍受挫，後撤，被國民黨吹噓爲「鄂西大捷」。蔣介石親到恩施，授胡璉以「青天白日勳章」，並表示對陳誠的極大信任。會戰後，陳誠再飛昆明，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十月下旬，因夜半胃出血昏迷，返回重慶療養。

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鑑於何應欽主持的軍政部剋扣軍餉，遲發補給，造成官嗾兵血，兵困擾民，中外輿論紛紛譴責，決計改組軍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調何應欽任陸軍總司令，以陳誠接任軍政部長。日本投降後，軍政部負責復員與接收事宜，陳誠商請美軍飛機將八個軍空運到南京、廣州等大城市，並以「甘心附逆，投機兩可，被迫協從，奉派策反」四種標準處理收編偽軍。許多偽軍搖身一變就成了「國軍」，走上了內戰的戰場，槍口依然對準中國人民。

內戰敗北

八年艱苦的抗戰剛剛結束，內戰的陰雲就重新籠罩在人民頭上。時局的發展使全國人民憂慮，陳誠內心也有一些矛盾，感到「還得作惡幾年才能了事」。他深知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早已下定發動內戰的決心，開戰只是時間問題。消滅共產黨也是他陳誠的初衷。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內戰不得人心。但他幾十年政治生涯，都以聽命於蔣介石為宗旨，沒有蔣介石，便沒有他陳誠，所以只有幫助蔣介石盡快打贏內戰，才是唯一的出路。

為適應內戰需要，蔣介石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達維的建議，將原軍令部、軍政部

和陸軍總司令部一概撤銷，職權統一劃歸國防部。經過激烈的角逐，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陳誠出任參謀總長。在部長與總長的職權劃分上，陳誠在蔣介石支持下，先是「以實線代虛線」，將總指揮權劃到總長名下，又「以虛線代實線」，參謀本部除預算和兵員須通過國防部轉呈行政院外，其他一切均逕報總統或主席，這樣國防部名義上決定大政方針，實際上卻被投閒置散，由參謀總長掌握實權，指揮一切。

在參謀本部的人員組成上，陳誠以劉斐任作戰次長，林蔚任人事次長，郭寄嶠（後郭懌代）任裝備補充次長，同時下設六廳，以親信劉雲瀚、方天、趙志堯分任主管人事，裝備補充和財政的第一、四廳長和預算局局長。國防部陸海空三軍及聯勤總司令，除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外，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部郭懌均為陳誠親信，在國防部參謀本部成了強大的陳誠系勢力。

權力的巔峰令人陶醉，也常使人失去理智。陳誠出任參謀總長，對於內戰的信心彷彿增加了許多。他在北平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國防部組織健全，各部隊多係美式裝備，實力強大，與共軍決一雌雄，三至五個月便能解決。他先後九次離開南京，飛赴鄭州、徐州、濟南、青島、瀋陽、歸綏、太原、蘇北、張家口等地，策劃指揮內戰。規定參謀本部官兵一律實行「新生活運動」，將原軍政部的「四不准」守則推行全軍。鑑於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他

大張旗鼓地標榜「刷新軍政」，整頓軍紀，嚴懲違令。兵團司令陳明仁在四平街立下戰功，但因擅自動用救濟總署物資，被他革職查辦；魯南戰役中，非嫡系部隊司令黃百韜作戰有功，他特頒「青天白日勳章」和獎金；而對嫡系部隊將領邱清泉援黃不力，予以撤職留用處分，以示不分親疏，賞罰嚴明。在當時頗能迷惑一部分人，對維繫軍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戰局的發展卻完全出乎陳誠的意料。從一九四六年六月國民黨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爆發起，人民解放軍經一年內線作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一百一十多萬人，而解放軍總數卻增加了近七十萬人，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完全失敗。戰事失利，國民黨內部集矢於陳誠一身。白崇禧責罵他剛愎自用，指揮無能。李宗仁說他「專橫跋扈」。蔣介石也對陳誠指揮全局的能力產生了懷疑，改由自己直接指揮全盤，令陳誠以參謀總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受此頓挫，雖不免沮喪，也只能寄希望於在東北創造奇蹟，以挽回軍事上的敗局，恢復個人聲譽。爲此，他絞盡腦汁，說服密友和智囊羅卓英出任行轅副主任，起用反共專家朱懷冰爲行營總參議，並帶了自己認爲最得力的幹將車蕃如、石祖黃、戴朴等，於八月底浩浩蕩蕩奔赴東北。途經北平時，雖已不像一年前那麼趾高氣揚，但仍然認爲只要整飭軍紀，提高士氣，協同作戰，便可以改變不利的形勢。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國民黨自發動內戰後，已人心喪盡，軍隊更是貪污腐化，厭戰怕死，早已不是北伐戰爭時期的狀態；而且他們

所面臨的對手，也不是日落西山的北洋軍閥和割據稱雄的地方軍閥，而是內部堅強統一的人民解放軍。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經過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已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牢牢站穩了腳跟。戰爭雙方的對比，說明國民黨在東北敗局已定，陳誠卻恰恰充當了國民黨這幕悲劇的主角。

九月一日，陳誠抵達瀋陽，提出了「整飭內部，安裕民生，培養戰力」的方針。為掃除軍政界奢侈腐化之風，他下令將所有高級餐廳都改為大眾飯店，連女招待（日本下女）也遣送回國。為洗刷部隊暮氣，增強戰鬥力，將前任行轅主任熊式輝和前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收編的偽軍和地主民團全部裁撤，同時大力擴充嫡系部隊。但是由於沒有地方部隊的配合，壯丁、軍糧無人承辦，情報系統失靈，作戰指揮全憑藉主觀臆斷行事，在人民解放軍強大冬季攻勢下，蔣軍日趨被動，公主屯一戰，新五軍十五萬人全部被殲，軍長被俘。長春、瀋陽、四平、錦州日益孤立，風雨飄搖。陳誠寢食俱廢，胃出血大發作，但他知道無法向蔣介石交待，只好在病床上約見軍政官員，通過電話指揮作戰，表示「決心死在瀋陽」。這可嚇壞了在南京的譚祥。她哭哭啼啼地找到乾媽宋美齡，請調回陳誠。蔣介石先派名醫戚壽南自寧赴瀋，又經宋美齡督促，親自飛往瀋陽，見陳誠確已病重，返回南京後即批准陳誠辭職，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陳誠遂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離開瀋陽，赴滬就醫。

東北之行，未能力挽狂瀾，反倒一敗塗地。國民黨內對陳誠的攻擊達到了頂點，有的「國大代表」甚至要求槍斃陳誠，以謝「國人」。但在蔣介石的庇護下，他僅受到撤銷參謀總長的處分。

陳誠面面觀

陳誠畢生以效忠蔣介石爲己任，奉之如神，百依百順，因他身材矮小，又唯蔣命是從，所以抗戰時期武漢的外國記者給他起了個有趣的綽號，叫「大元帥的袖珍本」。從「士爲知己者死」的傳統倫理道德出發，爲報答蔣介石知遇之恩，他對蔣介石始終竭誠擁戴，無論公私場合，對蔣都推崇備致。他不僅在性格上酷似蔣介石，少言寡語，感情不外露，而且在走路姿勢、說話語調，甚至在生活細節上也模仿蔣介石，不喝茶、不喝酒、不吃大葷。每當軍政會議，只要有蔣在場，他就很少發言，而在表決時又總是擁護蔣介石的主張。有時明知蔣的決定是錯誤的，也奉行不違，還要部下「服從命令，不要亂想」。所以他手下那些以忠於「校長」自居的黃埔學生，從來也不懷疑他的「忠誠」，以爲服從他，就是服從蔣介石。對於國民黨元老和軍政前輩他執禮甚恭。行文總是以字稱公，如對程潛稱頌公，對李宗仁稱德

公；對於文職大員、學者名流，謙虛和藹，行文以字稱先生，如對孔祥熙稱庸之先生，對胡適稱適之先生。且多次叮囑部下，對各界社會名流，要格外禮遇，以免影響社會聲譽；對於各軍將領，年長者稱公，同輩者稱兄，但對於嫡系部隊的屬下卻常發脾氣。這些手段非常奏效，使陳誠不僅得到蔣介石的信任，也頗得一些國民黨元老和文武群臣的好感。但陳誠與自己同列的何應欽、湯恩伯等人，常加指責刁難，不留情面。

陳誠是在毫無政治援引的情況下，以少壯軍人身份和戰功起家的，因此視軍隊，尤其是嫡系部隊為至寶，須臾不曾離開。無論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他始終和自己的老部隊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對重要的人事任免權牢牢抓住不放。十一師是他的起家本錢，他也始終把十一師引為自豪，不但自己經常誇耀，還特別喜歡別人恭維這個師，容不得任何人的批評。對於以十一師為骨幹建立起來，由他首任軍長的十八軍，武器裝備總是優先撥給，有求必應。使用上也格外關照。國民黨敗潰台灣時，陳誠最先接應自己的嫡系部隊，並在駐地、後勤保障等方面給予特殊照顧，對於其他部隊則不聞不問，甚至加以歧視。

陳誠始終是以黃埔系為主幹，以保定系和陸大系為兩翼組建部隊。十八軍從連排長到師長百分之八十為黃埔學生。黃埔生肖乾、黃維、霍揆彰、李樹森、李及蘭、陳烈、夏楚中、彭善、方天、方靖、宋瑞珂等，不僅是十八軍的骨幹，後來經陳誠提拔，都成為獨當一面的

高級將領。由於黃埔系學生占壓倒多數，並服從代表「校長」君臨指揮的陳誠的調度，所以十八軍形成了濃重的封建家長制統治，戰鬥力較其它部隊為強，同時也受到蔣介石的支持，視爲自己最可靠的嫡系部隊之一。保定系也是十八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一師師長羅卓英，十四師師長周至柔、郭懺、施北衡等均與陳誠爲保定軍校同學，特別是羅卓英和周至柔，一直是陳誠的左右手。後來兩人分別升任廣東省主席和空軍司令。

陳誠治軍注重從嚴苦練，常利用休整時間，開辦各種訓練班和教導隊，由軍部制定統一的訓練計劃。由於彈藥充足，每次野戰演習，都用實彈射擊。精神麻醉和軍事訓練相結合，使基本骨幹甘受驅使。只要駐軍三天以上，就必須出操上課，制度訓練計劃，按表實施，官兵人人到場，不准請假。對於軍容風紀，陳誠也十分重視，見部下衣冠不整，輕則訓斥，重則禁閉，毫不留情。任三青團書記長時，上紀念周前數分鐘，發現上裝一個鈕釦丟失，立即命勤務兵上街購買同樣釦子釘上，才進入大禮堂。

陳誠有感於國民黨軍隊貪污腐敗，爲整頓軍紀，提出了「人事公開，經濟公開，意見公開」的三大口號，並一直被十八軍等嫡系部隊所奉行。他聲稱決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尙，下令十八軍幹部，不論職位高低，均可介紹人來工作，即便是職位低的介紹職位高的進來也無妨。結果十八軍由於許多人牽線搭橋，幹部源源得到補充，選擇餘地大，質量也就高些。當

然對於各師、團等重要帶兵官，他還是要從自己親信將領中選拔。

國民黨軍隊兵多餉多，喝兵血，吃空缺司空見慣。陳誠標榜「經濟公開」，懸為厲禁。重要貪污案件，他要親自處理，貪污者一旦查出，不但要撤職，而且永不錄用。由於他在蔣介石集團中的地位，軍政部對十八軍的經費，一般不敢剋扣或延宕不發，這為陳誠整治貪污提供了條件。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軍隊一律發「國難薪」，軍餉微薄，帶兵主管吃空額之風一時甚盛，陳誠對此十分震驚，在吉安召集連以上軍官訓話說，吃空缺者是人吃人，對吃人的人，一定要槍斃。結果一連槍斃了幾個連長，全軍懾服，無形中大大提高了士氣。

至於「意見公開」，就要看對誰而言了。陳誠個人的政治性格特徵，是一貫獨斷專行，固執己見。他指揮作戰，軍令既下，決不更改，部下陳述意見，多不等說完，即中途打斷：「這我已經知道了」，立予拒絕。所以十八軍將領，有意見多向羅卓英先行陳述，請其向陳誠轉稟，才有改變的可能。由於陳誠固執己見，常鑄成戰略失誤。第四次「圍剿」十一師被殲，後來東北戰場的失利，均與此有關。

對在派系鬥爭中失意的政客和軍人，陳誠盡量收容荐舉，以收感恩圖報之效。王東原、萬耀煌、朱懷冰、張發奎、薛岳，都是經陳誠力保，才得重任要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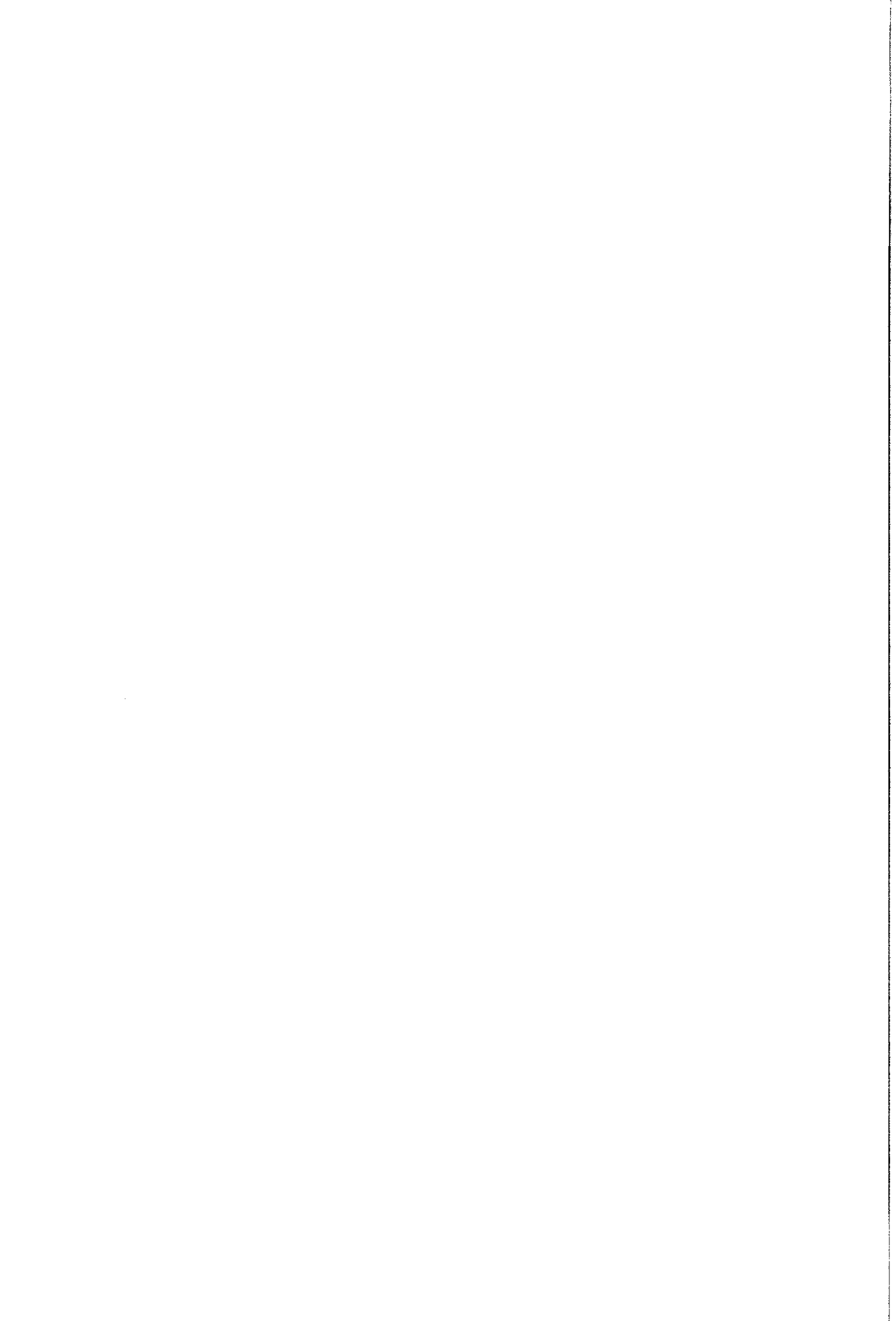
陳誠一生熱衷於權勢的擴張，最不能忍受寂寞。平時在家裏，也要把室內傢俱東搬西

移，改變格局。幕僚給他起草文電，他從不坐等，手頭抓隻鉛筆，在旁邊踱來踱去。他感到「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恨不得把蔣家王朝的所有軍政大事都包攬下來。別人怕事多纏身，他卻最怕事少。所以常身兼數職，且愈發精神旺盛。抗戰時期，一個美國記者做過一個不十分準確的統計，說他兼職五十三個。特別是在軍事上，他成爲蔣介石的「機動部隊」。而且陳誠還有個特點，哪戰事緊急，面臨崩潰，便自逞英雄，要「挽狂瀾於既倒」，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弄得不可收拾。權力既大，兼職又多，政治上的權力欲得到滿足，也就不可避免要對許多事負責，而受到攻擊，正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以至最後聲名狼籍。但陳誠並不吸取教訓，從東北回上海治病期間，還召集心腹幕僚柳克述起草過一個整頓國民黨的計劃，要求出任組織部長，整肅黨風，求東山再起，挽回國民黨的敗局。

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人民解放軍已發起遼瀋戰役，東北蔣軍即將徹底滅亡的前夕，陳誠銜蔣介石「重大使命」飛往台灣。蔣家王朝敗局已定，蔣介石外有美國壓力，內有桂系挾迫，不得不準備引退，並計劃在李宗仁代理總統與中共和談期間，在江南編練四百萬大軍，捲土重來。引退前，蔣介石發布了一項重要的人事任命：以陳誠任台灣省主席。殘酷的現實，病中的反省，使陳誠多少記取了一點教訓，他提出了「人民第一，民生第一」的

治台方針，在台灣大刀闊斧，實行三七五減租和貨幣改革，發展教育，振興民族工業，初步奠定了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基礎，進一步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從國民黨逃居台灣，到一九六五年他患肝癌病逝，陳誠躍居國民黨副總裁，兩度出任行政院長，三度當選「副總統」，成了名符其實的「小委員長」。

（劉福祥）



【第十一章】

黃埔驕子胡宗南

一九二四年三月，廣州黃埔軍校招生處的大院裏熙熙攘攘、人流不斷，一隊隊青年秩序井然地等候在門口，準備進行初試體檢。突然，體檢室內傳出激烈的爭吵聲，原來，檢查官認為一個青年身材過於矮小，準備將其淘汰。矮個青年與檢查官大聲爭執申辯，吵得不可開交，恰好這時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來到體檢室，見矮個青年言語激昂，參加軍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便下手諭破格錄取，編入軍校第二大隊第四隊。他，就是後來國民黨黃埔系學生輩中最為顯赫的人物——胡宗南。

天子門生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二日，胡宗南出生於浙江省鎮海縣一個農民家庭。七歲時全家遷居孝豐縣鶴落溪村。少年時代的胡宗南勤勉好學，他先入本村私塾學習，後考入縣立高等小學

堂。一九一二年初，又入胡州公立吳興中學。吳興中學的校長沈毓麟是同盟會員，思想進步，治校採用新法。他將全校學生組成愛山同學會，內設文藝、遊藝、體育三股。胡宗南膺力過人，擅長器械體操，被推為體育股長。兩年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吳興中學，被縣立高等小學校聘為國文、史地教員。在校任教期間，胡宗南多次隨孝豐教育界參觀團前往上海、南通等地參觀，眼界大開，漸漸產生雲遊天下的志向。一九二一年，他利用暑假時間，獨自一人到津沽、山海關一帶觀察天下形勢，途中發現有很多日本浪人往來於京榆路上，頗有覬覦中國之跡象。歸來後對其友人嘆息道：「十年後，日本為中國之大患，東三省將先受其禍。」

不久，小學堂改選校長，胡宗南與王微發生了激烈的競爭。王微是本地人，胡宗南競爭失利，不願屈居王氏門下，負氣出走上海，寄居朋友家中。恰逢黃埔軍校在上海招生，胡宗南在失意中萌發了投筆從戎的念頭，經同鄉闕懷珍介紹，他向朋友借了川資，乘船南下，來到廣州，跨入了軍校的大門。

胡宗南加入黃埔軍校之際，正是中國民主革命再度高漲之時。但孫中山逝世前後，統一戰線內部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右派的矛盾已日趨激化。黃埔軍校內部，共產黨員和進步軍人組成青年軍人聯合會，國民黨右派則發起孫文主義學會，形成了尖銳的對峙。胡宗南站

在孫文主義學會一邊，鼓噪吶喊，非常活躍。

一九二五年春，胡宗南由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被分派到教導一團三營八連任少尉見習，旋即調任機關槍連排長。是年三月十二日，黃埔學生軍東征陳炯明，在棉湖與陳軍惡戰。這是胡宗南第一次參加大規模戰鬥。他表現勇敢，指揮兩挺機關槍掩護學生軍作戰，以軍功晉升上尉。九月第二次東征出發前，又調升教導二團二營副營長。就在這次進軍途中駐紮梅縣時，他在所部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表明了反共的立場和決心。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戰爭揭開序幕。胡宗南所在部隊奉命集結株州，擔任中路軍總預備隊。戰前，第二團團長倪弼他調，胡宗南以二營營長升任團長，先後率部參加了武昌、南昌等戰役，又東出浙江，攻占杭州、進駐上海。北伐接近尾聲時，他升任第一師少將副師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又升任第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通電復職，再次北伐張作霖和直魯聯軍。作為嫡系部隊，胡宗南的二十二師受到蔣介石的重視，編屬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序列。四月二日，蔣介石親臨二十二師訓話，對胡宗南期許甚殷。七日，「北伐軍」出發，先後占領韓莊、濟南，奉張安國軍殘部倉皇北竄。占領濟南後，日軍向北伐軍尋釁，形勢危殆，蔣介石任命胡宗南為濟南衛戍司令，胡認為衝突不可避免，堅辭不就。五月三日，日軍首先向蔣軍進攻，駐守城內的四十軍奮起反擊。蔣介

石畏敵如虎，命司令部製旗八面，令胡宗南派部下持往四十軍陣地制止戰鬥。五日，北伐軍撤出濟南，移駐曲阜。

第一師起家

南京政府討奉勝利後，暫時妥協的新軍閥各派系之間矛盾又尖銳起來。蔣介石為奪取中央領導權，提出「統一軍政」、「編遣裁兵」的主張，企圖削弱各派地方勢力，培植以黃埔系為核心的「天子近衛軍」。胡宗南藉此良機，在蔣介石的扶植下，以第一師起家，逐漸形成了龐大的胡系黃埔軍事集團。

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胡宗南奉命將第二十二師縮編為第一師第二旅，任少將旅長，移駐徐州北部整訓。他深知蔣介石裁兵的真諦，縮編時私自挽留二十二師編餘官佐六十餘人，為日後擴充兵員預作準備。蔣介石對其「近衛軍」建設也極為關心。十一月，他親蒞徐州校閱第一師，胡宗南的第二旅被譽為模範旅，第二旅第三團，受閱成績名列全國陸軍第一。為了勉勵胡宗南，蔣介石特令第二旅團長以上軍官來南京官邸，由他親自接見訓話，宋美齡也出來與眾軍官一一握手，以示恩寵。

一九二九年三月，蔣桂戰爭爆發，第一師奉命出征，胡宗南率第二旅作爲先頭部隊由徐州抵黃陂。因桂系駐武漢的李明瑞師倒戈，李宗仁倉皇西遁，桂軍土崩瓦解。蔣介石聞報乘艦直赴武漢，胡宗南也率第二旅疾趨而至，警戒全市，保衛蔣介石。不久，第一師擴編，胡宗南的第二旅改爲第一旅。

一九三〇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組織擴大會議，聯合反蔣。第一師由武漢調防徐州。兵過浦口時，再次受到蔣介石的親自召見，全旅連級以上官佐在孫中山陵園集合訓話，獎勵備至。是年五月，中原大戰爆發，第一師師長劉峙調升第一路總指揮。由副師長徐庭瑤代理師長。不料在隴海路的野鷄崗第一仗，徐庭瑤的右臂就被迫擊炮擊傷，代理師長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胡宗南的身上。胡宗南率領第一師在菜油坊等戰役中表現出色，戰鬥結束後，蔣介石決定把傷癒後的徐庭瑤調爲第四師師長，而把第一師正式交給了胡宗南，表明了他蓄意培植黃埔系少壯派的企圖。從此，胡宗南開始大肆發展自己獨立的軍事系統。

爲了在第一師造成青一色的黃埔系勢力，他首先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第一師在劉峙時期曾經過兩次擴編，編入的軍官有不少是與劉峙關係密切的保定軍校畢業生。對此，胡宗南毫不客氣地大加清洗。第一師獨立旅旅長彭進之係保定生，胡宗南就任師長後，調彭爲副師長，將其架空，旅長一職即由第六團團長黃埔系的丁德隆接替。經過多次調整，第一師

團長以上的軍官很快就成了青一色的黃埔出身。至於中下級，由於連年軍閥混戰，在不斷的傷亡中不斷補充黃埔學生，儲備了大量的後備軍，為胡宗南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這樣，他以第一師為基礎，逐漸形成了黃埔系中的「少壯派集團」。

固原「勤王」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拒不抵抗。作為蔣介石忠實工具的胡宗南執行了蔣介石的既定「國策」。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宗南正率部開往吉安「圍剿」紅軍，事變發生後，奉命改往鄭州，擔任警備任務。一九三二年一月，淞滬戰事爆發，胡宗南部秘密開往指定地點布防。五月，國民黨與日本妥協，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接著，就對紅軍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

六月，第一師由安慶經桐城向鄂豫皖（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六安、霍山進攻。與其他國民黨軍隊不同的是，胡軍每攻占一地，都派人修理道路、村寨，賑濟饑民，以收買人心。他曾對部下說：「以軍隊剿匪，軍隊去則共匪又來，若組織民衆使抗匪，則可省軍隊之力，使

民衆安居，知有生之樂，自不願從匪，匪乃無所施其技，而匪患潛消矣。此爲根本要因，汝宜盡心爲之。」八月，第一師追擊紅軍徐向前部，經鄂北、豫南入陝。次年，又由四川松潘尾隨紅軍，「苦戰」八個月。駐紮甘谷時，胡宗南與參謀長于達住在一座北向陰晦的小廟中，冬日北方寒風凜冽，胡因此患腹痛，歷旬未癒，蔣介石聞知，派胡的黃埔一期同學冷欣偕醫生飛往陝西，特批胡宗南病假一月，赴京治療。胡宗南如此賣力地「圍剿」紅軍，使他備受蔣介石的信任和寵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胡宗南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次年九月，第一師擴充爲第一軍，胡又被任命爲中將軍長，仍兼第一師師長。

胡宗南志得意滿，率部全力進攻陝北紅軍。十月，胡軍第一師第一團鑽進紅軍伏擊圈，遭到毀滅性打擊，團長楊定南被擊斃。胡驚恐萬狀，正擬調整部署，突然於十二月十二日接到「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的電令，命所有「剿匪」部隊就地停戰，聽候命令。他大爲疑惑。忽又得到消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蔣介石被囚。胡宗南大驚失色，如喪考妣，急忙召集就近師長、參謀長開會。會上，衆人驚慌失措，意見紛紜，有人認爲千里勤王是遠水近火，無濟於事，應繼續實行「圍剿」計劃；有人主張與友軍會合，進逼西安。胡宗南反覆思慮，決定以主力監視東北軍王以哲部，然後再東移討伐張楊。不久，陝西省主席朱紹良和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先後來電，命胡宗南統一指揮在甘中央軍部隊，迅速東開，警戒固

原，進逼寶鷄，胡宗南遵命行動。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京。胡宗南也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分駐隴東各縣，整訓待命。

西北王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寇繼蘆溝橋事變後，又對上海發動了進攻。蔣介石被迫調集精銳，雲集淞滬抵抗。

戰鬥開始時，胡宗南奉命增援上海、寶山。在毫無工事掩蔽的情況下，胡部第一師、第七十八師遭到日軍重炮及空軍轟炸，苦戰五晝夜，團長楊杰、李友梅殉國。是役中，胡宗南部擴編為十七軍團，胡升任軍團長。十一月一日夜，上海抗戰失利，胡部退守無錫、浦口。南京淪陷後，又奉命經皖、豫進駐陝西整補。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蔣介石為避免國民黨軍隊損失過大，提出「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口號，暗地裏整訓部隊，保持實力，製造反共摩擦，把政策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適應國民黨政府這一決策的轉變，胡宗南蟄伏在黃土高原上，招兵買馬，擴充軍隊。名為扼守河防，拒阻河東、山西的日寇，實際上是屯兵西北，執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

針，對陝北構成數道碉堡線，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通曉內幕的人都說：「胡宗南的軍隊是準備於抗戰以後的，所以決不用於作戰，俾能全力訓練新軍。」由於胡宗南所承擔的「特殊使命」，所以備受蔣介石青睞，平步青雲，官運亨通，抗戰時期由十七軍團長而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一直升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統轄四十個師，四十五萬人，遍布陝、甘、寧、青各省，成爲西北地區國民黨最高統治者，被稱爲「西北王」。這與蔣介石在各方面的大力扶持是分不開的。

在幹部任用上，蔣介石賦予胡宗南獨斷的人事權。胡部所屬各集團軍總司令的去留，大多由他自行決定。所有軍、師長都由他報請任命，有時甚至可以先由胡發表任命，再報請加委。不隸屬胡宗南的軍師長調動，只要有胡的親電，蔣介石一定批准。胡宗南要求調用的人，蔣也有求必應。一次，胡要調西安行營副參謀長張××作他的總部副參謀長，起初行營主任不答應，但胡宗南電呈蔣介石執意要求，蔣馬上給予批准。爲了造成一支「忠實於蔣、聽命於己」的軍隊，胡宗南採取的幹部政策是「黃、浙、陸、一」四個字，即必須是黃埔軍校或陸軍大學畢業、浙江人、第一師的老幹部。保定、雲南系的軍官統統都站不住腳。胡部的排連長大部分是第七分校的畢業生；營團長多爲中央軍校畢業生，軍師長則俱爲「黃埔出身」，集團軍總司令又全係黃埔一期生。在各級司令部的幕僚中，胡宗南安排了許多浙江同

鄉，在他的副長官部中，很多處長、科長都是浙江人。爲使胡部具有充足的軍官來源，蔣介石還批准他在西北設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以及名目繁多的訓練班，拉攏青年多達五十萬餘人，培訓出來的學員多分在胡宗南自己的軍隊中充任幹部。

在軍隊補給方面，西安設有第七補給區司令部，由胡宗南的同鄉程開椿任司令。武器、彈葯、軍事器材等均優先供給胡軍，使胡軍的裝備水平遠在國民黨一般軍隊之上。由胡宗南簽名領取的經費在一個時期中竟占到全國軍費支出的四分之一。

胡宗南侍奉蔣介石小心翼翼，竭盡虔誠，有時甚至不惜弄虛作假。一九四〇年，蔣介石來西安王曲參加第七分校十六期學生畢業典禮。胡宗南受寵若驚，事前特地爲蔣介石準備了一座「行宮」，參加準備布置的人員，多達四五百人。他還專門派人攜設計圖樣和尺寸乘飛機去迪化（今烏魯木齊）採購了一套特製的地毯，委託戴笠在美國購置防彈小汽車，並購買了大批高級家具及供宋美齡使用的美國高級化妝用品。「行宮」營造期間，他每天都前往視察。一會兒坐在爲蔣介石準備的沙發、床舖上，看看是否舒服，一會兒又用白手套摸摸地毯上有無灰塵。蔣介石來到西安後，胡宗南更是鞍前馬後，忙個不停。每晚臨睡前，他都要用電話詢問，「委座睡了沒有？今日胃口如何？精神如何？」每天早晨起床又照例要問：「起床沒有？睡的好嗎？」畢業典禮結束後，胡陪同蔣介石參觀王曲鎮市容。在一家商店，蔣介

石看到櫃窗裏擺著博士帽，隨便問店員：「多少錢一頂？」店員不假思索地答道：「每頂兩元。」蔣介石驚奇地又問：「不錯嗎？」店員說：「我們這裏多著呢！都是兩元一頂。」蔣介石即令侍從人員買了一頂。回到重慶後，大肆宣揚西安市場物價如何便宜。實際上，王曲鎮的博士帽平時每頂要賣十五、六元，比重慶還貴，蔣介石參觀前，胡宗南指示第七分校召集商店老板集會，規定所有商品一律按戰前價格出售，損失由第七分校按時價賠償，這便是二元一頂博士帽的來歷。

在蔣介石的蓄意扶持下，胡宗南羽翼漸漸豐滿，成爲蔣介石嫡系部隊中的反共「王牌」。他的部下爲他吹噓說，在洛陽掘出一塊方古碑，碑上刻有「一輪古月照中華」七字，古月者，胡也，胡宗南有帝王之相。胡宗南兼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主任，該校校址在王曲青龍嶺，傳說是東漢光武帝劉秀東山再起之地，胡宗南也想藉此「發跡」，因而把青龍嶺改爲「興隆嶺」，把青龍嶺山下的皇甫村改名「黃埔村」，把終南山改爲「宗南山」，企圖繼承蔣介石「黃埔起家」的衣鉢，稱雄西北，最後獨霸天下。

胡陳爭寵

抗戰時期，重慶有人把陳誠、胡宗南、戴笠稱為蔣介石的「三鼎甲」。他們分握重權，擁有不待通報，直接晉見蔣介石的特權，成為蔣家王朝文武百官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但是，「三鼎甲」中的胡宗南與陳誠之間卻始終爭權奪勢，矛盾重重。這也是蔣介石慣用的「造成對立，分而治之」的南面之術。

抗戰之初，陳誠備受蔣介石寵愛，一身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三青團中央書記長，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和湖北省主席，儼然以「小委員長」自居。外界風傳陳誠將成為蔣介石「事業」的繼承人。陳誠出身於保定軍校八期炮科，他的獨攬大權，深為黃埔少壯派不滿。胡宗南、戴笠聯合賀衷寒、曾擴情、鄧文儀等內外夾擊，竭力動搖「小委員長」的地位。蔣介石爲了平息黃埔系的憤怒，把陳誠的政治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兩個職位交給了與黃埔系關係密切的張治中，暫時抑制了陳誠勢力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進兵河南，蔣鼎文、湯恩伯的部隊一觸即潰，鄭州、偃師、洛陽相繼淪陷。日寇沿隴海線西進，先頭部隊進逼陝州，潼關告急，西安震動。長期躲在黃土高原上養精蓄銳、消極避戰的胡宗南不得不調軍於陝州靈寶一線阻擊日寇。日寇因兵力分散，補給線過長，暫時停止了進攻。

洛陽失守後，國民黨軍隊變更戰區，將原屬第八戰區的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任陳誠爲司令長官，胡宗南副之。胡宗南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裁撤，改爲第一戰區西安指揮所。七

月四日，胡宗南奉召赴渝，晉謁蔣介石，蔣介石見到胡宗南，劈頭就問：「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你有什麼意見？」胡宗南滿腹牢騷地答道：「關中本來僅河防、陝西兩正面，併入第一戰區後，加上盧氏、西坪、漢中三正面，以現有兵力欲參加五個不同正面之作戰，殊非易事」，表示反對。原來，關中隸屬第八戰區時，戰區司令爲徒具虛名的朱紹良，胡宗南任副司令長官，在西安設有副司令長官部，以副司令之名行司令長官之實。現在戰區變更，自己非但沒有晉升司令長官，反而要屈居死對頭陳誠門下。他深知陳誠與朱紹良不同，定要掌握實權。胡宗南苦惱至極，又不敢抗拒老頭子的命令，遂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

在陳誠尚未就任前，他秘密召開親信軍師長會議，宣布對陳策略：第一，凡陳之一切命令指示，未經胡副署概不執行，第二，如接到陳的電令，指揮調動部隊均須請示胡再定行止；第三，部隊人事任免必須由胡親自決定。七月十四日，陳誠至漢中就職，胡宗南例行公事地敷衍了一陣之後，於八月下旬致電蔣介石，藉口患病呈請辭去副長官職。蔣介石回電勸慰：「當此整軍雪恥之時，還應積極負責，力圖自強，報效黨國，豈可有此消極養病之表示乎？所請不准。」九月四日，胡宗南第二次請辭，仍未獲准，遂蟄居西岳華山，稱病不出。爲了解決陳胡矛盾，十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電召陳誠、胡宗南同赴重慶。二十七日，胡謁見蔣介石，進行了一場富有戲劇性的談話……

蔣：「陳長官調任軍政部，第一戰區誰當此重任？是由公代理，還是另擇他人？」

胡：「學生資歷學識淺薄，不能負此重任，請另派人爲妥。」

蔣：「由公代理，是否容易行使職權。」

胡：「以現實環境，如由學生代理，不僅不能達成任務，且必累及鈞座，請另派他人。」

蔣：「有人提及劉經扶，如何？」

胡：「鈞座無論派定何人，學生皆極端服從。」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之職，胡宗南垂涎已久，但表面上卻故作謙恭，以退爲進，推辭不就。二十八日，他飛赴成都治牙，此事暫時擱淺。

十二月十二日，胡宗南再次晉謁蔣介石，時值正午，蔣介石留他陪侍午餐，談話繼續進行。

蔣：「一戰區事由你代，如何？」

胡：「如此適足爲鈞座之累，以另行派人爲妥。」

蔣：「藉此可以造就資望，並可培植新起人物。將來政治、黨務各有中心，各負責任，有爲分子團結在一起，則將來政權不致被異黨篡竊。獨當一面責任之人，器局膽量必須結

合。聽說你的軍師長安分守已有餘，開創有爲不足，並非安分守己不是，而是在此局面，必須有敢爲敢作之人，才能打開局面。而況你將來所負責任，恐是今日的二三倍，如無此種幹部培養，將何以打開局面乎？」

胡宗南聽罷，默然不語。

十九日，蔣介石再次召見胡宗南，推心置腹地對他說：「現時國軍精華集中一戰區，如一戰區失敗，國本動搖，真不可爲人矣。現時中心工作是補兵問題，大家應集中全力爲之。在陝加徵五萬人，速令祝紹周辦理。新兵十萬人，要明年三月前運到重慶，方能應急濟難。」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感到了自己寶座的震顛，他像一個紅了眼的賭徒，把反共滅共，奪取天下的賭注押在了胡宗南的身上。

二十日，胡宗南向蔣介石辭行，蔣介石再三叮囑：「要盡一切手段招募補充士兵，在三個月內，盡力在陝由祝紹周加徵五萬人，在豫徵募十萬人。」下午三時，胡宗南春風得意地偕范漢杰、羅列飛返西安。次年元月十二日，在漢中正式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內戰先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但戰爭並沒有結束。蔣介石口喊和平、民主，暗地裏卻調兵遣將，磨刀霍霍，準備挑起內戰。抗戰時期在陝甘消極避戰，專門封鎖八路軍的胡宗南，這時氣勢洶洶地衝下黃土高原，開始搶奪勝利果實。爲了表彰他的反共「業績」，十月三日，國民黨政府晉升他爲上將軍銜，十日，又授予他勝利勳章。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向中原解放區發起大規模圍攻，全面內戰爆發。胡宗南抽調主力部隊，準備以「高度機動、急速圍殲」的策略，迅速消滅共軍。面對強敵，中原人民解放軍採取「立即突圍、愈快愈好」的策略，兵分三路，經過兩個月的艱苦作戰，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的任務。胡宗南不得不在其作戰日記中哀嘆：「『王震匪』率二百餘人竄過公路渡過涇河北竄，此次剿匪計劃完全失敗。」

八月，蔣介石命胡宗南進兵晉東南，與山西土皇帝閻錫山配合，「肅清」晉南解放軍太岳兵團，以減輕進犯延安的側翼威脅。爲炫耀武力，取媚蔣介石，胡宗南在此役中投入了他的主力部隊第一軍羅列部，並電令遠駐陝西、他藉以發跡的第一師黃正誠部星夜開赴臨汾。胡宗南的第一師自稱是「天字第一號」的部隊，抗戰時期一直駐紮陝西華陰、華縣，全部是美械裝備，被蔣介石列爲「典型參觀師」。美國顧問也認爲這是「一支較爲優良、有希望、有前途的部隊」。抗戰八年中，胡宗南「金屋藏嬌」，始終將第一師滯留西北大後方，享受優厚的待遇，沒讓它向日寇打過一槍。全面內戰爆發後，胡宗南求功心切，才將它拉上了內

戰前線。

九月初，第一師由陝西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伺機尋找解放軍太岳兵團主力決戰。十一日晚七時，該師進占鶴雀鎮，正要宿營，突然槍聲四起，解放軍太岳兵團主力部隊已將其包圍，入夜，解放軍向第一師發起強大攻勢，師長黃正誠伏在報話機上聲嘶力竭地求援，毗鄰之蔣軍懼怕解放軍伏擊，均按兵不動。十二時前後，戰鬥結束，胡宗南炫耀一時的「王牌勁旅」僅五個小時就悉數就殲，師長黃正誠被俘。第一師的被殲，對氣焰囂張的胡宗南不啻當頭一棒，它敲響了胡系軍事集團走向滅亡的喪鐘。

一九四七年二月，蔣介石因「全面進攻」屢遭敗績，轉為對陝北和山東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胡宗南部擔任進攻陝北的主角。二十八日，胡應蔣介石電召，偕參謀長飛抵南京，密商進攻陝北問題。蔣介石問：陝北作戰有把握嗎？胡宗南充滿自信地列舉了雙方的兵力，聲稱極有把握。當晚，蔣介石留宴胡宗南，仍然放心不下，繼續詢問陝北戰役是否有把握，胡答如前。三月一日，其作戰方案經國防部批准，三日，他飛回西安。

三月十四日，胡宗南指揮所屬部隊，兵分兩路，開始向陝北解放區大舉進犯。當時，陝北解放區的西北野戰部隊只有兩萬多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放棄延安，實行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在運動中尋機殲敵。早在胡宗南進犯前，延安已是一

座空城，十九日，胡宗南重新組建的第一師第一旅首先進入了延安。

進占延安後，胡宗南欣喜若狂，立即命令洛川指揮所的參謀們偽造戰報，謊稱「我軍經七晝夜激戰，第一旅終於十九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虜敵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消息傳出，國統區各大報紙均增發號外，大肆進行渲染。慰問電、賀電紛至沓來。蔣介石也拍來賀電：「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獎叙。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

胡宗南侵占延安空城後，始終偵察不出西北解放軍主力的動向，而自己十餘萬軍隊的糧食彈藥補給卻大成問題。他先是徘徊猶豫，舉棋不定，幾天後，又從主觀臆斷出發，想在安塞以東，蟠龍以西地區尋找解放軍主力決戰。命令董釗兵團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劉戡兵團向延安東北方向的蟠龍掃蕩，結果兩路皆撲空而返。三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一旅為掩護側翼劉戡兵團前進，在青化砭附近突被西北野戰軍包圍，旋遭全殲。

青化砭敗後，胡宗南斷定西北解放軍主力在延安東北方向，決定使用兩個兵團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澗掃蕩。他吸取分兵被殲的教訓，決定採取國防部制定的所謂「方形戰術」，即用兩個兵團排成數十里寬的方陣，行則同行，宿則同宿，以免被各個擊破。面對強

敵，西北野戰軍以少量兵力牽住敵人的鼻子走來走去，主力卻潛伏在相反方向待機，致使敵人兩次掃蕩均徒勞往返。胡軍的「方陣」爬山梁、睡野地、啃乾糧，被拖得精疲力盡。四月十四日，胡軍第一三五旅行至羊馬河，又遭西北野戰軍襲擊，大部被殲。

首敗青化砭，再敗羊馬河，胡宗南仍沒有吸取盲目行動的教訓，認為解放軍主力部隊已經北撤，並準備東渡黃河，下令傾巢追擊。西北解放軍以部分兵力偽裝主力，誘敵北上，而主力部隊則秘密南下，突然向西北國民黨重要補給基地蟠龍發起猛攻，全殲守軍一六七旅，繳獲大量武器彈藥。當胡宗南主力兵團聞訊回援，趕至蟠龍時，蟠龍軍需物資已蕩然無存，街上烟火皆無，只有幾十名傷兵在一座破窯洞裏呻吟、叫罵。

胡宗南在陝北連吃敗仗，使蔣介石極為惱火，電召胡入京嚴加訓斥，並詢問下步計劃。胡稱：「據報毛澤東現在綏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皆在陝，企圖再與我決戰，故今日對陝北作戰，必須更積極行動。」最後，蔣介石決定陝北兵力暫不南調，但務必在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內「肅清」共軍。六月九日，胡宗南離京飛陝。

經過幾個月的戰鬥，胡部疲憊不堪，補給困難，士氣低落，兩月內完成陝北「剿共」任務實已不復可能。面對陝北戰場捉襟見肘的形勢，胡宗南憂心忡忡，回陝後致電蔣介石，陳述他挽救國民黨戰場頹勢的良策：「竊思兩年來國內形勢日益惡劣，國軍於整編之餘，力量

銳減，而「匪軍」則到處裏脅丁壯，又受俄方支援，兵力日增，致當前戰場我軍幾處於劣勢，危機之深，甚於抗戰……爲安定國本，消除「匪患」，擬請於萬分困難之中另編新軍，以應此艱巨任務，而免「匪勢」再事蔓延。」

爲了避免重蹈覆轍，他精心設計了所謂「釣魚戰術」，在延長、清澗、綏德等地遍設守備點，吸引解放軍攻打上勾，然後集結大部隊圍而殲之。然而，這終究只是胡宗南的一廂情願。八月到十月間，西北解放軍在沙家店和清澗先後殲滅胡軍第三十六師和七十六師，「釣魚戰術」失敗，胡宗南兩個月結束陝北戰事的幻想破滅了。而徹底失敗的命運，也正一步步地向他走來。

西昌覆滅

正當胡宗南在陝北損兵折將，一籌莫展之時，一九四七年八月，人民解放軍陳謝兵團由垣曲、洛源附近渡過黃河，挺進豫西。國民黨豫西守軍紛紛告急，蔣介石爲了策應河南作戰，保住關中，急令胡宗南由陝北抽調兵力，星夜開往豫西。胡宗南乘機溜回西安，把陝北的爛攤子交給了劉戡。

胡宗南主力調往豫西不久，留守陝西宜川的整編二十四旅突然被人民解放軍一野部隊包圍，旅長張漢初驚慌失措，送電求援。胡宗南急命劉戡率留陝兩萬多人傾巢往救。劉戡接命後沿洛宜公路疾進，行至瓦子街附近，被一野主力部隊包圍，戰鬥異常激烈。是時天降大雪，飛機不能起飛，援軍又遠在豫西，經六日激戰，劉戡所部全部被殲，連同宜川被殲之敵，共計四萬餘人，這是對胡宗南集團的又一次致命打擊。

瓦子街慘敗的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大為震怒，致電胡宗南，大加訓斥：「宜川喪師，不僅爲國軍『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爲最無意義的犧牲，良將陣亡，全軍覆沒，悼慟悲哀，情何以堪！」胡宗南赴京請罪，請求撤職查辦，蔣介石給其撤職留任的處分，旋又撤銷。

一九四八年底，蔣介石的「戡亂計劃」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遭到慘重的失敗。在國內形勢和各種勢力的強大壓力下，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蔣「以退爲進」，宣告下野。離京時致電胡宗南：「中馬日文告，想已達覽，中即於本日離京回籍，冀促成和平，惟念與兄患難久共，肝膽相照，茲當離別，曷勝馳念，尚祈爲國珍重，努力勿渝，以竟救國衛民之功，特致拳拳，不勝依依。」

二十六日，胡宗南又接到蔣介石親筆密函：「宗南主任弟勛鑒，近日政局，即有變動，

但陝省重要，一切工作皆應照常進行，而且比以前更應積極準備，作死中求生之奮鬥。關於增加弟之番號，已指定兩個軍及另配四個師，似已足用，武器亦已指配，望能於三個月內補充完畢，今後主力應置於漢中附近……，中不論在何時何地，對弟部一切必如在京時無異，不必以此自餒，只要吾人能自立自助，不屈不撓，百折不回，則最後勝利未有不屬於我也，余不百一，順祝戎安。中正手啓。」胡宗南深知蔣介石下野的用心，對蔣介石仍一如既往，言聽計從，並多次飛往溪口，晉見老頭子，聆聽教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太原。胡宗南懾於解放軍的強大攻勢，懼怕華北解放軍渡過黃河，與西北野戰軍會師，將他消滅，未經代總統李宗仁同意，即倉皇撤離了盤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縮進了秦嶺。他打算將第一軍、第三十八軍等主力編為十八兵團，集結川北，以掩護國際補給線為由，開進雲南，其他正規部暫居四川。一有風吹草動，就在十八兵團的掩護下，闖入雲南，在滇緬邊境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國際局勢變化。

一九四九年夏秋間，人民解放軍先後解放了湖北、湖南、廣東、青海、新疆等省，開始向西南進軍。蔣介石親赴重慶指揮，企圖固守四川，作最後掙扎。十一月初，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在重慶向蔣介石表示，希望國民黨軍隊在大陸上支持六個月，當由美國出兵支援。如果蘇聯出兵支援中國共產黨，因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有決心和力量打下去。諾蘭

的大話如同一支強心劑，加強了蔣介石固守西南的決心。但蔣介石沒有料到人民解放軍進軍神速，解放貴陽後，即西出瀘州、畢節，截斷了成都國民黨軍竄往西康、滇西的逃路。同時又攻占涪陵，直逼重慶。坐鎮重慶的蔣介石急忙逃往白市驛機場，並令胡宗南派第一師前來保駕。此時，胡宗南正打著個人的小算盤，準備將第一軍偷運滇西，打通滇緬路，逃脫被解放軍聚殲成都平原的命運。蔣介石要調第一軍去重慶「勤王」，他自然很不高興，但又不敢抗旨不遵，只好電令第一軍「勤王之師，義無反顧」，星夜馳援。十一月二十八日，胡宗南率部由漢中撤往成都。

十二月九日，四川將領劉文輝、鄧錫侯聯名通電「起義」，蔣介石逃往台灣。胡宗南多次電呈成都突圍計劃，蔣介石都不予批准。胡無計可施，只好坐以待斃，十八日，解放軍已兵臨城下，蔣才勉強批准了胡的組成兩大兵團，「東打西進」的突圍計劃，但要求胡宗南親自隨部隊指揮突圍。但胡宗南為保住性命，已無暇顧及老頭子的旨意。他丟下部隊，乘飛機逃離了成都。所部群龍無首，亂成一團，先後就殲。

棄師潛逃的胡宗南本打算直飛西昌，但因氣候不好，只好轉飛海南島最南端的三垵機場。蔣介石聞聽胡宗南獨自逃命，極為震怒，當即派顧祝同前往查辦。經顧從中轉圜，才允許他前往西昌，收容部隊，戴罪立功。為籠絡胡宗南，使之為蔣家王朝守住大陸上最後一個

據點，二十八日，蔣介石又致函加以撫慰，信中寫道：「王副司令、羅參謀長來台面報軍情，日來憂患，爲之盡息，此時大陸局勢繫於西昌一點，而此僅存之點，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顧一切，單刀前往，坐鎮其間，挽回頹勢，速行必成，徘徊則革命爲之絕望矣。務望發揚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務，不愧爲吾黨之信徒，是所切盼！」

三十日，胡宗南飛赴西昌。西昌是西康省東南十數公里的一個小盆地，水土饒沃，四周多高山深谷，爲彝族聚居區。胡宗南飛抵西昌機場時，迎接他的只有其嫡系第一師團長朱光祖部零落的隊伍，顯得格外淒涼。蔣介石電令胡宗南收容川西脫逃部隊，加以整編，固守西昌三個月，等候國際局勢變化。而此時胡宗南能夠直接掌握的軍隊，只有第一師的一個團和一個衛士連，總計不足二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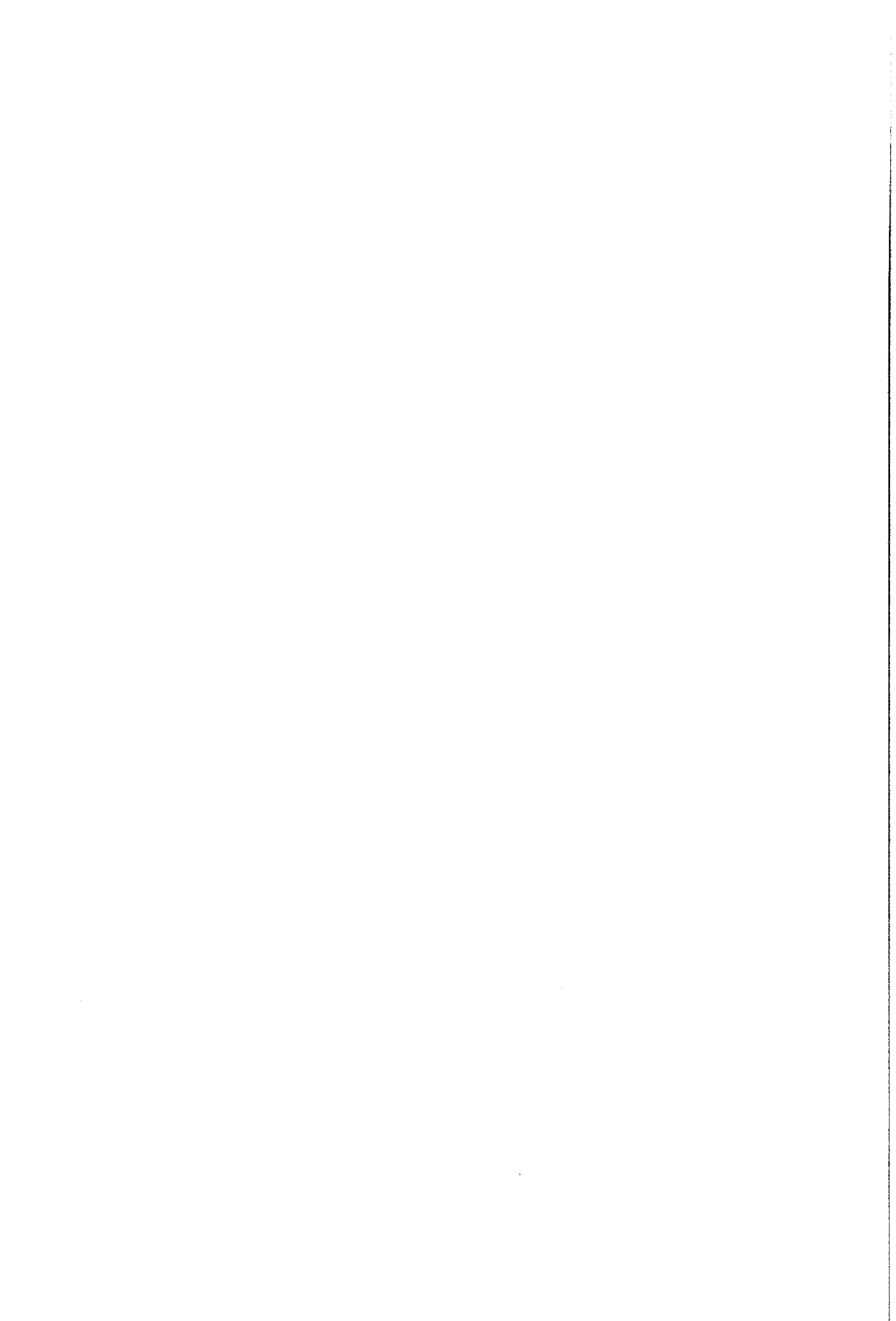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三月，蔣介石給胡宗南固守西昌三個月的命令已屆期滿，但國際形勢並未發生什麼明顯變化，而全國大陸已告基本解放。爲給胡宗南打氣，並討論建立滇西根據地的方案，蔣介石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和蔣經國秘密飛到西昌，以手函指示胡宗南：「雲南情況變化之後，西昌當更艱難，最近如將台北軍火配運西昌爲可能之事。如匪攻台灣，余必與台灣共存亡，而決不出國。」胡宗南在回函中表示：「此間情形至爲艱危，但如能在二月十五日以前空運一個師之武裝、彈藥到西昌，則大陸據點、西南局勢仍有可爲。」三月下旬，人民解

放軍兵分兩路，渡過金沙江，向西昌挺進，胡宗南自知力不能抵，準備秘密逃跑。三月二十六日深夜，解放軍兵臨城下，胡宗南偕心腹十餘人，乘飛機經海口轉逃台灣，丟下了參謀長羅列及官兵六千多人，這些殘兵敗將很快就被人民解放軍消滅，胡宗南黃埔軍事集團宣告徹底覆滅。

逃到台灣後，胡宗南歷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黨務特派員、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澎湖防守司令。組織沿海反共「救國」游擊部隊，企圖反攻大陸。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胡宗南因患血糖及血脂過多症死於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

(田毅鵬)



【第十二章】

中原王湯恩伯

在蔣介石的武將中，湯恩伯是個別具特色的人物，有人曾對他這樣描寫道：湯恩伯是個黑頭大漢，身上服裝，灰的、黃的、連同軍帽皮帶的顏色，總是湊成幾節，暑天坐在汽車裏，總是一隻褲腿包著鞋跟，一隻褲腿捲上膝蓋，除接見外賓，很少見到他有整潔的時候。他還經常到營、連找士兵海闊天空地漫談，對下級幹部，見面後，總要湊過去拍拍肩膀，因而，給人們留下了為人粗魯、慷慨、謙和的印象。實際上，湯恩伯是外粗內細，工於心計的人，在他寫字台的玻璃板下，壓著他手書晚清中興名將胡林翼的兩句話：「要有菩薩心腸，要有屠夫手段」，遵循這樣的座右銘，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蔣介石的羽翼下平步青雲，飛黃騰達，繼陳誠、胡宗南之後，成為蔣介石的一張紅牌。

從「克勤」到「恩伯」

湯恩伯是浙江武義縣嶺下湯村人，原名克勤。二十七歲那年，為紀念素昧平生的陳儀慷慨資助他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改名恩伯。從「克勤」到「恩伯」，反映了湯恩伯帶有傳奇色彩的早年歷史。

武義縣湯村是個偏僻的山鄉，人們聚族而居。少年時代，湯恩伯入武義縣立小學肄業，十二歲時，武昌起義爆發，武義縣青年男女紛紛剪辮放足，湯恩伯也找來一把鈍重的牛刀，割去了辮髮。一九一六年，他升入省立金華中學，中途又轉至杭州私立體育學校，一九二〇年夏畢業後，入援閩浙軍講武堂，任少尉排長。不久，這支部隊被敵擊潰，湯恩伯輾轉顛沛，流浪街頭，不知所從。恰在此時，他的同鄉、武義富商地主童維梓準備東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鏢隨同護送，湯恩伯毛遂自荐，與童一道來到了日本。

在東京，他原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但當時中國人要入學，必須有軍閥或官僚的保送，又需大量經費，湯恩伯無此奧援，只好作罷。

一九二二年，湯恩伯入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但他醉心軍事，對法科不感興趣。一九二五年，他拋棄學業回國，奔走於杭州、上海等地。爲了取得學習軍事的機會，他先後拜在浙江省長夏超、軍閥孫傳芳和前浙江督軍呂公望的門下，請求保薦資助，都遭到無情的拒絕。

一天，留日同學徐逸樵勸他去謁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請求資助，湯恩伯前往，竟然獲得意外的成功。五月，他興高采烈地東渡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步科學習。在湯恩伯一生中，這是他「登龍大道」的起點。爲紀念這一意外的知遇，湯恩伯奉陳儀爲恩師，敬若神明，改名「恩伯」。

發跡的秘訣

一九二七年夏，當北伐軍戰火燃至長江流域的時候，湯恩伯從士官學校學成歸國，任浙軍陳儀師上校參謀長。不久，北洋軍閥孫傳芳倒台，陳儀投靠蔣介石，湯恩伯也在陳儀的推荐下，當上了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中校參謀。但他對於此項職務並不滿意，常嘆息「要斬將擎旗，立功沙場，安能局蹙轅下，仰人鼻息。」

一九二八年，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遷往南京，湯恩伯調入軍校，任第六期學生總隊大隊長。操課之餘，以自己的心得撰寫了「步兵中隊教練之研究」。頗獲蔣介石的賞識，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對他也十分器重。蔣介石成立教導師，由軍校選拔幹部，經張治中提名，擬調湯恩伯任該師團長，蔣以團爲經理單位，說湯不會管錢，沒有批准，但不久卻超升他爲教導第

二師第一旅少將旅長。一般人推測，這是蔣介石玩弄的玄虛，藉以觀察湯恩伯的器識，後來聽說湯恩伯沒有絲毫怨言，遂予以越級提拔，以利籠絡。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原大戰爆發，湯恩伯部奉命固守中原重鎮歸德。歸德是中央軍空軍和陸軍的重要據點，蔣介石指揮部所在地，距閻錫山、馮玉祥軍占據的亳縣、鹿邑、柘城不過百里，經常遭到馮、閻騎兵的襲擾，湯恩伯率部死命防守，不敢怠慢。戰鬥結束後，以靖衛領袖有功，調升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一九三一年，湯恩伯升任第二師師長，在豫南潢川附近與紅四方面軍作戰，被徐向前將軍一戰擊潰，受到蔣介石的撤職處分。但不到一年，又准其戴罪立功，復任第八十九師師長，在衛立煌的指揮下，參與對鄂豫皖區的「圍剿」。一九三三年，又調江西參加第五次「圍剿」，並升任縱隊司令兼第四師師長。從此，他一帆風順，由第十三軍軍長升任軍團長、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成爲一個擁有龐大實力的軍閥，繼陳誠、胡宗南之後，成爲國民黨軍界後起的風雲人物。

國民黨統治是蔣介石的獨裁加上各派系互相傾軋的混合體，湯恩伯由北伐時期北洋軍閥的一名下級軍官，經過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在蔣介石嫡系部隊中獨樹一幟，是有其妙訣的。其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對蔣介石絕對忠心。湯恩伯深知，只要取得蔣介石的信任，不愁個人

沒有前程，他想盡一切辦法取媚於蔣介石。在一次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宴會上，酒酣耳熱之餘，忽然有人提起蔣介石的繼承人問題，一時議論紛紛，有人猜是陳誠，有人說是何應欽，湯恩伯獨坐一旁，一言不發，有人請他談談看法，他出乎意料地說道：「委員長政躬康泰，這問題無討論之必要，我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事。」眾人愕然無聲。湯恩伯還經常向蔣介石獻計獻策，提供手本。中原大戰期間，他的幾次手本被蔣介石採納，大大提高了他的興趣，起初只寫軍事方面，以後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黨務無所不寫。每逢他睡不著覺的時候，便十有八九要寫點什麼。戴笠曾經嫉妒而又稱讚地說：「湯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一揮而就，鋼筆草書，寫了就交，我寫則非墨筆工楷不可。」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手本十分重視，常轉給陳布雷，要他據此擬出具體解決辦法，隔些時候不見湯恩伯有手本呈上，還要查問。可見，湯恩伯受蔣介石的青睞重用，與手本不無關係。但湯恩伯也有觸怒龍顏的時候，一九四四年，由陶希聖執筆、以蔣介石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即將付梓，樣稿傳到湯恩伯的手裏，引起了他的寫手本的興致，在手本裏，他批評此書眉目不清、文字冗長，不適用於青年們的口味。這本書是蔣介石親自刪改過的得意之作，湯恩伯卻沒有半句吹捧的話，蔣介石見到手本，勃然大怒，將其撕得粉碎，把湯恩伯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這是湯恩伯所上的手本中僅有的一次碰壁。

湯恩伯的另一個升官秘訣是發展黃埔勢力。蔣介石是靠黃埔系起家的，湯恩伯復任八十九師師長時，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師旅團長，幾乎已經是青一色的黃埔學生，保定士官生及行伍出身的老軍官都逐漸被換掉。他深悉蔣介石的「建軍方略」，所以從一開始掌握兵權，就以黃埔系統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礎。八十九師師長離職，接替他的是黃埔學生王仲廉；第四師師長讓位，接替他的是黃埔學生王萬齡。湯恩伯曾在中央軍校任學生第六期大隊長，與第六期、第七期學生有師生關係，對於這批人，他大力安插，多方培植親信勢力。這樣，湯部中一切重要的官職均一步步地落到黃埔學生手裏。他打出的旗幟，和胡宗南一樣，是純粹的黃埔集團。在發展黃埔勢力的同時，爲了互相牽制，對於其他軍事派系，如保定士官及雲南、貴州各講武堂畢業的軍官，他也打著「人事公開」的幌子，兼容並收，但原則上是給官不授權，多安排以幕僚和副職，以籠絡人心。

與蔣介石身邊的人拉關係，也是湯恩伯的一條升官之道。蔣介石的親信俞濟時、陳布雷、錢大鈞等均是他的密友。對於這些天子近臣，湯恩伯經常進行程度不同的賄賂，每逢年節或婚喪壽誕，必贈以重禮。對俞飛鵬更是敬若恩師前輩，除送禮外，還利用各種機會拍馬諂媚。一九四三年，在三十一集團成立的周年紀念會上，湯恩伯當著俞飛鵬的面肉麻地吹捧：「俞部長是三十一集團軍的『保姆』，三十一集團軍如果沒有俞部長這個『保姆』，則

會受到饑寒之苦，更談不到壯大發展了，我們有了俞部長就能夠效忠黨國，就能夠完滿地完成委員長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蔣介石統治時期，國民黨內流行著一句順口溜：「學非黃埔、省非浙江、作官無路、眼淚汪汪。」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又是黃埔系骨幹，並與蔣有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關係，這些也都是湯恩伯青雲直上不可缺少的條件。

南口「鐵漢」

蘆溝橋事變後不久，平津失守，日軍從北平、天津沿平漢、平綏、津浦三路展開了攻勢。七月三十一日，日軍板垣師團由平綏線北進，攻擊進出察綏和山西的咽喉要地——南口。

七月下旬某日，蔣介石召見湯恩伯，命十三軍務必於八月初開赴南口阻擊日軍，歸傅作義指揮，無論情況如何艱難，必須堅守十天半月，再由衛立煌部增援。接命後，湯恩伯急返部隊，約集第四師師長王萬齡，第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參謀長吳紹周密商，決定進行緊急動員，派參謀長吳紹周向劉汝明接洽南口防務，全軍整裝待命，準備馳赴南口。但十三軍的

行動遭到地方軍閥劉汝明的刁難，他懷疑湯的中央軍有奪取察哈爾地盤的野心，認為中央軍不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苟安，藉口尙未接到命令，不准十三軍通過省境。

十三軍抗日受阻，湯恩伯立即電告蔣介石請求解決。蔣介石聞訊不動聲色地將湯的請示電報交給馮玉祥處理。原來，馮玉祥主張抗日，經常作詩諷刺蔣介石嫡系部隊迴避作戰，劉汝明係馮玉祥提拔的舊部，這次卻對十三軍的抗日軍事行動從中作梗，馮玉祥當然了解蔣介石的用意，即在原電上批覆：「如所報屬實，請依法拿辦。」過了幾天，蔣介石又親自找馮玉祥商量，決定派劉汝明的老上級鹿鍾麟前往說服。七月三十日，鹿鍾麟前往大同，經過多方洽談，劉汝明才允許湯恩伯部隊由張家口通過，但不得下車停留。

八月一日，湯恩伯命八十九師從大同出發，冒著敵機的轟炸，陸續開赴南口，接管了南口陣地。他自任前敵總指揮，駐在離南口百餘里的懷來縣城指揮作戰。四日上午，南口戰役開始，日軍步騎混合部隊一千餘人在空軍的掩護下，開始向南口陣地進犯，八十九師的官兵沉著應戰，打退了敵人多次進攻，敵我雙方都付出巨大傷亡。戰至第八日，前沿陣地羅芳珪團僅餘官兵四百餘人，敵軍山下旅團因兵力消耗過半，改由鈴木旅團接替，繼續進攻。我軍陣地上的好些山頭，經常是白天被敵人攻陷，晚間又由我奪回，並擊落敵機一架，擊毀坦克兩輛。敵酋板垣不得不公開承認在南口遭到了頑強的抵抗。

日軍久攻南口不下，只好改變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正面戰事突然緩和，兩翼卻發現了大批日軍，形勢危急。湯恩伯見援軍遲遲不到，決定收縮兵力，退守居庸關。十六日深夜，湯下令全軍撤至居庸關一線。二十二日夜，日軍騎兵採取大迂迴戰術，自鎮邊城進入長城，湯恩伯下令死守待援。然而，二十五日，張家口淪陷，南口失去後方，即或有兵馳援，也無補大局。二十八日，湯恩伯率部撤出懷來，向桑乾河一帶退卻，中國北方軍事要地，十三軍忠勇將士血染的關山淪入日軍之手。

南口戰役失敗了，而湯恩伯卻取得了成功，因為他防守南口的時間超過了蔣介石的規定。而且，劉汝明先失張家口，使南口的側翼受到威脅，失敗的原因應記到劉汝明的帳上。當時《大公報》戰地記者深入南口前線戰地採訪，曾發表一篇《南口喋血之戰》的戰地通訊，對湯恩伯大加褒揚，「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確是厲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拼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衫衣和短褲，手指被烟燻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維持著，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適的，但現在看去，已經特別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雙手去。」從此，湯恩伯的抗日「鐵漢」名噪一時。

南口戰役是抗戰初期中國軍隊華北抗戰中悲壯的一幕，它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湯恩伯參加並指揮了這次戰役，作為前敵總指揮，其運籌之功，當然不可埋沒。但是，戰鬥中他遠駐距前線百餘里的懷來縣城，很少親臨前線，其形象遠非戰地記者描寫的那樣高大，南口戰役的「鐵漢」應該是浴血奮戰的十三軍將士。

「水、旱、蝗、湯」

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因中條山失守被撤職，由蔣鼎文調充其職，湯恩伯任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直接撥歸他指揮的部隊有五個集團軍，數十個挺進縱隊，號稱百萬，成為第一戰區的實權人物。他以漢光武帝劉秀的發祥之地河南葉縣作為據點，又以曹操起於中原，終於成就霸業自詡，取號「中原王」。

湯恩伯躊躇滿志、鋒芒畢露，導致了他和「飛將軍」蔣鼎文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蔣鼎文雖然也是蔣介石的嫡系親信將領，但他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基本部隊，是個名符其實的光桿司令。他深知自己人單勢孤，乃取以攻為守的態勢，上任伊始，即倚老資格對湯恩伯發號施令，湯恩伯陽奉陰違，使他碰了許多釘子。蔣湯二人一個住在洛陽，一個住在葉縣，唱起

了對台戲。蔣鼎文與其智囊密商，決定勾結地方軍閥、政客，成立黨政訓練團，孤立湯恩伯。湯恩伯深悉蔣的用意，就在葉縣大辦招待所，厚贈禮物，「招賢納士」，以瓦解蔣鼎文的陣營。由於湯恩伯在河南勢力雄厚，一些官僚、政客、軍閥紛紛雲集葉縣，蔣鼎文卻漸漸門庭冷落，車少人稀。

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旱、蝗災，大河南北，赤地千里，農田顆粒無收，百姓以草根樹皮充饑，餓死多人，難民紛紛棄家逃荒，有些地區數百里荒無人烟。湯恩伯作為河南國民黨實際上的最高軍政長官，非但不組織救災，反而以「軍事第一」為藉口，大興土木、橫徵暴斂。天災人禍，造成了更大的人間慘劇。

湯部編制內的四十萬軍隊，全部軍糧都出自地方，他經常派人到四鄉搜刮錢糧，擾得農村雞犬不寧。大早期間，黃泛區以東的青壯婦小幾乎全部外出逃荒，各村未能逃走的殘病老弱留下的一點維持生命的糧食，都被湯部士兵搶走。由漯河到周家口大道兩側的麥田裏，餓斃的饑民屍體隨處可見，無人收殮，被野狗爭食，慘不忍睹。湯恩伯還指使親信在界首、漯河、洛陽等地套購黃金，大作投機生意，聚斂財富。爲了擴充政治資本，又在葉縣大興土木，修建「中正學院」和「政治學院」，建築材料全部在葉縣附近的十餘縣內徵用，湯恩伯魔爪所至，不但祠堂、廟宇、古蹟名勝被毀，許多民宅也被拆掉。當時，河南民間流傳這樣

一句話：「湯屠夫要蓋房子，連龍王宮也要拔掉。」

河南人民不堪天災人禍的重壓，流離失所，相望於道。「水、旱、蝗、湯」被老百姓稱為河南「四害」。在河南，提起湯屠夫，群眾莫不咬牙切齒。深夜有嬰兒哭鬧，母親只要說：湯屠夫來了，哭聲便戛然而止。湯恩伯禍豫之甚，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四四年，日寇為打通華北到南洋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以進攻洛陽、鄭州為主要目標的中原戰役。當時，握有實權的湯恩伯置洛陽正面陣地於不顧，將重兵布置在以葉縣為中心的新月形防線上，使蔣鼎文在洛陽坐立不安，圍繞著部隊換防問題，蔣湯矛盾再度激化。正當二人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日軍迅速向鄭州、洛陽進兵。當時日軍兵力不到十二萬人，而蔣軍參加會戰的兵力卻超過五十萬人，但蔣湯二人平時專以擾民為事，不作戰鬥準備，前線一片混亂。結果鄭州、洛陽、葉縣相繼失守，湯恩伯率領潰不成軍的殘部，倉皇逃入嵩山。

中原戰役中湯恩伯的慘敗，使蔣介石大為惱火，蔣鼎文被撤銷職務，湯恩伯也被調離，由「小委員長」陳誠前來收拾殘局。陳誠一上任，立即召開中原戰役檢討會，認為失敗原因起於「四不和」，即將帥不和、軍民不和、軍政不和、官兵不和。當面指責湯恩伯，湯只好服輸認罪，陳誠乘機肢解吞併了湯恩伯的部隊。湯見自己辛苦經營的家底頃刻間化為烏有，

叫苦不迭。會後，他大發牢騷說：「陳矮子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總有一天會整到他自己頭上。」

一九四四年九月，湯恩伯調往重慶。途經西安時，西北王胡宗南在他的公館裏設宴爲湯接風。席間，胡宗南首先講話，說明聚會目的是爲湯先生洗塵，同時借此機會檢討中原會戰的失敗教訓，請湯先生向大家報告一下。湯恩伯不知胡宗南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沈默了片刻，忽然抱頭大哭，然後啾啾唔唔地說：「中原戰爭失敗之責任由我來負，蔣鼎文雖然拉了我的後腿，我不怪他，怪他也來不及了。胡先生要我作報告。我真不知從何談起。」宴會不歡而散。

中原戰役慘敗後，湯恩伯失去了他多年辛苦經營的軍事實力。他雖然乃受寵於蔣介石，但僅是一個傳達命令的工具，中原王的美夢成了泡影。

「以德報怨」的接收大員

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爲了重建在中國的獨裁統治，企圖壟斷中國戰區的受降權。但國民黨的幾十個機械化師團還遠在滇西緬北的崇山峻嶺之中，鞭長莫及，爲搶奪抗戰勝利果

實，蔣介石決定與昔日的敵人日偽合流。早在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時，蔣介石就發表了《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廣播，要求中國人民對日軍不要企圖報復，不要用暴行來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要不念舊惡，與人爲善，企圖借此取得日軍的好感，作爲合流的基礎。

爲實行既定的接收計劃，蔣介石對於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接收大員人選問題煞費了一番腦筋。上海本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轄區，對於接收上海，顧祝同事先早有布置。他曾派了很多耳目在上海，與敵僞早有聯絡。日軍一投降，他立即打電話給周佛海，讓他轉告岡村寧次，要其派員向顧祝同接洽投降事宜。僅上海一地，第三戰區所屬的機關就有聯絡處、辦事處、聯絡委員會、宣導組、先遣警衛隊等十餘個單位。在顧祝同看來，接收南京、上海，非他莫屬。不料重慶方面突然發布命令，京滬由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受降。顧祝同大失所望。原來，蔣介石和何應欽認爲顧祝同在京滬一帶早有部署，顧又是江蘇人，久居江蘇，如負責接收京滬，將形成一股雄厚的地方勢力。而湯恩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熟悉日本情況，與京滬江蘇沒有地方淵源，對蔣介石又絕對忠心，因而入選。

八月二十一日，湯恩伯飛抵芷江陸軍總司令部，會商接受日本軍隊投降繳械等有關事宜。九月八日，湯恩伯又飛抵上海，以抗戰名將的姿態，乘坐敞篷汽車作凱旋式的巡行。一連數日，大宴賓客，招待的酒席達一千餘桌。湯恩伯坐著汽車到各大飯店、餐廳輪流乾杯、

演說，熱鬧非凡。

在上海期間，湯恩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接收政策，對日本侵略者媚氣十足、醜態百出。他在上海華懋公寓接見日本登陸部隊司令官松井中將時，剛一見面，便慢聲細語地說：「對不起，今天要您到這裏來談……。」坐在旁邊的美國顧問立即警告他：「將軍，你要顧及你的地位，你是勝利者，對於投降的人沒有什麼對不起，你應該說我命令你。」這樣，他才重新用命令的口吻發言。後來，湯恩伯再次與松井會見時又不無歉疚地說：「早知這樣，我們應該預先演習一下。」

對於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等大戰犯，湯恩伯更是敬若上賓，嚴加保護。據岡村寧次回憶，在押期間，湯恩伯對他關懷備至，曾屢次向他透露：蔣主席內定伺機將與中國有關戰犯全部釋放回國。湯的參謀長龍佐良也多次探望岡村寧次，告訴他：「湯將軍面謁總統，力陳岡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戰時有功，應令松井立即回國，對岡村應判無罪，蔣主席大致同意。事為何應欽得知，何認為松井可令其歸國，岡村必須考慮輿論及國際關係，未便立即宣判無罪，應徐圖善策，以待良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晚，湯恩伯將岡村寧次接到自己的公館，聽取有關防守長江的建議。岡村根據長時期以來研究長江下游軍事要地的經驗，陳述了意見，談話約一小時，方才

離去。一九四九年一月，當岡村寧次即將出庭受審之時，蔣介石辭職下野，副總統李宗仁繼爲代總統。湯恩伯又急派龍佐良告知岡村：「國民黨內矛盾重重，無法收拾，蔣總統不得已終於辭職。但是湯恩伯將軍仍擔任上海地區警備，審判仍按預定進行，對你的處理不變。」一月二十六日審判開始時，湯恩伯更是插手其間，大作文章，在湯本人的日記裏留下了這樣的記錄：「民國三十七年對岡村寧次大將進行審判時，正值華北局勢惡化，共產黨對此審判也極爲注意。在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審議本案時，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員均主張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我從反共的見的出發，主張宣判無罪，並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別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並經蔣總統批准。」上海軍事法庭宣判岡村寧次無罪後不久，代總統李宗仁爲爭取和平談判，下令重新逮捕岡村，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將命令扣壓不發，於二十九日將岡村秘密遣送回國。對此，岡村感激涕零，在其回憶錄中爲湯恩伯寫下了這樣的評語：「湯恩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極端親日。戰爭結束後，湯負責上海地區接收工作，爲日本人盡心竭力，十萬僑民深爲體諒和感謝……。」

京滬杭的垂死掙扎

一九四六年四月，遣送日俘日僑工作告一段落，湯恩伯奉命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第一綏靖區司令長官，自上海移駐無錫，負責長江南北及近畿地區治安。七月，擢升陸軍副總司令兼首都衛戍司令官，積極幫助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

一九四七年二月，國民黨在屢遭敗績的情況下，被迫放棄「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將原徐州、鄭州綏靖公署的兵力統編為三個兵團，湯恩伯調任第一兵團司令官。

五月，華東野戰軍為誘敵深入，決定將主力撤至萊蕪、新泰、蒙陰地區。國民黨軍事當局則判斷人民解放軍是向東北方向「潰退」，急令湯恩伯部會攻，企圖將華東野戰軍消滅於沂蒙山區。湯恩伯第一兵團中的整編第七十四師仗其美械裝備，前進積極，態勢突出。當該師行至蒙陰東南三十里的孟良崮時，發現已被包圍。湯恩伯自恃該部戰鬥力強，地勢居高臨下，致電師長張靈甫：「匪來犯我，實難得殲匪之良機……，貴師為全局之樞紐，務希激勵全體將士堅強沉毅，固守孟良崮，協同友軍予匪痛擊，以收預期之偉大功績。」為策應七十四師，蔣介石急調十個整編師前往增援。但援軍被人民解放軍頑強阻擊，無法與七十四師會合，而七十四師被困得飲料斷絕，驛馬受砲火驚擾，四處奔竄，亂成一團。五月十六日，七十四師陣地呈動搖狀態，湯恩伯苦苦求增援部隊「務須以果敢之行動，不顧一切，星夜進

擊，破匪軍之包圍，救袍澤於危困。」不久，解放軍發起總攻，頃刻間，號稱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七十四師全軍覆沒，國民黨軍在山東遭到嚴重打擊。此戰的失敗與張靈甫驕傲輕敵和援軍行動遲緩有關，湯恩伯對解放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又沒有及時阻止張靈甫在孟良崮上山，也負有重大的責任，戰後，他再次受到撤職處分。

時局的發展完全出乎蔣介石的預料，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已消滅殆盡。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宣布下野。臨行前，他又打出了湯恩伯這張「王牌」，任命湯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收集餘衆，企圖憑藉長江天險，作最後的掙扎。

一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和湯恩伯，秘密策劃長江布防問題，決定將長江防線劃分爲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白崇禧指揮，配置兵力約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湯恩伯指揮，兵力約四十五萬人。京滬杭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長江防線爲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爲重點，以淞滬爲核心，準備持久防禦，最後堅持淞滬，與台灣相呼應，以優勢海空軍從台灣支援淞滬，進行長期固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此同時，將上海約值三億多銀元的黃金白銀從海路運往台灣。

湯恩伯就職後，爲向蔣介石表示忠誠，經常在京滬公開或半公開地宣稱：「如果李宗仁代總統要舉行所謂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到南京、上海來開會。」又說：

「如李代總統要向共產黨投降，安全的責任我們是不能負的。」

是時，國民黨已失去半壁河山，軍心動搖，倒戈者日衆。一九四九年春，浙江省主席、湯恩伯的「恩師」陳儀決定「起義」。一月三十日，陳儀派其外甥丁某持親筆信赴上海動員湯恩伯共同舉事，湯接見了某時，恰好上海警察局局長、軍統特務頭子毛森在座。湯恩伯遂出賣陳儀，向住在奉化的蔣介石告密。不久，蔣介石途經杭州，陳儀往謁，蔣介石拒不接見，結果陳儀被免去省主席職務。二月二十一日，陳儀離任後來到上海，蔣介石命令湯恩伯予以逮捕，押至衢縣監獄看管。杭州解放後，陳儀被轉移到台灣高雄陸軍監獄，後被殺害。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晚，國共和談破裂，深夜，人民解放軍在強大的砲火掩護下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江防線全面崩潰，南京、杭州相繼解放，上海陷於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四月二十六日，蔣介石乘太康號兵艦抵達吳淞口，召集顧祝同、湯恩伯開會，部署上海防禦。五月十二日，人民解放軍第九、第十兵團向上海發起進攻，經過半月激戰，湯恩伯率殘部五萬餘人從海路逃往定海、台灣。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

七月，蔣介石仍幻想美國出兵，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命湯恩伯率領廈門殘兵布防死守。企圖保持閩浙海岸線，藉以屏障台灣。七月下旬，人民解放軍大兵壓境，湯軍連連敗

績，狼狽逃往台灣、金門。蔣介石驚恐萬狀，急電湯恩伯：「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十月二十四日，解放軍三個團分別在龍口、林厝、古寧頭登上金門島，湯恩伯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向台灣求援，在國民黨海、空、戰車的立體攻擊下，解放軍渡船被毀，進攻金門失利。十月二十九日，湯恩伯自金門飛抵台北。

一九五四年五月，湯恩伯胃病復發，飛往日本東京就醫，經慶應大學醫院手術無效，死於日本，結束了他的一生。

(田毅鵬)

【第十三章】

嫡系中的雜牌衛立煌

在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中，衛立煌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老同學符昭騫先生曾對他有這樣的描述：「衛是蔣集團中最能打仗的一員戰將，遇事不畏難，不怕苦，不討價還價，故取得蔣之歡心和信任。且衛行伍出身，久經戰陣，打起仗來，行動敏捷，猶如生龍活虎。很多人認為他是老粗，不學無術，看他不起，也有許多人譽他為曾國藩部下的鮑超。」衛立煌從一九一一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到一九六〇年於北京溘然長逝，在其四十九年的戎馬生涯中，作為孫中山的衛士，蔣介石的虎將，共產黨的敵人和朋友，書寫了他一生複雜多變的歷史。

黃金歲月

一九一一年，安徽省合肥縣一帶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災荒，禾稼枯槁、瘟疫橫行，百姓流離失所。可怕的災荒瘟疫也襲擊了衛立煌的家鄉，合肥縣東十里的衛楊村，他的父親、二哥、二嫂相繼死去，衛家一貧如洗，生計難以維持。

是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合肥革命黨人起而響應，成立了廬州軍政分府，招募兵士。年僅十五歲的衛立煌爲革命高潮所吸引，剪去辮髮，應召入伍，參加了和州衛城之戰。和州失守後，又投入湖北學兵營，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久，學兵營結業，他來到上海，跟隨安徽革命黨人范鴻仙從事反袁活動。革命黨人進攻袁軍盤踞的上海製造局時，衛立煌懷揣炸彈，越過塹壕，把炸彈投入了敵人的兵營。事後，衛立煌爲躲避追捕，巧妙地登上了黃埔江邊的外國輪船，南下廣州，參加了粵軍。

一九一七年八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揭起護法旗幟。衛立煌被選進孫中山的衛隊，隨侍左右。一次，衛立煌隨孫中山外出歸來，其坐騎看見馬廐，突然狂奔起來，衛身揹長槍，入門時磕在門楣上，摔下馬來，口吐鮮血，孫中山先生厚贈川資，送他回鄉養病，傷病後歸隊，調升警衛團排長。

一九一八年初，衛立煌調粵軍許崇智部第二支隊，參加第一次北伐，以功升連長。後又在清剿地方土匪時，屢立戰功而升任營長，軍中稱爲「小營長」。爲裝扮老成，他蓄起了一撮鬚鬚，從此，這便成爲衛立煌面部的顯著特徵。

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居上海，電令在閩粵軍改稱「東路討賊軍」，回粵討陳。進軍途中，衛立煌巧施妙計，固守一處陣地而不放一槍，使敵軍不知底細，唯恐中計而離去，以功擢升團長。次年一月，討賊軍攻克廣州，陳軍敗走東江。孫中山與宋慶齡重登永豐艦，與討陳有功人員合影，衛立煌參加了這一典禮。孫中山送他一張這次合影的十二寸照片，並親筆題簽「衛立煌同志，孫文贈」。衛立煌非常珍愛這張照片，長期貼身保存，有時還陳放在客廳的茶几上。後來，衛立煌把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期稱爲他一生中的「黃金歲月」。

中原大戰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成爲國民黨軍界無可爭議的頭面人物。

對於蔣介石，衛立煌早就熟悉。他的安徽同鄉吳忠信是蔣介石的把兄弟，經常向他談及蔣介石。有時吳忠信請蔣介石到家裏吃飯，衛立煌也常前去作陪。衛在粵軍中素以驍勇善戰著稱，又是非粵籍軍官，蔣介石對他非常客氣，視之爲主要的聯絡對象。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後，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指揮的蔣介石乘機改編粵軍，把不服

從他的軍隊包圍繳械，與黃埔教導團合併，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下轄三個師，原粵軍補充旅旅長衛立煌被任命為第九團少將團長。對於蔣介石的降職任命，衛立煌頗為不滿。儘管如此，既然成為蔣介石的部下，當然要服從命令。

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黃埔戒嚴，各師黨代表、共產黨員均遭監視，衛立煌所在的第九團黨代表曹淵被撤走。七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衛立煌隨何應欽由東路進攻閩浙。第九團作為東路軍的攻堅團，所向披靡。攻占福州後，衛立煌升任第十四師師長。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政變，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衛軍駐紮南京，負責警衛工作。八月，參加龍潭戰役。旋於鎮江結識了教會學校精明強幹的女校長朱韻珩女士。不久，兩人結為伉儷。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復職後，積極培植個人勢力。因衛立煌既非浙江籍，又與黃埔無緣，非但沒有得到提拔，反而以「應多讀些書」為由，將衛立煌送到北平進陸軍大學特別班「進修學習」。

陸大學習期間，衛立煌勤勉刻苦。校方規定可選修一門外語，衛即選擇了日語。他還大量搜集日本自甲午以來侵華的戰略和武器等方面的資料。其先祖衛汝貴甲午在朝鮮與日軍鏖戰的慘敗，給衛立煌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衛立煌賦閒北平期間，蔣介石爲了消滅異己，建立獨裁統治，先後與桂、閻、馮各系軍閥展開大戰。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在即，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紛紛北上，集結於隴海路兩側，而津浦鐵路作爲蔣軍的主要運輸線，卻處於防備空虛狀態。十二月上旬，原已投蔣的「倒戈將軍」石友三突然在浦口通電反蔣，沿浦口至蚌埠鐵路線駐紮的蔣軍第五十六師、第一六八旅全部被石友三繳械。後方起火，而北上的大隊嫡系人馬卻無法調回，南京空虛、警報頻傳。

就在這時，衛立煌的夫人朱韻珩意外地收到了昔日美國留學好友，此時「天下第一夫人」宋美齡的來信，信中寫道：「現在您的將軍已在陸大學習，達到了您的願望。蔣先生想請衛將軍以嶄新的姿態，速返安徽，重組勁旅，以保衛南京、保衛中山先生的陵園……。」讀罷來信，朱韻珩淚如雨下。作爲妻子，她本打算衛立煌軍校畢業後，遠遊歐美，繼續深造，超脫於軍閥混戰之外。衛立煌雖然對蔣介石抱有怨氣，但卻視此爲重返軍隊，再建戰功的好機會。他說服了妻子，登車南下就職。

經過數月的慘淡經營，衛立煌以粵軍時期的老部下和黃埔學生爲基幹，組建了四十五師，駐紮蚌埠。石友三見狀，馬上軟了下來，以擁護閻、馮的名義，撤離津浦路南段，移軍河南商丘。中原大戰期間，衛立煌坐鎮蚌埠，使津浦路南段始終暢通，爲蔣介石前方混戰提

供了安定的後方條件。蔣介石用他獨特的「夫人外交」，把驍勇善戰的衛立煌拉入了軍閥混戰的血海。

剿共將軍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為解決其「心腹之患」，對紅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衛立煌在五次反共「圍剿」中，為蔣家王朝衝鋒陷陣，出生入死，被封為「剿共常勝將軍」。

一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在武漢籌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糾集六十三萬人馬重點進攻鄂豫皖（中共）革命根據地。衛立煌被任命為中路第六縱隊指揮官，轄第十師和第八師。八月十日凌晨，衛部奉命馳援在黃安七里坪與紅軍大戰七晝夜的陳繼承部。黃昏，先頭部隊行至黃安郊外馮壽二地區，與以陳賡第十二師為先鋒的紅軍主力部隊相遇，雙方展開了一場天昏地暗的夜戰。戰鬥剛剛開始，善於夜戰的紅軍便將第十師主力連同衛立煌的指揮部包圍得水洩不通。面對紅軍閃電般的凌厲攻勢，衛立煌命令各部隊收縮防線，固守等待天明。深夜，紅軍向衛立煌指揮部發起了猛攻，衛部警衛營傷亡慘重，防禦圈

行將崩潰，如果紅軍再前進二百米，衛立煌就將變成階下之囚。衛組織護兵拚死抵抗，紅軍爲避免傷亡，沒有繼續強攻。次日天明，雙方進入僵持狀態。入夜，紅軍爲了避免持久的陣地戰，自動撤走。是役，第六縱隊傷亡慘重，休整數日，於九月九日開赴新集。

各路蔣軍自侵入（中共）革命根據地以來，備嘗紅軍鐵拳的打擊，紛紛尋找藉口，畏縮不前。爲刺激士氣，蔣介石明令各縱隊，誰先占領金家寨，即將此鎮改爲縣治，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金家寨位於安徽西部，曾是太平軍、捻軍和白朗起義軍的重要據點，此時爲鄂豫皖蘇維埃的中心。九月上旬，衛立煌率部向金家寨推進，這時，鄂豫皖紅軍主力已經轉移，衛部沒有遇到大的抵抗，即率先進入了空空蕩蕩的金家寨。蔣介石正在拚命督責各縱隊進兵，忽然接到衛立煌占領金家寨的電報，喜出望外，親赴前線慰勞，並獎以巨款。半年後，蔣介石下令將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南城五個縣的部分地區劃出，以金家寨爲中心，建立縣治，稱「立煌縣」。蔣介石這樣作，一方面是爲踐前諾言，另一方面也是企圖拉攏衛立煌，冰釋蔣衛之間的矛盾。國民黨統治時期，以人名爲縣名者，原只有孫中山的故鄉——中山縣，因而，衛立煌名聲大噪。

對於蔣介石的「抬舉」，衛立煌並不感動。他自附蔣以來，就披堅執銳，屢建「戰功」，但因既非浙籍，又非黃埔，無法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在統轄軍隊問題上，蔣介石不是

將其降職，就是派其「進修」，打了勝仗，也僅予虛名，從不讓他掌握實權。衛立煌夢寐以求的，是當一個擁有地盤的省主席，卻遲遲不能實現，而與他資歷相當的顧祝同早在一九三〇年就當上了江蘇省主席。對此，衛立煌耿耿於懷。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調集大軍，對江西（中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衛立煌任第一縱隊指揮官，位居前敵指揮官陳誠之下。對此，他大為惱火，一氣之下返回南京，撘了挑子。蔣介石聞訊又驚又氣，準備撤銷衛的職務，經武昌行營主任熊式輝再三勸阻，命令才沒有發出。

衛立煌回到南京後，稱病住院，小病大養，將腋下一無關緊要的小瘤手術割去，親朋屬下紛紛前往探視，有意誇大渲染，回贛就職之事遂不了了之。衛立煌的「撘挑子」事件，使得剛剛有所緩和的蔣衛矛盾又趨於激化。

鎮壓閩變

正當蔣介石糾集重兵，對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時候，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州成立「中華人民政府」，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蔣介石懼怕國

內抗日反蔣勢力的聯合，急調精銳部隊，兵分三路進兵福建。爲盡快結束閩變，蔣介石決定起用居家賦閒的衛立煌。

事變發生後十餘日，衛立煌接到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的電話，令他立即乘飛機去撫州報到，就任討閩軍第五路總指揮。爲使衛立煌忘記日前的不快，熊式輝親赴衛立煌總部，送來命令和行軍地圖，備加撫慰。衛立煌爲再掌兵權，贏得蔣介石的信任，也主動向蔣介石致電請纓。

十二月中旬，衛立煌指揮所部晝夜兼程，很快到達閩北，相機而動。是時，福建人民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上層領導人紛紛離閩出走。蔡廷鍇決定放棄福州，率領由原十九路軍擴編的十個師沿海岸線向西南撤退，準備強行進入廣東。蔣介石電令各路行動。衛立煌率部疾進，隱蔽地繞到閩江以南進行阻擊。蔡廷鍇部一行七萬餘人，行軍擁擠，軍容混亂，無心戀戰，被衛軍緊緊咬住。不久，蔣介石收買蔡部毛維壽、沈光漢等將領發表通電，同意改編。在內外夾擊下，福建人民政府終於失敗。衛立煌在這次戰役中，戰術機動靈活，爲蔣介石出了大力。事後，蔣介石在紀念周上讚賞他行動敏捷，出乎意料。

但衛立煌仍未得到蔣介石的重用。福建省主席的位置給了陳儀，其餘的肥缺也都被蔣的親信瓜分，衛立煌僅作了一個閩贛邊區「清剿」總指揮，後調任豫鄂皖三省邊區「清剿」總

指揮，位居老軍閥劉鎮華之下。非但如此，蔣介石還將衛部十四軍下屬的第十師和第八十三師調走，偷樑換柱，架空了衛立煌。而最令衛立煌傷心的，是「迎春飯店打牌事件」。那是在閩變平息之後，衛立煌的第五路軍即將解散，各師、團高級官員大宴於杭州西湖畔迎春飯店。酒後，衆人雅興未盡，擺起方桌，打起了「衛生麻將」，天亮方才散去。次日中午，蔣介石給衛發來電報，電報末句是：「昨晚勝負如何？」衛立煌見此大爲驚異，遙在千里之外的蔣介石如何知悉他的一舉一動？分明有蔣介石的「耳目」在側。他略加思索，發回一電，「昨晚歡宴過晚，是我的責任，我有錯誤」。午後，蔣覆電：「戲言也，勿介意」，事件發生後，衛立煌對蔣介石越發戒備了。

忻口大戰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發動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作爲一個具有民族良知的中國軍人，衛立煌毅然揮師北上，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七月上旬，衛立煌奉命率領十四軍馳援蘆溝橋。然部隊尚在途中，平津已先後失陷。中日兩軍在平綏線上的軍事要塞南口發生激戰。蔣介石遂命他增援南口。南口棄守後，他率領

部隊準備參加保定會戰。但保定戰場的正面總指揮劉峙在日寇強大攻勢面前，失魂喪魄，落荒而逃，引起了全線崩潰，衛只好引兵南撤石家莊集結。日寇在南口、保定得手後，直撲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老巢——太原，閻錫山驚慌失措，向蔣介石呼救，蔣乘機派衛立煌率十四軍進入山西。在蔣介石的全盤計劃裏，衛部入晉除抵禦日軍之外，還有兩項奇妙的功用，一是藉機侵吞閻錫山的地盤；二是監視、限制、甚至消滅八路軍。

接命後，衛立煌率部分乘十列悶罐車開入山西，進駐軍事重鎮忻口，修築工事，嚴陣以待。十月七日，日軍五萬餘人在五十輛坦克、二十輛裝甲車的掩護下，輪番向忻口發起攻擊。戰役之初，日軍進攻的重點是南懷花陣地。是時，我軍陣地多為臨時性壕溝，又沒有高射炮，敵機可低空準確轟炸。在日軍的陸空立體攻擊下，南懷花陣地首先出現缺口，衛立煌急令李仙洲師反攻。戰至十四日，雙方死傷枕藉。為確保圍殲日軍計劃的實現，十五日，衛親自來到南懷花附近，集中五旅兵力，利用黑夜向南懷花和靈山發起猛烈衝鋒，雙方展開肉搏，靈山幾次易手，敵第五師團四十二聯隊終被我軍消滅。

忻口前線激戰之時，十月十九日，八路軍一二九師七六九團夜襲代縣日軍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二十四架。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會戰，也極大地改變了衛立煌對八路的看法。經過二十一天的戰鬥，日軍死傷慘重，給養斷絕，進退維谷。衛立煌正擬迂迴殲敵，戰局突然發生

逆轉。第一戰區劉峙繼保定大潰退後，又從滹沱河退至河南安陽漳河一線，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石家莊。娘子關門戶洞開，太原震動，忻口陣地也陷入日軍包圍之中。衛立煌只好於十一月二日下令撤退。忻口會戰不敗而敗。

冤仇宜解不宜結

忻口戰役之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一去不返，蔣介石決定由衛立煌繼任其職。這時，太原日軍正積極準備南下，晉南形勢岌岌可危。幾個月來的戰爭使衛立煌深感八路軍是第二戰區一支可以倚重的抗日力量，必須與之竭誠合作。當他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華北初次見面時，就豪爽地說：「把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冤仇宜解不宜結。」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軍由太原進攻晉南，企圖將中國軍隊趕至黃河以南，以完全占據華北。第二戰區負責人閻錫山、衛立煌、朱德在臨汾開會，決定由衛立煌在韓信嶺一帶阻擊日軍南進，朱德率部作為東路軍與之配合。衛部在韓信嶺激戰十餘日，被日軍迂迴包圍。而朱德率東路軍利用山形地勢，沿日本軍隊後方空隙悄然突圍。衛立煌學習八路軍的戰法，十幾個師分成數路，也從包圍圈中拉了出來，避免了毀滅性的潰敗。

突圍後，衛立煌身邊只有一個團的警衛，且戰且退。撤至大寧時，日軍因得漢奸報告，出動飛機、步兵阻攔，將其衛隊衝散，衛立煌大為恐慌，發電請求友軍援救。朱德聞訊立即派五團二營馳援，衛立煌方才脫險，對於朱德的救命之恩，衛立煌感念至深。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蔣介石電召衛立煌前往洛陽。為爭取時間，他決定取道陝南。四月十七日，衛立煌的車隊由延水關出發，直奔延安。在延安，他受到盛況空前的歡迎，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並與之合影留念。隨即，衛立煌應邀在抗大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講，夜晚又參加了文藝聯歡會。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裏，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使他讚嘆不已。

返回西安後，衛立煌立即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身分簽發了一個手令：「即發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他見負責軍需的國民黨軍官面有難色，即道：「第二戰區的軍隊受我指揮，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樣看待，十八集團軍打得很好，我們就要充分供給。」不久，彈藥如期撥發。

一九三八年夏，蔣介石擴大軍隊建制，衛立煌的舊部第十四軍擴充為三十三軍團，由軍長李默庵升任軍團長。李默庵是畢業於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蔣介石任命他為軍團長，實際上是想架空衛立煌。李尚未走馬上任，就以軍團長的身分直接上書蔣介石，條陳人事任免事

宜。將衛立煌的親信分別架空調走，塞進黃埔學生充任要職。蔣介石欣然應允，衛立煌則勃然大怒，一方面，他召集親信大發牢騷，吼道：「我的心已經變了，不是從前的衛立煌了，我當共產黨去，你們幹不幹？」暗地裏，衛立煌還找到他特意從延安調入總部的秘書趙榮生，在一個燭光昏黃的暗室裏，秘密詢問如何加入共產黨，以作為與蔣介石決裂後的退路。另一方面，他又致電蔣介石，公開反對調動，並提出了有利自己的方案。蔣介石雖然傾向自己的學生，但考慮到衛立煌能征慣戰，華北尚不可缺，李默庵資格尚淺，指揮不動山西的雜牌軍，只好覆電核准。這場權力之爭方才偃旗息鼓，告一段落。

消極反共

衛立煌自北上以來，一戰忻口，再戰韓信嶺，頑強地把國民黨勢力保留在華北，蔣介石認為指揮華北戰事非衛莫屬，決定由衛立煌取代程潛，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對於蔣介石的提拔，衛立煌並不滿意。因為各戰區司令長官兼任該戰區最大一省的省主席已成慣例，但衛立煌上任後，命令卻遲遲沒有發下。他耐著性子等了半年，仍然杳無音信，他一面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要求；一面託好友在重慶為之奔走說和，幾經周折，直到一九

三九年九月才由重慶政府明令發表衛立煌擔任河南省主席。

衛立煌上任伊始，正是國民黨積極醞釀反共高潮之時。國民黨頑固派先後在河南、晉西、冀北製造了一系列反共血案。衛立煌熱誠抗日，同情共產黨，對反共採取了消極應付的態度。對於河南竹溝血案的背後操縱者、河南土皇帝別廷芳，衛立煌對其限制、打擊、沒收其兵工廠，又在年底將別廷芳召到洛陽，大加訓斥。驕橫無比的別廷芳忍氣吞聲，積鬱成病，吐血身亡，其所部民團被收編。對於晉西閻錫山、冀北朱懷冰發動的反共事變，衛立煌也堅守中立，約束他的軍隊盡量不介入。他常對人說：「內戰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內戰就完了……。」

一九四一年春，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三月，又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表反共演說，氣焰十分囂張。蔣介石將衛立煌叫去，對他在華北縱容共產黨勢力發展，消極應付反共高潮大為不滿，暗示要撤掉衛立煌的職務。衛立煌一氣之下，向蔣介石請假去峨眉山休息。正在這時，日軍突然對中條山發起進攻，國民黨守軍一敗塗地，中條山失守，洛陽震動。面對第一戰區糜爛的戰局，蔣介石認為此時應讓衛立煌返回戰區，收拾殘局。衛奉命從峨眉山回到洛陽，經過數月苦戰，擊退日軍，收復鄭州，第一戰區又趨於穩定。

一九四一年底，衛立煌去重慶參加國民黨九中全會。元旦之夜，蔣介石宴請文武近臣，

爲籠絡衛立煌，也給他發了請柬。到了晚上，蔣家華筵初開，貴客齊來，唯獨不見衛立煌，十四個座位的大圓桌旁只有十三人，蔣介石急得抓耳撓腮。按西洋風俗，十三是個不祥的數字，無奈只好把秘書找來湊數，大煞風景。原來，這天孔祥熙也來請衛立煌吃飯，並說孫夫人宋慶齡亦在孔家過年，衛聽後異常興奮，欣然答應赴約。蔣介石卻認爲衛立煌狂妄自大，目無領袖，是故意捲他的面子，大爲不快。衛蔣裂痕由此擴大，加快了蔣介石撤換衛立煌的步伐。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蔣介石正式宣布：衛立煌調任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由蔣鼎文續任其職，蔣介石再次褫奪了衛立煌的軍權。

西安行營是個沒有實權的閒散衙門。衛立煌就職後，懶於行政，整日遊覽古城舊跡，打發時日，頗爲悠閒。但作爲一個軍人，離開炮火紛飛的抗日前線，又未免有髒中生肉之苦惱。三月的一天深夜，蔣介石給衛立煌打來電話，要調他去緬甸與英國軍隊聯合作戰。兩天後，衛立煌乘飛機去渝接受任務。正在此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叛變，告發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期間有「通共、容共」之嫌疑，蔣介石聞訊大怒，命戴笠立案調查，遠征緬甸之事遂被束諸高閣。蔣介石認爲衛立煌缺乏政治頭腦，受共產黨迷惑，沒有深究。衛立煌也順水推舟，請求回成都奉養老母。蔣介石爲表現他氣量恢宏，愛護功臣，同意了衛的請求，衛立煌出征不成，又開始了無聊的閒居生活。

遠征滇緬

一九四三年深秋的一天，衛立煌接到急電，趕往重慶，受到蔣介石親自接見。蔣介石告訴他：「恢復你的上將軍銜，就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馬上趕赴雲南前線。」

原來，此時遠征緬甸的中國遠征軍連遭敗績，日軍攻入雲南，隔怒江與我軍對峙，形勢萬分危急。為打通國際陸路通道，取得外援物資，蔣介石接受美軍建議，決定重組遠征軍進行反攻。一九四三年四月，蔣介石曾以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但陳誠專橫跋扈，上下矛盾重重，與史迪威也嚴重不和，不到半年就稱病辭職。在遴選繼任者時，蔣想到了衛立煌，並向史迪威推薦，史迪威欣然接納。在史迪威的記憶裏，衛立煌是國民黨軍界中罕見的「百戰百勝將軍」。派衛立煌遠征滇緬，不會再接觸共產黨，蔣介石也覺得非常放心。

衛立煌在楚雄建立遠征軍司令部，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戰鬥準備。由於這是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渡江反擊戰，衛立煌對於每一行動步驟都作了周密的安排。一九四四年五月六日，蔣介石批准了他的作戰計劃。五月十一日拂曉，強渡怒江的軍事行動開始。隱蔽在江邊的渡江部隊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強渡成功，建立了灘頭陣地，後續部隊也陸續過江，迅速向縱深

推進。

怒江以西的日軍，盤踞在崇山峻嶺間，以騰衝、松山、龍陵等地，以鋼筋水泥築成的永備工事為支撐點，負隅頑抗。遠征軍攻關奪隘，所向披靡，戰鬥中衛立煌表現出沉穩、果敢的指揮風格，一日，他與美國准將寶恩、美國記者若干往前線觀察戰情，日軍飛機發現目標，俯衝掃射。衛立煌面不改色，拿著望遠鏡若無其事地繼續遠眺，美國人見狀大為驚嘆。經過數十日血戰，松山、騰衝、芒市先後克復，盤踞緬甸的日軍被消滅，被日軍封鎖達三年之久的滇緬公路打通，遠征軍與在緬北作戰的中國駐印軍勝利會師，遠征緬甸的戰事結束。戰役結束後，大批美國雜誌和報刊上面都刊登了強渡怒江的報導，《時代》雜誌封面上還刊出了衛立煌威風凜凜的騎馬照，詳細介紹了他的抗日事跡，衛立煌一時聲名雀起。

此時，軍界盛傳緬北戰事結束後，中國遠征軍司令部將改組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衛立煌是理所當然的總司令人選。但不久，蔣介石電召衛立煌赴渝，親自接見並授以青天白日勳章。衛立煌剛剛回到保山司令部就接到蔣介石的來電：「中國遠征軍的任務已完成，任你為中國陸軍副總司令。」衛立煌又一次受到蔣介石的捉弄。他不想就任這一虛職，何應欽多次親來昆明勸請，衛立煌都稱病婉辭。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友人的搓和之下，衛立煌與美國留學生韓權華女士舉行了簡單的婚

禮，再度揚起生活的風帆。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派衛立煌出洋考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衛立煌偕夫人、參謀、秘書一行四人由上海啓程，開始了漫遊歐美十國的歷程。

就任「東北剿總司令」之謎

一九四七年十月，在蔣介石迭電催促下，衛立煌由巴黎轉道美國飛回上海。

這時，國民黨軍隊經過十年的「戡亂」作戰，損失慘重，被迫收縮戰線。在東北戰場上，蔣軍屢吃敗仗，戰局日益糜爛。行轅主任陳誠既專橫跋扈，又無可奈何，只好以胃病復發爲由，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介石親臨瀋陽，見陳誠確已黔驢技窮，只好另覓人選。在這四面起火的危急關頭，他又決定打出他的王牌——衛立煌。

回滬後，衛立煌立即謁見蔣介石。蔣告訴他，目前軍事形勢緊急，不久將成立東北、華北、華中、華東四個「剿匪」總司令部。東北剿總一職非他莫屬。衛立煌立刻答道：「辭修（陳誠字辭修）已在東北駕輕就熟，現在換人，恐怕不好。」蔣介石見他推諉，便指使張群、顧祝同等人輪番「勸駕」，陳誠的妻子也跑到衛家苦苦哀求，請衛早日赴瀋。一時，衛

公館車水馬龍、門庭若市，衛立煌一時莫知所從。

正當衛立煌躊躇徘徊之時，報端忽載衛立煌被任命為東北「剿總」總司令的消息，蔣介石也打來電話，約他共進午餐。蔣介石一見到衛立煌，便先發制人，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去東北的注意事項。午餐後，又被一群蜂擁而至的記者團團圍住。衛立煌就這樣，被推上了「東北剿總司令」的「寶座」。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他率隨員由南京軍用機場登機，飛往瀋陽赴任。二月五日，陳誠乘飛機悄然回京，溜之大吉。

關於遼瀋戰役前夕衛立煌的東北之行，當事者給我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回憶。衛夫人韓權華女士認為「衛立煌去東北並不是想幫助蔣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蔣介石失敗」。早在出洋考察時，衛立煌就曾委託韓權華的甥婿，思想進步、與法國左派有密切往來的汪德昭博士，設法代他轉請蘇聯使館向中共領導人表明他對國內戰爭形勢的一些看法，以取得聯繫。因而，遼瀋戰役期間，衛立煌雖非「倒戈將軍」，但他處處故意與蔣介石對立，製造蔣軍內部混亂，為解放軍全殲蔣軍作出了貢獻。而遼瀋戰役期間與衛立煌同在東北的國民黨將領杜聿明、范漢杰和廖耀湘等人在其回憶中卻持不同觀點。他們認為，衛立煌在東北問題上與蔣介石的分歧是戰略思想不同，並非本質差異。然而無論怎樣，衛立煌在東北期間與蔣介石的矛盾對立加速了國民黨軍隊崩潰的進程，卻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司令之時，國民黨東北戰局已經相當嚴峻，許多軍事要地先後失守，瀋陽與錦州之間的交通完全斷絕，東北與華北失去聯繫。對此，衛立煌主張採取穩重態度，不管解放軍打到什麼地方，守軍如何告急，他總是把主力集中在瀋陽附近不動，並說：共軍的戰術是圍城打援，我們不能上當。而蔣介石則力主放棄東北，撤兵關內。圍繞著瀋陽的撤守，蔣衛之間發生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激烈爭論。

一九四八年三月，蔣介石派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羅澤闓飛抵瀋陽，建議衛立煌乘瀋陽暫時穩定之機，以精銳部隊打通北寧路瀋錦段。衛立煌堅決反對，派副司令鄭洞國飛赴南京，向蔣介石說明意見：「目前各軍均疲憊不堪，正在休息，若側敵長途行軍，在兵法上有破綻，至為不妥，東北實地指揮將領均不同意出兵遼西方案。」仍擬堅守瀋陽，待部隊整補完畢後，相機打通瀋錦線。蔣介石頗為不快，堅令衛立煌執行原議，並將主力撤至錦州，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鄭洞國快快回瀋復命。

鄭洞國向衛轉述蔣意後，衛立煌仍堅持己見，再派趙家驥等赴南京見蔣，陳述利害得失。此時蔣介石正處在競選總統的非常時期，不想在軍事上造成大的動盪，方才允許衛立煌在東北暫時維持現狀，加緊補充訓練，待整訓完畢，再由瀋陽、錦州同時發動攻勢，打通瀋錦線。十個月過去了，東北軍事形勢繼續惡化，蔣介石認為有必要立即執行打通瀋錦線，撤

退錦州的計劃。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電召衛立煌入京，試圖說服衛立煌從命。

衛立煌從來沒有見過蔣介石這樣沮喪，蔣介石也從未看到衛立煌如此堅決，談話以衛立煌的勝利結束。

五月初，蔣介石已出任總統。此時，關內國民黨各戰場更加被動。蔣介石又電令衛立煌打通瀋錦線，撤退錦州，衛立煌仍堅持己見。蔣介石見衛立煌如此固執，決定製造矛盾，架空衛立煌，以實現他的撤兵計劃。他暗示廖耀湘，許以西進機動兵團司令，領率瀋陽精銳開赴錦州。隨後，又命范漢杰建立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委以指揮東北全軍之全權，而把衛立煌懸在一邊。蔣介石這種拙劣的手法使東北國民黨將領各揣心腹事，誰也無法統一指揮。九月，遼瀋大戰在即，國民黨東北軍隊尚無明確戰略方針，「剿總」內部一片混亂。

一九四八年九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奔襲北寧路，包圍錦州，揭開了遼瀋大戰的序幕。蔣介石急電衛立煌出兵援錦。衛立煌認為錦州之圍應由關內出兵解決，回電拒不執行命令。九月二十四日，衛立煌被蔣介石召到南京，在總統官邸，蔣介石歇斯底里地命令衛立煌執行援錦計劃，衛立煌據理力爭。最後，蔣介石派參謀長顧祝同與衛立煌同赴瀋陽，以監軍身分逼迫衛立煌行動，衛立煌仍持反對意見，與顧祝同多次爭吵。此時，錦州防線形將崩潰，顧祝同見衛立煌仍無動於衷，只好飛回南京，向蔣介石告狀。蔣介石聞報大怒，於十月二日親赴

瀋陽，「御駕親征」。他撇開衛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組織援錦西進兵團，集中新民，火速援錦，企圖配合錦西、葫蘆島東進兵團，以東西對攻的戰術解錦州之圍。但東進兵團在塔山受到解放軍頑強阻擊，寸步難行。廖耀湘的西進兵團也在新立屯一線被解放軍鉗住。十月中旬，錦州、長春先後解放，蔣介石的東西對攻解圍計劃破產，衛立煌認為廖耀湘的西進兵團已無西進必要，應迅速撤回。但此時蔣介石像輸紅眼的賭徒，仍令廖兵團繼續西進，妄想收復錦州。廖耀湘率部盲目前進，行至黑山、大虎山，被解放軍包圍殲滅。

廖兵團覆滅後，國民黨在東北僅剩瀋陽一座孤城。十月中旬，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城下，蔣介石三令五申，要衛立煌與東北共存亡。在特務的監視下，衛立煌蜷曲在「剿總司令部」裏，一言不發。炮聲越來越近了，蔣介石生怕衛立煌成爲解放軍的俘虜，自己臉上無光，只好派飛機前往接應。在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衛立煌的座機慌忙起飛，逃離了瀋陽城。十一月二日，瀋陽解放，遼瀋大戰以國民黨毀滅性的失敗宣告結束。蔣介石眼看他的精銳部隊土崩瓦解，心如刀絞，只能拿衛立煌出氣。二十六日，他無視推衛立煌上任時許下的不追究戰敗責任的諾言，發布命令：「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遲疑不決，坐失戎機，致失重鎮，著即撤職查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淮海戰役爆發在即，北平城中的國民黨軍隊風聲鶴唳、草木皆

兵。蔣介石飛往徐州，布置黃淮平原大戰。獨居北平的衛立煌此時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他乘此混亂之機，秘密租用了陳納德航空隊的一架飛機，突飛廣州，準備逃往香港。但身著軍裝，腰佩手槍的衛立煌一行很快被保密局的特務發現，特務包圍了衛立煌下榻的酒店，衛立煌被解回家，住進了崗哨林立的衛家大院。特務禮貌地向他宣布蔣介石的命令：不准出門，不要會客、不許通信、打電話。衛立煌被軟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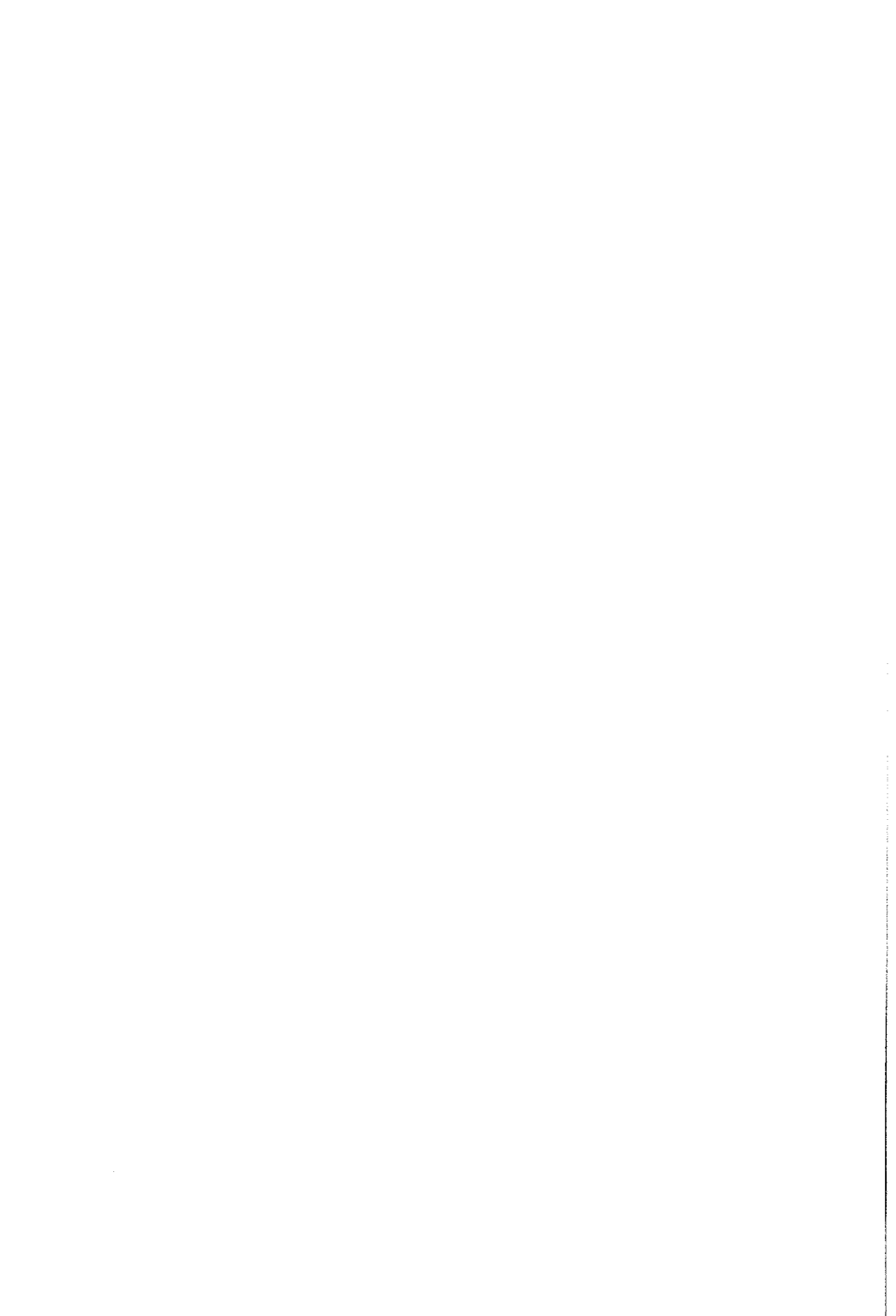
隱居生活

淮海戰役結束後，蔣家王朝的精銳部隊已喪失殆盡。蔣介石見大勢已去，重施故技，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上台後，為收買人心，取消戒嚴令，釋放政治犯，衛家大院外一排憲兵也奉令撤走。除夕之夜，衛立煌剃去鬚鬚，在貼身侍衛的護送下，乘轎車疾馳上海，登上駛往香港的英國輪船，逃出了蔣介石的網羅。在香港，衛立煌夫婦隱姓埋名，閉門謝客，開始了隱居生活。

蔣介石逃到台灣後，得知衛立煌寓居香港，生怕衛回大陸聯共反蔣，曾多次派吳忠信微服至港，勸衛立煌赴台，衛立煌都斷然予以拒絕。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在（中共）外事

人員的周密安排下，衛立煌經澳門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田毅鵬)



少壯將領杜聿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戰場上，人民解放軍活捉了一位國民黨高級軍官，這就是聲名赫赫的國民黨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中將副司令、蔣介石嫡系少壯派將領——杜聿明。他的被俘宣告了國民黨不可挽回的敗亡。

決心附蔣

杜聿明，字光亭，陝西米脂縣人。他在中學讀書時，正是五四運動剛過，大批愛國的熱血青年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號。這股救亡圖存的浪潮也衝擊著杜聿明的家鄉。他立下志向：要麼出洋看一看世界強國，學習富國強兵之法；要麼投筆從戎，自己訓練出一支保家衛國的精兵。由於語言方面的障礙，杜聿明最終放棄了出洋的念頭，決心做一名愛國軍人。

正當杜聿明中學畢業急於尋找出路的時候，他同時看到了黃埔軍校和吳佩孚的洛陽軍官

學校的招生廣告。杜聿明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擇。在時代的感召下，尤其是在他的親戚、陝北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驅杜斌丞的薰陶和教育下，杜聿明毅然選擇了南下的道路，萬里迢迢來到革命的中心廣州，成爲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

開學不久，開始辦理入黨登記。杜聿明同時收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份登記表。送共產黨員登記表的同學同時送他一本《馬克思資本論淺說》。杜聿明浮皮潦草地看了一遍，感到不可思議又枯燥無味。出身於地主家庭的杜聿明，在思想上感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很有一段距離，感情上對「共產」二字也有著一種天然的抵觸情緒。而對三民主義卻覺得順理成章，親切自然。所以他終於接過國民黨黨員登記表，逐項填寫並簽了名，成了一名正式的國民黨黨員。此後，黃埔學生逐漸形成了左右兩派。杜聿明雖未介入任何一派，但在思想感情上卻與右派同學有著強烈的共鳴。

一九二六年，武漢分校發生了左右兩派爭鬥的「血花劇社」事件。杜聿明見到學兵團團長張治中，對此大加評論：「我反對『血花劇社』有人提反蔣口號，我認爲反對校長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搗鬼。」其政治態度有了更明顯的傾向。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天，在武漢分校學兵團任職的黃埔一期學生洪君器同張治中談及某些政治問題，有人向當局告密說張治中、洪君器企圖帶學兵團到南京。洪君器即被逮捕，武

漢分校當即在武昌閱馬廠召開大會，將洪執行槍決。學兵團全體師生同仇敵愾，怒不可遏。當眾人高呼「打倒蔣介石」時，杜聿明既不舉手，也不吶喊，垂首站在憤怒的人群中一動不動。此舉激起大家強烈憤慨。當晚，杜聿明所在連召開全體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大會，對連長杜聿明提出質問。會上，任憑多方提問，杜聿明來個以靜治動，一言不發，最後被禁閉，呈請上級徹底查辦。當被反綁押送時，杜聿明拼命反抗：「我反對政府的言論行動在哪裏？你們憑什麼來禁閉我？」禁閉期間，杜聿明聽說要被槍斃，就在當晚和同室的犯人冒著傾盆大雨逃出了監獄，化裝成商人，乘船到南京，投奔了他最崇拜的校長蔣介石。

扶搖直上

國民黨軍事集團創建伊始，杜聿明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他踏實苦幹，善於訓練，為人處世又很靈活，頗受張治中青睞。機遇偏愛了這個有準備的人。一九二九年，蔣介石成立教導第二師，張治中兼任師長，杜任該師中校營長。一九三〇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杜聿明已升為上校團長。一九三〇年冬，教導第二師改番號為陸軍第四師，徐庭瑤任師長，杜聿明任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團團長。時徐庭瑤新任師長，很多部下對他以為然，部隊紀律

鬆弛。徐庭瑤大爲沮喪。唯有杜聿明的第二十四團駐地清潔、內務整齊、操練嚴格。因而徐對杜聿明尤爲讚許。使杜聿明和徐庭瑤關係更爲緊密的還有一件事。一九三二年杜聿明服喪期間，參加「進剿」鄂豫皖邊區紅軍的第十二旅在湖北應城遭到慘敗，旅長被俘。蔣介石對徐庭瑤嚴加訓斥，命全師開往武漢，全力「進剿」。時值杜聿明歸隊，徐庭瑤即勉勵杜好好練兵，爲十二旅報仇，爲第四師恢復名譽。杜聿明果然不負「厚望」，率領第十二團向據守在霍丘的紅軍猛烈出擊，取得了戰果。徐庭瑤爲此上報請獎，晉升杜聿明爲少將團長。從此把杜聿明倚爲不可多得的骨幹。杜聿明追隨蔣介石出生入死，幾經坎坷，總算在派系林立的蔣家王朝內找到了一個比較穩固的靠山。這是他一生事業的關鍵！不久，杜聿明就成爲蔣介石嫡系部隊徐庭瑤第十七軍第二十五師副師長。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軍進逼熱河。蔣介石迫於輿論，調派一部分嫡系部隊北上。三月，二十五師進至古北口長城陣地。十一日日軍開始總攻，戰鬥十分激烈。杜聿明負責指揮古北口南城正面的戰鬥。激戰一整天，二十五師陣地屹然未動。師長負傷後，杜聿明代行師長職務，連續擊退敵人三次衝鋒。日軍在將近四十天中未敢冒進。古北口抗戰顯示了杜聿明沉著冷靜的指揮才能。

古北口戰役後，杜聿明仍任第二十五師副師長，一九三三年秋，他進入南京中央軍校開

辦的高等教育班。學習期間，他與陝西同鄉、黃埔一期同學馬志超交誼很深，馬志超早已加入復興社，便勸杜也加入。杜聿明一貫有軍人不干預政治的思想。便心不在焉地問復興社是怎麼一回事。馬回答說：「復興社是校長創辦的，由校長親自領導，目的是爲了鞏固國民政府政權，剪除社會異動障礙。」杜聿明一聽是蔣介石親自領導的組織，立刻改變了態度。急切地說：「既是校長親自領導，可見甚關重要。能夠在校長直接領導下工作，我很願意加入。」杜聿明由此成了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爲數不多的復興社分子之一。其後，他並沒有參與復興社的活動，參加復興社不過是爲了表白對蔣介石的一片忠心。一九三六年三月，新的南京陸軍交輜學校成立，蔣介石掛名校長，徐庭瑤任中將教育長。徐向蔣保舉杜聿明做了學員隊隊長。學員都是從各部隊軍官中遴選出來的。杜聿明和他們相處很好。

一九三七年，國民黨軍委會、軍政部決定成立第一個陸軍裝甲兵團。蔣介石、徐庭瑤皆矚目杜聿明，委爲第一任團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杜聿明升任由裝甲兵團擴編而成的第五軍軍長。該軍是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初期成立的唯一機械化新軍。在國民黨軍官眼裏，部隊和武器裝備就是他們賴以發跡的根基和資本，很多人曾覬覦第五軍軍長這個寶座，而杜聿明卻幸運而穩固地保住了它。這既是因爲老上級徐庭瑤的扶植，也得助於他個人良好的軍人品格和才能。他清楚這個位置來之不易，從一掌握機械化部隊，就開始苦心經營，努力學習和

掌握裝甲車和汽車的性能。當時國民黨隨軍記者曾對杜聿明有過這樣的評價：「他雖非機械專科出身，而研討機械知識極有心得，治軍之暇，仍手不釋卷，將來學問之造詣，與事之成功，無可限量者矣。」杜聿明一向主張「戰時靠戰功，平時靠練兵」，對部隊訓練極為重視，視察士兵訓練時，每每親自做示範。同士兵進行射擊比賽，提出誰打滿分，當場發給獎金。他待人和氣在第五軍中頗有威望。其治學、練兵和部屬同甘共苦以及敢於負責的精神，使全軍士氣旺盛。第五軍的軍事訓練也被軍事委員會列為全國第一。

一九三九年秋，杜聿明在廣西界首地區舉行大規模的師攻、防、追、退演習。軍訓部長白崇禧、訓練總監徐庭瑤親臨視察，影響頗大。徐庭瑤看過演習激動地說：「現在我可以告白天下了。國家創建這支機械化部隊沒有白花錢；我荐舉了第五軍軍長，沒有看錯人。」

激戰崑崙關

位於南寧東北的崑崙關，是西南國際交通線上扼邕（南寧）賓（賓陽）公路的雄關，地勢極其險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一九三九年夏，日本侵略軍開始在我南海地區集結兵力。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領南寧，十二月十四日，進占崑崙關。為此，蔣介石決定動用四個

集團軍的兵力進行一次以收復南寧爲目的的會戰，擬首先克復崑崙關，並把攻關任務交給杜聿明的第五軍。

十二月十六日，戰鬥打響之前，杜聿明召集團長以上軍官會議，宣布作戰計劃。他深知，這次戰役之勝負，關係到會戰的全局，更關係到他第五軍的前途。他說：「第五軍是抗日戰爭中新建立的第一個機械化部隊。我相信全軍將士一定能勇敢善戰，勝利地完成這次攻堅任務，一定要抱『不成功必成仁』的決心，殲滅日寇，收復失地！」大家一致舉手宣誓，定要完成任務。

崑崙關守敵是日寇最精銳的坂垣第五師團所部號稱「鋼軍」的第十二旅團。杜聿明分析了雙方態勢，決定採取戰略上迂迴、戰術上包圍「關門打虎」的作戰方案，又根據敵我態勢的變化，及時調整了作戰布置，採取要塞式攻擊法，加強側翼攻勢，一口一口地吃掉敵人，對日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但日軍殘部憑著「鋼軍」的武士道精神和優勢地形，頑強抵抗。每天以空投糧彈，甚至空投少量士兵來維持戰鬥。敵中村正雄旅團長親至九塘督戰，被當場擊斃。經過十數天血戰，負隅頑抗之敵被最後消滅。

崑崙關一戰，日軍損失極爲慘重，第十二旅團班長以上官佐死亡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餘人。中國軍隊還繳獲了大量戰利品。這是第五軍空前的大勝利。

崑崙關戰役捷報傳出，舉國歡騰。在一片歡呼和讚揚聲中，杜聿明十分謙虛審慎。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有一點是需要著重宣傳的，那就是強調本軍是民衆的武力，民衆是本軍的父老。本軍的勝利，其實也就是民衆的勝利。」爲了悼念陣亡將士，他在巍峨的崑崙關上，建立了一座「陸軍第五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含著熱淚親筆楷書了四百多字的悼文。

然而，他的路並不總是寬闊平坦的。崑崙關戰役後不久，杜聿明就經歷了一次不堪回首的慘敗！

遠征緬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兵陷泰國，直逼緬甸。英國感到威脅，遂醞釀與中國聯合作戰，作爲第一步，成立了「中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杜聿明作爲考察團重要成員，參加編寫了考察報告書。一九四二年初，當日軍輕取毛淡棉，逼近仰光時，英國慌了手腳，請求中國速派軍隊入緬參戰。三月，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正式成立。蔣介石任命杜聿明爲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之職，率第五、六軍遠征緬甸。根據當時協議，遠征軍在中國設立中國戰

區，蔣介石爲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將軍史迪威爲參謀長，所有軍需美國供給。

杜聿明奉命到達緬甸後，根據所獲情報，決定集中兵力，利用毛奇公路重鎮同古之有利地形，擊破日軍，進而協同英緬軍收復仰光。這個被稱作「同古會戰」的計劃得到了史迪威的批准。當然杜聿明真正下決心施行是在得到蔣介石的批准之後。他滿懷信心地期望著在把「攻必克」三個大字刻在崑崙關之後，再把「守必固」三個大字埋在色當河。然而由於整個戰役缺乏配合，守同古的第二〇〇師孤軍奮戰，連續戰鬥數日，英方卻有意延誤運輸，使二〇〇師補給中斷，糧彈兩缺。而同時東路我第六軍，西路英緬軍正與敵展開激戰，無力分兵增援。如果曠日持久，第二〇〇師可能被殲滅，整個遠征軍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杜聿明決心令二〇〇師突圍，又遭史迪威反對，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杜聿明通過電台向在重慶的蔣介石報告同古戰況和他的主張。蔣介石卻要他「絕對服從史迪威將軍指揮」，在這關係到第二〇〇師乃至整個遠征軍存亡的重大問題上，一向不說硬話的杜聿明也只好直言不諱了：「這二〇〇師不是美國人的，而是中國人的。……」蔣介石沉默片刻，終於回答：「撤就撤吧，反正沒有軍隊，也就無所謂武器不武器了……」這樣，杜聿明沒有理睬史迪威的意見，命令二〇〇師撤出了同古。

同古棄守，仰光未能收復，日軍得以向我軍後方長驅直入。遠征軍所面臨的局勢更加困

難。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又派羅卓英爲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而羅的到來，不但沒有使杜、史的矛盾減輕，反而由於他對史的唯命是從，雙方矛盾更加不可調和。

四月，蔣介石再度入緬，視察戰況。六日，親自到梅苗部署平滿納會戰，並叮囑杜聿明要服從史迪威和羅卓英的命令。平滿納會戰放棄後，史迪威、羅卓英準備在曼德勒組織新的會戰。命第五軍和後到的第六十六軍分布在長達三百餘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杜聿明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羅卓英連發四道命令，急令杜聿明向曼德勒集結。杜聿明不得不將已經攻克之棠吉放棄。於是日軍重占棠吉，直取臘戍。從而截斷了曼德勒準備大戰的中國主力軍後方。而當羅卓英下達曼德勒會戰命令的時候，西路英軍已全部撤走。日軍向曼德勒回竄，會戰即成泡影，緬甸戰局巨變，遠征軍已無力再戰。

這期間，史迪威和羅卓英丟下部隊隻身逃往印度，並電令部隊全部向印度方向撤退。爲了不使自己的軍隊成爲流亡外國受美國人控制的軍隊，杜聿明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向國境撤退。第五軍撤退所經之處，到處山巒疊嶂，古樹擋道，青藤纏身。又逢雨季，大雨瓢潑，連日不絕。參天大樹，遮天蔽日。螞蝗蚊蟲比比皆是，瘟疫四處蔓延。死亡累累，慘絕人寰。杜聿明本人也患了回歸熱，兩天兩夜不醒人事。就在這險惡的歸途中，曾跟隨杜聿明多年的二〇〇師師長，年僅三十八歲的戴安瀾將軍壯烈犧牲。他是我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出國作戰

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正式作戰中未損失團長以上將領，撤退中竟損失四人之多，就只第五軍有一萬多人暴屍荒野，慘死他鄉。堪稱國民黨軍隊精英，滲透著杜聿明無數心血的第五軍，曾幾何時竟到這步田地。杜聿明滿面淚水回到中國。

杜聿明到重慶見蔣介石，他檢討緬甸的失利，請求按軍法處置。蔣介石原諒了他：不能怪你，不能怪你，第五軍全軍將士浴血奮戰，整個世界都是知道……。杜聿明得到的不是懲罰，而是升任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蔣介石要杜聿明爲他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

剪除龍雲

龍雲是赫赫有名的「雲南王」。從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任命爲雲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起，集全省軍政大權於一身，統治雲南十幾年。抗戰前，蔣介石忙於反共內戰，對龍雲雖心懷疑忌，但又鞭長莫及。抗戰爆發後，雲南成了抗戰的後方基地，蔣想乘機統一雲南，龍雲則處處戒備。當入緬遠征軍進入雲南後，一切軍政事宜均與龍雲有關，矛盾時有發生，美軍也怨聲迭起。對蔣介石說來，鏟除龍雲已經成了他一塊非治不可的

心病。他知道龍雲不會坐以待斃，爲免除後患，必須選派對自己絕對忠誠的得力幹將暗中進行。經過反覆考慮，他終於選中了杜聿明。

杜聿明作爲昆明防守總司令，既要完成「捍衛西南戰略要點」的重任，又要搞好與「雲南王」龍雲和美軍兩方面的關係，更要伺機完成蔣介石的特殊任務。他首先對龍雲表面親熱，凡與龍雲有關的事，無不請示匯報，禮數周全，漸漸取得了龍雲的好感和信任。對龍雲的左右重臣，杜聿明也廣爲結交。這些活動，引起人們紛紛議論，甚至有人向重慶揭發控告。杜聿明深感日子難過，專程飛重慶面謁蔣介石，痛陳在昆明所作所爲的苦衷，又要求免職。蔣介石聽了不僅毫無愠色，反而撫慰再三，立刻叫侍從開了一張巨額支票送給杜，令杜速回昆明，安心履行原任務，杜聿明心領神會。

一九四五年春，蔣介石電召杜聿明到重慶，向杜說明了要解決龍雲，並囑杜：「要守秘密，要慎重。」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蔣介石電召杜聿明到重慶面授機宜，開始對龍雲這個「搬不倒」下手。杜聿明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假借解除日軍武裝爲掩護，暗中進行解決龍雲的軍事準備。與此同時，表面上對龍雲推崇備至的蔣介石開始施行調虎離山之計。他先令盧漢率第一方面軍的三個軍進入越南對日受降，接著，又把龍雲留在昆明的子弟兵其長子龍繩武的部隊也調到越南。這樣一來，龍雲在昆明只剩下他的二兒子龍繩祖的憲兵團和警衛營。

一切準備就緒後，九月十九日，蔣介石秘密下達了免去龍雲本兼各職、任命他爲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的命令。九月二十九日，杜聿明發布行動命令，封鎖交通、電訊。三十日凌晨五時，各部隊到達進攻位置，將軍委會命令送交龍雲各部。除一部分憲兵大隊稍事抵抗外，其餘都摸不著頭腦地舉手投降，僅五十分鐘，就乾淨利索地解除了除五華山之外的龍雲全部軍警憲武裝。驚慌逃奔五華山的龍雲急忙發出「戡亂」電報，哪知已成甕中之鱉。三十日中午，杜聿明發布安民告示，局部恢復昆明秩序。同時對西南聯大暗中戒備，以防龍雲的反抗和西南聯大師生的民主運動結合起來。當了解到由於市場關閉，西南聯大師生伙食發生困難時，立即派人送米送麵，「問寒問暖」，籠絡人心。杜聿明以其周密審慎的指揮出色地完成了蔣介石的重託。龍雲最後終於在行政院長宋子文的親自勸說下，離開五華山，離開他稱雄多年的獨立王國，來到重慶。

杜聿明爲蔣介石除掉了心病，卻得罪了龍雲。龍逢人就罵杜「蔑視國法、背叛長官」。十月十四日，蔣介石召見杜聿明，以勝利者的姿態饒有興致地詢問了解決龍雲的經過，然後「推心置腹」地對杜說：「你解決龍雲對國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龍雲。你應該爲國家背過，任勞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的命令，以後再任你別的職務。」杜聿明深解蔣意，慨然言道：「只要於國家有利，個人不計較任何名義地位。」蔣介石對這個「識大

體、明大義」的學生深表嘉許。十月十六日，《中央日報》頭版頭條登載了蔣介石的命令：「杜聿明在雲南處理失當，著即撤職查辦。」杜聿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撤了職」。

搶占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蔣介石為準備內戰，瘋狂搶奪戰略要地。作為全國重工業基地的東北成為蔣軍奪取的首要目標。八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宣布成立東北行營，熊式輝任行營主任，而在西南被「撤職」的杜聿明這時又被派到東北，坐上了保安總司令長官的交椅。杜聿明受任艱巨，深諳蔣介石的用意。還在昆明時，他即電蔣建議：「國軍這次接收敵占區，在解除日寇武裝的同時，請令大軍所至各地，將共產黨的武裝游擊隊一律肅清，以消除今後建國後患。」隨著蘇軍撤走，和平接收東北已成泡影。蔣介石根據杜聿明擬定的勾結美軍以武力控制東北的意見，決定抽調中央精銳部隊，由海、陸、空三路進入東北，實行武裝占領。杜聿明就是這場戰後大劫收的直接指揮者。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聿明率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向東北進攻，很快進占山海關，並先後占領綏中、興城、錦西、葫蘆島、錦州等戰略要點。蔣介石連電嘉獎。杜聿明按照蔣介

石密電指示，又於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停戰令生效前搶占了平泉等地。

正當杜聿明一路順風之時，突然得了腎結核，不得不施行手術。他保荐了第三方面軍副司令官、他的黃埔老同學鄭洞國爲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代行長官職務，才放心地離開東北。住院期間，忽然傳出東北要換人的消息，杜聿明如坐針氈，硬要出院返部。這時，蔣介石已派范漢杰到東北準備接替杜聿明，一種失寵之痛襲上心頭。四月中旬，東北一些將領紛紛來電要杜返部主持大計。蔣介石得知杜已有所恢復，致電杜聿明：「望速指揮所部收復東北領土主權，有厚望也。」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杜聿明帶著「厚望」，拖著尙未痊癒的身體返回東北。

杜回到東北，首先進占瀋陽門戶本溪，繼而占領四平街，接著又占領了長春和永吉。到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由於戰線過長，已感兵力不敷使用。六月六日，蔣介石明令東北國民黨軍停戰半個月，藉以緩和輿論的譴責和軍事形勢的困境。

在停戰令下達同時，蔣介石派專人給杜聿明送來兩個文件。第一個說，在北平三人小組中得到中共秘密文件，其主要內容是：中共和談是爲拖延時間，爭取主動，準備反攻，並藉機削弱國民黨實力，讓國民黨裁軍，不讓國民黨統一整編。詭稱：「文件是打進北平三小組的特務搞來的，華北和南京都不便發表，以免暴露。」杜看了文件認爲，這既可以此誣蔑中

共，又可誇耀他收復長春的戰果，當即予以發表。第二個文件是一幅預定同中共在東北地區整編軍隊的示意圖。這份圖上，將共軍限制在佳木斯、齊齊哈爾等幾個中小城市，而國民黨軍則遍布各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杜明白這是蔣介石想藉整軍的幌子消滅解放軍。盡管他認為這是很難做到的，但仍煞有介事地在長春接見中外記者，「義正詞嚴」地發表聲明說：「停戰令下達後，國軍已遵令在東北全面停止戰鬥，而共軍不遵守停戰命令，現正集中兩萬餘人向拉法國軍進攻。如果共軍在停戰期間，不遵守停戰協定實行整軍的話，國軍將於半月後繼續接收東北領土。」談話發表後，蔣介石又假惺惺地來電責備杜聿明。同時又命杜聿明「嚴飭所屬……應加緊整訓部隊準備接收東北領土。」兩人一唱一和，十分默契。

停戰期滿，國共談判破裂。杜聿明懷著搶奪整個東北的野心，制定了南攻北守的作戰原則。人民解放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杜捉襟見肘，難以招架，接著東北解放軍起了強大的攻勢，國民黨在東北的處境每況愈下。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東北國民黨軍被殲滅八千二百餘人，喪失縣以上縣城四十餘座。殘存的長春、四平、瀋陽等幾座孤城已如漂浮於狂濤之上的幾葉危舟。一年前還躊躇滿志的杜聿明，這時卻一籌莫展，以致憂鬱成疾，不能視事。電請蔣介石准其離職治病。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垂頭喪氣地離開了東北。

杜聿明在上海治療一個時期後，本擬去美國治病，終因蔣介石的堅持，爲了「黨國」的

前途，杜聿明終於退掉了去美國的機票，讓自己心愛的女兒隻身飄洋過海，十幾年後才得重逢。

臨危受命

一九四八年，國共雙方已進入最後的決戰時刻，剛剛出院的杜聿明即被任命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長官。然而，蔣介石的信任與重用帶給他的並不是榮譽，而是更加慘重的失敗。九月，杜聿明上任伊始，號稱金湯之固的濟南陷落，給了他當頭一棒。十月十五日，正當杜聿明窮思急慮，向華東野戰軍發動攻擊時，蔣介石忽然來電要他速到東北。原來自杜聿明離開東北，陳誠接替熊式輝，東北大部地區失守，十萬多蔣軍被殲滅。蔣介石只好將衛立煌拉出來頂替陳誠作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匪」總司令。衛要固守瀋陽，蔣介石卻要將主力撤至錦州，雙方僵持不下。錦州的范漢杰連電乞援，衛立煌卻按兵不動。眼看大勢已去，惱羞成怒的蔣介石才急調杜聿明來東北。就在蔣衛為如何保錦州爭論不休的時候，十六日，錦州失陷。東北的大門被關閉，蔣軍已成甕中之鱉。不久鄭洞國部放下武器，長春解放。這前後，蔣介石曾召集衛立煌、杜聿明等在瀋陽、北平兩次開會，蔣介石

堅持收復錦州，無人附和，一向理解蔣介石的杜聿明也緘口不語。眼看東北全盤皆輸，蔣介石認準確保錦州就是勝利。實際上，杜聿明已經看出蔣已決定放棄東北，但爲顧全個人尊嚴和影響，希望有人代他受過。杜聿明體察蔣之隱衷，提出兩個方案，其中之一是：以營口爲後方，用一部守瀋陽，主力由廖耀湘率部隊從南部進擊大虎山、黑山，成功則進而收復錦州，失利即逐次退向營口。蔣介石馬上表示同意。

面對殘局，誰能替蔣介石承擔這失敗的責任，杜聿明成了較爲合適的人選。十月二十日，蔣介石召見杜聿明，要他去接衛立煌。杜反覆申述收復錦州凶多吉少，甚至會有全軍覆沒的危險。蔣介石主意已定，斷然說：「我已決定要你到東北去，你應該聽我的命令。快去接衛的事。」杜聿明只好服從，但要求優先補充兵員和裝備，蔣一聽揮拳大喊：「爲什麼共匪能打游擊，就地籌糧籌餉，而我們黃埔學生不能？」杜聿明以從未有過的勇氣申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何況學生不是巧婦。」蔣介石氣得面紅耳赤地罵：「你們黃埔學生都不服從我的命令，懦怯怕匪，這樣子我們要亡國滅種！」杜聿明同蔣介石發生了有生以來一次最嚴重的爭吵。

十月二十日午後，蔣介石召集傅作義、衛立煌和杜聿明再次開會，決定全力收復錦州，並說：「光亭去指揮，我相信收復錦州是有把握的。」當晚，蔣介石明令發表杜聿明爲「東

北「剿總」副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的命令。杜聿明懷著無以名狀的悲悽回到東北，下達了收復錦州的命令。結果廖耀湘兵團在瀋陽至錦州途中被人民解放軍全殲。

當廖兵團電訊全無之後，蔣介石於二十七日派專機接杜聿明到北平。他沒有責怪杜，卻語態和緩地問杜：「你看怎麼辦好？」杜聿明認爲目下只有趕快撤退營口的部隊。蔣介石趕緊派人備船，並叫杜聿明回瀋陽協助衛立煌，部署瀋陽防務。跟隨蔣介石多年的杜聿明，此時此刻感到他悲哀可憐至極，決心完成校長在東北最後的使命。

杜聿明回到東北計劃撤退營口、葫蘆島軍隊。十月三十日，蔣介石派專人送給杜一封親筆信：「瀋陽秩序混亂，你馬上到瀋陽找周福成將防務調整好，再回葫蘆島。」杜聿明明知瀋陽無可挽回了，但還是不顧危險前往瀋陽。可是，他卻無法降落。

杜聿明按照蔣介石命令，布置東北戰場殘存的一點兵力從葫蘆島撤退。直到最後一批船到齊，杜聿明才登機逃往北平。遼瀋戰役以蔣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淮海被俘

離開東北一到徐州，杜聿明首先聽到的是黃百韜兵團被圍的消息，一種從未有過的末日

來臨的恐懼直襲心頭。面對江河日下的破落局面，身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的杜聿明曾想稱病出走，但轉而又想，東北解放軍即將入關，共產黨不久就要一統天下，自己大半生追隨蔣介石的「事業」已面臨無可挽回的失敗，於是，他硬下心來，等待著命運的安排。

杜聿明試圖穩定華中戰局的第一個目標是解黃百韜之圍，結果付出了巨大代價，黃百韜兵團還是被全殲。黃百韜兵團的敗亡，使徐州處於極為孤立的地位。為增援徐州，蔣介石命令豫南的黃維兵團向宿縣進攻，結果黃維兵團又在雙堆集被團團包圍。杜聿明對此提出方案：讓黃維堅守，牽制人民解放軍，徐州部隊撤出，再經永城南下到淮河附近解救黃維。蔣介石當即表示同意。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杜聿明指揮徐州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慌張張撤出了徐州。

正當各部隊向永城前進時，杜聿明忽然接蔣空投親筆信，讓杜停止向永城前進，直解黃維之圍。蔣介石又變掛了。開戰以來，蔣介石忽東忽西、搖擺不定，致使幾個主力兵團一個被殲，一個被圍，剩下這幾股還如此疲於奔命。剛剛向南走了半天，晚上又接國防部正式命令，要杜迅速解決濰溪口、馬莊之敵。此時的杜聿明已陷於逃跑已晚，打亦無望的境地。

就這樣，杜聿明所部三個兵團左拐右拐被包圍在永城東北青龍集陳官莊地區。孫元良兵團企圖突圍被全殲。邱清泉、李彌兩兵團包圍圈越縮越小。杜聿明迭電蔣介石，催促調兵決

戰。蔣介石覆電無兵可調，要杜不要存有幻想。此時，二人雖心照不宣，但都十分清楚：華中完了。

十二月十六日，黃維兵團被全殲。人民解放軍按中央軍委布置，為配合平津戰役，對杜聿明殘部暫不作最後解決。杜聿明部被圍期間，斷草絕糧，飢寒交迫，陷入了絕望的深淵。經常有整連整排官兵投降人民解放軍。杜聿明不想臨戰脫逃。陳毅將軍曾派人給杜聿明捎信，信中質問杜聿明「爲什麼替四大家族服務，而不爲人民服務？」杜當時還不曉得何謂「四大家族」，但「爲人民服務」卻似有啓發。他心中一動：如果能保全兩個兵團部隊的話，也可以同意投降。但邱清泉要頑抗到底，杜聿明也未敢暴露自己的想法。十二月二十九日，空投下來的報紙上刊登了人民解放軍公布的包括杜聿明在內的四十三名戰爭罪犯的消息。杜聿明明白，這是蔣介石要他死拼了，戰犯還有何生路呢？蔣介石還會來電：「聽說吾弟身體有病，如果屬實，日內派機接弟回京醫治。」杜覆電表示：「生雖有殘疾在身，行動維艱，但不忍拋棄數十萬忠勇將士。……生一息尚存，誓爲鈞座效忠到底。」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蔣介石言和平，杜聿明這個一貫主戰的人，被共軍打得垂頭喪氣，也覺得只有和平才有一線生機。可沒過幾天，一月三日，蔣又電令突圍。杜聿明審度當時的狀況，認爲坐戰車一個人逃走還有可能，但他怕遺棄官兵，聲名狼藉，遂決定繼續守下

去。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杜未曾看到，但在當時即使看到，要全部放下武器，僅保證生命安全，他也是不會投降的。一月五日蔣介石下了最後突圍的命令，杜聿明還想拖延。可是六日中午，人民解放軍發起猛烈攻勢，杜所屬部隊鬥志全無，一觸即潰，情況萬分緊急。九日晚，各部分頭突圍，杜聿明帶著副官、衛士十餘人離開大隊人馬單獨行動。天亮時行至張老莊被人民解放軍俘虜。

(葉民)

【第十五章】

蔣家鷹犬戴笠

一九二六年，戴笠帶著老頭子黃金榮的推荐信，登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去投考黃埔軍校。

這位無精打采的賭徒，幾年之後，卻飛黃騰達，成爲有中國「希姆萊」之稱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蔣家王朝的催命判官。

家道中落

戴笠，字雨農，小名春風，又名子佩，號芳洲，學名徵藍，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生於浙江省江山縣硤口鎮一個破落地主家庭。戴笠幼年在硤口鎮讀私塾時，即染上賭博惡習。他十六歲考入浙江省立一中，不到三個月就因偷竊被開除學籍。十八歲與江山鳳林鎮地主毛應升的女兒結婚。

因賭博騙錢，戴笠常遭索債者之打，已難以在缺口立足，最後騙取了當地農村婦女編織的一批麥桿製品充做路費，混入浙軍周鳳岐第三師當兵。以他的逍遙放蕩成性，何能接受軍紀的約束。他白天在軍管訓練，晚上熄燈號一響，就悄悄越牆逃出兵營去賭博，雖常受懲處，卻結識了一批流氓幫會朋友。不久，他就到上海拜大流氓黃金榮為老頭子，過起了「打流生活」。後經黃介紹，並得到缺口毛同順布店老板資助，赴廣州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經三個月訓練，入騎兵營當學生，駐紮在廣州郊區沙河燕塘。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開始了「清黨」。戴笠常向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告密，致使許多進步同學入獄。六月，騎兵營先後移駐南京、蘇州，戴笠因藉伙食採買之便貪污公款，引起同學公憤，被開除學籍。

特務生涯的開始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宣布下野，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回奉化溪口小住後，於次年十月抵達上海，準備赴日。與後來的引退不同，蔣第一次下野時羽翼尚未十分豐滿，心情頗為惆悵，但卻在上海遇到了一個在危難之際仍忠誠於自己的學生戴笠。原來，

戴笠離開廣州後，又回到了上海。以打流爲生，住在一個經營小生意的表哥張冠夫家，晚上睡在地板上，還常遭表嫂的白眼。他聽說蔣介石到了上海，感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便每天到其住所擔任「警衛」，並告訴蔣他是校長的「學生」，來保衛「校長」的安全。蔣介石十分感動，對這個身材矮小的「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舊中國政治風雲瞬息萬變。一九二八年初，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重新恢復了總司令職務，並擔任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戴笠也在蔣的身邊，當了一名正式的侍衛隨從，他藉助於失業的黃埔學生，開始搜集情報，將這些情報寫好，託廚子或警衛代轉蔣介石，或在總司令部門口，等到蔣的汽車一停，便呈遞上去。開始，蔣介石並沒有太重視，後來發現情報頗有些價值，便親自召見戴笠，並發給每月活動費三千元，進行情報活動，約定由機要秘書毛慶祥代轉。

一九二三年冬，唐生智於河南鄆城舉兵反蔣。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前往行刺，在鄭州車站被發覺包圍，被唐部下周偉龍藏入兵營內，才得以逃往漢口。次年，戴笠在蔣介石支持下，糾集了王雲木、唐縱、張炎元、徐爲彬、胡千秋、周偉龍、黃雍、馬策、鄭錫麟等十人，成立了一個特務小組「調查通訊小組」，以戴笠爲組長，這就是後來「軍統」特務組織的前身「十人團」。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奉軍張學良在關鍵時刻舉兵入關，使戰局發生急劇變

化。閻錫山派孫連仲的快速騎兵師，包抄設在野鷄崗的蔣介石總司令部。多虧戴笠事先偵得情報，蔣才得以轉危爲安，並對特務組織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體會。

特務系統初具規模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導致東三省迅速淪陷。全國上下抗日呼聲此伏彼起。蔣介石受到國民黨內的壓力和全國各階層的憤怒抨擊，不得不準備再次引退。此時，國民政府軍事、政治、財政大權雖已由其親信所把持，但蔣介石仍不放心。十一月，他召集黃埔學生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鄭介民、戴笠等十餘人開會，表示國難當頭，外有日本侵略，內有共產黨「搗亂」，「革命」快要失敗了。戴笠與賀衷寒等人心領神會，立刻積極行動，終於在年底蔣下野後，成立了秘密擁蔣組織——力行社。蔣介石自任社長，社內組織形式採取集權制，只服從社長一人，每周由蔣在官邸召開聯席會議一次，親自講解「力行哲學」。次年三月蔣介石重新上台後，戴笠又和劉健群向蔣介石建議，成立了「復興社」，以蔣介石爲社長，賀衷寒、鄧悌爲常務幹事，周復爲組織處長，康澤爲宣傳處長，戴笠擔任了特務處處長。「力行社」和「復興社」

的出現，標誌著蔣介石在走向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過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之前，國民黨內雖多次出現政見分歧和派系衝突，尚無忠於私人的秘密特務組織。「力行社」、「復興社」採取法西斯組織形式，以忠實蔣介石個人為職志，孕育了「軍統」特務組織的雛形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戴笠擔任「復興社」特務處處長以後，有固定的活動經費和組織名義，結束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局面。他以南京明瓦廊中央軍校畢業生同學會通訊處和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為聯絡機關，操縱「復興社」在各省的特工幹事，利用組織關係，廣泛搜集情報。

同年夏，航空署長徐培根縱火燒毀南昌飛機場案發生，當時任委員長侍從秘書兼南昌行營調查科長的鄧文儀事先防範不力，事後敷衍包庇，戴笠詳查後予以揭露，並接收了南昌調查科下轄的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行轅調查科，以及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陝西等地的保安處諜報股和鄧文儀手下的一批特務骨幹。從此戴笠特務系統滲入了軍事機關和地方保安機關。

為適應特務組織日益發展的需要，培訓特務骨幹，一九三二年夏，戴笠被蔣介石派為浙江省警官學校特派員，率領毛人鳳、王孔安等十幾人進駐警校。他以王孔安為政訓處書記長，毛人鳳為秘書，毛宗亮為譯電員，趙龍文為政治指導員，迅速掌握了該校的組織、人

事、訓練大權，並於次年成立了甲、乙、丙和電訊等訓練班，講授特工理論技術、國際間諜史話、情報學、兵要地理、秘密攜帶、痕跡學、密碼學、毒藥、麻醉、爆破、仿造、照相、手槍射擊、騎馬、汽車駕駛、國術、擒拿等課程，培養特務骨幹、交通掩護人員，蔣介石警衛組的便衣警衛人員和特務電訊人員。該訓練班培養出來的學生毛森、蕭勃、章微寒、樓兆雲等，後來都成爲「軍統」的高級特務。

在特務組織日臻完善，人員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戴笠報請蔣介石批准，把復興社特務處和南昌行營調查科合併，成立了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特務處，設機關於南京四條巷，並在國民黨統治區遍設區、站、組三級情報網，採用杭州無線電機製造所的五瓦特工機，在各地設秘密電台，採取「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方針，進行特務活動。特務處由戴笠任處長、鄭介民任副處長，下設情報科、行動科、特務隊。北京、上海、天津、武漢、重慶、香港等地都設立了特務站。

戴笠特務系統的迅速發展和粗具規模，是與蔣介石奉行的「安內剿共」政策分不開的。它適應了蔣介石排斥異己，獨裁專制的需要，初肇伊始就顯示出作爲一條鷹犬的特殊作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人提出抗日反蔣的政治主張，成立福

建人民政府。正在從事「剿匪」的蔣介石唯恐其與紅軍聯成一氣，立即於建甌設立行轅，親自指揮蔣鼎文、張治中、衛立煌率三路大軍進攻福建，並派飛機轟炸。戴笠爲了顯示自己的能量，也迅速趕到建甌，通過布置在十九路軍的特務，迅速了解到福建方面的軍事布置，向蔣介石做匯報，又派鄭介民爲策反組組長，張炎元爲副組長，率特務分頭潛入福建，分化十九路軍。通過收買參謀長黃強、參謀處長范漢杰，得到十九路軍密碼本，利用偵聽台，隨時掌握情況，蔣介石感到如有了順風耳，千里眼一般。由於「軍統」的密切配合和十九路軍內部的分化倒戈，次年一月蔣軍即占領福州，戴笠爲蔣剪除異己出了大力。

一九三六年五月，陳濟棠利用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聯合李宗仁，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實行抗戰，並於七月在廣州就任抗日救國聯軍總司令，李宗仁任副總司令，以實現其「南粵王」的夢想。蔣介石命陳誠、羅卓英率三十萬大軍包圍粵北，同時由戴笠與鄭介民攜巨款赴香港，通過朱家驊，利用中山大學天文台主任兼廣東航空學校主任張雲，與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取得聯繫，並派原上海娥娜舞廳紅舞女、「軍統」特務黃佩貞化名潛赴廣州，以色相誘黃上勾，允每架飛機以兩萬元收買。六月十三日，飛行員黃志剛等駕駛機投蔣。七月，陳濟棠八十二架飛機又從廣州白雲機場直飛南昌，飛機師、飛行員共一五〇多人全部投蔣。陳濟棠見大勢已去，被迫於十八日宣布下野，乘英艦逃往香港。蔣軍兵不血

刃平定廣州「叛亂」，戴笠立下頭功，得到蔣介石更大的寵愛。此後，他不需任何審批手續，憑一張字條，就可以直接在中央銀行領取大量特務經費，這是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都沒有の特權。

但是，戴笠覺得表演出色、得意的還是在「西安事變」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宋美齡、宋子文乘專機前往西安，隨行者除端納顧問，就只有戴笠一人。臨行前，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人員，涕淚交流地說，此去凶多吉少，要和委員長共生死，並帶了兩支左輪手槍，上滿子彈。到西安一見到蔣介石，即撲通跪在地上，抱腳痛哭，大罵自己沒有盡到保衛「校長」之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趕回南京，將「軍統」西北區區長王新衡等扣押，責其未盡職守，以示嚴懲。同時，遵照蔣介石的旨意，將張學良軟禁於南京陵園，並先後遷奉化溪口雪竇寺、黃山、萍鄉、貴州、陽明洞、桐梓天門洞、重慶中美合作所等地，一九四六年，又用飛機押往台灣新竹。次年春，楊虎城攜夫人謝葆真及幼子楊拯中由法國馬賽回到香港，住九龍半島酒家，旋應蔣介石之邀到達南昌。戴笠率同湖北省政府官員百餘人在車站迎接，將其軟禁在二緯路一號「軍統」特務機關，並先後囚禁於貴州息烽陽明坎看守所和玄天洞、重慶中美所。解放前夕，楊虎城將軍和他的秘書宋綺雲一家全部被「軍

「統」殺害。

在西安事變及善後處理中，戴笠確實表現了對主子的百倍忠誠，所以，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曾提及其名，並授與他「西安事變紀念章」一枚。這一直使戴笠引以為榮，並成爲他自吹自擂的資本。這次事變標誌著戴笠這個文則高中未畢業，武則黃埔被開除，既無資歷，又無戰功，甚至連國民黨黨員都不是的鷄鳴狗盜之徒已青雲直上，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西安事變」後不久，他患闌尾炎在上海宏恩醫院手術，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不僅常去看望，還叫姨太太天天燒飯菜送到病房。胡宗南、宋子文都親往探視。甚至宋美齡也特地代表蔣介石來醫院，並關照未完全痊癒，不准出院。這種寵幸，是國民黨許多出生入死的將領都不曾得到的，自不能不令戴笠感激涕零。

「軍統」惡性膨脹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決定加強特務統治，增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他認爲戴笠「軍統」的骨幹大多爲黃埔學生，搜集軍事情報、暗殺、綁票較爲合適，所以決定將陳立夫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一

部分交與戴笠，而使「中統」專在黨政部門和文化教育方面活動，以便各有分工側重。但一問戴笠何時入黨，黃埔幾期，才知其尙是「非黨人士」，黃埔六期也沒有畢業，便下手令追認他爲黃埔第六期正式生，並親自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由於戴資歷太淺，軍統局成立初期，局長一職乃由歷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兼任，而戴笠則以副局長名義掌握實權。軍統局舉凡組織計劃，人事調動，行政措施，情報活動等，都由戴笠一人獨攬，所以被特務們稱爲「老板」。

抗戰時期，蔣介石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實行獨裁專制，大大刺激了戴笠特務系統惡性膨脹。一九三八年八月，原特務處擴大爲局本部，以鄭介民、唐縱爲幫辦，張毅夫、毛人鳳爲主任秘書，設軍事情報、情報、行動、電訊、經理、人事、訓練、總務八處和司法室、技術室及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不僅在國統區各地，而且在美國、緬甸和港澳均設立了特務站。他以「抗日救國」爲幌子，誘騙大批流亡學生進入「軍統」，先後在臨澧、黔陽、息烽、重慶、蘭州開辦近百個特訓班，訓練特務二萬餘人，電訊人員五千多人，使「軍統」特務發展到五、六萬人，爲特務處時期的十倍，以至總務、人事兩處甚至難以統計出準確的人數。

一九四一年，李滋羅斯率英國財政金融考察團來華，向蔣介石建議開關稅源，增加財政收入。爲此，國民黨政府成立了財政部緝私署，以戴笠兼任署長。後因查辦林世良包庇走私

案而得罪了孔祥熙，孔令俊在宋美齡處大哭大鬧，蔣介石才不得已將其又調任戰時貨運管理局局長。戴笠利用所兼各職控制了軍令部二廳及附屬各機關、各部隊的軍事情報網、十二個戰區的長官部調查室和部分集團軍總部調查室、軍法執行總監部調查室和東南分監部調查室、各省保安處情報網、部分省政府和行署調查室、內政部警政司和民政廳警政科、各省市警察局，幾乎無孔不入。

一九四一年，由「軍統局」電訊處長魏大銘主持的「特科技術研究室」利用日本空軍俘虜日信三等入，偵聽日本空軍電訊往來，發現日本有偷襲美國珍珠港的意圖。戴笠向蔣介石報告後，立即通過駐美特務站站長蕭勃、駐美使館武官郭德權轉告了美方。但美國佬狂妄自大，瞧不起中國情報機關，甚至認為這是在破壞美日關係。結果日本空軍在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成功，美軍由於全無防範，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滅，長期喪失戰鬥力。這時，美國的一些將軍才想起中國的提醒，轉而要求中美情報合作。蔣介石當時正利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機會爭取英美的支持，聽了戴笠的報告喜出望外。不久，蕭勃陪同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到重慶協商，並於一九四二年底在重慶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由戴笠任所長。次年五月，羅斯福私人代表、美國《生活雜誌》發行人魯斯來華，正式與中國外交次長胡世澤簽訂了合同。美國方面向該所提供十輪大卡車五百輛，吉普車約一百輛，戰馬三百匹，警犬五

十條，並分別在重慶、衡山、息烽、建甌、修水等地設立了中美訓練班，由美國情報教官幫助軍統局訓練情報、行動和武裝特務。蔣介石對於中美的「合作」十分滿意。《中央日報》也不斷發表文章，大造輿論。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戴笠和梅樂斯藉口去東南視察，帶著蓋有調查統計局關防的空白公文紙和軍委會空白委任狀數百張，率特務骨幹多人分乘六架飛機前往上海、南京。由於許多軍統特務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又有杜月笙等地頭蛇配合，所以戴笠率先占洋房、搶汽車、侵吞敵偽資財，大搞「五子登科」。使國民黨在「劫收」中心喪盡。

抗日戰爭勝利後，內戰與和平，民主與獨裁的鬥爭十分激烈。一九四六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中共聯合民主黨派提了各反對內戰、和平建國的方案，並一致要求取消特務機構。國民黨一些元老不滿於「軍統」的飛揚跋扈，陳誠等少壯軍人也感到「軍統」有損「黨國形象」，一些地方派系則慮於這隻鷹犬咬人，所以紛紛向蔣提出特務機構過於龐大，應考慮取消或縮編。「軍統」在抗戰中，全靠投機倒把，敲詐勒索發國難財維持，戰後失去生財之道，這筆龐大的開支很令蔣介石頭疼。更重要的是經過抗戰，蔣的國際影響已足使他穩居統治地位，所以也感到「軍統」有縮編的必要，遂令毛人鳳急電戴笠返渝，研究對策。戴笠

這時已預感到「軍統」前途不妙，便起草了一個全國建警計劃，請求成立全國警察總監部，由他出任總監。但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得到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支持，也在窺視此位，並先行一步，初步得到了蔣的首肯。戴笠得到蔣介石身邊特務的報告，坐立不安，急欲返渝，連秘書、警衛都沒帶，只與人事處長龔仙舫等人，乘坐北平航委會撥給的三二二號客機從北平飛抵天津。夜間接到上海方面氣象不好的預告，但他爲了爭取時間，赴滬參加其情婦胡蝶與丈夫潘友聲的離婚簽字式，以便與胡正式結婚，仍決定起飛，並令多帶汽油。上海不能著陸，便直飛南京。飛機師素知戴笠的意志不能違抗，只好冒險在次日上午九時起飛。機抵上海，大雨滂沱不能降落，又轉飛南京。南京也正下大雨，機場勉強同意降落，並派四架軍用飛機導航。但因雲層低，氣候惡劣，導航機與戴笠座機聯繫不上，與地面聯繫也受到障礙。十二點半以後，全部聯繫中斷。三二二號專機終於撞在南京江陰板橋鎮岱山一棵五丈高的大樹上，遺落一支螺旋槳，又連續擦過三個山坡，撞於山腰。一聲巨響，大火熊熊，全機十三人全部斃命，且經兩個多小時焚燒，面目難辨。

三月十七日晚，軍統局本部負責與戴笠聯繫的主任秘書毛人鳳沒得到其抵達滬寧的消息，急電各處查詢。軍統人員忙了一個通宵，也沒有查出戴笠下落。次日，毛人鳳急忙向蔣介石報告，蔣親自打電話到航委會查詢，得知曾到達上海，在南京上空失去聯繫，便立即指

示毛人鳳派特務乘飛機到解放區尋找，並寫了「無論何人，不許傷害戴笠，各軍政機關，地方政府如發現戴笠，應負責護送妥爲出境」的親筆手令，交給毛人鳳，讓尋找的特務帶上。但當日晚即得到報告：戴笠專機已墜毀南京板橋鎮。「軍統」特務趕到現場，屍體已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並被沖到困雨溝內。不久，國民黨中央社向國內外發布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因飛機失事身亡的消息，稱：「戴局長及其隨員七人遺體已辨認明確，運回南京城內，於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分別入殮。其餘屍首五具，除其中之一係戴局長之友人黃順伯，並由該局予以收殮外，餘係該機飛行員馮振忠等之遺體，已由航委會運回殮葬。」

蔣介石素以冷酷無情著稱，但對於戴笠的墜機身亡卻十分悲哀。一九四六年八月，他與宋美齡同到靈谷寺志公殿戴笠靈堂憑弔，半個月後，又在毛人鳳陪同下登上靈谷寺後山，以一個善觀風水的陰陽家的身分，爲戴親自選擇了墓地，國民黨衆多文武要員，生前得到蔣嘉勉信任的爲數不少，死後能得這種「殊榮」的，除了陳誠，恐怕只有戴笠一人。

（劉福祥）